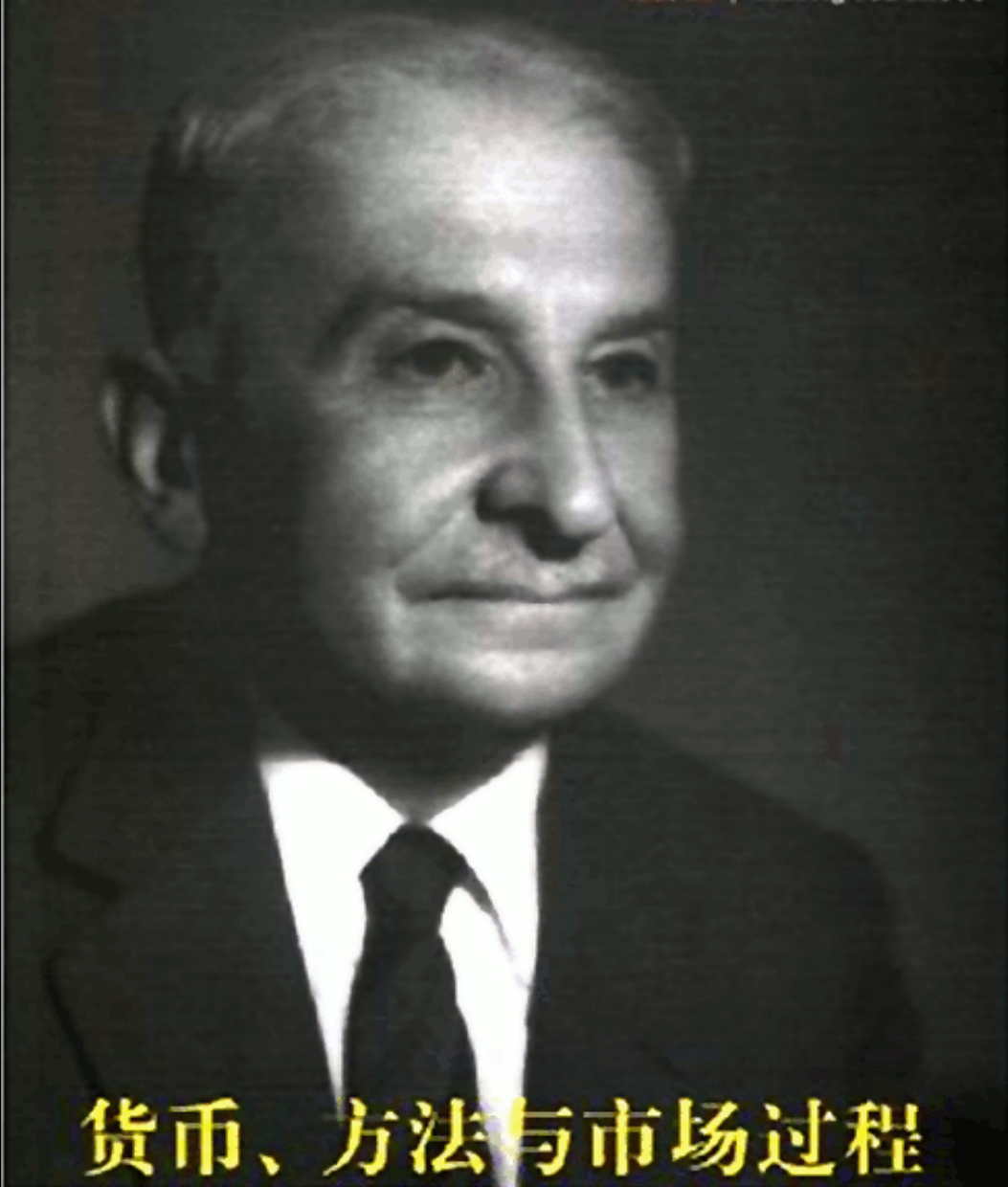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项目成果出版

Ludwig von Mises



# 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德】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著 施建宏 吕泽坤 译 钟今 校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玛吉特·冯·米塞斯 选编

*Ludwig von Mises*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Selected by Margit von Mises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M. Ebeling.  
1990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本由美国米塞斯研究所授权出版。

## 翻译说明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是奥地利学派发展史上的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本人对奥地利学派的诸多理论予以深化、发展、拓展，尤其是在经济学方法论、货币信用理论、比较经济制度分析等方面，这些使其跻身于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列。同时，正是他把奥地利学派带入美国，并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

米塞斯著作等身，最重要的著作（已有中文译本）包括：

《货币与信用理论》（*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mittel*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1912）；中译本，夏道平译，台湾银行经济编印，1967 年。

《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Die Gemeinwirtschaft: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Sozialismu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1922）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Liberalismus* [Liberalism], 1927）；中译本，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中译本，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人的行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 1950）；中译本，夏道平译，《人的行为：经济学研论》，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6 年。

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是由米塞斯的遗孀玛吉特·冯·米塞斯选编的，包含了米塞斯对自己认为重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几乎所有方面的探讨，是一本全面反映“米塞斯经济学”的读本。

不过，本译本没有译出原书第十六章 *A Hundred Years of Marxian Socialism* (1967)，而代之以米塞斯的另一篇文章《自由与财产权》。全书英文原版可在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网站上查阅 (<http://www.mises.org/mmmp.asp>)。

另外，为便于读者更详尽地了解米塞斯的主要思想，译者译出了米塞斯重要的学生、奥地利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穆雷·罗斯巴德的文章《米塞斯的精髓》，作为附录。

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戴忠玉翻译序言、第一到第十二章、第二十、二十一章，刘亚平翻译第十三到第十五章、第十七、十九章，秋风翻译第十六、十八章。姚中秋统校全书。

译 者

2007 年 3 月

## 补充说明

本书第十六章《马克思社会主义百年》根据网上资料还原，编改之十六章《自由与财产权》作为补充移至附录之后。另外原文中的注释与参引单辟出来移至最后。

本书仅供学习参考，不得随意散播及用作商业用途，如有能力请支持购买原版图书。

本电子书制作人

# 目 录

序言〔理查德·艾伯林〕	III
-------------	-----

## 第一部分 方 法

第一章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1942〕	2
第二章 社会科学中对“非理性”的处理〔1944〕	11
第三章 人的行为科学中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1962〕	28

## 第二部分 货 币

第四章 货币在经济财货中的地位〔1932〕	41
第五章 货币的非中立性〔1938〕	52
第六章 确定购买力变化的方法对于指导国际货币 与银行业政策的适宜性〔1930〕	60
第七章 德国大通胀〔1930〕	74
第八章 西尼尔关于货币问题的演讲〔1933〕	80

## 第三部分 贸 易

第九章 国际劳动分工的解体〔1938〕	86
第十章 自给自足及其后果〔1943〕	105
第十一章 经济民族主义与和平的经济合作〔1943〕	120

第十二章 不发达国家的困境（1952）-----129

第四部分 比较经济体制

第十三章 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1969）-----136

第十四章 平等和不平等（1961）-----146

第十五章 集团利益的冲突（1945）-----155

第十六章 马克思社会主义百年（1967）-----165

第十七章 俄国改革运动之观察（1966）-----181

第十八章 合作社运动之观察（1947）-----185

第十九章 当前经济学方法与政策之观察（1951）-----218

第五部分 思想

第二十章 学说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1949/50）-----225

第二十一章 自由的思想源自西方（1950）-----236

附录 米塞斯的精髓（穆雷·罗斯巴德）-----243

补充 自由与财产权（1958）-----269

注释与参引-----281

# 序 言

理查德·艾伯林

—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路德维希·冯·米塞斯<sup>[1]</sup>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杰出的经济理论家之一。F·A·哈耶克曾经说过，米塞斯对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核算的可能性之批判“对我这一代有最深刻的影响。……对于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读过他的《社会主义》一书（当这本书出版时）的人来说，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世界了”。<sup>[2]</sup>莱昂内尔·罗宾斯勋爵在 1931 年向讲英语的读者介绍奥地利学派在货币与贸易周期方面的文献时，强调“维也纳学派”的“奇迹般复兴”是在“米塞斯教授……的领导下”取得的。<sup>[3]</sup>霍华德·埃利斯在其对《德国货币理论》的详尽研究中，坚称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是“论述货币理论的德语文献中最为重要的论文之一”，还坚称米塞斯因在结束奥地利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成为风云人物。<sup>[4]</sup>弗里茨·马赫鲁普指出，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就我所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首先指出了因通货膨胀和奥地利政府的财政政策导致资本账户扭曲而产生的资本消费（consumption of capital）现象”。<sup>[5]</sup>詹姆斯·M·布坎南在研究经济学中成本理论的发展时，强调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 20 世纪 30 年代于伦敦经济学院得到详细阐述而在更近的年代由奥地利学派的最新一代加以深入发展的“主观主义经济学的首要发起者之一”。<sup>[6]</sup>

尽管如此，在战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米塞斯的著作在经济学



家中江河日下，即使他继续广泛地发表演讲，并在此期间出版了超过半打的书籍，在 1969 年以 88 岁高龄退休之前还在纽约大学正常执教。这种特殊状况的原因在于他的立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针锋相对。1945 年后，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家中几乎一统江山，以致只要任何人挑战当时的“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或政策建议，他差不多就是在体验知识分子的死亡之旅。尽管如此，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做的一切正是质疑和毫不妥协地批评凯恩斯学说的一切。结果，他几乎被完全地从经济学领域放逐了。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知识界的状况开始转变。紧随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可悲失败，对于凯恩斯理论体系之基本原则的怀疑也开始出现。当试图将凯恩斯的“真正意思”神圣化而完成的无数解释性读物面世时，学术性的自我批评也大量出现。不同的研究殊途同归，得出的结论是：凯恩斯的真正意思几乎包罗万象，取决于读他的哪一卷书以及在任何一本特定的书中的哪些段落得到强调。

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导致了经济学家中开放的、智力上的竞争，而这样的现象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就未曾见到了。在这场竞争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思想和他身为其中光辉一员的奥地利派经济学占据了显著位置。

## 二

1871 年，卡尔·门格尔之《经济学原理》<sup>[7]</sup>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奥地利派经济学的诞生。卡尔·门格尔通常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莱昂·瓦尔拉斯一道被奉为替代了古典学派及其劳动价值论的“边际主义经济学”之共同奠基人。然而，门格尔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对经济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使得他卓然区别于杰文斯与瓦尔拉斯。

这三人都掌握了边际效用的根本要义：价值依不同选择之间的相对比较而定，各个选择的重要性由决策者在边际上进行评估，边际也就是在选择中能够得到或必须放弃的下一个单位量的商品或服务。

然而，在杰文斯与瓦尔拉斯看来，边际效用概念的价值在于它在给定的交易环境中有力地展示了均衡的条件。另一方面，在门格尔看来，均衡纯粹是一个有用的限制性情形，这一情形描绘了在其

中不存在对于交易者的进一步激励的境况；在门格尔看来，边际效用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本身能使得对交易过程进行分析，而不论任何实际的均衡结果之具体表现如何。<sup>[8]</sup>

对于非均衡状况下的交易次序与过程的研究，必定会凸显关于不同的市场参与者掌握的知识、关于时间的作用（因为时间与涉及到变化的调整时期和生产时期有关）以及关于预期与预见（**expectations and foresight**）的形成（因为潜在的交易者试图预测将来的情况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引）等等的问题。

自杰文斯及瓦尔拉斯肇始的经济分析从根本上是静态性的，主要是想为均衡状态规定某种先决条件。与之相对，门格尔始创的“奥地利派”方式具有根本的动态特性，这使得它与这些年来其他思想学派区分开来。<sup>[9]</sup>

门格尔于 1871 年所奠定的基础在 19 世纪最后 20 年以及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努力中，有两位做出的贡献最值得注意，事实上，也正是他们使得奥地利派经济学获得世界声誉，他们就是欧根·冯·庞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庞巴维克将门格尔的理论扩展到分析资本理论的问题、利息的起源和形成过程的问题。<sup>[10]</sup> 维塞尔正确地理解了门格尔的洞见，即边际效用和价值评估是主观猜测，据此他证明了，成本也是主观现象，只不过是次优选择或当选择及交易发生时必须放弃或失去的机会。<sup>[11]</sup>

### 三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奥地利学派的贡献跨越 60 年，几乎触及经济科学的所有方面。米塞斯著作中最有争议的毫无疑问是专门讨论方法论问题的部分。尽管如此，这可能是他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米塞斯致力于为经济科学的整个体系建立哲学基础，这里的经济科学指的是自亚当·斯密对自发市场秩序的第一次分析始，到卡尔·门格尔有意识地运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重新阐述这一自发秩序的基本原理所形成的学科。<sup>[12] [13]</sup>

米塞斯在方法论上的耕耘事实上贯穿了他整个的研究生涯。他在这一主题上的早期研究成果，在 1933 年收入《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sup>[14]</sup>。这些成果得到进一步的精炼，被融会贯通于一本经济学

通论性著作中，也就是《国民经济》<sup>〔15〕</sup>（1940），英文版为《人的行为》<sup>〔16〕</sup>（1949）。并在《理论与历史》<sup>〔17〕</sup>（1957）和《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sup>〔18〕</sup>（1962）中得到重新阐发。

米塞斯认为，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分开来的独特因素是人类所有努力的目的性或者说意图性（**purposefulness or intentionality**）。人作为卓然在上的万物之灵，能够意识到可以改善自己命运的机会，并在认为环境有可能提供成功的机会时运用手段以达到目的。

米塞斯强调，目的性、对环境的察觉能力、对机会的敏感，都是只有人才拥有的特质，这些特质的具体内容取决于各人特定的视角、所处的环境和对事物的解读。因此，社会科学的出发点系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基础。一切社会现象，都是行动中的人的主观世界。自然法则和自然环境可能是人努力获取可能成就的极限，但是，正是人对可能的东西和能够获得的东西之察觉，才是触发人采取行动的探测杖。

在米塞斯的这一研究纲要中，我们也看到了主宰着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中的所有动态的因素：不完备的知识、时间与变化、预期与预见。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对于有目的的行动这个概念都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因为行动——指向已选定目标的有意识的行为——仅当其选择被认为有可能实现时才具有逻辑的意义。选择就是从众多可选机会中做出抉择，仅当对于未来的确定知识还缺乏时，选择才有实际意义。相应地，正如米塞斯所要强调指出的，时间、变化与行动是不可分离的，因为，采取行动的想法本身，就隐含着某事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

在分析时间与行动的关系或“可能达到的目的”与“可用的手段”之意义或成本（作为放弃的机会）与收益（作为心理状况改善的潜在收获）时所采用的方法论主观主义方法，导致米塞斯抛弃了他视之为实证主义的帝国主义，也就是将在自然科学中恰当的方法强行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做法。应用实证主义的“客观科学”原则，必定要求抛弃构成人类事件之独一无二的要素；必须将人类行动正确理解为从行动者的观点来看是有主观意义的事件。米塞斯认为，物理对象在个人之间的运动，之所以具有被赋予“交易”的性质，就是因为，行动者分别赋予了自己的行动及他人的行为以那种意义。

尽管如此，在米塞斯看来，拒绝将量度与量化作为社会科学的标准，并不意味着会陷入历史主义（Historicism），他也认为，在社会领域中，既没有法则也没有永恒的规律性。米塞斯认为，社会现象的法则在终极上派生于行动的逻辑（logicofaction）中，而后者本身与思想、理性的逻辑完全是一回事。倾向于使供应与需求达到均衡、使市场价格等于市场成本的市场过程，完全可以还原为一个逻辑，这种逻辑引导着可分别称之为“供应者”与“需求者”的不同个人之行动，这个逻辑的含义就是：任何特定手段的价值不应超过它们所服务的任何特定目的之价值。

这一点能够解释被人认为属于米塞斯特有的坚定立场：经济理论既是先验的，也在经验上为真。在米塞斯看来，它是先验的，因为行动的逻辑及它所需要的手段与目的、成本与收益等等范畴，从概念角度看，必定在思维中先于对任何具体的目的之选择和对任何具体的手段之应用，因此，也就先于指定某物为一物或另一物的活动。它之所以在经验上为真的，是因为，人的思想的这种逻辑不会考虑不在上述范畴内发生的有意识的人的行为，因此，它也就经验地反映了人的所有有意识的活动的根本性质。

尽管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可以用行动的范畴作为归档系统，来为社会领域的复杂性制订秩序，并对其予以清晰的解释，但这些范畴就其性质而言，仍然纯粹是一般性的（generic），也就是说，它们不能提供关于个人所选择的特定目的与手段的任何信息，也不能提供关于由一系列行动所产生的具体结果的任何信息。因此，需求与供应的“弹性”，以及价格、产出和预期的特定“调整速度”，都会依赖于历史的环境。在收入本文集中的《社会科学中对“非理性”的处理》一文中，米塞斯透彻地解释了这一点。

对于德国 1914 至 1923 年间的通货膨胀，我们掌握了充分的数据。经济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彻底掌握价格变化之原因的所有知识。但是这一知识并不能给我们数量上的明确性。经济学是……定性而非定量的。……在人的行为的领域，量值之间并不存在恒定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物价的上涨并非仅仅是银行钞票数量增加所造成的。其他变化也发挥了作用。由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军而不再就业于工厂，政府控制商业而导致生产率下降，封锁阻止了从海外的进口，工人营养不良，这一切都推动了商品供应量下降。用理解〔Verstehen，即解释性的“理解”〕以外的任何方法，都不可能确定这些因素——以及其他相关的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价格的上

升。……理解是在历史领域替代定量分析与量度的方法，后者是不适用于除技术领域之外的人类行动领域的。〔第19~20页〕

同样，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从本质上说，经济预测是试图充当“未来的历史学家”的一种努力。<sup>〔19〕</sup>这是一种努力，试图设想自己置身于未来，预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市场参与者如何将不同的实体区分手段或者是目的；他们对于最有利的行动进程，将形成什么样的预期；然后再来分析不同个体的计划在社会领域相互碰撞而产生的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的结果。<sup>〔20〕</sup>

米塞斯经济科学的贡献就在于，他一直试图将这种方法论应用于具体何题上。正如F·A·哈耶克所精辟地指出的那样，“……米塞斯之所以极为独特，乍一看使许多读者大为震惊，被认为过于奇怪、不可接受，恰恰是因为老早以前，在对主观主义方法的始终如一的发展中，他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同侪。”<sup>〔21〕</sup>

例如，在货币理论上，通过强调不确定性和预期在市场参与者的行动中的作用，米塞斯成为第一批成功地运用边际效用分析解释货币价值的人。他的经典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sup>〔22〕</sup>（1912，1924，1935），以及他的专著《货币稳定化与周期性政策》<sup>〔23〕</sup>（1928）以及《人的行为》的若干部分<sup>〔24〕</sup>所包含的内容，却远不止此。借用当前经济学的说法，米塞斯试图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运用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和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对于货币与“自然的”利率之区分，他构想了一种动态过程分析，揭示了货币供应的变化是如何通过相对价格的扭曲而导致收入分配的变化并引发周期性的波动的。

使得米塞斯的方法与诸如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货币数量学说区分开来的，正是米塞斯拒绝（像费雪和其他人那样）从对货币总量的变化的分析，一下子跳到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的分析。米塞斯坚持严格遵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对于经统计计算出来的总就业与总产出的或“价格水平”的变化之解释，必须分解为个别的市场行动、反应、计划调整以及随着货币供应量增长（或下落）的重新调整的“层层推进”（step-by-step）的连续过程。因此，宏观总量应该通过严格地分析货币注入的“传播机制”而分解为其微观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sup>〔25〕</sup>

同样的方法论上的考虑贯穿着米塞斯关于比较经济体制的名著。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维塞尔，尤其是庞巴维克，已经批判性地评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劳动价值论，并在后者的逻辑和假设中都发现了根本性的缺陷。<sup>〔26〕</sup>然而，社会主义阵营及非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都几乎没有考虑以国家经济计划替代市场经济的效果问题。米塞斯在其互相关联的三本书中，即《社会主义》<sup>〔27〕</sup>（1922）、《自由主义》<sup>〔28〕</sup>（1927）和《对干预主义的批判》<sup>〔29〕</sup>（1929），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米塞斯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到知识、变化和调整的问题——又是门格爾的主题。另一方面，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世界中——其中假定相关的供需条件是已知的且市场以均衡价格出清——表面上看起来，“市场”的结果和“计划”的结果似乎是可以互换的。<sup>〔30〕</sup>但是，如果假定经济不是处于均衡之中而且供需两侧的经常性变化是体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换言之，在真实世界上，这意味着什么？林林总总的个人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如何协调方可保证有效配置稀缺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

正如米塞斯所解释的，在市场经济中，这一切通过价格机制得以实现。相互竞争的企业家以各自对现存产品或新产品的相对消费需求之预测为基础，为使用或购买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出价。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在企业家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企业家预期到消费者愿意为生产要素有助于生产之最终产品付出的价格，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则对其他可选的使用机会抱有预期。如此，利润与亏损的不停顿过程，能够确保那些稀缺的生产要素的经济控制权，总是倾向于掌握在那些用事实证明了自己对潜在的市场状况表现出具有更准确预见能力的企业家手中。<sup>〔31〕</sup>

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使整个市场过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稀缺资源赖以产生价格的市场也就无法存在。由于没有真正的市场创造的可以反映不停变动的供需状况的价值，也就不存在合理的技术来进行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s），而这是评价种种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所必不可少的。因此，米塞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普遍建立必定导致所有理性的经济计划的结束。<sup>〔32〕</sup>

米塞斯推断，政府对市场秩序的干预，如同社会主义一样，最终造成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更为温和一点。强加于价格的自由市场

形成过程和生产活动的引导过程之上的政府干预的程度有多大，市场力量——也就是企业家竞争性地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努力——受到抑制的程度就有多大。此外，由于政府的任何干预都会扭曲和扰乱竞争性的市场价格体系，政府就会持续地面对一个问题，即要么扩张其控制和管制，以弥补自己以前干预所导致的不平衡，或要么废除业已存在的干预，而允许回到竞争性的市场安排中。因此，米塞斯坚称，干预主义式的“混合经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从逻辑上看，它要么要求通过持续的零星的过程来扩张干预，直至确立无所不包的计划，要么干预主义国家不得不收缩，直至自由市场秩序再次取得主导地位。<sup>〔33〕</sup>

米塞斯的结论是，市场经济才是经济秩序问题的惟一解决之道，就他的本意而言，这并不应当看作他个人的价值判断。正好相反，他将其视为一个科学问题的纯粹科学意义上的结论。一旦社会不再是原始的经济状况，或更为准确地讲，一旦社会跨越了这一状态，那么，必定存在着一系列的制度体系，使得有利地运用广泛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随着劳动分工而出现的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知识的分散，将使得通过中央指挥当局进行任何成功协调变得不可能。某种机制必定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作用，米塞斯认为，价格机制就正是这样的一种机制。关于消费者偏好和企业家预期的纷繁芜杂之信息，能够通过制成品和生产要素二者的市场价格之变化成功地在一国之内、一洲之内，事实上在全世界之内传递。

如果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权被宣布为非法，真实市场的价格——反映真实偏好、真实预期、关于稀缺状况的真实信息——就不可能产生，因为，没有产权就不会有交易，没有交易的能力，就不会有竞价和出价，而没有竞价和出价，也就不会有真实的价格。另一方面，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并不能取消价格，而只是扭曲和打断信息的流动，因而会严重降低整个扩展利用劳动分工的效率。故此，作为科季家的米塞斯有信心说，最终，除开彻底的市场经济之外，别无选择。

在米塞斯对国家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如同在其货币研究中能发现的微观经济过程分析，干预冲击经济体系中的某一点。市场中相对的生产与价格关系受到扰乱，导致形形色色的市场参与者的行动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将扭曲市场秩序。这些发生改变了的行动，又影响到其他人的行为和反应，



导致种种供需关系进一步发生不平衡和扭曲。米塞斯的言下之意是，任何特定的干预之更为长远的复杂后果，倾向于使任何最初的市场状况更为糟糕，而干预措施本来是为改善最初的市场状况才采取。因此，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米塞斯得以构建出一个复杂的次序分析，它强化了古典经济学家在理解经济政策的实施中看得见的（干预时最初的、短期的效果）与看不见的（更为长远的后果）效果的重要性的论点。<sup>〔34〕</sup>

## 四

在战后的年代里，隐含于米塞斯著作中的方法论力量，不可避免地注定要与凯恩斯主义的时代精神相冲突。对于范围广泛的理论与政策事项，微观经济学被宣称为拙劣的分析工具。诸如米塞斯式的“主观主义”微观经济学方法，注定要遭到摒弃。据说，对于特殊的“宏观”经济问题，需要构建不同的工具。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做出种种努力，企图发现假想中存在于一些经济总量之间的量化函数关系，如总投资与总就业、总收入与总消费之间。这种探寻最终惨淡收场：它注定要归于失败。从一开始，这种探寻的失败就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凯恩斯主义不折不扣地充满了“概念实在论”（conceptual realism）的谬误，即借助于由统计得来的、与其组成部分没有关系、互相分割的量值、特征和性质。正如与米塞斯同为奥地利派经济学家的F·A·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运用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的方法，实际上对于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实质的障碍”。经济理论本身确实受阻于试图在货币总量、总体价格水平、以及……和生产总量之间建立直接因果关系的努力。诸如此类的数量中，没有一个曾经对个人的决策有过何种影响；而……经济理论的主要命题的基础，正是有关个人决策的知识假设。我们对于经济现象的任何理解，都应归功于这一“个人主义的”方法。……因此，如果货币理论仍试图在总量与平均值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这就意味着货币理论落后于经济学的总体发展。事实上，总量和平均值间彼此是没有关系的，根本就不可能如同在个别的现象与个别的价格之间那样，在二者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联系。<sup>〔35〕</sup>

反对这种仍然盛行宏观经济学方法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进入宏观分析中的总量，都不过是在经济学家对选定量值的计算之外本身并不存在的东西。例如，“价格水平”是在某个时刻一组选定的有利价格之统计平均值。但是，处于市场中的个人从来不会面对这样



的统计上的“价格水平”。他们实实在在地面对着的，是一系列特定的价格，它们代表着货币与以交换媒介相交易的商品或服务间的交换比率。由计算得出的“价格水平”的任何变化只能是对一系列个别价格的既往的统计平均值。导致市场决策变化的因果联系本是货币与不同的商品之间的特定的个别的兑换比率上的变化，而不是由经济分析家在所有个别的价格变化已经发挥了作用之后或仍在发挥作用之时得出的统计上的“价格水平”，也不是这些价格变化仍在发挥作用时对经济的影响。

同样的推理可以应用于总产出与总就业的任何可量度的变化。这样的统计计算同样纯粹是对特定的个别的产出、特定的个别的就业机会之一系列变化的事后的求和与再取平均值。在任何意义上，人们不能将“总体的”变化与对这一“总体”变化发挥了影响的经济每个部门的具体环境分离开来。实际上任何这样的企图必定使我们不可能去分析已经导致这些变化的状态，不可能去分析那些必然会发挥作用的要素，这些要素或者维持或者进一步改变业已达到的产出与就业“水平”。<sup>[36]</sup>

我们不得不承认，宏观经济学这个庞然大物将经济理论引入了歧途，这一不可避免的结论对于某些经济学家而言是不可承受的。在一次包括对米塞斯及奥地利学派的批判性评估在内的方法论讨论中，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教授认识到了“严格地解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经济学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会取消不能还原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所有宏观经济学命题；而既然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可以还原的，这就等于对几乎全部公认的宏观经济学说再见了。”布劳格愤然宣称，“具有如此破坏性含义的方法论原则必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要很好地回应布劳格，我所能做的事情莫过于引用另一位经济学家亚瑟·W·马盖特（Arthur W. Marget）的话，他像米塞斯一样，被凯恩斯主义的潮流给淹没了，因为他也质疑凯恩斯体系的根本基础：

“近代”版本的“一般”价值理论的一个根本的方法论命题是：有关“供应”与“需求”的所有范畴，必须毫不含糊地与呈现于经济人[“economizing” individuals][或每家商业企业]——他们的计算将使“供应”与“需求”在市场中得以如实现现——头脑中的范畴相关联，……我们必须在这些“微观”决

策与这些“宏观”过程之间建立起关系，由此而引起的那类问题，并不会因为随心所欲地引入作为一个整体的产业的“总供应函数”和“总需求函数”就能得到解决，原因在于，在引入这些函数时，根本就没有顾及到，这两个函数没有一个涉及到那些直接进入各个企业家计算之中的因素，而正是这些企业家的“微观经济”决策和行动，才使得“宏观经济的”过程得已形成。我们必须说，这样做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它完全没有认识到微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分析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 ...<sup>[37]</sup>

直到最近，相当多的宏观理论家甚至逃避了试图与微观经济学建立联系的责任。尽管最近几年，在这一目标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些新文献，但这些新文献主要在“静态”方向上发展，也就是说，是分析选择理论（choice theoretics），这种理论指引市场参与者在选择特定的价格、产出和择业的逻辑，然后，微观经济的数量，则被求和而成宏观总量。

沿着米塞斯所提出的方向前进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则已经尝试过更为动态的分析方法。米塞斯的“层层推进”的程序之精髓，就在于展示不同的微观经济要素之变化，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导致前后衔接的效应，从而造成个人行为之修正，而这又反过来不仅导致“总体”数量值的变化，还导致相对价格与生产结构的变化。<sup>[38]</sup>

另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已经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以通货膨胀过程为例，他认为：如果

不说明新增货币从何而来、注入何处、数量是多少，以及它如何渗透入经济体系〔以何种速度通过何种途径和渠道〕，就得不到多少信息。同等总额的新增货币，是通过消费者贷款，还是通过生产商借贷，还是通过国防部〔公共开支〕，还是失业补助的方式注入经济体系，其后果将大不一样。取决于经济现状，货币注入的每个点，会使总额相等的新增货币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货币分析必须既详细地分析商品流动的变化，同时又要详尽地分析服务流动的变化。<sup>[39]</sup>

米塞斯及其奥地利学派同侪对于根据微观经济过程分析宏观经济现象的强调，促使约瑟夫·熊彼特得出结论说，“奥地利学派强调个人行为或决策、从个别商品而不是这样那样的价格水平出发来确定货币之交换价值的方式，的确有其优点，特别是在分析通货膨胀

过程之时；它倾向于用一种较为不清晰但在结果上更为现实与丰富的图景，取代简单却不适当的图景。”<sup>[40]</sup>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方法具有超过“纯理论”的重要意义。宏观经济理论的持续危机，反映的是忽视微观动态的这些特殊方面的结果。正在老化的“新经济学”<sup>[41]</sup>之卫道士，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政策对“总”需求、“总”就业和一般“价格水平”的效应上，依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政策对经济的整体结构的扭曲作用。通过中央银行（联邦储备体系）永久地注入货币，已经扰乱了市场价格体系，创造了人为的就业机会并因此严重地误导了劳动和资本的流向。财政政策扭曲激励体制如此之深，以致美国的储蓄率属于西方世界最低之列。各个层面的干预与管制方案，严重降低了现有生产能力的有效利用，也缩窄了企业家进行新的发现和创新的范围。

不过，此时此刻，却似乎有发生变化的机会。当正统凯恩斯主义声名狼藉之时，当经济学家中产生对于自由市场的新的且处于增长中的认识与同情之时，当大众日益担心政府对社会和经济事务的干预程度之时，情势的逆转似乎是可能的。

## 五

本书出自 20 世纪经济学思想的领军人物之手，触及到了当时几乎所有主要问题，可以作为实现这一理论及政策逆转的重要指南。

本选集中包含的论文（许多是以前未曾发表的），可以当作米塞斯经济学的一份方便的集大成读本。这部论文集包含了米塞斯对自己认为重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几乎所有方面的探讨。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本论文集展示了在米塞斯的其他著作中无从发现的各种方案之应用。

前三篇论文是关于“方法”的，详细地描绘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探讨了在社会分析中价值中立的重要性，解释了米塞斯本人所认识到的，他关于人的行为的科学——人的行为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之间的区别。

接下来的五篇论文是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了货币在经济交易中的独特地位，货币扩张对市场活动的扭曲效应，持续恶化的通货膨胀之破坏性后果。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米塞斯分析了试图

通过稳定价格水平来稳定经济活动的企图之局限性。

再接下来的四篇论文是关于“贸易”的，关注存在于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盛行的世界中的种种经济扭曲和低效率现象。虽然绝大部分写于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早期，但这些论文比以前更有针对性。时值第三世界国家极力推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而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主义日益高涨之际，米塞斯发出的没有自由贸易的世界将爆发国际冲突和战争的警告，将会被发现是尤为令人折服的。

关于“比较经济体制”的七篇论文，分析了自由市场秩序和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冲突。其中包含有对社会主义、合作社运动以及集团冲突的经济基础之详尽研究。

最后的关于“思想”的两篇论文强调指出：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终极竞争，不是各个国家和军队之间的竞争，而是支配人类行动的种种思想之间的竞争。

杰出的德国经济学家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曾回忆过，米塞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写的《民族、国家与经济》（1919），“在许多方面回答了困扰着一位刚从战壕中爬出来的年轻人的诸多问题”。<sup>[42]</sup> 随着凯恩斯主义霸权的崩溃，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间开始了新一轮观念之战，此刻，米塞斯的著作将再一次成为那些守卫思想战壕的新一代战士的帮手。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向公众献上了这本《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

**理查德·M·艾伯林**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讲座

经济学助理教授

希尔斯德尔学院

希尔斯德尔，密西根

1989 年 9 月

# 第 一 部 分

## 方 法

# 第一章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

现代社会科学奠基于 18 世纪。而在此之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历史学。当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充满了种种暗示，据说，不论何时何地，它们对于人类的所有行动均有效，即使这些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明确地这样宣称，他们也必定是将他们对于事实的掌握与解释建立在这类假定之上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进行任何具体的分析，来阐明这些隐含的假设。

另一方面，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在人类行动的领域中，除了好与坏之外，别无其他标准可以运用。如果某项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那要么是因为人类的道德还未臻完善，要么是因为政府的软弱无能。有了道德发展充分的人和强有力的政府，任何事情都是可行的。

然而，上述思想在 18 世纪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在市场运作中发现了规律性。他们发现，任何一种市场状态对应着一种价格状态，而且，一旦试图改变这种状态，一种恢复这种状态的趋向就会自我显现。这一洞见开辟了科学上新的一章。人们开始惊奇地认识到，人类行动还可以从道德以外的观点出发来进行研究。他们急于认识一种可与他们业已熟悉的自然科学中的规律性相提并论的规律性。

自康替龙（**Cantillon**）、休谟、重农学派、亚当·斯密以来，经济理论一直在不停地——虽然并非稳定地——进步。在这一发展过

程中，经济理论远不仅仅只是一种有关市场在建立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之上的框架内运行的理论。一段时间内，这种理论成了有关人的行为、人的选择与偏好的普遍理论。

## 二

社会认知的要素是抽象的，不可还原为任何具体的可由感官来理解的表象。为使这些要素更易于设想，人们求助于比喻性的语言。生物学的比喻一度极为流行。甚至有论者将这一比喻发展到荒唐的地步，只要举出利林费尔德<sup>[1]</sup>的名字就足以证实这一点了。

时至今日，这种机械论的比喻更是大行其道，其理论基础则可以在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观点中找到。实证主义漫不经心地将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一切教导弃之一旁。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来，历史学完全不是科学，经济学则是一种特别的形而上学。为取代历史学与经济学，实证主义假想出一种须由实验方法所建立的社会科学，而其中的实验方法则是指被理想地运用于诸如牛顿力学这样的自然科学中的方法。经济学必须是实验性的、如同数学般精确的和可以量化的。它的任务是测量，因为科学就是测量。任何命题必须接受事实的验证。

然而，这种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每一个命题都是错误的。

因此，数学在经济研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仅仅就是描述静态均衡。方程式和无差异曲线所处理的是一个假想的从不存在的状态。它们所能提供的就是对于静态均衡的定义的一个数学表达。因为数理经济学家从经济学必须用数学术语来处理的成见出发，他们就将静态均衡当作经济学的全部。这一概念本来纯粹只是一种手段，但这一性质却被对它的过分倾心而淹没了。

当然，数学并不能为我们提供达到静态均衡的方式的任何信息。从数学上确定实际状态与均衡状态之间的差别，并不能替代逻辑经济学家或非数理经济学家所用之法，由此法能我们认识到在数据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实现均衡所必需的人的行为之本质。

迷恋静态均衡，其实是误入歧途，逃避对主要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均衡概念的实际价值不应被低估，但是它只是解决一个问题的一种工具而已。在任何情况下，对于静态均衡的数学阐述，仅仅

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细枝末梢而已。

这类似于曲线的运用。我们可以用两条曲线（也就是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叉点来表示一种商品的价格。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对于这两条曲线的形状其实一无所知。我们知道凭经验得来的价格，并将之假定为交叉点，但我们并不知道曲线在此之前或之后的形态。运用曲线的表现方式，仅仅是用图解的方式来表达理论并使之更易理解。

数理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价格要么是价值的某种量度，要么是商品的等价物。对此，我们需要指出，价格并非用货币量度，价格是用来交换一种商品的货币的数量。价格不是商品的等价物。仅当买主认为商品的价值超过其价格、而且卖主认为商品价值低于其价格时，买卖才会发生。没有人有权不顾这一事实，并在交易双方对估价有差异时却假定存在等价关系。当任何一方认为价格是该商品的等价物之时，根本不会有交易发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次交易对于双方来说均是一桩“物物交换”（bargain）。

### 三

物理学家从外部考量他们所研究的物体。他们对于一块正在下落的石头的内部或其“灵魂”内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有机会在实验中观察石头的下落，并进而发现他们所称的落体定律。在这些实验知识的基础上，他们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来构建理论。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并非有时所讲的商品、经济学上的数量或价格。我们并没有用人的行为进行实验的能力。但是，我们本身就是人，我们了解行动中的人的思想。我们对于行动中的人赋予其行动的意义有所了解。我们知道不安逸是寻求变化的最根本的激励。一个完全满足的人，或一个虽然不满但看不到改进手段的人，是根本不会行动的。

因此，正如凯尼斯（Cairnes）所言，经济学家在研究之初就已经掌握了主宰其所研究的现象的终极原则，但人类却并不直接掌握有关终极的物理原则的知识。<sup>[2]</sup> 此处即为社会科学（伦理学）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别。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的是进行实验的能力，使社会科学成为可能的是掌握或理解人的行为的能力。



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十分不同的对于行动的意义理解：我们构想〔conceive〕，我们理解〔understand〕。

我们构想行动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将行动当作行动本身。我们在行动中看到旨在运用手段达到目标的努力。在构想行动的意义时，我们认为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有意识的行为，但并不考虑其目询或所运用的手段的性质。我们认为行动就是其本身，就是其逻辑的（人的行为的）属性与范畴。在这种构想活动中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通过演绎的分析来发现在行动的首要原则中所蕴含的一切，并将它用于可以设想到的不同类型的情形中。这一研究就是人的行为的理论科学（人类行为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人类行为学最发达的分支——经济学（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

由上所述，经济学并非基于或源于（抽象于）经验。它是一个演绎的体系，始于对人的理性与行为的原则的洞见。事实上，在人类行动领域内的所有经验，都是基于我们在头脑中具有此一洞见，并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没有这一先验的知识与源于这一先验知识的法则，我们根本不能够认识人的活动。我们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的经验，取决于人类行为学和经济理论。

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程序和方法不仅仅是科学研究所独有的，而且是理解社会事实的日常方式。这些先验的原则和基于其上的演绎不仅被经济学家所使用，而且被任何处理经济性事实或问题的人所运用。外行所运用的方法与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并无显著不同，只是外行有时不是那么具有批判精神，在演绎的每一步中不是那么严谨，因而更容易犯错。只要我们注意到，任何对当前经济问题的讨论，很快就进入到对抽象原则的考虑而不涉及到经验，就应该能够明白这一点了。例如，你讨论苏联体制时就不能不借助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讨论到工资与工时法案时，你就不得不借助关于工资、利润、利息与价格的理论，这一理论也就是市场社会的一般理论。“纯粹事实”——让我们暂且先忽略其中的认识论上的问题，即是否存在这样的事实——是可以任人解释的。这些解释需要运用理论上的洞见来阐明。

不仅经济学不是源出于经验，甚至于借助于经验来验证经济学的定理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必须重复一遍：任何复杂现象的经验，可以而且的确有不同的解释方式。同样的事实，同样的统计数字，可以被用来证实相互矛盾的理论。

比较一下社会科学中用于处理经验的技术与自然科学中用于处理经验的技术，是有益的。很多本经济学书籍在提出一种理论后，总会附加数章，试图用事实来证实其理论。这并非自然科学家所运用的方法。自然科学家从实验确定的事实出发构建其理论。如果从他的理论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来预言还未曾在实验中发现的某种状态，那么，他描述何种实验就对其理论非常重要了；如果结果符合预言，理论似乎就得到了验证。这与社会科学所采用的进路截然不同。

为将经济理论与现实对照，我们并不需要刻意解释已由他人做出不同解释的事实，以此来表明这些事实似乎证实了我们的理论。这种可疑的程序不是理性的讨论所应采取的方式。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必须细究在我们的推理中所隐含的行动之特殊情形，是否与我们在所考察的现实中发现的情形相对应。一种货币理论（或者不如说是间接交换理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并不取决于我们所研究的现实的经济体制是实行间接交换还是仅有实物交换。

应用于这些理论性的先验考察中的方法，就是思辨性构建（speculative constructions）的方法。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学推理的外行与其相似——在并不存在的事物之上构建出一幅图景。构建所用的材料来源于对人的行为之情形的洞见。思辨性的构建所描述的事物的状态是否对应于现实，或者是否能够与现实相对应，并不影响该构建的工具性效用（instrumental efficiency）。即使是不可实现的构建，也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作用，即让我们有机会来设想，是什么使得构建不能实现，在哪些方面这些构建与现实有别。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辨性构建，对于经济推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最为人所知的、也是最经常被应用的思辨性构建，就是上面提及的静态均衡状态。我们充分认识到了，这样的状态是从来不能实现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一个一成不变的世界的话，我们也就不能研究变化的含义。现代经济学家中没有人会否认这一思辨性构建的应用，对于阐释企业家利润与损失的性质以及成本与价格间的关系，是极为有价值的。我们所有的经济学论证都运用了这些思辨性的概念。诚然，这种方法有其危险性，它很容易导向错误。但是，由于它是惟一的方法，我们也就离不开它。当然，在运用中我们需要格外小心。

从先验性原则出发的纯粹逻辑性的演绎如何能够让我们认识现

实？对于这一浅显的问题，我们必须这样回答：人的思想和行动之渊源相同，因为它们同是人的头脑的产物。从我们的先验原则中得出的正确结果，不仅在逻辑上是无可辩驳的，同时也绝对地可以运用于现实，只要其中所涉及的假定是现实中存在的。否定经济学的结论的惟一方式是，表明结论中有逻辑错误。至于所获得的结果是否可应用于现实，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一点也只能通过表明其中的假定对应于或不对应于我们试图解释的现实来判断。

故而历史经验——经济经验都是历史的，因为它是已经过去事物的经验——与经济理论的关系，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经济学理论不是起源于经验。相反，经济学理论是掌握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工具。经济史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经济学理论的学说。恰恰相反，经济学理论使得我们可以构想过去的经济事实。

### 四

但是，要在人的行为的世界中找到方向，我们就不能局限于仅仅构想人的行为的意义。行动着的人和仅仅进行观察的历史学家不仅要像经济学理论所做的那样来构想行动的范畴，还要理解人的选择的意义。

对人的行为之意义的这种理解，是历史研究的特别方法。历史学家必须运用人的行为的理论科学——人类行为学——以及这一学科的最发达的分支（即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来尽可能地确证事实。然而，除此之外，他还必须更上一层楼。他必须研究个别的独特的情形。个体是无法言传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个别性（individuality），这一个别性已经不可能再给予解释，或追溯到其他实体那里了。在这一意义上，个别性是理性不及的（irrational）。历史学科所运用的特殊的理解之目的，就是通过某种心理的过程来把握个别性的含义。个别性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个性化的事物。个性也决定了估价、目标、理论、信念以及错误，一句话，决定了行动中的个人的总体哲学以及他们构想其行动所处的环境的方式。个别性使我们设身处地于行动的环境中。当然，这一特殊的理解方式不能与解释者的哲学分离。在特殊理解的领域中，自然科学、先验逻辑科学和人类行为学中可以达到科学客观性的程度是伦理科学或历史科学不能企及的。人们能够有不同的理解。历史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来书写。历史学家可能对所有能通过理性方式加以确证的一切有一致的看法，但仍然会

在对这一切的解释上大相径庭。历史注定是要重写的：新的哲学总是需要对过去予以重新表述。

历史科学中的特殊理解并非某种纯粹理性的活动。理解是这样的认识，即理性已经穷尽其所能，我们只能尽力尝试，就如我们试图尽力解释理性不及的、且不可用穷举法或单列法来说明的事物一样。这就是理解所要完成的任务。理解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且应当作为逻辑工具来运用。它不应被用于夹带历史著作充斥着蒙昧主义、神秘主义等等的谬论。它不是无稽之谈的特许状。

之所以必须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人们有时借助于一种受到错误解释的“理解”，来证明对某种历史主义的滥用是“正当的”。逻辑、人类行为学的论证，以及自然科学的论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理解所推翻。无论历史资料提供的证据如何有力，无论某个事实从与之同时代的理论之视角来看如何易于理解，只要这一事实不符合我们的基本原理，我们就不可接受它。女巫的存在和巫术的做法业已经过大量的法律程序认定为真，但是我们却不会接受这一套。众多法官的判决历历在案，宣称人们借助于扰乱一国的国际收支而使该国货币贬值，然而，我们不会相信这样的行动会有这样的结果。

历史学的任务并非重现过去。任何重现的企图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样的重现非人力所能及。历史是用概念来表现过去的。历史研究所用的具体概念是类型化的概念（**type concepts**）。这些历史方法的类型只能借助特殊的理解来建立，并且，这些类型仅在它们得以建立的理解之框架内有意义。因此，并非所有逻辑上有根据的类型一概念均有助于理解。一个分类要在逻辑的意义上成立，其条件是统一于这一类当中的所有要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分类。它们是人类的头脑在观察事物时据以识别相同点与不同点的产物。一个在逻辑上成立并且基于合理考虑的分类，是否能用于解释给定的数据，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例如，毫无疑问地，一种“法西斯”的类型能够以逻辑上成立的方式建立，并且可与另一种称之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类型相对照。这种“法西斯”类型不仅包括意大利式的法西斯，还有德国式的法西斯、弗朗哥将军治下的西班牙体制、霍尔蒂上将（**Admiral Horthy**）治下的匈牙利体制，以及其他的某些体制。“布尔什维克主义”则包括俄国式的布尔什维克体制、贝拉·库恩（**Bela Kun**）治下的匈牙利式体

制，以及慕尼黑的短命苏维埃时期。但是，这种分类及从这种分类出发推断过去 20 年间整个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即法西斯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是否是理解当今政治现状的正确方式，却是值得商榷的。你能用不同的分类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段历史。你可能将之分为民主与极权主义，然后将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纳入民主旗下，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其他的法西斯类型归入极权主义。你到底是采用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分类，取决于你观察事物的整体方式。理解决定分类方式的选用，而非相反。

历史科学或者道德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中所用的类型一概念，都不是统计上的平均数。用于进行分类的大多数属性，并不是根据数值来决定的，仅这一点，就决定了不可能将其建构为统计上的平均数。这些类型一概念（在德语中人们使用理想型 [Ideal-Typus] 一词，已将它们与其他学科，尤其是生物学中的类型一概念区分开来）不应当与为构想人的行为的范畴而使用的人类行动学的概念混淆。举例来说：经济学理论中使用“企业家”的概念来描述某种功能，即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企业家。当然，经济学理论中进行这种分类的任务不是辨认人，而是辨认功能，并解释利润和亏损之原由。这一意义上的企业家乃是那些导致利润或亏损的功能之人格化。在经济史上，在处理当前的经济问题时，“企业家”一词则指某一类人，他们投身于商业，但他们在很多方面又大相径庭，以至于企业家这个一般性的词，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只能使用具有明确限定的词，比如，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华尔街”，军火企业，德国企业等等。历史学和政治学中所使用的这类企业家一词，永远不能具有人类行为学中的企业家概念所具有的概念上的精确性。在生活中，你永远碰不到一个仅将一种功能人格化的人。<sup>[3]</sup>

## 五

前述所言证明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着根本的差别。社会科学的进步要归功于其独特的方法，并须在其研究目标的特殊性质所要求的路线上继续前进。

有人提出在社会科学中运用数学，并且相信这样将使社会科学更为“精确”，这是一种谬论。数学在物理学的应用，并不使物理学更“精确”或更具确定性。不妨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一旦数学命

题涉及现实，那么，命题就不是确定性的；只要它们是确定性的，那么它们便与现实无关。”对于人类行为学中的命题，情况则不一样。这些命题涉及的是人的行为的真实，具有完全精确性和确定性。对于这些现象的解释，在于这一事实：人的行为的科学与人的行为具有共同的根源，即人的理性。假定量化方式能够使得人类行为科学和人的行为更为精确，这是错误的。由于人的测量能力的限制，每一个数字化的表达都是不精确的。剩下的只需要提及上述在社会科学中量化表达方式的纯历史性质就够了。

图谋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以改善社会科学的改革者，试图通过指出社会科学的落后状态来为自己的努力的正当性辩护。没有人否认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远未臻于完善的境界。每一位经济学家都知道任重道远。但需要记住两点。其一，当今不如人意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与所谓的经济学理论不够发达毫无关系。如果人们不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指导其政策，那么，他们就不能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经济学。其二，即使有朝一日经济学理论需要从根本上修改，那也不会沿着当前经济学的批评者们所指的方向进行。这些反对意见已经被透彻而永久地驳倒。<sup>[4]</sup>

## 第二章 社会科学中对 “非理性”的处理



目前，“反感理性”的一个表现，是试图因社会科学是一门纯理性的学科而从中挑错的倾向。批评者说，生活与现实，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对待生活与现实，好似它们是理性的以及可通过推理而任意解释，是错之甚远的。理性主义仅集中于细枝末节。其认识浅薄，缺乏深度；它并不深入事物的本质。将明显在不断变化的生活现象，压缩成为枯燥的理性计划和苍白的抽象是荒唐的。我们所缺乏的是一门研究非理性的科学，一门非理性的科学。

这些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人类行为的理论科学，即人类行为学，特别是其最发达的分支，经济学或交换学（catallactics）。但是攻击的范围也包括历史学科。

应该注意到，政治动机触发了这场风暴。政党与压力团体由于其计划不能经受冷静的推理之驳斥，所以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来做借口。但是，科学不能仅因反对的动机不正，就对反对意见置之不理。科学不能预先作这种假设：因为非难科学的支持者浸淫在政党的偏见中，所以非难必定是没有根据的。科学注定要回答任何责难，而不论这些责难背后的动机与背景如何。

对于理智与理性的挑战并非起源于德国。如同所有其他的社会学说与哲学，挑战源于西欧。但是，挑战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声势浩大。长期以来，它一直是普鲁士大学中的官方学说。它也塑造了德国人今天的精神状态，纳粹哲学家自豪地美其名曰“德国社



会哲学”。德国官方学者已经广泛地批判经济学是产生于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心灵的骗人玩意儿，德国历史学家也贬斥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成就。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一长串的德国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已经在阐释历史的认识论问题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sup>[1]</sup>当然，我们理应因其贡献而感怀的这些人，在当今德国的名人堂中却无一席之地。

在开始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专门研究之时，首先给出这两个术语的精确定义应是合理的。但是，要满足这个合理要求却是不可能的。原因恰恰在于，我们想要回应的各种反对意见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些反对意见以一种含糊不清的方式使用这两个术语。他们蔑视明确性与逻辑严谨性，却对含糊其词情有独钟。他们并不讲求清晰，或是深度。他们以晦暗的和暗喻的谈话方式自傲。

我们需要探究的就是这个问题。社会科学是否因为运用不得要领的推理而偏离了正确的道路？我们是否应该寻找有别于推理与历史经验所能提供的方法之外的康庄大道？

### 二

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是人的行为。历史研究过去的事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重现这些事件。它包含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语言学、人种学；人类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人类学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生理学、认识论的分支，也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史和描述性经济学（descriptive economics）当然是历史。社会学这一术语被用于两种不同的含义。描述性社会学研究那些不在描述性经济学范围内的人的行为的历史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描述性经济学与人种学和人类学所宣称的研究领域有部分重合。另一方面，一般社会学以一种比其他历史学分支更接近于普遍性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经验。例如，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一个单独的城镇或一个特定时期的数个城镇，一个单独的民族或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马克斯·韦伯在其主要著作中大体上是研究城镇，也就是研究有关城镇的完整历史，而不局限于各个历史时期、地理区域或各个民族、国家、种族和文明。<sup>[2]</sup>所有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一材料都是过去的，历史科学不能给我们适用于所有人的行为的任何教益，对于将来而目也是如此。

自然科学也研究过老的事件。当然，每一个经验都是已经逝去的事件之经验；未来发生的事情的经验是不存在的。但是，自然科



学之成功所归功于的经验是实验的经验，而在实验中，所有的变化要素是可以分离出来进行观察的。以这种方式积累的事实能用于归纳，这是一种特殊的推理程序，其不足之处已经显现出来，虽然其认识论上和逻辑上的限制还有待解决。

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总是复杂现象的经验。复杂现象没有固定的解释。自然科学利用实验的结果来预测未来的事件，而复杂现象却不能为我们提供可同样使用的事实。复杂现象不能用作构建理论的材料。

人类行为学是理论性和系统性的，它不是历史科学。它的研究范畴是人的行为，而不考虑具体行动的环境的或偶然的境况。其目标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知识，而在这些情况中，条件与隐含的假定和推断准确相符。人们是直接通过实物交换来交换商品还是通过交换中介来间接进行交易，是一个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只有历史才能回答的问题。但是，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使用了交换媒介，则货币理论的法则就交易而言就是正确的。<sup>[3]</sup>

本文的任务并非探究是什么使得人类行为学这门科学成为可能，它的逻辑上的和认识论上的性质何在，以及它运用什么方法。社会科学的认识论上的问题之研究被人忽略的事由来已久。即使诸如大卫·休谟、惠特尼大主教、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斯坦利·杰文斯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逻辑学与认识论著作中也仅研究自然科学，对人的行为科学的特殊性质并未给予关注。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是知识体系中最年轻的分支。而且它的大部分工作仅与历史学有关；一种理论科学的存在长期以来被忽视了。西尼尔（Senior）和凯尼斯（Cairnes）的先驱性工作只在后来才结出硕果。<sup>[4]</sup>经济学家大多数缺乏哲学训练，而哲学家对经济学也不熟悉。现象学对于解决人类行为学中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sup>[5]</sup>

但是本文并不想关心这些任务。我们需要应对的是那些批评家，他们指责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忽略了“非理性”的事实。

行动意味着有意识的行为或有目的的活动。行动与人体内发生的生物学的、生理学的、本能的过程是不同的。行动受到意志与理智的调节与指导。行动的领域正好与人类可以自由影响事件进程的范围一致。只要人有能力达成某种结果或变化，他必定会行动，无论他做什么或者约束自己不做什么。一动不动、被动反应、冷眼

旁观，都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因此，也是行动。在这行动中，任何时候一种不同形式的行为都是可能的。一个忍受他本来能够改变的处境的人，与一个试图改变处境以求另外一种结果的人相比，两者的行动至少旗鼓相当。一个克制自己去影响他本来能影响的生理与本能因素之正常运转的人，也是在行动。做点什么事情是行动，不做本来能做到的事情同样也是行动。

一个人的绝大部分日常行为是常规性的。他做某些事情时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些事情：他之所以做很多事情，是因为他从儿童时代就这样被训练，是因为别人也这样做，是因为这些事情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是习惯性的。他养成习惯，他也形成自动的反应。但他沉迷在这些习惯中，则是因为他钟意这些习惯的结果。只要他发现这些习惯方式不利于他达到更令他愉悦的目标，他就会改变他的态度。一个在清洁水源地带长大的人会养成随意饮水、洗涤、洗澡的习惯。当他移居于水源被致病病菌污染的地方时，他将会极为注意以前根本不曾在意的程序。他将会永久地小心谨慎，以免因不加思考地沿袭他的无意识反应或他传统的常规方式而损伤自己。放弃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对于那些一心期望取得超越众人之上的成就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要想断绝致瘾性的毒品的使用，经常需要经过治疗程序。）一个行动在事件的常规进程中被自发执行，这一事实并不像其表面那样意味着行动不是因意志而产生的。沉迷于一个有可能被改变的习惯，这本身也是行动。

行动是理智对刺激的反应，也就是对人所处的自然和其他人的行为所构成的环境之反应。行动与身体器官的功能性反应不同。行动是人的意志的结果。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意志。我们只是将人从事件的不同状态中进行选择、偏好一种状态而不屑于另一种状态的能力称之为意志；我们称行动为欲达到一种状态而放弃另一种状态的行为。行动是一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姿态。

人类行为学并不关注与决定论相对而言的自由意志这个形而上学问题。人类行为学的根本洞见是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即人能够从不同事态中进行选择，对于这些事态，他并不是中立的，并且这些状态也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同时享受所有的状态。人类行为学并不声称人的选择独立于先天的生理或心理的条件。人类行为学并不讨论决定选择的动机。它不探究为什么一位顾客偏好这种款式的领带而不是另一种款式，或偏好一部汽车而不是一匹马

和一部轻马车。它探讨的是选择，研究的是选择与行动的类的要素（categorical elements）。

人类行为学也不关注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我们也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但此时我们仅需要强调：人类行为学并不需要探究终极目标，而只需要研究达到目标的手段。它是关于手段的科学，而非关于目的的科学。

研究应用技术领域里符合自然法则的手段与达到明确的目的之间的適切性，是技术科学的各个分支的任务。人类行为学不研究技术性问题，而是研究选择与行动的绝对的本质，研究设定目标与运用手段的纯粹的原理。

人类行为学不是基于心理学之上，也不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将现代价值理论称作一种心理学理论，简直是错得离谱，将它与韦伯-费克纳的精神物理学定律（Weber-Fechner Law of Psychophysics）相提并论，也是糊涂所致。<sup>[6] [7]</sup>

人类行为学研究选择、行动及其结果。心理学具体地研究决定不同选择的内在过程。心理学是否可以成功地解释在一个具体事例中一个人为什么偏好红色而非蓝色，或偏好面包而非抒情诗，似乎尚无定论。无论如何，上面提及的解释与知识的某一支是没有关系的，在这一分支中，具体的选择本身就是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或分析的数据。在人类行为学中，重要的是人确实在进行选择，而不是他选择了什么。

行动的动机与源起对于人类行为学的研究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人们想要丝绸的原因在于他们希望御寒，或发现丝绸的美感诱人，或期望使自己更为性感，这些对于丝绸价格的形成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有意义的的确是确存在着对丝绸的某种程度的需求。

尽管如此，现代心理学仍然产生了一些人类行为学可能感兴趣的成果。人们一度认为精神错乱者和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是荒谬和“非理性”的。布罗伊尔（Breuer）和弗洛伊德的一大成就是否定了这一观点。精神病患者与精神错乱者与我们称之为健全与正常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获得满足的手段。他们的“技术”不同于健全的人，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与常人无异。<sup>[8]</sup>他们也有目的，并且采用一定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精神上有问题但仍有一丝理智、尚未降

格到动物般智力水平的人，仍然是一个行动的个体。只要尚有人人的心智的痕迹，任何人都不能逃脱行动的必要性。

### 三

人的每一行动都旨在以更令人满意的境况来取代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境况。人之所以行动，是因为他感到不自在，并且相信他有能力通过影响事件的进程来排遣这种不自在。一个完全满意于其处境的人不会有动机来改变事物；他既没有愿望也没有欲望，因为他已经是完全地幸福了，所以他也就不会行动。一个尽管不满其处境但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可能性的人，也是不会行动的。

严格而言，只有增加满意程度（降低不自在程度）才能称之为目的，相应地带来这种增加的所有状态才能称之为手段。日常用语中人们使用的是不准确的术语。他们将本应称之为手段的事物称之为目的。他们讲道：这个人只知道惟一的目的，也就是积累更多的财富，而不是讲：他将积累更多的财富当作获取更大满足的惟一手段。如果他们使用后一种更好的表述，他们就可以避免当前的一些错误。他们就会认识到，只有每个人自己才能决定，什么能更好地或更差地满足他自己。他们就会想到，价值的判断纯粹是主观的，并不存在个人愿望之绝对满足或绝对幸福这样的状态。事实上，在他对所谓的目的进行判断的时候，他已将这一目的降格为手段了。他从另一（更高的）目的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一目的，并且询问这一目的是否是达到另一（更高的）目的合适手段。但是最高的目的，人类行动的最终目标，却是满足个人的欲望。除开个人的价值判断之外，别无判断更多或更少的满足之标准，而个人的价值判断因人而异，而且，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也因时而异。使一个人感觉不自在或更轻程度地不自在的事物，是由这个人自己的意志与判断的标准来决定的，由个人的评价来决定的。没有人能够强称什么可以使另外一个人更幸福。不容异说的先天情绪和神经病患者的“独裁情结”促使人们漫不经心地抹杀另外一些人的意志与渴望。然而，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的目的和意志强加判断的时候，并不是在宣称是什么使得另一人更为幸福或更少不满；他只是在断言，这另一人的境况更适合他自己，也就是这个审查者自己。

我们需要从这一角度正确地理解幸福说<sup>[9]</sup>快乐论<sup>[10]</sup>、功利主义的主张。如果赋予幸福、痛苦、欢乐和效用这些词语以正式的意

义，那么，反驳这些学派的理由就是不成立的。幸福与快乐就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事物有用即指人们认为它是达到所追求目的合适手段。经济学中所提出的效用概念指的是获取某些从任何观点来看均为有用的服务之适宜性。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价值论的主观主义（*axiological subjectivism*）。效用同时也是考验科学的公正性与科学客观性的标准。它并不研究“应然”，而是研究“实然”。它的主题是，例如说，价格形成之本身的解释，而非价格应该怎么形成，或者如果人们以一种不同于他们的真实行动方式的方式行动，价格又将会是如何形成的。

### 四

人类行为学不使用“理性的”一词。它研究的是有目的的行为，也就是人的行为。行动的相反一极不是非理性的行为，而是身体器官对于刺激的被动反应和本能的被动反应，它们不由意志所控制。如果我们一定要给理性找到明确的含义，那么只能是：人决心取得某种结果的态度。

“非理性”与“非理性的”被广泛用于审查具体的行动模式。一个行动被称之为非理性，要么是因为该审查者不赞成其目的（例如行动中的个人试图获得满足的方式），要么是因为审查者认为所采用的手段不适合于用来获取所期望的结果。但是，通常归之于非理性的行动，其实是值得赞扬的；由高尚动机所激发、并被执行到损害自己的福利的程度、而旨在追求利他性目的的行动，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

我们并不需要详细研究这种措辞的自相矛盾和逻辑上的不一致。对目的加以限定的做法，对于人类行为学这一有关手段的而非目的的科学而言是毫无意义的。显然，普罗大众并非一贯正确，他们有时也会选择不能实现目的的手段。

技术科学与治疗学的任务是寻找正确的手段来实现明确的目的。应用经济学的任务则是为在社会合作领域达到明确的目的而寻找适当的方法。但是，如果科学家的这种努力失败或者行动的人不正确地使用推荐的方法，结果就会令采取行动的人大失所望。尽管如此，不适宜于达到目的的行动仍然是行动。如果我们称这样一个不相称、不适当的行动为非理性的，我们并没有从中剥夺这一行动是有目的的这一特质，我们也不可能否定这一论断：从本质上可以绝对地设

想出来的惟一的方式，是由人类行为学提供的。

经济学并不研究如根深蒂固的寓言中所指责的虚构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而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homo agens*），通常是软弱的、愚蠢的、轻率的、受过拙劣教育的人。他的动机是高尚的还是卑微的，是无关紧要的。经济学也不主张人努力的惟一目标是为自己和家人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经济学的法则就价值的终极判断而言是中立的，并且对于所有的行动都是成立的，而不论这些行动是否利己。

探究人们追求何种目的及他们采用何种手段来实现计划，属于历史学而非人类行为学的领域。

### 五

人们一个常犯的错误是假定获取生活与健康的基本必需品的欲望，比追求其他令人愉快的事物的努力更为理性。诚然，对食物与温暖的爱好，对于人和其他哺乳动物而言是普遍的。通常，一个食不裹腹、居无定所的人会集中精力于满足这些急迫的需要，而不关心其他事情活下去、保存自己的生命及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增加自己的生命，是生活的一个基本的特征，表现在所有的生物身上。然而，屈从这一内在冲动，并不是——对于人类而言——无法摆脱的必然。

所有其他的动物无条件地受保护自己生命和繁衍后代的内在冲动所驱使。由于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们永远处于内在冲动的支配下。人却不是这样的。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本能。他能支配自己的性欲与活下去的意志。当生活环境不可忍受时，他能够放弃自己的生命。人能为一项事业而死，也可以自杀。对人而言，活着是选择与价值判断的结果。

希望生活富足也是如此。禁欲主义的存在证明，追求更多乐趣的努力并非是不可摆脱的，相反，这是选择的结果。当然，绝大多数人喜欢生甚于死，偏好富贵甚于贫困。另一方面，认为只有对身体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才是“自然的”，因而也是“理性的”，而其他一切都是“人为的”，因而也是“不理性的”，实际上是一种主观臆断。人类本质的特征就是人不仅如同其他动物一样寻求食物与居所，而且还追求其他类型的满足，以及还有人所特有的需要。工资铁律

〔the iron law of wages〕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忽略了这一事实。

## 六

价值的具体判断不可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假定这些判断绝对依赖其原因，并受制于这些原因。但是，只要我们不知道外部（自然的和生理的）事实如何在人的“灵魂”中产生思想与意志，并进而产生具体的行动，我们就面临着某种无解的二元论（dualism）。在我们知识的当前状态中，实证主义与一元论的根本主张仅仅是形而上学的假定，并无任何科学基础。理智与经验为我们展现了两个分离的领域：自然的与生理性的事件之外部世界，以及思想、感觉、有目的的行动之内部世界。就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形来说，这两个世界之间并无桥梁联接。同样的外部事件有时导致人类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外部事件有时导致人类同样的反应。我们并不明白其中的原由。

除人类行为学和历史学所提供的方法之外，我们仍然没有发现研究人类行动的其他方法。泛物理主义（pan-physicalism）提供的建议，即将物理学的方法用于人类行动，是没有用处的。毫无疑问，泛物理主义的处方贫乏之至。尽管其支持者狂热地进行宣传，却没有人曾经使用过。简言之，它根本就是无法应用的。实证主义是形而上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失败。

价值的具体判断和由此而发生的行动，对于历史学而言是终极的数据。历史学试图收集所有相关的事实，并且在这种努力中，来利用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特别是人类行为学所提供的所有知识。但是历史学永远也不能将所有的历史事实还原为任由物理学和生理学解释的外部事件。它必定会达到某一点，超出这一点的任何进一步分析都会失败。此外，历史学除处理个别或独特的事例之外，也不能提出任何东西。

在柏格森的哲学中，研究这类历史事实的精神活动就是“直觉”（une intuition），也即“la sympathie par laquelle on se transporte à l'intérieur d'un objet pour coïncider avec ce qu'il a d'unique, et par conséquent d'inexprimable.”（译文：带着这种同情进入对象的内部，以确认它的独一无二因而也是难以言传之处。）<sup>〔1〕</sup>在德文术语中，称这种活动为das spezifische Verstehen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或者简单地称之为Verstehen（理解）。我建议其英译应为



“特殊的理解”，或干脆就译为“理解”。“理解”并不是历史学家理应采用或认识论建议历史学家采用的一种方法或精神过程。它是所有历史学家以及所有其他人在评论过去的社会事件或预测将来的事件时所使用的方法。对“理解”的发现与界定，是对认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并非一门尚不存在而有待建立的科学之蓝图。

在穷尽逻辑学、人类行为学、自然科学的一切方法来对任何历史事实进行解释之后，这一历史事实仍然保留的惟一性与独特性才是终极数据。然而，当自然科学不能就其最终数据作更进一步的发掘时，历史学能尝试使其数据可以被理解。虽然不可能将数据还原为它们的原因这一层次——如果可以的话，这些数据就不会是终极的数据了——观察者却能够理解它们，因为观察者自己就是一个人。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称为理解一致性和同情性理智（*sympathetic intelligence*）的天赋能力。但是我们需要小心谨慎，以免错误地混淆理解与赞成，因为这两者的等同是有条件的，只在某些情况下才成立。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有时将他们感觉上厌恶的行动记录在案；他们仅将之视为行动，也就是通过确定行动背后的目标与所使用的技术性的和人类行为学的手段。理解一个独特的事例，并不意味着在解释它，遑论为之申辩。

理解也不必与审美的移情行为相混淆。审美的移情行为使得一个人能够欣赏一种现象的美感。移情作用和理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历史观点上来理解一件艺术品，确定它的地位、含义，在一系列事件中的重要性，与从情感的角度欣赏一件艺术品，是不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大教堂。但是，一个人也可以以一个热情的敬慕者的角度，或以一个未受影响的漫不经心的游客的角度，来看待同一座大教堂。一个人可以以博物学家——地质学者、地理学者或动物学家——的角度来看山脉，或以唯美的眼光——古人常带点厌恶，而近代人常对优美风景极具热情——来看待山脉。同样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模式，可以采取审美性欣赏模式，也可以采取通过理解或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的把握。

理解确立了一个事实，即一个人或一群人投入到基于某种明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而采取的、并有明确目的性的行动之中。理解还更进一步地试图正确地评价该行动的效果和效果的强烈程度。它也试图确定每一行动的适当性，即这一行动在一系列事件中的意义。

历史学家给我们关于滑铁卢战役的全部事实与事件的说明，其



完整与精确的程度达到了当前所有资料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只要历史学家研究投入的兵力、他们的装备、战术性的行动、士兵伤亡与被俘的数目、各种事件发生的顺序、指挥官的种种计划与执行，他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历史经验之上的。他的断言要是正确的，要么与事实正好相反，要么被证明，要么被能找到的文件否定，要么因没有足够的信息支持而显得模糊。其他的专家要么同意他，要么反对他，但是无论他们同意与否，他们的观点都依据对已有的资料的合理解释。这样，整个讨论必定是在合理的肯定与否定中进行。但是这还不是历史学家应该完成的全部工作。

战役导致了法国军队的决定性挫败。经过文献考证的许多事实能够解释这一结果。拿破仑当时患病，他过于紧张，也缺乏自信。他对形势的判断与理解不再如以前那样准确。他的计划与命令在许多方面是不适当的。法国军队组织涣散，数量上占劣势，疲惫不堪的老兵与缺乏经验的新兵混杂一处。将军们不能胜任，尤其是格鲁希元帅犯了大错。<sup>[12]</sup> 另一方面，英国与普鲁士的士兵在威灵顿和格奈森瑙的（Gneisenau）卓越的指挥下作战，人多势众，士气高昂，组织严明，且装备精良。在何种程度上这些不同的情况导致了法国军队的失败？从这一事例中获得的信息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能够确认或驳倒历史学家关于先遣部队或布吕歇尔（Blücher）<sup>[13]</sup> 统率的普鲁士军队何时到达战场的论证，但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证实或否定历史学家对前述问题的回答。

让我们另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关于德国在 1914 至 1923 年间的通货膨胀，我们掌握有充分的数据。经济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彻底掌握价格变化之原因的所有知识。但是这一知识并不能给我们量化的明确性。正如许多人所言，经济学是定性而非定量的。这并不是因为有些人所称的经济学的落后。在人类行动的范畴内，数量之间没有恒定的关系。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存在着这一性质的关系。推翻这一无根据的假定是现代经济研究中最重要成就之一。货币理论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由于货币数量的增加导致的价格上涨，从来不与货币量的上升成正比。通过对其过程的分析，这一发现摧毁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谬误赖以维系的惟一依据。在经济学领域中不可能有量度。所有能够得到的统计数据仅有经济史上的价值。它们就如滑铁卢战役的数据一样，是历史的数据。它们能够告诉我们在一个特定的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例中发生的事情。运用这些数据的惟一方式是通过理解来加以解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物价的上涨并非仅仅是银行钞票数量的增加所造成的。其他变化也造成这种状况。由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军而不再就业于工厂，政府控制商业而导致生产率下降，封锁阻止了从海外的进口，工人营养不良，这一切导致商品供应量下降。用理解以外的任何方法都不可能确定上述因素——以及其他相关的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价格的上涨。在人的行为领域之内的定量的问题是没有其他解决之道的。历史学家能够列举共同作用而造成某种效果的所有因素，以及与前述因素具有相反作用和可能延迟或减轻最终结果的所有因素。但是他不能用定量的方式来确定不同的原因对结果的影响。定量分析与量度不适用于技术领域之外的人的行为，而在历史领域中，替代这种方法就是理解。

技术能够让我们得知钢板需要多厚才能不被从 300 码以外的毛瑟枪射来的子弹击穿。因而，技术能够回答一个躲在一定厚度的钢板后面的人是否会在一次枪击中受伤。历史学却不能以同样的信心解释，为什么路易·菲利普会在 1848 年失去王冠，或为什么宗教改革运动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在法国更为成功。这样的问题只有具体的理解才能回答。

理解不可以代替逻辑学、数学、人类行为学的先验推理，或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它的用武之地正是这些方法失效的地方：在描述一个独特的惟一性的、不可作进一步分析的事例时，理解的定性作用——在评估共同作用的不同因素的强烈程度、重要性、作用力时——可用以替代行不同的定量分析。

历史理解的目标是从精神上掌握不可完全用逻辑学、数学、人类行为学和自然科学来阐明的现象，这些现象中科学与理智无法阐释的地方，正是历史理解的用武之地。历史的理解表明，科学研究已经达到不可再进一步的某一点，并且试图通过理解来弥补。<sup>[14]</sup>只要自己喜欢，一个人可将理解视为非理性的，因为它利用了个人的判断，而个人的判断是不可用纯理性的方法来评判的。然而，理解作为一种方法也不可任意偏离从文献中得来的已被证明为真的结果，或偏离从自然科学与人类行为学的研究中得到的关于理解的解释。如果理解冒昧地与物理学、生理学、逻辑学、数学或经济学相冲突，那么它就超越了其本来的界限。许多德国学者滥用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人文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的方法，德国历史学派自欺欺人地以虚幻的“理解的国民经济学”（*verstehende Nationalöko-*

nomie)来代替研究人的行为的经济学,这种种谬趋是不能归咎于理解的方法本身的。

德国官方学者已经鼓吹过非理性科学的福音。他们用武断的判断来代替理性与经验:他们从直觉中导出历史事件的知识,而这些历史事件是现有的文献无法提供信息的或者与已有文献中精心考证的事实相反。他们不能在逻辑上驳倒经济学理论的主张,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得出与之相违的结论。他们也不害怕制造谬论。他们的惟一理由就是,生活是非理性的。

让我们从一本有英语翻译的严肃学术著作中找一个例子来讲吧。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先生(Ernst Kantorowicz)是诗人和空想家斯蒂芬·乔治那个小圈子里的一名历史学家,在他为德意志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所作的传记里,正确地描述了在这位霍亨索伦王朝君主统治时期发生的政体演变过程。腓特烈二世在德国的地位非常不稳定,因为他对西西里的世袭领主权使得他与教皇和意大利各共和城邦处于冲突之中。他缺乏力量来保护自己在德国的皇家威严,被迫放弃皇位的绝大部分权力,给予各路诸侯巨大的特权。正如康托洛维茨所正确指出的,随之而来的是在他的版图内每个诸侯都获得了几乎完全的独立,这一点显然妨碍了德意志各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国家。

<sup>[15]</sup>就此而言,康托洛维茨仍然从合理的理解出发并与其他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保持一致。但这之后,就出现了空想、神秘主义的令人惊奇的解释;他补充道:“但是,在更高的意义上,腓特烈完善和完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他用崇高的治国之才……强化了诸侯们的权力……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皇权与辉煌在散发光芒中不但不会暗淡,反而会增添光辉,被凯撒大帝视为与己平等的诸侯越强大、越辉煌、越庄严,腓特烈的皇位就越为耀眼。诸侯不再是承受王位压力的柱石……他们成为表现向上发展力量的中流砥柱,预备着成为傲视同侪的诸侯中的诸侯、国王中的国王,并最终成为诸侯与国王”。

<sup>[16]</sup>固然,各路诸侯在强求特权之前的三政会上使用的词藻有相似的声调。诸侯们礼数有加,不想给予皇帝过多的痛苦,同时也急于包装他们将会逼迫皇帝接受的条件。希特勒在将捷克斯洛伐克降格为属国之时也甜言蜜语,说他给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保护。尽管如此,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胆敢说“在更高的意义”上,希特勒通过为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德意志帝国的保护而“完善和完成”了前者的独立。腓特烈二世给予诸侯们特权而肢解了神圣罗马帝国。断言他“在更高的意义上”“完善和完成”德国的统一是荒唐的。任何比喻性的说

词和非理性的诉求，都不能比这样的荒唐说法更站不住脚的了。

理解使得历史学家可以判定正被讨论中的两种特权在帝国政治结构的演化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可以判定它们的效果的量级。比方说，他可以表达这种观点：这两种特权所扮演的角色被夸大了，其他事件比这些特权更具破坏性。他可以试图证明他的论题和他的理解方式。但是这样说则是不可接受的；是的，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而那是其结果；尽管如此，“在更高的意义上”正好相反。

人的知识永远不能超越理性与经验所传递的认知之外。如果事件的进程中有所谓的“更高的意义”，也是人类心智不可企及的。

### 七

某个特殊学派持这种观点：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某种永恒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个人自私地追求个人幸福，社会就会成为悲惨世界。社会合作和文明仅在牺牲个人福祉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社会的存在及其繁荣要求其成员一直做出牺牲。因此，我们不可·能设想道德法则和社会的合作是起源于人道和纯粹的理性。某种超自然的存在赐予人类以道德准则，并将执行这一法则的使命托付给伟大的领导人。历史不是自然因素与在某种限度内可由理性任意阐释的有意识的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不断重复的先验性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就是命运，理性永远不能彻底探知其深度。

正义与邪恶间、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间的冲突因而是永恒的、不可解决的。世界观的分歧以及对价值的终极判断的不同，区分了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和政党。这种不一致根源于人类灵魂与内在本质的最深处；任何推理或不得要领的论证都不能清除这种不一致，也不能调和其间的差异。一部分人天生具有领袖群伦的号召力，另外一部分人则有自发地支持全民大众的事业并接受这一事业的领袖支配的天赋；但是许多人不能找到正确的方式，为了给凄惨的自己谋求幸福，而不得不接受趾高气扬的独裁者之驯服与支配。社会哲学无非就是要认识到集体主义永恒为真，并揭露个人主义的虚伪谬误和自负。社会哲学不是理性过程的结果，而是直觉赐予上帝之选民的启发。运用逻辑学的理性方法来获取社会与道德真理是徒劳的。上帝给予被选中的人以正确的直觉。余下的人则只能放弃思维，盲目地服从上帝赐予人间的权威。真正的智慧、理性主义经济学的和

理性主义历史学的伪劣教条在理解历史的和社会的事实、政治措施和个人行为这些方面从来就没能取得一致。人的行为不是获取社会总体的真知的适当工具；理性主义和它的变种，经济学与批判史学，在根本上是错误的。<sup>[17]</sup>

这种教条的根本性的假定，即社会合作与个人利益相冲突，只有牺牲个人利益社会合作方才可行，早已被驳斥得体无完肤。英国社会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发展了一种社会演化理论，在其中，不需要具有超人的智慧与能力的领袖人物奇迹般地出现。社会合作及其必然结果，即劳动分工，较之孤立与对抗，能更好地服务于参与其中的个人之利益。迈向和平合作的每一步都能为所有参与者带来眼前的、可辨别的好处。人们之所以进行合作并渴望合作，是因为他们渴望追求自我的利益。个人为维系社会合作所作的牺牲只是暂时的；如果他约束自己，不从事危害社会但能给自己带来眼前小利的活动， he 可以从和平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更高生产效率中获益更多。因此，社会协作（association）的原理阐明了将游牧部落与部族逐步融合起来直到最后形成世界范围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力量。长远来看，社会利益与得到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社会不是需要个人牺牲个性的摩洛神<sup>[18]</sup>，正好相反，社会是每一个人获得福祉与快乐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是个人得到生存与进步的最合适的武器。社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满足人的所有欲望的最佳手段。

我们不需要深入批判集体主义学说的种种主张。我们只需要确证这一事实：所谓的集体主义政党的行为与它们的哲学原则并不一致。这些政党的政治代表偶尔在讲话中提到集体主义的口号，并默许在党歌中贩卖同样的高调。但是，他们并不要求他们的追随者在集体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安宁与幸福。他们急于通过推理来证明，他们推荐的方法在长远上将最能为其追随者的利益服务。他们只要求暂时的牺牲，并许诺日后将连本带利获得成百倍的回报。纳粹的教授和诗人讲道：“为了德国的辉煌委屈一下你自己吧，为了德国的万世光荣与伟大，放弃你可怜的生命吧！”但是纳粹政客却用不同的话语：“为你自己的生存与未来的幸福而战！敌人决心要灭绝雅利安英雄的高贵种族！如果你不反抗，你们都会遭难死去。但是，如果你们勇敢地面对挑战，你们就有机会挫败进攻。许多人会战死，但是如果敌人的险恶计划畅行无阻，你们都不会幸存！如果我们选择战斗，更多的人将会得到拯救。我们只可二择一：要么敌人获胜，

我们必然全部灭亡；要么我们获胜，绝大多数得以生存

在这一纯粹理性的——虽然一点都不合乎情理——论证中，并未诉诸于“非理性”。但是，即使集体主义的教条是正确的，即使当人们仅仅因为超人般的领袖之劝诱或威压而放弃其他利益而瞄准集体的利益，人类行为学的所有观点仍然稳如磐石，而历史学也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其研究方法。

### 八

对社会科学广泛轻蔑的真正原因在于，人们不愿接受自然对人的行为施加的限制。这种不情不愿潜在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则是压倒性的。由于不能同时拥有互不相容的两样东西，由于必须为任何东西付出代价和从来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人们因此而感到不幸。他们责怪社会科学，因为它证明了保存与增加活力而同时排除不自在感受的要素的稀缺性。他们蔑视社会科学，因为它描绘了世界的真实状况而非他们喜欢的状况，也就是那种有无穷机会的宇宙。他们不是足够的明智，因而未能理解：生活正是对于逆境的积极抗争，生命就体现在这一抗争中，心智正常的人不能想象完全无拘无束的生活。理性是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斗争中最为重要的装备。在愚人的天堂里，理性没有任何作用，也不会有任何发展。<sup>[19]</sup>

不能将社会改变成乌托邦，这不是社会科学的过错。经济学不是一门“沉闷的学科”（dismal science），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满足目的的手段是稀缺的。（至于有人设想这样一种状态：人可以完全得到满足，因为他们不必依赖稀缺的要素，而人也不必采取行动，对此人类行为学，即关于人的行为的科学是不必进行研究的。）只要手段存在稀缺性，人就会理性地行动。如此则没有“非理性”的余地。

显而易见，人必须为维护那些能使他实现目标的社会制度而付出代价，他会认为这些目标比他要付出的代价、比他为此而做出的牺牲更有价值。将对于这一事态的不满，粉饰为对于社会科学的所谓教条的正统之反感，是于事无济的。

如果经济学理论的“理性”方法证明  $a$  导致  $p$ ，那么，借助于“非理性”也不能使得  $a$  导致  $q$ 。如果理论是错误的，那么，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驳斥错误的理论并取代不正确的解决方案。

## 九

社会科学没有忽略全面考察那些在人们心中指称为非理性的所有现象。历史学已经发展了一种特别的方法来研究它们：理解。人类行为学已经建立了它的体系，使得其法则适用于人的所有行动，而不论这些行动从某种观点来看是理性或非理性的。指责社会科学遗漏了本应研究的一部分领域，纯粹是无稽之谈。因而，建议建立一门新的科学来研究非理性现象，是毫无意义的。根本就没有为这样一门新科学留下未曾开垦的领域。

社会科学当然是理性的。所有的科学都是如此。科学是运用理性以求对现象进行系统的描述与解释。没有不基于理性的科学。对非理性科学的憧憬，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

终有一天，历史会从历史观点上将“对理性的反感”理解为过去数代以来的一个历史因素。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杰出的贡献业已发表。

经济学理论不是完善的。人类的工作不是为永世不朽构筑的。新的法则可能补充或取代旧的法则。然而，当今经济学的缺陷却并不在于它未能掌握那些所谓非理性因素的重点与意义。<sup>[20]</sup>



### 第三章 人的行为科学中的 认识论的相对主义

---

直至 18 世纪，历史学家几乎忽略了他们那门学科中的认识论上的问题。研究自己的主题时，他们再三提及某些规律性——如同他们自己以及大众没有根据地假定的那样——适用于人的任何行动，不论行动的时间、地点以及行动者的个人特质与思想如何。但是他们未曾提出一个问题：规律性在人的行为的本质中，究竟是外在的还是本身固有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人不能获取他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他们却未曾问道：人的能力的界限是否完全是由自然法则和神对人的奇迹般的干预和人的更为强大的超级能力所设定的？

如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历史学家也区分出符合和违反道德法则的行为。然而，也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不遵守伦理法则并不必定——在此生中——导致不能达到目的。无论在神的最后审判日及以后在罪人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历史学家也不得不认识到，这个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时过得很好，比许多虔诚的人过得还要好。

当经济学家发现在市场现象的次序与互相依赖中存在规律性时，一种全新的视角出现了。这是迈向关于人的行为的一般理论，即“人类行为学”的第一步。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了下面的事实：为了成功，人类不仅要服从自然法则，还要服从人的行为的特殊法则。即使是强力政府管辖下的最有效率的警察也不是万能的，虽然从自然法则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显然，这一新科学的主张从三个角度来看都富有挑战性。首先就是所有的政府。暴君以及民众的大多数并不乐于得知他们的力量是远非绝对的。他们不断地实行因忽略了经济学法则而注定要失败的政策。但是他们并没有吸取教训。相反，他们雇用成群结队假冒的经济学家来批驳“抽象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学的空洞的——学说。

然后，有一些伦理学理论指责经济学是伦理唯物主义（**ethical materialism**）。在他们看来，经济学所教导的是人应该只关注或最主要地关注感官的满足。他们固执地拒绝了解经济学在最终目的的选择上是中立的，经济学只研究为达到所选目的所用的方式，而不论这些目的到底是什么。

最后，一些学者以所谓的“非历史的方式”为由来反对经济学。经济学家声称，经济学的法则绝对正确；他们断言，在人类事务的进程中有某种东西一直在发挥作用，在历史的大潮中，这种东西却岿然不动。在许多学者看来，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接受这种说法必定使历史学家们的研究陷入极度的混乱中。

在应对这种相对主义时，我们应该考虑到：这种相对主义的流行，不是出于认识论的考量而是实用的考量。经济学指出：许多被寄予厚望的政策不能达到政府预期的目标，却产生了其他的结果，从那些在支持与执行这些政策的人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比这些政策试图要改变的情形还要糟。从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措施与其目的南辕北辙，抛弃这些措施将能造福于所有人的得到正确理解的或长远的利益。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眼前利益得到照顾的人，痛苦地谴责“沉闷的科学”。某些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在认识论上的疑虑，在希望保留特权的贵族与地主以及试图获取新特权的小企业与雇员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反应。于是，欧洲的“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获得了通常拒绝任何理论学说的政治人物和大众的支持。

不过，确认这一事实决不能引诱我们无视这里所涉及的问题的严肃性与重要性。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像某些历史相对主义者，比如在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sup>[1]</sup>和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表现的那样，并不是由政治热情所激发的。历史相对主义的这两位突出代表，在他们那个年代德国大学的环境里，已经算是没有受热衷干预主义政策的激情的影响了，也没有表现出针对外国，即英国、法国、

奥地利经济科学的沙文主义偏见。此外，克尼斯·写有一本关于货币与信贷的杰出的著作，韦伯<sup>[2]</sup>则通过证明价值判断的非科学性质，而给予施穆勒和布伦塔诺<sup>[3]</sup>学派所应用的方法以致命一击。因此，在历史相对主义支持者的论点中，当然还有一些东西需要予以阐明。

## 二

在分析针对经济学中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而提出的反对意见之前，有必要指出：基于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而反对经济学的理由，与实证主义者反对历史学家实际使用的方法的理由，是没有关系的。

从实证主义的观点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仅是闲谈，充其量也就是这些历史学家不知道应该如何运用的大量资料的堆砌。真正需要的是决定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的法则之科学。而只有运用使得物理学可以从经验中得以形成的同样的研究方法，才能发展出这样的科学。

几位德国哲学家的成就就驳斥了这种关于历史学的实证主义理论，首先是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和海因利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他们指出了历史学(即人的行为的记录)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别究竟是什么。人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它以实现所选择的明确目的为目标，而历史学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强调，且仅在这一意义上——是目的论的(finalistic)。但自然科学中没有目的与最终原因之类的概念。

还有第二种根本的差别。在自然科学中，在实验室中，我们可以观察只改变一个因素而其他的因素——其变化可能引发某种后果——保持不变所得到的结果。这样，发现自然科学称之为经实验证实的经验事实就成为可能。这样的研究技巧在人的行为领域中是不存在的。关于人的行为的经验都是历史的，也就是说，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变化之复杂现象的经验。这样的经验不能产生与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事实”一词所指的事实。它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法则。如果它不能被源于历史经验之外的理论加以解释，那么，它就永远是一个谜。

时至今日，李凯尔特和他所属的“德国西南哲学学派”(South-western German philosophers)中的其他学者，或者是与这一学派

有共同观念的历史学家，都不再如同这最后的结论那样走得那么远。对这些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大学中的教授们而言，还没有听闻这样的思想：不论时间、地理、种族的或民族的特征如何，居然有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科学，它竟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于生活在德意志第二帝国那种精神氛围下的人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抽象”的经济理论的主张是空洞的，德国的 *wirtschaftliche Staatswissenschaften*（意即“政治学的经济方面”）——它完全是历史性的学科——已经取代休谟、亚当·斯密、李嘉图学派的空洞概括。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人的行为——除开神学、伦理学和法学——只能借助历史学才能予以科学地研究。他们的极端经验主义使得他们未曾注意到有关人的行为的先验科学的可能性。

狄尔泰（Dilthey）、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及其追随者们所摧毁的实证主义教条，并不是相对主义的。它要求形成一门学科——社会学——源自对于历史所提供的经验数据进行的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知识，这样一套知识对于人的行为领域对于人的思想所提供的用处，这些知识有助于人们理解人类行动。这些德国哲学家证明：这样一门普遍的人的行为科学不能通过先验论证来阐明。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它可以是一种先验推理的产物。

### 三

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在于，他们试图将“纯粹的经济性活动”与人类所有其他的感兴趣的事情和行动截然区分开来。他们的伟大成就在于发现市场现象的相互联系与前后相续中存在着一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可与自然事件的相互联系和前后相续中的规律性相提并论。尽管如此，由于未能解决价值的评估问题，他们在研究市场及其交换比率时止步不前。他们认为，在人们的交易中，交易物并不是根据其效用来估价的，否则“铁”就应该比“金”贵重得多。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样明显的自相矛盾只是由于他们表述问题的错误方式。行动中的人进行价值判断时，并不谈到同样的“铁”和“金”，而总是谈论确切数量的每种金属，在这两个量之间，行动者不能同时拥有，因而被迫进行选择。古典经济学家没有发现边际效用法则。这个缺陷使他们没有将市场现象追溯到消费者的决策那里。他们只能研究商人的行为，而对于商人而言，消费者的估价仅仅是数据。“拣最便宜的买，到最贵的地方卖”，这一著名的规则只对商人有意义。对于消费者而言，则毫无意义。

于是，古典经济学家被迫将分析仅限于商业活动，从而创立了财富科学的概念，或曰财富的产生与分配科学的概念。根据这一定义，财富指可以被买卖的一切。获取财富的努力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活动的领域。从这一科学的角度看，人感兴趣的所有的东西，都只是扰乱性因素。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也很少有几个人对经济学这样的研究领域表示满意。但他们寻求一个更满意概念的努力未能成功，直到最后，边际效用学者才提出了主观价值理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们种种流产的努力。只要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被认为是经济学分析的主题，那么就必须区分人的经济活动与非经济活动。这样，经济学就成为了仅研究人的一部分行动的知识之分支。在此范围之外的人的行为，经济学家就无从发言。这门新兴学科的内行拒绝研究那些在他们眼里已经超出经济学范围的人类关心的种种事情，在很多局外人看来，正是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些经济学家受到目空一切的唯物偏见的主宰，对于人类关心的这些事情漠不关心。

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讲，由于有了对价值评估的主观解释理论，事情就不一样了。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性与所谓的非经济性目的之间的差别，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最终消费者的价值判断表达的不仅是对更多有形物质的追求，也有并不比前者为少的对人类所有的其他关切的追求。物质财富科学的狭隘观点被超越了。从有关财富的科学中发展出了由行动的人做出选择的普遍理论，关于人的任何一种行动的一般性理论，即人类行为学。人们在市场的行为表明了，他们不仅想要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还想满足至少同样多的其他偏好。市场价格反映的不仅是人的“唯物的一面”，还有他的哲学的、伦理的、宗教的思想一面。遵守宗教戒律——建立和维护礼拜场所，节日不再工作，长期或在特定的日子或几个星期斋戒，禁绝酒类与烟草，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此等等一是决定消费品供需因而决定商业行为的因素之一。人类行为学对个人希望达到的终极目标而言是中立的。它不研究终极目的，而研究达到目的的手段。它所感兴趣的仅仅是所采取的手段，到底是否适合于所追求的目标。

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出版的反对经济学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其论点可归结为一个。这些文献的作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一个真正的人、行动着的人，不仅追求更多的物质享受，还追求某些其他的——更高级的或更崇高的理想——目的。从这一观点出发，

自称为历史学派的学者们攻击他们称之为经济学说的绝对主义，同时支持相对主义的方法。本文的主题不是探究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是否真的忽略了人的非物质性的关切。但应该强调的是：历史学派的所有反对理由，例如克尼斯在其著作<sup>[4]</sup>中所提出的理由，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教义而言，均是无用的和不正确的。

人们一般在德国政治学文献中区分出老历史学派与新历史学派。<sup>[5]</sup>罗舍尔(Roscher)、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还有克尼斯，是旧历史学派的旗手。施穆勒(Schmoller)在德意志帝国于1870年建立之后在德国的多所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新学派中包括施穆勒的追随者。这种将思想史划分为不同阶段的方式，是狭隘的本土观念的结果，这种观念诱使德国学者轻视所有外国学术。他们未能认识到，从“历史主义”角度反对所谓经济学的绝对主义的思想，源于德国之外。它的突出代表是法国的西斯蒙第(Sismondi)<sup>[6]</sup>，而不是罗舍尔和希尔德布兰德。不过，更重要的是要认识下面的事实：在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批判经济学说中的唯物主义的著作出版之后，德国及其他国家事实是与风车大战。

#### 四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有关人的行为的普遍科学的概念——他称之为社会学——已不再提及经济行动与其他行动的区别。但是韦伯区分了真正理性的行动与其他各类行动，这事实上认可了历史相对主义所提出的对经济学的理据。他的学说与德语中的一些无法翻译的特殊词汇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用英语来解释其学说极为困难。

韦伯区分了“社会性行动”与其他类型的行动，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角度看，这一区分其实并不重要。要紧的东西在于，韦伯十分正确地区分了意向性行为(sinnhaftes Handeln)与纯粹由生理因素决定的人体的自然反应。“意向性行为”是由行动着的个人赋予该行动的意向(Sinn)所指挥的；我们可以这样翻译：是由行动者赋予该行动的意义，是由他所欲透过该行动达到的目标所指挥的。这种区分看起来似乎是人追求某一明确目的的行动与人体内的神经和细胞的生理——半自动——反应之间那种再明显不过的区分。不过，这之后，韦伯继续在意向性行为中又区分了四个小类，第一类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是旨在追求某一确定目的的行动。第二类叫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wertrationales

Handel)),是由基于对某种行为方式——伦理、美学、宗教或其他原则的角度所具有的——内在的绝对价值(unbedingter Eigenwert)的信念所决定的行为,而不管这些行为能否成功。韦伯没有看到的是,遵守确定的伦理、美学和宗教观念而进行的努力,也一样具有某种目的,跟人们可能会竭力追求的其他目的并无不同。一位画十字的天主教徒,一位在赎罪日不进食、进水的犹太教徒,一位为了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而忘记吃饭的音乐爱好者,他们都在追求某一目的,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这些目的比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放弃之物要更为可取。只有本人的价值判断,才能否认他们的行为是目的合乎理性的,也即不是在追求某一确定的目的。根据韦伯的定义,“不管是否能够成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天主教徒之所以画十字,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将引导他走向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成功的世俗目标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马克斯·韦伯这位杰出的宗教史家,试图将德国的社会学思想从其天真的价值判断解放出来的人,却竟然没有认识到他的学说中自相矛盾之处,这实在是一个悲剧。<sup>[7]</sup>

试图区分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其他努力同样地基于某种愚蠢的错误认识,也同样地失败了。其中的大多数观点将由错误的想法和期望(就方法的效果而言)所激发的行动称之为“非理性的”。因此,魔法在今日被称之为非理性的。它们当然不适用于所追求的目标。然而,运用这些方式的人们自己却认为,它们是正确的技巧,正如直到上世纪中叶,医生相信放血是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的方法。谈及人类行为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行动者看来,他的行为与其目的完全相称,不论一位更为见多识广的旁观者或历史学家是否赞同他的观点。当今的医生治疗癌症的方法并不是非理性的,虽然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会发现更为有效的治疗与预防方法。如果一份关于他人行动的报导将“非理性”一词用于一个人的行为,而这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少于记者,那么,这份报导将会令人疑惑。没有记者能够声称自己全知全能,他至少得在他称之为非理性行动的定性前加上一句:“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非理性的”这一称号被使用的另一种方式不是针对手段,而是针对有明确行为模式的目的。因此,一些学者要么以赞成的态度,要么以反对的态度,将某些人的行为称之为“非理性的”,这些人偏好宗教的关切、民族独立或其他所谓的非经济性的目标甚于更多物质上的满足。针对这种高度不适宜的、令人迷惑的术语,有必要再

三强调这一事实，即没有人有权就终极目的而对他人的价值判断做出判决。当胡格诺教徒宁愿失去所有财富，宁愿接受最残忍的惩罚，宁愿被流放，也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之为盲目的信条之时，他们的行为并不是“非理性的”。路易十四驱逐其版图内许多最富有的公民以求符合他的良心准则之时，他也不是“非理性的”。历史学家可能不同意迫害者及其受害者的终极目的。但这并不能使他得以称他们为达目的而诉诸的方式为“非理性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二词，在用于目的与用于手段时，一样地不适当。就终极目的而言，一个凡人惟一能断定的就是从自己的价值判断出发，是赞同还是不赞同。就手段而言，则只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手段是否适合于所追求的目的。

我们当代的绝大多数人都受这一理念支配：所有罪行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诉诸于暴力来迫使一个人按其所不齿的宗教或政党学说的戒律来行动。但是，历史学家必须记录在案的是：在很多历史时期，只有一小部分人笃信这一点，狂热的君主和民众则掀起了无法形容的恐怖。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路易十四宣布新教为非法，在法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但他需要同时指出，国王并不知晓他的政策会导致这些后果；即使他的确预见到这些后果，他也可能认为，实现宗教统一是一件好事，而所付代价也并不太高。过去的随军医生尽力挽救伤兵的生命。但是他们的医疗知识却是令人痛心是不够充分。他们为受伤的人放血，事实上是要了他们的命，因为输血本可以救活他们。由于无知，他们的治疗与其目的正好相反。但称这样的行动为非理性的，显然是误导和不适宜的。今天的医生不是非理性的，虽然未来的更见多识广的医生可能会认为，现在的医生所用的治疗技术是有害的，并与其目的南辕北辙。

## 五

不论何时只要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被用于终极目的，就意味着支持某一目的之选择的价值判断，要么得到谈论者或作者的首肯，要么得不到其赞同。现在，价值判断的颁布不是人类行为学家、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的事情，而是宗教、形而上学、伦理学的任务。宗教的历史并不是神学，神学亦不是宗教的历史。当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被用于手段时，就意味着谈论者或作者认定，所讨论的手段不能为其目的服务，也就是说，不适合于诉诸此种手段的人的目的。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当然是研究人们用来达成目的的手段之有用性。



同样理所当然的是，人类行为学和他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分支即经济学的主要实际目标在于区分适用于目的的手段与不适用于目的的手段。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用“理性”与“非理性”来作这一区分，是不适宜的和令人困惑的。

就心理分析学者运用“理性”与“非理性”二词的方式而言，上面所述同样成立。他们“称主要为感情的或本能的行为为非理性的”，更进而称之为“所有的无意识的功能”，并在这一意义上区分“非理性的（本能的或情感的）行动和理性的行动以及非理性的与理性的思维”。这一术语是否适用于治疗学的问题，可能由心理分析学者来决定了。从人类行为学的观点来看，人体器官的自发反应和受本能驱使的活动不是行动。另一方面，称情感的行动——例如，一个人由于意识到同胞的不幸而产生的反应——为非理性的，显然是个人价值判断的结果。更为明显的是：“非理性的思维”只能表达这样的意思，即逻辑上不成立且导向错误结论的思维。

## 六

历史相对主义的哲学——历史主义——未能看到这一事实，即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一方面，它构成了历史学或区别于其他事件的历史事件领域，另一方面，这些东西使得人们可以处理这些事件，也即记录这些事件的前后相续并试图发现其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能够理解它们。这一不变的现象就是一个事实：人对他所处的环境（包括他自己身体的状况）并非无动于衷的，他尽可能地以有目的的行动来改善他的处境。一句话：人采取行动。仅这一点，就将人的历史与人类行动领域之外的变化的历史区分开来，与“自然历史”及其种种子分类，例如地质学或物种的演化区分开来。在人的历史中，我们研究行动者的目的，也就是研究终极因。<sup>[8]</sup> 在自然史中，如同自然科学的其他分支中，我们对终极因一无所知。

人类所有的智慧、科学与知识仅研究宇宙中可用人的头脑来感知和研究的一部分。在谈及人的行为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事物时，我们所指的仅仅也就是这一部分的情形。有学者假定，宇宙的状态可以以一种我们一无所知的方式演变，还假定我们的自然科学所言的，例如关于钠和杠杆的行为，在这一新的状态下可能不成立。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否定“化学与机械学的命题具有任何普遍性”，并暗示，它们可以作为“历史命题”来看待。<sup>[9]</sup> 这样一种不可知论的超级历



史相对主义〔agnostic hyperhistoricism〕研究的是——正如他们坦率地所承认的那样——关于我们并不了解、也无从了解的东西的空想状况，在这里，理性与科学是无用武之地的。

思考中的人用以看世界的头脑，并不是洛克式的白纸（Lockian paper），任由现实在其上书写自己的故事。他头脑的这张纸有一种特殊的性质，能使人将感觉到的原材料转换为知觉，将知觉到的数据转换为有关现实的图像。正是这种特殊的性质或人的智力，即人的头脑的逻辑结构，使得人有能力比非人类的生命形态对这个世界看得更多。这种能力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是有帮助的。但是，仅有它，还不能使人从他的伙伴的行为中比从星星或石头的行为中、从变形虫或大象的行为中发现更多东西。

在与他人相处时，个人不但诉诸于逻辑的推理（a priori of logic），也诉诸于人类行为学的推理（praxeological a priori）。自身就是一个行动的生命体，他知道追求自己所选的目的意味着什么。他在伙伴的鼓舞与刺激中所看到的東西，要比他在非人类的环境的变化中所看到的東西要多得多。他能探索伙伴的行为的目的之所在。在他的眼中，有一种东西可以区分在显微镜观察下液体里的细菌的运动，与在纽约中央车站的高峰期时可以观察到的人的运动。他知道，一个人匆忙行走或闲坐必有原因。他用以观察他的人际环境的工具是智力性的，这一工具在观察他的非人际环境时是不需要的——或更准确地说——完全会阻碍他。这一特殊的智力工具就是人类行为学的推理。

历史相对主义者的激进经验主义因忽视了这一事实而误入歧途。任何关于人的行为的报告都不能不用到人类行为学的推理。的确存在着某种原理，它对于人的所有的行动，无论时间、地理，以及行动者的种族、国家或文化的特性如何，都是成立的。不提及目的与手段、成功与失败、成本、利润或亏损等等范畴性概念，就不能研究人的行为。李嘉图的协作定律，也就是更广为人知的比较成本定律，所阐明的原理对于任何基于劳动分工的人的自愿合作，均是成立的。那些受到嘲笑的经济学定律所阐明的，正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定律所预示的条件得到满足。

不管是否情愿，人们终会认识到，他们有所不能，因为有些事情与自然法则相违。但是他们却羞于承认：即使最强有力的政府也有所不能，因为有些事情与人类行为学的定律相违。

## 七

与羞于承认人类行为学推理的历史学家有所不同的是属于形形色色的历史相对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和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们。如果这些学者立场坚定，他们会将其研究仅限于所谓的经济史；他们将仅研究历史，并小心地克制自己不对未来作任何断言。只有具备了对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之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这一认识对于所有行动均成立，而不论行动发生的时间、地理和文化环境如何，才能对未来事件做出预测。沉迷于历史相对主义或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他们是为本国政府还是为落后国家的政府提供意见。如果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以用于阐述一定的行为方式的必然结果，也就没有办法做出预言，也就无从建议或反对一项为取得某种确定结果的措施。

同样地，当一些学者反对这一观点，即存在着对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均成立的经济学法则之时，他们却假定，每一个历史时期有各自的经济学法则，且这样的经济学法则有待通过研究所涉及时期的历史，通过归纳来发现。这些学者或许会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成功地发现了控制直到昨天为止所有事件的法则。但是一——从他们自己的认识论学说的观点来看——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假定，同样的法则也会决定明天会发生什么。他们有权确定的是：过去的经验表明 A 导致 B；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明天 A 是否会导致 B 以外的某些效果。

否定经济学的另一个变种，则是趋势学说。其支持者漫不经心地假定，过去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将会持续下去。然而，他们不能否认，在过去的时代，趋势本身也确实在发生变化，也不能否认，当前的趋势不会在某一天改变。因此，当关注当前趋势持续性的商人咨询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时，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他们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都是：统计学向我们表明，你感兴趣的趋势到我们最近的统计数据所指之日仍在继续；如果没有干扰因素出现，没有理由相信趋势会改变；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新因素出现。

## 八

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即历史主义的基本学说，与其他思想学派的伦理相对主义清楚地区分开来。有学者将人类行为学

的相对主义与伦理相对主义相提并论。但也有学者在赞成伦理绝对主义的同时，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行为学法则。因此，历史学派经济学及历史学派制度主义的许多学者从他们认为不可辩驳的、永不改变的道德规则——也就是说从财富与收入的平等的观点来对历史做出判断。在他们某些人的眼里，私人产权是道德上应予反对的。他们谴责经济学家给予物质财富所谓的赞扬而蔑视更为高尚的关切。他们谴责私人企业制度是不道德的，而因社会主义具有所谓的更高的道德价值去提倡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苏俄比崇尚物质财富的西方国家更符合伦理的不可变更的法则。

与这种情绪性的议论相反，有必要再一次指出：人类行为学及其最发达的分支即经济学，对于道德规则而言是中立的。它们研究行动者追求目标的努力，而不考虑从何种观点来看这些目标是否可以接受。绝大多数人偏好更多的有形财富而不是更少的有形财富，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这一事实在经济学理论中并无一席之地。经济学既不提倡资本主义，也不反对社会主义。它仅仅试图证明这两种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什么样的。不同意经济学学说的人应该驳斥其中的不严谨论证，而不应使用辱骂、暗讽或诉诸于武断的也就是所谓伦理的标准。<sup>〔10〕</sup>

## 第 二 部 分

# 货 币

## 第四章 货币在经济财货中的地位

卡尔·克尼斯曾经建议用生产资料、消费品、交换工具的三分法来代替将经济性财货（**economic goods**）分为消费品与生产资料的传统二分法。<sup>[1]</sup> 这种分类方法术语上的问题，应该完全根据其是否具有促进科学工作的作用来决定；定义、概念和现象的分类法需要在使用这些术语的研究之结果中证明。当用这些标准衡量克尼斯所提议的分秀与术语时，可以明显看出其提议极为恰当。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不用到这些术语的交换学（**catallactics**）理论。<sup>[2]</sup> 货币的价值理论总是获得特殊的对待，并被分离出来，为的是解释生产资料及消费品价格的形成，虽然货币价值理论显然是价值与价格这一整体理论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并不是有意识地使用克尼斯式的术语与分类，但在所有重要的讨论中，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是我们已经完全采用了这些术语一样。

但是也有必要注意到货币在所有经济财中的特殊作用——如果有任何特殊性的话——被过度强调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决定货币购买力的问题受到这样的对待，就好像这些问题与非货币性交换问题毫无共同点，或仅有微不足道的共同点。这造成了货币理论的特殊地位，而这对于经济学的理解之发展却是有害的。时至今日，我们仍见到不断有人试图为货币理论没有根据的特殊性进行辩护。

罗舍尔曾说过，“货币的错误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货币优于最容易售出的商品，一类认为货币劣于最容易售出的商品”<sup>[3]</sup>，这一评论经常被引用。他的评论不仅仅适用于货币定义的问题。即使那些认为货币理论是交换学一部分的人，在强调货币的特殊地位时，也走得太远了。我们科学的这一分支已经有太多的难题了，并

不需要再去构造什么人为的问题；现存的问题就已经构成了充分的挑战。

### 一、货币性服务与货币的价值

外行的一个天真的观念是，任何东西本身都有其价值，也就是有其内在价值。这种观念必定导致这样一种立场：在货币及货币的替代物之间划分出一条界线，这一立场和一件东西的价值来源与其效用的立场是不同的。那些认为价值是事物本身内在固有的属性之结果的人必定会对具有物理价值的货币，与本身并无物质价值而仅提供货币服务的交换工具做出区分。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导致将正常的货币与恶劣的、不正常的货币对立起来，事实上，后者根本就不被当作货币。

今日已经没有必要来讨论这种理论。对于现代的主观价值理论而言，问题早就解决了。没有人仍然会公开辩护说，价值的一部分或全部以及价格理论是基于内在的交换价值的，也就是说，是独立于行动中的人的估价。一旦承认这一点，也就等于已经接受了主观价值理论的根本原则，也就是边际效用的原则。

对于近代科学出现以前的经济学家——重农学派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将货币的价值理论与其他货物的价值理论结合起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目空一切的唯物偏见，他们认为，价值源于货物“客观的”有用性。在这种观点看来，可以充饥的面包与可以御寒的布料为何有价值是很明显的。但是，货币既不能果腹也不能取暖，其价值来源于何处呢？一些人回答说来源于“约定俗成”（convention），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货币的价值是“虚构出来的”。

这种观点中的错误早已被发现。约翰·劳（John Law）的讲法最简洁。如果所有的价值都源于有用性，那么，采用贵重金属作为交换工具这一做法，必定使贵重金属得以产生价值。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用作货币的金属之价值源自其货币性功能而要说其价值是虚构出来的，那他也不得不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虚构出来的：

一件东西的价值仅存在于它对于我们的用处及我们赋予它的预期，并与数量成正比。<sup>[4]</sup>

在这几句话中，劳初步提出了主观价值理论；他在我们的学科

发展历史中应有的地位不应被埋没。他未能将他的重要思想全部发挥，或他在累累错误甚至罪行中迷失，这些都不降低其成就的重要性。

在他之后的研究者们也未能充分利用劳所提出的显然极为重要的观点。我们仍然会碰到三个方面的糊涂认识：

首先，一些学者从根本上否认由货币所提供的服务能够生成价值。不幸的是，他们未提供理由来支持为什么货币服务应该不同于由食品与衣服所提供的服务。由“纸币”所造成的困难可以绕过，只要视“纸币”为真正的也就是“物质上”有价值的金属货币之凭证。“纸币”兑换率的浮动可以用铸币支付的概率之变化来解释。考虑到过去十年来货币理论的发展，我认为，挑战这一理论是无事生非。我已经给出了经验主义的驳斥，还没有遇到充分的反驳。<sup>[6]</sup>

在某种意义上看，第二种错误与第一种错误是有联系的：否认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货币其“实质”就是提供货币服务而无任何其他功能。通常而言，货币服务可以产生价值，正如其他服务一样。克尼斯坚称：如果金银在未被用于货币服务之前，未能作为经济财满足人类的需要，一种普遍的需要，一种被广泛感受且持久稳固的需要，那么，金银将会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一样，不适合担当货币的功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我们毫无保留地予以同意。

<sup>[6]</sup>但是，当克尼斯继续说，“光说贵金属的这一原始用途先于其货币服务的用途是不够的。这一原始用途还必须要持续下去，否则，贵金属块将失去其作为货币的功用……如果人们停止使用金银满足他们对于珠宝或装饰品等等的欲望，那么贵金属的另一用途，即作为交换工具的用途，也就会消失”时，这却是错误的。<sup>[7]</sup>克尼斯未能成功地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一种作为普遍使用的交换工具的经济财，仅仅因为它的其他用途逐渐消逝，居然就失去其作为货币的能力，这其中的原因，决不是显而易见的。

要采用一种商品作为交换中介，就需要这种商品以前曾被用于其他用途或消费，这种看法源于下面的事实：要使它满足作为交换工具的特殊要求，它必须已经具备某种客观的交换价值。当它开始作为交换工具时，这种客观的交换价值——这一价值以后将由对这种商品作为交换工具的需求加上对这种商品“其他”用途的需求来调整的——只能以它在“其他方面的”用途为基础。但是，一旦一种经济财成为货币，那么，对于货币的特殊需求，就会融进市场中

货币与商品间业已存在的交换关系中，即使由其他用途引发的对于这种作为货币的财货（money-good）的需求已经消失。

人的精神将自己从唯物主义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极其缓慢而困难，而唯物主义思维模式导致人们一直抵制一种观念：即一种商品被采用作交换中介，就跟该商品任何其他可能的用途一样，也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能够习惯一种价格，并且能够改变这种价格。如果某物满足人需求的能力，以及对这种能力的认知，要以该物的财货属性（goods-quality）为前提<sup>[8]</sup>，那么，人们也就接近于将经济行动的对象区分为“真实的”与“不真实的”财货。只要经济学家承认上述立场，那你就失去了立足之地，于不知不觉中滑出科学客观性的领域，进入伦理性的价值判断、道德和政策领域。在那里，他会认为仅仅“被认为有用”的东西也是“客观上有用的”的东西。他将详尽地考察，被认为有用的（也因此被相应地对待）东西，在“客观的”意义上是否有用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有用的。只要他走出这么远，那么，惟一符合逻辑的就是问一个问题：由一种财货提供的效用，是满足一种真实的需要还是假想的需要？这种思维方法可能导致这一观点，即贵金属（只能满足对于珠宝的欲望而不能满足生理需要，例如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食物与衣服无可辩驳地满足着生理需要）的价值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是不适当的社会制度与人类虚荣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这样的结论：贵重金属的价值被承认是合理的，因为，对珠宝的欲望也是“实在的”和“正当的”。他们并不否认这种贵金属的客观效用；相反，他们对货币提供的服务之前提条件的一般正确性提出质疑，因为，社会一度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存在过，不管怎么样，这样的社会总是可以设想的。“财货属性”要求具有某种“天然的”、不受任何预先假定的社会秩序之特殊要求约束的效用，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但还有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它试图因货币在表现其货币功能时并不失去可用于其他目的的能力，换言之，就是因为货币的“实质”在它被用作货币的服务中并未耗尽，而否定货币性服务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

所有否认货币的功能具有决定其交换价值的能力的人，都未能认识到，惟一决定性的因素是需求。存在着对于货币——这种最适于容易交易（最容易售出）的财货，其他财货的所有者愿意以之进行交换的财货——的需求，这一事实就可以创造价值。



## 二、货币供应与需求：货币的流通速度

在货币理论不正确地偏离直接交换理论的种种情形中，最糟糕的是未能将货币的价值理论之根本问题的分析，建立在货币总量与个体经济单位对它的需求之关系上，或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与供应的关系上。相反，这样的分析总是从货币单位对于总体经济的客观效用开始，这种效用体现为货币相对于货币总量的周转率，然后，又以它与交易总量作比较。

从财政学派<sup>[9]</sup>一脉相承而来的旧的倾向似乎难以根除，他们倾向于从整体而非从采取行动的人的角度来分析“国民经济”中的经济问题。尽管主观主义的经济学家不断发出警告，我们仍然连绵不断地看到故态复萌。伦理的判断在科学客观性的伪装下出现，这只是更小的罪恶中的一种而已。例如，生产性活动（也就是在一个由批评家所领导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被执行的活动）被拿来与逐利性活动（也就是某种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社会中的个人的行为）进行对比。前者被认为是“正义”的生产方式，后者被视为是“不正义”的生产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根据总体的社会经济来思考的话，那他就永远不能理解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坚持认为，个人的行为只有可在个人所处的环境之框架内被理解，这一点可以证明集体主义方式的必要性，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经济分析并不依赖于对行动的动机之心理学上的理解，而仅依赖于对行动本身的理解。对于交换学而言，面包、衣服、书籍、大炮或其他宗教器具为什么在市场上有需求是不重要的；惟一重要的是一定的需求确实存在着。市场的机制，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仅当从市场T中运行的力量出发思考时，才能被掌握。但是，在市场中，只存在作为买方与卖方的行动的一个人，从来没有所谓的“总体”。在经济理论中，总体仅能从经济协作组织（economic collective）的意义上考虑，在这里，生产资料完全在交换的范围之外，并因而不能出售以换取金钱。在此，既没有价格理论也没有货币理论的存身之地。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掌握集体主义经济的价值问题，我们只能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运用后来被称之为“个人主义的方法”的分析方法。

依靠考察总体经济而非市场要素来解决货币价值问题的努力发展到极至，就得出了一个毫无认识论价值的同义反复的关系状态。只有能够显示买卖双方的主观价值判断如何受交换关系中不同要素

的变化影响的理论，才能被正当地称为货币的价值理论。

市场中的买卖双方从来不关心交换关系中的要素，交换关系中的两个要素即流通速度与价格水平在市场各方行动之前甚至就不存在，另外两个要素，即货币总量（在整个经济中）与交易总量对于市场中的各方而言，是不可得知的。只有市场中的形形色色的行动的人赋予自己所持有的现金余额的重要性及各种商品的所有权的重要性，才能决定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易关系的形成。

与货币流通速度概念有关的是一种头脑中的映像，即货币仅在交易的瞬间才产生有效用，但在其他时候却是“多余的”和无用的。当谈到货币贮藏并进而比较货币“贮藏”量与必须用于发挥货币服务性功能的货币量时，就区分出活钱与死钱；将前者与后者区分开来的是在活钱与死钱之间划出的一条界线。这两种区分都理应抛弃。

货币提供的服务并非仅限于交换。它不仅在交换时的换手中履行其功能。由于预期货币作为普遍运用的交换工具在贸易中所具有的未来的用途，因而货币在贮钱柜中一动不动时，作为最易售出的商品，也在履行其功能。个人以及整个经济对货币的需求由维持现金余额的欲望而非由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交易总量所决定。<sup>[10]</sup>

将货币存量分为执行货币服务功能的部分与作为货币贮藏的部分，这是武断的。当然，如果将对货币的需求分为对贮藏的需求与执行货币功能的需求，就不会产生什么危害了。但是，如果一个公式只能描绘和解决一个问题的人为划定的某部分，而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另一个公式能够以一种始终如一的方式研究和解决整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必须抛弃前面那个公式。

### 三、货币价值的波动

货币理论史上最奇特的现象之一是数量理论所遭遇的顽固反对。这一理论的众多支持者给出的有缺陷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受到反对，其中的许多支持者——例如本杰明·安德森<sup>[11]</sup>——将之归咎于这个概念的含义与普遍接受的含义截然不同。结果，他们所说的数量理论，以及他们所反对的数量理论，并不是该理论本身，而是该理论的一个变种。这并非特别令人惊奇。但是真正奇怪的是，直至今日，仍然有人试图否定在货币需求与货币供应间关系的变化，会改变货币单位的购买力。有一种解释，将这归因于那些因有关货币政

策的知识扩散而受到损害的通货膨胀论者、中央经济统制论者（statists）、社会主义者及公务员和政客的特殊利益，这是不充分的。采用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学派（Historical-Realistic School）的方法，我们永远也不能得到答案。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学派（追随的是马克思的榜样）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所有的思想。解释为什么某些相信自己会直接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得益（即使直接的利益还不足以弥补间接的损失）的阶级，发展和拥护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问题。需要解释的是：错误的理论是如何产生以及得到信徒的。许多人毫无根据地设想，一种政策要么使得全社会受益，要么使得社会中的某些集团受益，这是怎么发生的？

然而，这样的货币理论并不关注这些解释数量理论何以不受欢迎、而倾向于接受其他种种货币价值之解释的理由。相反，货币理论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反对数量理论的各种学说中，哪些要素可能是有用的？既然不能否认，供应的变化对于直接交换领域的交换关系之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性与间接交换领域的交换关系一样大，那么，一个人要反对数量理论，首先得从原则上承认该理论的正确性，然而，他们却争辩说：尽管这一理论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另一项原则通常会取消这一理论的正确性。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就试图这样做，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储藏理论（theory of hoarding）和从这一理论派生出的理论：货币的流通会自动调整以适应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货币需求。到今天，这两种理论都已经被推翻。

如同许多理论所遭遇的一样，数量理论的支持者比其反对者对这一理论的伤害更大。我们已经提到那些基于货币流通速度概念之上的种种理论的不足之处。至少同样错误的是将数量理论解释为货币数量上的变化导致商品价格成正比地变化。在货币供应与需求关系上的任何变化，都必定会导致在财富与收入分配的变化，因此，不同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不可能成正比地和同时地被影响，而这些都被人忽视了。

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运用从力学中模仿得来的公式而不是注意市场因素影响的问题，都不及在这一情形下发生得更为严重。经济学家希望不管货币量上和货币需求量上的变化而运算交换方程，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最初，仅有少量经济主体的估价和与之相伴随的行动受到影响，而由此导致的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之变化就会一步一步地在经济体中扩散。换言之，人们一直以“静力学”的方法处

理货币价值发生变化的问题，尽管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动态性质，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任何疑问。

### 四、货币的替代物

货币理论中，最困难同时也最重要的特殊问题是货币的替代物的问题。货币性服务也可以借助有保障的见票即付的货币索取权（**money claims redeemable on demand**）来实现，这一事实对于货币理论家试图定义货币供应与货币需求的努力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要研究与所有其他信贷形态不同的、通过发行信用媒介的方式的授信活动，则只要货币替代物没有被清晰地界定并被划分为货币流通券（**money certificate**）和信用媒介（**fiduciary media**），这一困难就不可能被克服。

那些不涉及到信用媒介（例如银行钞票或没有相应货币担保的存款）之发行的贷款，对于货币量而言并不重要。货币需求可能受到经济秩序中其他机构发放的贷款的影响。由于没有某一特定情形下的数据，我们不能说这种影响将在何种走向上起作用。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即信贷扩张总是导致对货币的需求下降，这是错误的。如果贷款合同中的许多合同规定了在某些日子中（例如月末或季度末）要作巨额偿还，结果将是对货币需求的增加而不是减少。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安排，或银行为在关键的日子增加信用媒介总量，则这种货币需求增加的后果将表现在价格上。

一切都依赖于对货币与货币替代物清晰的区分和在货币替代物这一类别中对货币流通券（有货币完全支持的货币替代物）与信用媒介（没有货币支持的货币替代物）之分区。但是，这首先是一个术语是否贴切的问题。然而，考虑到问题的困难与复杂性，这一问题就有了它的重要性。不是通常所主张的“授信”，而是影响价格、工资与利率的信用媒介之发行，才是银行学说需要研究的。因此，将银行理论视为有关信用媒介的理论，并无不当之处。

### 五、经济核算与“价值稳定性”的问题

有一种古老而被广为接受的认识，以为货币是价格与价值的衡量标准，对于现代理论而言，这种认识是不值得讨论的。但是，这一概念并不是对主观理论完全无害的忽视，它没有注意到货币对于

经济计算的重要性,也没有注意到经济计算问题的重要性。传统上,理论经济学区分出不借助媒介〔直接〕进行交换的理论,与借助媒介〔间接〕进行交换的理论。交换学的这种划分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种划分,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有用的结果。但是应该始终牢记:经济财在没有普遍使用的交换工具参与的情况下也能进行交易的假定,只有对所交换的是消费财及与消费财关联最近的最低等级的生产资料而言才是现实的。消费财及与之直接相关的生产资料的直接交易当然是可能的;这种交易过去曾有,今日仍旧存在。然而,更高等级的商品之交换就必须使用货币了。市场的根本就在于协调供需的各种要素,这一概念正是现代理论建立的基础,且必须以其为基础,如果没有货币的使用,那么,这一概念就是不可设想的。只有借助货币之使用,才有可能比较财货之各种不同用途的边际效用。只有在存在货币的地方,才有可能清晰地分析当前财货与未来财货的价值差异。只有在货币经济下,这种价值差异才可能被抽象地理解,即不受对具体的财货估价之变化的影响。在实物交换的经济中,利息现象从来不能与对个别商品的未来价格波动之估计相分离。设想在没有普遍使用的交换工具的情况下也能存在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这就像是一部类似于法伊欣格尔的“仿佛”理论(Vaihinger's "as if" theory)的幻想小说。<sup>[12]</sup>

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货币计算对于理性行为和社会合作的重要意义,这不是交换学而是社会学的任务。货币理论的领域足够广阔,即使仅限于对本领域内最紧迫的问题进行彻底研究,就已经够多了。

用货币来进行计算、用相应数量的货币来表示所有其他经济财的价格、将经济决策完全建立在货币单位的价值基础之上的做法,决定了货币在经济财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做法的结果之一是货币与商品间的对立,在习惯用语“高生活成本”中能看出这一点,在重商主义理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赋予货币这样突出地位的一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有人提出了货币的“稳定价值”的观点,这一观点尽管幼稚而又含糊不清,却仍然对货币政策有持久的影响力。

当认识到货币不具有“稳定的价值”时,就出现了一种政治性要求:货币应该具有稳定价值,或至少应该进行一番设计以使它尽可能地接近这样一种理想状态。金本位制以及金银复本位制的支持

者们曾经吹捧，他们的货币体系是对货币价值尽可能保持稳定的最好保障。许多建议基于这样的思想，即货币购买力尽最大可能保持不变，是货币政策的终极和最重要的目标。这种建议中的其中一个提出，创建一种商品货币（commodity currency）（即按物价指数确定币值的货币本位[tabular standard]），用于订立长期合约，以补充稀有贵金属货币。由欧文·费雪<sup>[13]</sup>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sup>[14]</sup>提出的建议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提议一种基于指数体系的“受操纵的货币”。

对于“稳定的价值”这个概念的缺点和基于其上的货币政策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就不必再次指出了。<sup>[15]</sup>在日常生活中，假如我们暂且忽略以后要仔细探讨的长期贷款合约，则经济活动主体在估计价值的活动中只考虑短期的时间周期。企业家的经济计算一般仅限于几个月或一年后。在经济计算中，只有可见的将来才能被预测和考虑。撇开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所造成的困难，想较为可靠地预见更为遥远的未来之经济状况，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购买力保持“稳定”的期望，源于人们在兴衰不定的市场中保护财富与收入的愿望。其目标是“永久地”维持财富与收入。那种农民式的心态认为，从土地那里可以找到一种藏富的手段。土地总是土地，农业收成总是悦人心意的；因此，就形成了这样的信条，即土地所有权就是一种能够确保稳定收入的财富。对于生活在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时代的我们而言，很容易就可说明这种观点的错误。一个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的自给自足的农民，确实可以“永久地”使自己与周围发生的变化隔离开来。但是，对于在一个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的社会中运作的企业来说，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资本和劳动必须投放于最好的地块上。在次等的土地上生产，不会产生任何净收益。当更好的土地大量涌现时，一些地块的价值甚至会急剧下跌或者完全消失。

这种类型的思维迅速从土地转移到了由土地所有权所保障的权利主张上。然后加进受保障的权利中的是，对国家和公法创造出来的其他东西的索取权。国家被认为是永恒存在的，而国家保证偿付的承诺，则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结果，政府债券作为将财富从生活的不确定性中转移到“永恒”状态中的一种方式应运而生。对于这种思想中的错误，我们无需再费口舌。仅需指出一点就足够了：国家也会灭亡，国家也会拒付其债务。

与通行的看法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没有自动产生回报的财富。为了从以生产资料之形式存在的财产中获得收入，则要么将财产投入到成功的企业之中，要么将财产贷给前景看好的企业家。但是对于企业家而言，成功从来不是“必然的”。一家公司可能衰落，投入其中的部分或全部资本则烟消云散。本身不是企业家而仅借款给企业家的资本家，面临的损失之风险比企业家要小；但是，即便是他，也承担着风险，即企业家所遭受的损失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不能偿还所借贷的资本。资本的所有权并不是自动产生收入的源泉，而是一种其运用成功才能产生收入的方式。一个人要从以资本形式存在的财产中获取收入，他就必须具备将资本作有利可图的投资的能力。一个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不能期待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获得收入；相反，他可能完全失去所拥有的资本。

为将这些困难与不确定性减少到最低程度，资本家购买土地、政府债务与抵押债券。但是就在这里，某种缺乏“稳定价值”的货币的缺陷就开始造成问题了。如果是短期信贷，则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对于权益价值之影响，就可以被消除，或至少会因短期贷款的市场利率随着财货价格的波动而降低。然而，如果是长期贷款，就不可能有这种调整了。

在寻求具有“稳定价值”的货币的努力之背后，有一个终极根源，它可以在创造一种能够将资本所有权从现世的世界中转移到永恒世界中的媒介的愿望中看到。但是，仅当经济体系的所有流动和变化都被消除时，才有可能解决价值稳定性的问题。实现货币与财货之平均价格间的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固定所有财货间的交换比率。

只要货币政策避免采取任何能够造成货币与商品间产生于“货币因素”的交换关系之剧烈变化的措施；只要货币政策选择一种商品性货币，其价值不会因其供应或因工业性与其他非货币方面的需求而突然波动；只要货币政策约束信用媒介的发行，那货币政策就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来减轻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所造成的负面效果了。如果货币政策被限制在这些任务上，那么，对于那些害处的消除而言，这样的政策比有意识地实现一种不可达到的理想之努力会更有建树。一个人要是理解“稳定状态”这个理论性概念的意义与含义，他就无法否认：任何试图将这种概念化的东西从经济理论的世界中引入现实生活中的努力，注定是不会成功的。<sup>〔16〕</sup>



## 第五章 货币的非中立性

16 世纪与 17 世纪的货币经济学家成功地消解了关于所谓的货币稳定性的种种流行谬误。旧的错误消失了，却诞生了新的错误，也就是货币中立性的幻象。

当然，古典经济学在处理这些错误时已经尽力了。大卫·休谟，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以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古典经济学家中的最后一位，都以出色的手法处理过这一问题。我们也不应忘记凯尼斯，正是他，在关于贬值的文章中为现实中所涉及的问题开辟了道路。<sup>[1]</sup>

尽管迈出了朝更正确的方向理解的第一步，但近代经济学家仍旧将货币中立性的错误融入了他们的思维体系中。

现代边际效用经济学是从纯粹实物交换状态的假设出发来进行论证的。商品交易与市场交易的机制被认为是基于只有直接交易占据主导地位的假定。经济学家描绘了一个纯粹假定的实体，一个没有间接交易、没有交换中介也没有货币的市场。毫无疑问，这是惟一可能的方法，即消除货币是必要的，我们不能没有直接交易的市场这一概念。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是一个假想的概念，在现实中没有对应物。实际的市场必定是间接交易和货币交易的市场。

货币中立的错误思想源于上面这种没有货币的市场之假定。经济学家是如此地喜欢这一假想的概念提供的工具，以致过高地估计了它适用的范围。他们开始认为交换学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应用这种假想的概念来分析。根据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分析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直接交易。在此之后，所剩下的就是将货币术语导入到所



获得的公式中。但是在他们眼中，这只是次要的工作，因为他们确信：货币术语的导入并不影响他们所描述的机制的实际运作。由纯粹实物交换的概念所展示的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是不受货币因素的影响的。

诚然，经济学家知道货币与商品间的交换比率会变化。但是，他们相信——这正是货币中立性之错误的实质——购买力的这些变化在整个市场中会同时发生，对所有的商品会产生同样程度的影响。这种观点中最惊人的表述，可以在最近关于价格的比喻性术语，即“水平”一词的运用中找到。货币供应或需求的变化一其他保持不变——使得所有的价格和工资同时上升或下降。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发生变化，但是各种商品间的价格关系仍维持不变。

当然，经济学家在一百多年间发展了指数的方法，以求量度在各种商品间交换比率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购买力的变化。但是，在这种做法中，他们也没有放弃一个假定，即货币供应或需求的变化之结果，是价格成比例地、同时地调整。设计指数方法的用意是为其提供一种方法，以区别两种价格变化造成的结果，其中一种变化起源于个别商品的需求或供给方面，而另一种起源于货币的需求或供给方面。货币中立性的错误假定是构建所谓的交易方程之公式的一切努力的根源。在研究这样的一个方程中，数理经济学家假定：方程中的一个要素变化，则其他值的相应变化必定随之发生。方程的要素不是个别的经济所关切的对象，而是整个经济体系所关切的对象。结果，变化不是发生在个人的层面，而是发生在整个经济体系的层面，是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层面。据此前行，经济学家不知不觉地运用了根本上不同于现代交换学方法的方式来研究货币问题。他们复归于更上一代的经济学家所运用的注定要失败的旧式论证方式。在那个时代的早期，哲学家在他们的思索中研究一般的概念，如人类和其他的一般概念。他们问道：金或铁的价值何在？也就是对于所有的时代与所有的人而言，总体而论价值何在；金和铁，不论是否现有的还是尚未开采的，总体而论价值何在。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只发现了他们无法解决的所谓的内省思考。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所有成就都要归功于这个事实，即我们已经学会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认识到，在市场中行动的个人从来没有机会在所有现存的金和所有现存的铁之间选择。他们不必决定是金还是铁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更为有用，但是他们必

须在不能同时拥有一定数量的金和铁之间选择。他们在决策时所处的情形下决定哪种选择更为有利。面临可选择项的个人做出的行动，是市场上所确立的交换比率的根本原因。我们须将注意集中在选择的行动上，而根本不该感兴趣于那个比喻性的、不切实际而且空洞的问题：在以超越人类经验的观点来审视世俗情形的超人智慧看来，总体而言哪种商品更为有用。

货币问题是经济学的问题，理应采用适用于其他所有经济学问题的方法来研究。货币经济学家不必研究一般的实体，例如表示总贸易量的贸易额，或表示整个经济体系中全部货币的货币量。他就更不必使用“流通速度”这样的模糊比喻。他要认识到，对于货币的需求源于市场形态的社会中的个人偏好。因为每个人希望有一定数额的现金，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一点，因此就有了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从来不是简单地存在于经济体系或经济中，货币从来不是简单地流通着。所有能得到的货币总是由某人以现金方式持有。货币中的每一张都可能在某天——有时更频繁，有时频次更低地——从一个人的现金持有变成另一个人的现金持有。但是在任何时候，货币总是由某个人所有，是这个人持有的现金的一部分。个人对现金持有量的决定构成了购买力形成的根本因素。

货币量的变化及因对现金持有的需求而产生的对货币的需求之变化，如果不在个体的家庭中发生，就不会在整体的经济体系中发生。在个别家庭中发生的变化不会以同等的程度同时发生于所有的家庭，因此，这些变化从不以同等程度同时影响所有人的价值判断。休谟与密尔试图构建一种假想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货币供应的变化能够以一致的方式影响所有人，即所有的商品价格将以同样的比例同时上升或下降。他们的努力失败了，这提供了负面的证据，而现代经济学则增添了正面的证据：不同商品的价格不会同时和同等幅度地受到影响。根据陈旧的数量学说和当代数理经济学家的过于简单的公式，价格，也就是所有的价格，会与货币量的上升或下降成比例地上升或下降。这种公式已经被推翻。

为简化与缩短我们的分析，就以通货膨胀为例加以说明吧。新增的货币量起初并不是到了所有人的腰包里；首先受益的人所得的数额并不完全相等，也并非所有人在得到同样数目的新增货币后会有同样的反应。首先受益的人——如果货币是黄金则为金矿主，如果货币为政府发行的纸币则是财政部——就有了比以前更大的现金

持有量，他们就可以为他们想要的商品或服务支付更多的货币。他们所能支付的新增货币之数使得市场上物价与工资上升。但是不是所有的价格与全部的工资都上升，而且上升也不会是同等幅度。如果新增的货币被用于军事目的，只有某些商品和一部分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其他会维持不变，甚至会暂时下降。这种下降是由于市场上某些群体的收入没有上升，但是却要为一些商品（也就是在通货膨胀中首先受益的人所需求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由通货膨胀引发的价格变化最初仅从一部分商品和服务开始，然后或快或慢地从一类商品扩散到另一类商品。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使新增货币量丧失其影响价格的能力。但是，最终，不同商品所受到的影响也不会是同等程度的。累进贬值的过程已经改变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与财富。只要贬值持续下去，只要新增货币量还没有丧失其影响价格的能力，只要还有某些价格根本就没波动或没有波动到理当波动的程度，在社会中就有受益的群体与境况不利的群体之分。出售价格最先上升的商品或服务的人可以售出更高的价格，同时，可以以未曾变动的原来的价格买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出售短期内价格不变的商品或服务的人则只能以未能提高的价格售出而必须出更高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前者得到了特殊的好处，后者则遭受损失，投机者就从后者身上榨取额外收益。只要通货膨胀仍在继续，财富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转移就不会停止。当通货膨胀的潜势消失殆尽，社会群体间的财富转移就业已完成。结果是经济体系中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布，在新的社会秩序中个人的需求得到相对满足的程度是不等的。新秩序中的价格不会简单地是以前价格的某个倍数。

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所造成的社会结果是双方面的：其一，由于货币是延期付款的标准，因此，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关系被改变了；其二，由于购买力的变化并不同时和同等幅度地影响所有的价格与工资，在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就发生了财富与收入的转移。稳定购买力的所有建议中的一个错误就在于没有考虑到第二点。我们可以说，经济理论总体上并没有对第二点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有什么重视的话，它仅在研究一国外贸中的货币变化之反应时才主要地考虑第二点。但是这只是一个有着更广阔范围的问题的一个特殊应用而已。

对于经济学理论而言，根本的一点是：在货币量的变化与价格变化之间没有恒定的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各

种价格与工资。价格“水平”的比喻式说法是误导性的。

相反，对于上述错误观点，我们可以作一下分析：让我们考虑两个绝对独立的静态均衡体系 A 和 B。两种体系在所有的方面都完全一样，除了对应于 A 中货币总量 (M) 和每一个人所持有的现金 (m) 在 B 中则为  $Mn$  和  $mn$ 。在这些假定之下，当然 B 中的价格与工资就是 A 中的  $n$  倍，但是这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这完全是我们的假定。但是，没有人能够设计一种方式，使得体系 A 得以转换到 B。如果我们想探讨一个动态问题，运用静态均衡当然就不可接受了。

抛开对于静态与动态的术语运用之疑虑不谈，我想说的是：货币必定是动态的，以静态的方式来研究货币问题则是错误的。

当然，在静态均衡的概念下，是没有货币的容身之地的。在静态社会的概念之产生中，我们假定没有变化发生。一切都以原来的方式进行。今日就如昨日，而明日就似今日。而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需要持有现金。仅当一个人不知道在不确定的未来他会面临何种情形时，他才需要持有现金。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他何时需要购买什么东西，他就不必要私人来持有现金，他大可以将需要支付的特定金额以定期方式存入中央银行直到未来需要付款的特定日期。由于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中央银行就不需要任何储备以履行其偿付义务。当然，中央银行每天需要向买方支付的货币总量恰好等于卖方每天存款的总量。如果我们假定，在这个静态均衡的世界中，在达到均衡前的一刻只有金属货币，例如黄金，我们就得假定，在达到均衡的渐进过程中，市民们将越来越多的黄金存入银行，而不需要黄金的银行就将黄金售给珠宝商和需要黄金用于工业用途的其他人。随着均衡的到来，不再有金属货币，事实上，也不再有货币，而是一个抽象的结算体系，这一体系不能被认为是常规意义上的货币，而是不可实现也不可想象的会计体系，是某些经济学家心中理想的货币应有的兑换率标准。如果它可以被称之为货币，那将是中立的货币。但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均衡状态是纯粹假想出来的，这个概念只是帮助我们思考的工具。由于不能进行实验，社会科学必须创造这样的工具。但是，运用这些工具时，必须非常谨慎。我们必须认识到，静态均衡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能达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在这一假想的状态中，个人不选择，不行动，不需在互不相容的选择中取舍。在这种状态下的生活的本质已经不复存在。在构建这种假想状态中，我们只是想通过想象没有变化的情

形来理解行动的动因，而行动总是意味着变化。但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我们不仅不必面对死亡，也不必面对生命、行动和变化。而在活生生的世界上，没有货币中立性的空间。

货币当然是动态的因素，不可以根据静态均衡来讨论。

现在，让我简短地指出从对货币的非中立性的真知灼见中得出的主要结论。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抛弃货币中立性的错误概念就等于摧毁了数量经济学的支持者的最后一根支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杰出的经济学家相信：有朝一日将有可能用数量经济学替代定性的经济学。在经济量间没有固定的比率，这一事实使得前述的希望落空。在研究需求与价格的关系时，经济学家的发现与通过实验决定其关系（例如，不同物质的重力）的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经济学家所确定的仅具历史价值；在他的统计工作中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却不是一位实验者。已故的亨利·舒尔茨<sup>[2]</sup>的工作是经济史；我们从他的研究中学到的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一段有限的时期内某些商品发生了什么。对于在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或在另一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或在将来会发生什么，他的工作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

但是，仍然有人相信：对于货币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想用费雪教授关于货币购买力的书籍作为一个例子，这本书基于这样的假定：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与货币量成反比。<sup>[3]</sup>我认为这个假定是武断和错误的。

我们可以得到的第二个结论是：试图稳定货币购买力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在我简短的致辞中，解释了合理的货币政策的好处和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已经超出应有的范围。但是，我们不应混淆合理的货币这一政策概念与稳定的货币这一理论上的概念。我不想讨论这种稳定性概念里的自相矛盾之处。从当前主题的观点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一点：力求稳定的所有建议除开其他缺点外，都是基于货币中立性的思想。这些建议提出了一些方法以抵消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即如果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就采取方法使得发生同等程度的紧缩，反之亦然。他们没有认识到，采取这种步骤，他们并没有取消第一次变化的社会性效果，只是简单地加上了一次新变

化的结果。如果某人已经被汽车碾过而受伤，让汽车从相反方面再碾一次，不会对上次的惨剧有所补救。

但力求稳定的种种方案却大受欢迎，这引发我们进行哲学思考。人类理智的一个普遍弱点就是认为，静止状态和缺乏变化比运动的状态更为完美。绝对的、被误解的哲学思辨的古老幻影还与我们同在；它的现代名字叫做稳定性。然而，所谓的稳定性，也就是缺乏变化，我们重申一次，是生活的虚无。

我们能得到的第三个结论是：静态与动态之间、短期的与长期的经济学之间的区分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研究货币变化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它表明，每一个现实的经济学之思考都必须是动态的，静态的概念只是工具性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所有现实的经济理论之建立，都是从短期到长期效应的一个渐进过程。

但是，货币的动态机制理论的最重要价值是它在货币主义的商业周期理论（the monetary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之发展中的应用。古老的英国货币理论在有限的程度上已是一种商业周期的货币主义解释。它在仅有一国发生信贷扩张而全球其他地方一成不变的假定下研究了信贷扩张的结果。这看起来似乎已经足以解释英国 19 世纪上半叶的商业周期。但是，货币外流因素的解释并没有回答，在一个完全隔离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或当全球同时发生信贷扩张时会发生什么。而只有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在 20 世纪的境况下才能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只有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建议，即要么降低国民经济的国际联系，要么按布雷顿森林体系<sup>[4]</sup>所规定的方式使得信贷扩张国际化来消除周期性的变化。商业周期的货币主义理论吹嘘，它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严重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不想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因此，我只想略为评论一下某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对于这样问题的研究。我本人并不对“中立的货币”一词负责。我发展了购买力变化及其社会性后果的一种理论。我证明货币具有动态性，购买力的变化与货币供应和需求关系上的变化成反比关系的假定是错误的。“中立的货币”一词是以后的学者提出的。我不想考虑这是否是一个令人高兴的选择。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反对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使货币保持中立，也反对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确定这样做的方法。我希望强调，在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在一个行动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中立的货币。货币只能是非

中立的，否则它就不存在。<sup>〔5〕</sup>

## 第六章 确定购买力变化的 方法对于指导国际货币 与银行业政策的适宜性

### 导言

“黄金购买力的波动”和“黄金购买力波动的量度”这两个词语不能被使用，除非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其目的有明确的认识，而这两个词语的精确定义对于这种目的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这两个词语已经演进到可以基本上满足实际的要求，而非仅仅是理论的要求。意识到价格变化的令人不快的结果，我们寻求手段来消除它们，或更好地消除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结果，任何提及这些词语的研究必须以考察下面的问题为出发点：我们发现到底什么是令人不快的、为什么我们发现它令人不快、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消除它们而不同时引发更糟的结果。

### 一、黄金购买力变化的社会效应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原因使得黄金购买力的变化影响收入与资本状况。要不是这些因素的作用，就社会效应而言，购买力的变化将不会比度量衡或日历的变化更重要。如果：(a) 没有延期付款，即没有用黄金来表示的债务和债权权益，而所有的货币交易都是现金交易；(b) 如果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对整个经济体系和每种独特的商品之影响在程度和时间上都是相同的，我们就没有理由关注黄金购买力的变化带来的效应。

#### (a) 购买力的变化与负债

由于缔结合同的各方并没为黄金购买力的变化留下余地，购买



力的变化就得以影响以黄金表述的债务合同。大体而言，全世界都坚信黄金具有“稳定的价值”，尽管这种看法幼稚而经不起细致的推敲。然而，即使这种观点并不盛行，在长期的债务合同中，仍然不可能根据黄金购买力的变化进行调整。对相当长时期的未来而言，是无法对购买力变化的走向与程度做出任何判断的。短期债务则是不同的。如果预期商品价格在以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将会上升或下降，短期贷款合同的利率就会相应上升或下降。因此，购买力变化的效应所造成的问题仅在长期的债务合同中存在，而非短期债务合约。

### 〔b〕购买力变化的第二类后果

一个多世纪以来，当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几乎完全忽略了购买力变化在债务合约进程中的影响时，英国和美国的学者们极为详尽地研究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英国和美国的学者们对于购买力变化所造成的第二类后果未予注意。结果，为消除这类购买力的变化所带来的令人不快的后果而提出的无数方案与建议，通常就只关注变化对债务合约的效应，而未曾考虑其他效应。

如果购买力的变化同时地以同等程度影响所有的商品与服务，对人民收入与支出的影响将是一样的，既不会有人从中受益，也不会有人因此受害（除开前一节中讨论到的债务合约的情形）。然而，这种“如果”从来也不会发生。杰出的经济学家，自大卫·休谟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降，徒劳地试图构建一种理论上的情形，在其中购买力的变化会同时地以同等程度影响所有的商品与服务。构建这一情形是不可能的。

购买力的变化总是在经济体系的某个特殊点最先被感受到，然后，它的效应才从这一点分阶段地连续扩散开来。当货币量增加时，最先得到新增货币的那些人能够——用他们增加的收入——为商品与服务支付以前的市场价，即在没有新增货币供应量的情况下形成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中，货币收入的增长等价于真实收入的增长，甚至可能最终导致资本的增长。在另一方面，那些收入增长发生在最后的人们，则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被迫为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支付有了新增货币供应之后形成的价格，而此时，他们的收入还没有相应增长。在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时期，在所有国家都可清楚地观察到这一过程。但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最为人瞩目的就是这一过程；凯尼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集》中对

于这一过程予以了精彩的说明，并描绘了发现黄金的效应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逐步加深的贬值过程。

对购买力的变化之社会性后果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考虑它们对债务的影响。我所描述的时间上的滞后效应也应被考虑进来。

但是正当我们努力来这样做时，我们意识到这条道路上的重大困难。如果我们只考虑货币购买力变化的效应，我们就倾向于假定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确定货币购买力的平均值，让一种价格的上升为另一种价格的下降所抵消。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购买力的变化的第二类后果，则这样做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后果正是由于某些价格上升而另外一些仍然滞后而产生的。因此，如果我们遵循某些稳定购买力的建议，也就是在购买力的变化发生之后根据某种指数来纠正这些变化，我们就无从消除这类特殊的社会效应。

## 二、对稳定性企图的分析

显然，在我们着手我们的主题所表明的任务之前，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措施所要应用的对象。

在循环往复发生的经济衰退之后接踵而来的严重混乱使得世界上的许多人接受了“稳定的”经济体系这一概念上的理想。然而，这从来不是指所有的价格都一成不变的经济体系。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建立一种不受“货币面”严重冲击的体系。

一些学者主张修改债务合约的法律基础，即用明确数量的商品而非黄金来表述合约。这类建议的目的是建立所谓的“商品本位”（commodity standard）或“按物价指数确定币值的货币制度”（tabular standard）。长期以来，有人天真地假定这样的本位必定是“公平的”。我想，正如在我之前的其他经济学家那样，我已经充分地表明了这一假定是不可能得到普遍接受的。

即使我们忽略对商品本位或按物价指数确定币值的制度的“公平本质”之驳斥，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已经被指出的这一点：建立这种本位制只能消除购买力变化所造成的社会效应的一部分。或许有人会说，它完全有可能消除购买力变化对债务合约的影响，而更为困难的消除第二类后果的难题，则得留待将来解决了。然而，这种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某种延期支付的标准（a standard of deferred

payment) 问题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这里的情况正如在其他的问题中一样，经济“能够自我修复”，在短期债务合约中的确如此，甚或在长期债务合约中也是如此。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出借长期资本的债权人，例如债券持有者，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种情形引发了市场上对于长期债务的一定程度上的谨慎。这一倾向在今天是明显的；但是在衰退的早期，这种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使还未达到同样的程度。本来会成为债券购买者的一些人的勉为其难——这是过去几十年间不幸经历的结果——造成了短期货币与长期资本投资的利率有很大差别。如果这种谨慎的态度持续下去，那些希望取得长期信贷的人将不得不在利息之外为应对购买力的下降而付出溢价；否则，他们就必须满足短期信贷的要求，在其中（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为购买力的可能变化预留余地。<sup>[1]</sup>

而对于购买力变化的第二类社会影响，则没有类似的调整机制。有些人倾向于以第二类效应是暂时的这一理由忽略第二类效应；当购买力的变化已经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时，无规律的或不平衡的购买力变化给收入与资本状况造成的影响将停止作用，只是在这一意义上，前述的理由才能成立。但对于收入与资本状况的影响却仍旧存在，一个人得益，另外一个人则受害，从这个方面来讲，第二类效应与第一类没什么两样。

为稳定货币购买力的所有建议均因一个事实而黯然失色：这些建议都是被设计来消除购买力的变化对于债务合约的影响。这些建议完全没有考虑到变化的第二类效应，因为其建议者们相信，它们对于债务合约的影响是惟一重要的或首要的。所有这些旨在稳定币值的建议，无一例外地都是设想在变化发生之后根据一个平均值体系计算出来的变化来进行调整的。

应该指出在这两种体系中的区别。旧的体系是“根据物价指数来确定币值的”体系，它仅在延期支付的情形下才作调整；也就是说，它仅在根本不触动货币体系的情况下调整债务合约的名义金额。第二种体系，以欧文·费雪的“稳定美元”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受操控的货币”为代表，涉及到对于流通中的所有货币之购买力的调整。在此重申：直到购买力的变化发生以后，直到变化的不平衡的和无规律的效应出现之后才调整。这种事后的调整既没有消除也没有减轻第二类效应；它只能应用于第一——类效应。这就是需要强调的关键点。

因此，大体上可以说，旨在稳定币值的所有建议只考虑了购买力变化的效应中的第一类。它们只能消除购买力变化对以黄金支付的长期贷款合同的效应，却无法消除其他效应，而后者比起前一类效应来同样或甚至更为重要。

记住这一点后，就可以认识到：尽管这些建议听起来激进，但在实践上决不是有效的。它们也远谈不上如同乍看之下所想象的那样，比古老的、更为谦虚的“稳健货币学派”的方案更为高明。更古老的方案并不试图稳定币值；它满足于尽可能地消除一切可能导致购买力发生突然和过度变化的因素。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做出了支持金本位制的决策，因为他们感觉到，金本位制提供了至少相对而言绝对的稳定性。

可曾发生了任何事情，使得数十年前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对古典金本位制的拥护者的期望落空吗？

### 三、过去几十年间购买力变化的起因

自从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黄金的购买力一直稳定地下降。没有必要去故纸堆中查找针对这种变化的程度或者原因出了什么文献。但是需要坚决强调一点，因为这一点通常在近来对问题的讨论中被完全忽略了。我指的是，在所讨论的时期内，黄金购买力下降背后的首要原因，应该从各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中去发现，而非在黄金生产的状况中寻找。形形色色的政府在货币政策中有意识地追求“节省”（economizing）黄金，这样的努力导致了黄金购买力的下降比没有将黄金从有效的流通中驱除出去之时剧烈得多。如果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日常流通中使用金币，就如同几十年前的德国与英国那样，如果更小更穷的国家的发钞行以真正的黄金而非主要地以对外国的提取黄金的权益之形式来保持其货币储备，黄金的贬值要么根本就不会发生，要么至少不会到如同 1896 至 1920 年间事实上发生的这种程度。

毫无疑问，各国政府没有认识到，所有的国家执行这种同样的政策的后果会是价格的普遍上涨。每个国家考虑的是降低本国内的流通成本。除开其他一切，这些政府被一种错误的思想所影响，即可以通过多方面的货币政策措施（包括集中一国的黄金供应于中央银行的地下室）来降低利率。但是，不管一国政府在执行这种政策时所考虑的是什么，无可争辩的是：如果其他因素一样，这种政策

的结果注定是黄金购买力的下降和用黄金来表示的商品价格的上升。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居然认为，在这一段时期内价格的上升完全是由于独立于政府政策的黄金生产状况所造成的，而没能认识到，如果他们的政府执行不同的政策，价格的上升绝对不可能达到实际发生的程度。

如果政府果真执行的是不同的政策，而且以黄金表示的商品价格之上升要么没有发生，要么程度不及实际的严重，则永远也不会有金本位制失败之时的任何议论。此外，如果说在价格下落的今日，抛弃金本位制的呼吁更为急切，那我们只能再次指出：价格的大跌——这是最近几年来最突出的经济事件——是以前信贷扩张结束后不可避免的反应。信贷政策的错误可以归咎于多种因素，但是，金本位制绝非其中之一。因此说，事件表明金本位制是不适用性，这是不正确的。失败的不是古典的有效流通的金本位制，真正失败的是发行钞票的中央银行的“节省”黄金的体制和信贷政策。

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不应就未来做出任何结论。今日有这样一种忧惧：一些至今未采纳金本位制的国家转向金本位制，与黄金生产的下降结合在一起，将会导致未来以黄金表示的商品价格的下降（即黄金的购买力的上升）。这种担忧当然不能等闲视之，虽然对于关于未来币值的所有预言，都应保持最大的保留。但同时也要记住，即使黄金的生产在未来数十年间下降，即使各国均采纳金本位制（包括中国与俄罗斯），那也不一定会出现价格的下降。只有继续实行甚至加强“节省”黄金的政策（这一政策在过去数十年间慢慢地向全世界所有国家蔓延），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由于这个问题与通过信贷扩张的货币发行——例如：没有黄金准备金的钞票和银行结余——密切相联，它被弄得尤为复杂。

将低利率视为经济政策之理想的民意，或多或少地公开鼓励发行执行信贷扩张的政策，以使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即如果发行不干预货币市场上通行的利率，这一政策必定导致价格的上升，但这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反对这种政策的理由；相反，他视上升的价格为繁荣的征兆。直到有别于企业家的阶层开始增强其对总体经济状况判断的影响，世界才开始认识到，上升的价格并非只是吉兆。对商人而言，价格上升的时期是“扩张”与“繁荣”的时期；对于承租人、公务员，以及靠相对固定的收入为生的人们来讲，上升的价格意味着“上升的生活成本”。

希望通过银行干预获取廉价资金的商人没有注意通货学派的老一代经济学家，以及更近时间以来维克塞尔和商业周期的货币主义理论（或更准确地说，商业周期的流通信贷理论）的所有现代拥护者给出的教训。这个教训的要点是：银行人为地降低自由市场利率的任何努力，会导致更高的交易量，但是从长远来看，此举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危机与衰退。

那些相信购买力的变化可以精确量度的人，坚持要求银行业政策应该与这些量度值联系起来，让银行将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之稳定，作为信贷政策的目标。因此，在进一步探讨之前；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问题：为量度购买力的波动所提出的种种方法，是否在事实上提供了一种可以有效地用于经济政策目的的手段。

### 四、量度购买力波动的种种方法及这些方法 对于稳定性问题的意义

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可以精确量度的假定，基于这一信念，即当取一般平均值时，特定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的调整，也将被充分地考虑进来了。价格“水平”的概念正是基于这种想象之上；看起来，所需要的一切是确定这一“水平”在整体上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对于具体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之间发生的相对变化之公然忽视，得到了一个事实的鼓励，即在购买力变化的效应中被考虑的，主要是那些起源于货币作为延期支付的标准之外的效应；由于商品和服务并不同时地或同等程度地受到货币购买力变化的影响而导致购买力变化所造成的其他社会后果，几乎完全被排除在考虑之外。

但是，即使假定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平均值来计算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是充分的，仍然存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难题，不可能通过一个方法来解决。首先，有一个“平均值”的问题，是指算术平均值，还是几何平均值，还是调和平均值，抑或是数学上的其他某种平均值？对于这一问题，没有人给出实质性的回答。

其次，用什么方法来确定各种价格的加权值呢？也就是说，对于具体的商品和服务，表示其相对重要性的系数应当是多少？同样，对这一问题也没有答案。

正是因为对这两个问题没有一个惟一的答案，也就是说，没有解决方案可以说是一定正确的而其他所有的方案都是错误的，则我

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指数方法根本上就不适合于对货币购买力变化的精确量度。诚然，提议的大多数体系很适合计算货币购买力已经发生的变化的近似指数，而且，这些体系在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变化已经发生这一事实方面，具有丰富的启示作用。同样无可争辩的是，通常，在相对短的时期内，用不同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是，我们必须坚决强调的一项事实是：所有这些计算都仅是近似的，而非精确的，而且，精确的计算根本上是不可能的。有必要强调这一点，不仅仅是安慰理论家的良知，而是将注意力引向前一句中所强调的事实对于指数在货币与银行业政策方面的实际应用的深远影响。

因为有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购买力变化的指数——所有这些方法是同等地正确和错误——同时，因为这些方法中的每一种都给出了不同的结果，则不可避免的是：一旦指数的量值不再仅仅单纯是学术界的兴趣，而是对经济政策有了直接的影响时，这个纯粹的科学问题，就进入了严重的利益冲突的领域。设想依据欧文·费雪的建议来稳定美元，或依据凯恩斯体系的逻辑引进一种“受操控的货币”，或中央银行的信贷政策依赖于指数计算的结果，那么，不同的利益集团就会根据他们是对价格上升还是下降有兴趣，立即出来偏袒这种或那种计算方法。在金本位制下，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治影响，而最终依赖于黄金生产所获得的利润。但是，采用指数计算的方法后，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就会沦为政党和政治斗争的玩物。政府在购买力政策上的突然变化，或哪怕只是预期到这样的变化，就足以在个别国家产生严重的扰乱作用。那么，国际贸易的状况，就将是完全无法忍受的。设想某些国家——或所有国家——通过或许由国际联盟指定的联合组织，努力执行基于指数计算结果的一致的通货政策。结果将是，若干国家间商业上的敌意将会马上激化，由于世界被分为两大集团即债务国与债权国，一种特有的仇恨就会立即表现到冲突中来。

赞成“按物价指数确定币值的货币制度”的形形色色的学者是如此坚定地相信他们自己的独特计算方法的正确性，以至于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没有看到这一严重的缺陷。欧文·费雪一次又一次地重申，几种计算指数的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别不大。这是言过其实了。说它们之间差别不大，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即使确实差别不大，也必须牢记：考虑到操控购买力的重要性，即使细微的差别也足以在每个国家造成严重的利益冲突，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国与国之间



造成严重的利益冲突。

即使妨碍指数计算的困难可以克服，实际上仍然存在的困难还是巨大的。获取商品与服务价格的最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只考虑那些用于消费的商品与服务，也即在送达最终消费者那一刻上的价格。至于生产的多少个中间阶段应该被纳入到计算当中，这必定是完全任意的选择。由于这一原因（且不论其他的理论上的反对理由），任何其他的计算体系都会崩溃。结果注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一件产品在生产的中间阶段被多少次作为一件单独的商品对待，二是在计算中这一产品被多少次纳入了计算之中。在对最终消费品的调查之中，之所以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是因为，在处理产品质量的变化时，不可能建立恒久的标准。为消除质量差异所带来的问题，所有的指数体系就必须自限于数量不大的商品范围（主要是原材料），在这样的商品范围内，产品质量的同一性无可争辩。除开质量的差异，消费的变化（消费者在自己的“购物篮”里放进新的商品）也给统计计算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我们再一次地被引向这一结论：只要统计计算自理论的领域一出现并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时，每个国家内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争端——以及国家之间更大的争端——注定就会立即产生。

以上的考察可以归结如下：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能够提议一种体系，来近似地确定购买力的变化，一种他认为最接近于解决这一不可解决的问题的体系。但是，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能斩钉截铁地向一位不偏不倚的当事人证明，他的体系优于所有其他的体系。选择指数计算的方法或多或少地总是任意的。如果在这样的选择中涉及到深远的实际后果，就像如果这样的选择被作为货币政策的基础时必定发生的那样，各国之间——或各国国内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必定不可能达成一致，因为，每个国家的利益以及各国之内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

以上的意见可能显得不仅激烈而怀疑性强，而且乍看之下，与一百多年来众多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勤奋研究之结果相矛盾。但是，事实上，我的意见只不过代表了从关于这一主题的完整文献中得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我的观点独立地解释了，为什么杰出经济学家提出的基于指数的稳定货币之创造性建议，迄今为止从未付诸实施，这使我的观点独具力量。到现在为止，前述的结论不仅仅是一种保守态度，使得政治家和商人远离这些建议，它也使



人认识到这些建议中内在的根本性错误。

从国际的视野来考察这个问题，以上对于指数方法的反对理由将特别有力。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即使那些明了国际性的商品、货币交换之重要性的人们，居然也持这种观点，即国内价格的稳定性比国际交换的稳定性更为重要。这些建议的后果是，如果这些建议被付诸实施的话，每个国家都会执行基于自认为最有利的一种指数体系之上的货币政策，这将使得国际交换（在金本位制下，国际交换的流向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易遭受突如其来的、剧烈的波动。没有人不会看到，这会将一种主要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引入到国际商业关系中，并引入到更为重要的国际债务格局中。

### 五、纯粹金本位制与受银行影响的金本位制

在考虑国际合作在货币政策领域的功能之前，必须讲到银行业政策对购买力的影响。

考虑到操控购买力所带来的缺陷，纯粹金本位制的根本原则就是：使世界的货币供应依赖于黄金生产的状况是更为可取的。就如今日的情形，纯粹的金本位制将为我们提供一个货币体系，在其中，商品的价格会缓慢下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黄金的发现达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黄金的购买力下降。但是，不论购买力是上升还是下降，在金本位制下的购买力只会慢慢变化，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同一个方向上变化。在纯粹金本位制下，整个世界的货币供应（广义上）的增长，只能来自于新生产且被以货币的形式投入流通的黄金。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只能是由于黄金被从货币用途转入工业用途。

金本位制的特征是除开体系建立时流通货币的总额，银行在没有黄金准备金的情况下，不被允许增加货币与银行结余。1844年的皮尔银行法案（*Peel's Bank Act of 1844*）以及各种各样或多或少地基于其上的其他银行业法律，代表了创造这类纯粹金本位制的努力。这种努力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对流通的限制仅限于钞票，而没有考虑可凭支票提取的银行结余。货币学派的奠基人未能认识到，通过支票支付与通过钞票支付，本质上是一回事。这种失察的结果就是，负责银行业立法的那些人，从来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如果银行法中没有这一疏忽，如果因为没有这一疏忽而有效地

排除了由银行发起的信贷扩张，世界就会得到这样一个货币体系，在其中，价格将会有下落的一般趋势——即使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黄金未曾被发现。我们当代人中的大多数将会找到充分的依据认为，这样的货币体系本身是不好的，因为他们深信不疑地认为健全的商业与高价是一回事。但是，他们所深信不疑的只是一种偏见。如果我们在八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有缓慢下降的价格，我们就会习惯于在一直降低的价格、稳定的或下降的货币收入中寻求生活水平的改善与真实收入的提高，而不是通过增加货币收入来达到目的。无论如何，改革我们的货币与信贷体系这一困难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能仅仅因为其中包含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就被随意抛弃。首先，我们必须不使自己受到近来的价格迅速下跌的不幸后果的影响。缓慢而稳定的价格下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当前的体系中所发生的事情相比较，即价格先是突如其来地巨幅上升，然后是同样突然地猛烈下落。

由于货币学派的疏忽，世界上就有了这样的货币体系，它不仅受黄金生产的波动之影响，而且受银行业信贷政策波动的影响。民意希望获得低利率和上升的价格所带来的好处，受这样的民意之驱策，银行在衰退之后一直努力通过信贷扩张为经济注入人为的刺激。这样，银行就造成了一段时期内价格持续的上升，直到这种扩张政策最终被迫停止；然后，就再一次地通过限制信贷造成价格的下降。

我们现在正经历这样的一段时期。杰出的经济学家在银行的限制性措施中寻求衰退的原因。但是，不幸的根源不是限制，而是限制之前的扩张。银行的政策不应因停止信贷扩张而受到批评，而应因居然允许信贷扩张的发生而受到责难。

考虑一下如果银行一旦开始信贷扩张后就准备永久地执行这种政策，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了维持人为引发的那种局面，银行被迫维持增加信贷扩张的幅度，其结果是更猛烈更快的价格上升。但是，一旦企业认识到越来越强的信贷扩张看不到尽头，也就是价格将不停顿地上升，企业就会立即向银行申请越来越多的信贷，投机性地提前为价格增长打折扣——既然赊账总是有利可图的交易——最终的结果将是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不可能永远持续而不引起恐慌和整个货币体系的崩溃。这是一个不再需要详述的真理，它已经被过去十五年间的通货膨胀的经验所充分证明，而且还有关于这一主题的众多著作解释这一真理。

因此，当在不同的场合有人争论说，近来价格的下落是由于银行行政政策的改变，从表面上讲，这是正确的。但更为仔细地审视事实却会发现：或迟或早，信贷扩张的政策都必须停止，如果这种政策持续时间越长，则其危害就会越严重。罪恶不在于限制，而在于限制之前的扩张政策。当前价格的下落之最终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即银行——在民意的赞同下，而且事实上在媒体、企业、政府的直接鼓励下——运用了他们增长流通货币的权力，也就是人为地增加了信贷。如果银行不运用这种权力——这一点只有在中央银行在储备一发行方面的特权被明令禁止或民意强烈谴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我们就不会经历经济波动。如果货币购买力只依赖于黄金的生产，我们可能会有缓慢下降的价格。但是，我们当然不会经受突然的转换过程，即从猛烈的价格上升到同样猛烈的价格下降，而在过去十年间，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这样的过程。

## 六、能够实现的改革目标

如果政策的目标不是想比无为而治造成更大的损害，任何影响货币购买力的系统政策从一开始就应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首先，有必要完全放弃不科学的、同样也是不切实际的以维持货币购买力“稳定”为目标的种种做法。其次，我们必须摒弃购买力下降在某些方面优于购买力上升的观念。最后，我们需要认识到，基于利率可由银行业政策来降低的思想之上的理论是错误的；这种方向的任何努力在一开始的确会刺激商业的扩张，但是，由于将资本引入错误的渠道，最终却只能引发危机和衰退。

同样也要记住，对世界上各国的银行章程进行激进改革的建议，在现在或未来的多年间不会有被付诸实施的前景。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在购买力清楚地显示持续上升的趋势时，采取减轻的措施，在购买力清晰地展示连续下降的趋势时，采取相反的行动。在以上两种情形下，行动都不应干扰由黄金生产所调节的正常趋势，即既不阻止也不扭转正常趋势。

不管这样的行动是各个国家单独采取，还是国际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对这类行动的幅度，都应高度谨慎。为防止影响购买力的政策为形形色色的经济利益集团所操纵——由于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本身正确的指数计算方法——将对购买力的干预限制在各方一致同意的方向上，是极为重要的。这意味着，仅当购买力的下降已经被

所有可能的不同方法所确证时，才能采取增加货币购买力的行动，而当由某一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有所不同时，则应推迟行动；这也同样适用于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措施。

一个国家所执行的任何其他政策，都会引发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果某些联合的国际组织执行任何其他政策，就会导致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很可能地，在这些冲突出现之初，对于货币与银行业政策问题的一致性处理的所有国际性努力，都不得不付之东流。

这份备忘录的目标不是研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达到这些目的。它的目标仅仅是考察确定购买力变化的哪种方法是最好的。以上偏离主题所作的解释对于回答这一问题是有必要的。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予具体的回答。

## 七、购买力变化的量度：货币与银行业政策的标准

前述的考察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量度购买力变化的工具可能起到的作用。问题不再是，竭力去满足哪个不可能达到的希望得到一种量度货币购买力变化的精确标准的要求；问题仅仅是，对变化所指方向形成某种大致的估计。直到今日，几乎所有已经提出的建议都以某个正确的标准——一种“精确的”标准，一种“科学的”标准——为目标。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寻求的是一个常规的标准，这意味着它是任意选择的一种标准。我们的建议不应因此而受到责难，反正每种标准都易受到有力的反对，而且不管采纳了什么标准，这一决定必定总是任意的。我们建议的理由仅仅在于一个事实：从一开始，我们为我们的标准将指引的货币与银行业政策设置的目标就更为狭窄，这一点正与以稳定性为目标的方案相反。仅当购买力的变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已经无可争议地确定下来时，我们的政策才开始投入运作；而只要这一政策使得购买力成功地回升到某一点，人们可能怀疑政策所要扭转的趋势是否仍然存在，政策就立即停止运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批评那些基于对购买力变化之量度而提出的某些建议。对于这一主题，已经产生了数十卷的文献，最敏锐的经济学家也已经研究了主题。试图在已经提出的建议之上再加一个新建议，这是完完全全的错误。但是必须认识到这类建议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避免地有缺陷。

本文所提出的建议之优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即在一定

程度上，这个建议有可能使我们粗略地把握购买力的变化，而这一了解可以在不挑起利益冲突与对抗的情况下成为货币与银行业政策的基础。一些量度购买力变化的建议从一开始就是不切实际的——不论它们在理论上的优点如何——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将购买力变化之计算基于工资与零售价格之上的建议，就属于这种情况。惟一实际的建议是那些以批发价格作为主要基础的建议；甚至在这种情形中，为排除质量变异的困难，也有必要加以选择并将计算仅限于那些其质量的恒定性没有争议的商品。

系统地调节购买力的努力只能通过国际协定来进行。如果个别国家准备采取这样的行动，它们会发现自己处于货币孤立的地位，结果，促进国际贸易的最重要成就之一，也就是由金本位制所保证的货币之一致，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对稳定的交易，就会丧失。不过，在这一领域，只有从一开始就避免利益冲突，才能尝试采取国际性的行动。减少货币购买力在这个或那个方向上的剧烈变化，是所有国家都将欣然同意的目标，为达此目的，我们所掌握的方法已足以量度购买力的变化。超出这一目标的努力，就等于要求一个国际组织承担它无力担负的责任。

采用以上阐述的政策之后，购买力变化的量度之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了。而一项政策假如追求更为探远的目标，其所面临的难题将是根本无法解决的。<sup>[2]</sup>

## 第七章 德国大膨胀



过去二十年来，欧洲所遭受的所有不幸是过去五十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与经济哲学的理论之应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德国的通货膨胀首先应归因于多年来迷住了大学里占据经济学讲席的那些人、迷住了掌控德国金融政策的那些人、迷住了最有影响的报纸与期刊的编辑们的货币与银行理论。

这些错误理论的主要特色是完全否定数量理论（the Quantity Theory）<sup>〔1〕</sup>和货币学派（the Currency School）的一切学说。<sup>〔2〕</sup>经验主义一相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不相信任何理论——特别是从国外传来的理论——他们深信，数量理论和货币学派的理论只是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犯的一个无法解释的错误。德国学院社会主义者<sup>〔3〕</sup>没人愿意浪费时间来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因此，他们没有认识到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长期论战的焦点到底是什么问题。他们对于这件事的惟一知识来源，是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于 1862 年出版的 *Theorie der Peel'schen Bankakte* 一书。瓦格纳绝对缺少经济推理的天赋。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银行学派的所有主张；从他的书中完全不可能推断出货币学派对于银行学派理论的反反对理由何在。

另外一位最主要的货币与银行业问题的权威，威廉·莱克塞斯（Wilhelm Lexis），其经济学推理的才干就更为逊色了。像瓦格纳一样，他对于李嘉图的外汇理论——“购买力评价”理论——也是一无所知。两个人都深信：外汇受国际收支余额的支配。

因此，由这类人的学说熏陶出来的未来的经济学家准备好了不加批判地接受耐普和本迪克森（Knapp and Bendixen）的学说，这两人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支配着德国的货币与银行理论。耐普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是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统计学家，他为了研究普鲁士的农民政策而花了大量时间在档案上。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他曾经注意过李嘉图和英国其他的货币经济学家。在耐普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偶尔提及了李嘉图的思想，然而，在他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与李嘉图的书籍和小册子中所读到的意思正好相反的观点。耐普绝对忽视了价格的问题。在他看来，货币理论的任务不过是对各种各样的货币进行纯粹形式化的分类。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政府对价格形成机制的干预，造成了一种仅靠政府政令无法控制的局面。

对于德国在货币理论方面的观点之形成，至少同样致命的是本迪克森这位抵押公司经理的影响。他从耐普那里得到灵感，写了一些详细解释银行学派原则的小册子。本迪克森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对货币理论文献极不熟悉，而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阐述全新的思想！

回顾从战争爆发到 1923 年的大灾难之间的德国货币与银行政策，最令人称奇的是，德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政客、银行家、新闻记者，想要成为经济学家的所有人，对于货币科学的最基本原则是绝对地无知。任何外国人都不可能认识到这种无知是如何地无边无际。由于这一原因，德国大通胀的最后三年，一些外国人认为，德国人摧毁了自己的货币以求将其他国家卷入自己的毁灭之中，从而逃避支付赔款。将隐密的恶魔行为归咎于德国的政策是一种曲解。德国政策的惟一秘密在于德国对经济理论缺乏任何程度的了解。

因此，德意志银行的行长赫尔·哈芬斯坦因先生真诚地相信，新钞票的持续发行与商品、工资和外汇的价格上升之间没有关系。这种上升被归因于投机者和奸商的诡计及内外敌人的勾结。这的确是普遍的想法。没有人敢于反对这种观点而不招致被指为叛国者及牟取暴利的教唆犯之风险。在公众及当权者眼里，货币状况糟糕的惟一原因就是政府对于牟取暴利的可悲放任。为恢复合理的货币，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强力打压不爱国者的自私自利。

这种看法是施穆勒所书的德国历史学派所教授的社会与经济哲学的整个体系之必然结局，揭示出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根据这个



学派主张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的观点，权力是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最强有力的政府也不能为所欲为，存在着不为最强有力的干预所动的人类生存状况，这是这一学派从不承认的前提。这个学派认为，经济理论的研究是无用的，因为所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都忽视了一个事实：政府有能力改变任何状况。它易于承认李嘉图体系是对当时英国状态的可靠描述，但是却否认这个体系适用于德国。在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普鲁士国王的版图上，一切都是不同的。因此，在大学的课程表中，它以普鲁士政府史取代了经济理论研究。它教导说，社会生活中惟一重要的东西是权力，而它的权力的概念是非常唯物主义的。权力在它的眼里就是士兵与枪支。它从来没有理解休谟的发现：所有的政策都建立在观念的基础上。

但是，追溯这一发展，需要写出从歌德、席勒、洪堡的自由思想，到特赖奇克（Treitschke）、施穆勒、斯图亚特·张伯伦的军国主义思想之转变的完整历史，要写出普鲁士这个标榜为诗人与思想家国度的国家之霸权史，和由俾斯麦所建立而亡于威廉二世之手的德意志帝国的历史。显然，这超出了本文的目标。

## 二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理解，研究通货膨胀时期的德国书籍基本上毫无价值，这些书籍中充满了偏见，而且通常是如此地缺乏必须先于所有历史描述的理论洞察力，以致这些书籍根本不能描绘出重大历史事件的适当图景。由于这一原因，由一位博学的美国人写的一本著作更受欢迎。普林斯顿大学的F·D·格雷厄姆教授在他的《恶性通胀中的交易、价格和生产：德国，1920~1923》一书中，尽力提供了可靠的叙述。

在评价这本有价值的书籍时，我们应该明白，德国通货膨胀的经历并无可以迷惑理论经济学家的地方。对于施穆勒之流的政治经济学家<sup>[4]</sup>来讲，许多事情是不可解释的；不仅如此，整个事件对他们而言就是不可解释的。但是，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被经历过以前通货膨胀的理论家观察到，并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阅读格雷厄姆教授的历史性研究时，甚至连高通胀的见证者，也必定会一再对德国整个国家的各个阶层面对货币问题的无能为力感到惊奇。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德意志银行的贴现政策的不适当。格雷厄姆教授的断言是：“从战争的早期直到1922



年6月末，德意志银行的利率维持在4%；7月提高到了6%，8月则到了7%，9月就到了8%。在1922年11月，则达到了10%。1923年1月，12%；4月，19%；8月，30%；9月，90%。但是，在贷款合同期间，这样的增长与贷款负担越变越轻相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1923年9月之后，银行或私人就得为从德意志银行得到的贷款每年支付900%的利息了，这也没有打击借贷。支付每年百分之数千甚至百分之数百万的所谓利息而实际上是保险费，这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既然用以偿还贷款的货币正以远超过前述利率的速度贬值。以900%的利率发放贷款，德意志银行事实上是在派送金钱，在贬值还没有这样严重的前几个月里，同样也是如此。德意志银行当局鼓励商业票据贴现以减少信贷短缺的政策，却进一步地证明了这家机构的董事们幻想般的决心：跑得更快以便跟上他们自己。信贷短缺完全是由于货币贬值引起，给出的解决方法居然是增加支付工具的总量！”<sup>[5]</sup>

但是不应忘记，并不是只有德意志银行才犯过这个错误。私有银行也借钱给任何一个提供了抵押品的投机者。利用从银行借得的钱来购买股票，很容易就变得富有。一些人用这种方式一夜暴富。既然此后所有这些颇受尊崇的投机倒把者都失去了他们曾经赢得的一切，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证明了他们并不具有天赋的杰出营商能力。事实上，不需要杰出的营商能力就可以智胜任何一家德国大银行。这些银行的经理与董事管理机构之大失败，证明他们实在是不称职。

德国商人花了数年时间，才认识到马克不再适用于经济计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真的相信，以马克计算的利润是真正的收入。他们不理解：用一种更为稳定的货币来计算会有相当不同的结果。当然，商人们比普罗大众要早一点发现这个真理。然后，他们就用金币代替了马克。这是收场的开始。当马克不可遏制的贬值不能再被忽略时，它就必然崩溃了。

只要通货膨胀还在起作用，社会主义劳工领袖和学院派社会主义者全都赞成通胀，并教导说，不是货币的数量而是投机者的不爱国行为才是马克贬值的根源。通货膨胀结束之后，他们的想法改变了。现在，他们谴责“资本家”有意地制造了通货膨胀来为自己攫取财富。对德国大众来说，每次不幸都是“剥削阶级”的诡计造成的。

## 三

在经济学家看来，德国通货膨胀为他的理论原则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例证，却没有提供任何不符合这些理论原则之处。在这一事件中，货币与经济理论没有新的东西可供发掘。当然，德国的施穆勒一耐普这一流派的政治—经济科学需要从中学习一切。但是事实上，除开某些年轻人之外，他们拒绝得出这个结论。真是孺子不可教也，他们仍然相信这种理论，即一国货币价值之变化，要归因于一国的国际收支余额的变化。他们将通货膨胀政策的失败归因于政府缺乏能力及民众不够爱国。

德国政客们也没有从通货膨胀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政府与德意志银行均认为，货币困境起源于国际收支余额的不利状况，起源于投机和资产阶级的不爱国行动。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控制外币和没收德国人持有的外国资产来对抗德国马克贬值的危险。他们不理解，防止币值下降的惟一措施是实行紧缩政策。但是，尽管政府与教授们没有学到什么，人民却吸取了教训。当战时通货膨胀到来之时，德国无人理解币值变化意味着什么。商人与工人都认为，以马克计算的收入上升是真实收入的上升。他们认为，商品价格的上升是由于封锁所造成的商品短缺导致。当政府增发新的钞票时，政府可以用这些钞票来购买商品与支付工资，因为在增发钞票与相应的价格上涨之间有一段时间的滞后。公众轻易地接受并持有钞票，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购买力在不断地下降。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但是，当他们知道政府没有决心停发新钞时，当他们知道钞票数量的增长必定导致价格更进一步上涨时，他们的行为就改变了。每个人都急于花掉口袋中的钱。货币提供的服务在于它是可以用最好的交易条款售出的商品。持有货币可以使一个人在随便哪天以最方便的方式购买他所需要的任何商品。但当钞票日益贬值时，保留货币就意味着损失。得到钞票的任何人立即就将它一花了之——甚至是买下他当时不会用到甚或是将来也不会用到的东西。在通货膨胀的最后日子里，雇员按天领取薪水，立即交给太太，他们的太太则飞奔着去买点东西以便尽快地将钱花出去。没有人愿意持有钞票，所有的人就像扔掉烫手的煤块一样甩掉货币。当这种在证券交易所称之为“真实价值的逃离”——逃往商品形式的实物投资——的趋势变得普遍时，即使是最没有商业头脑的人也会如法炮制。马克崩溃了。政府发行钞票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好处，因为贬值造成的损失已超过增发钞票的收入。

在对通货膨胀的记忆没有消失之前，一个经受过通货膨胀直到其最终崩溃的国家，将不会进行同样的第二次试验。只要见证了1923年大通胀并深受其害的男男女女还活着，德国的任何政府就不能通过增发钞票来充实国库。所遭受的痛苦使得他们非常之谨慎，只要通货膨胀一启动，就足以造成他们的恐慌。价格的上涨会与纸钞数量的增长不成比例；价格的上涨会抢先于钞票的预期增长。政府发行的钞票越多，其购买力越小。公务员与士兵的工资越高，他们能够买到的东西就越少。因此，政府通过发行钞票来改善财政状况的努力必会失败。在官场看来，通货膨胀是没有用的。

经济学家可能强烈主张，这个教训可以更低成本从理论而非经验中获得。要是德国人对于经济理论的教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们本可以得知这一切，而不需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这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后见之明。

但是，无论如何，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货币史证明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经受得起轻蔑地对待经济理论的代价。<sup>[6]</sup>

## 第八章 西尼尔关于货币问题的演讲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最近在重版其丛书时，又出版了纳索·威廉·西尼尔关于货币与国际贸易的著名演讲。<sup>[1]</sup>重读这些经典论文，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经济学论证在实际中的应用，似乎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我们正处于贸易壁垒日益不可超越的世界上。在为贸易保护主义体制进行的辩护中，每天都可以听到同样的陈词滥调，而它们已经西尼尔及其经济学家同行所驳倒，而且李嘉图数年以前就早就将其驳倒了。为什么对重商主义的财富理论（*Mercantile Theory of Wealth*）<sup>[2]</sup>的尖锐批评，并没有成功地使舆论信服？在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学说一无是处的过程之中，是否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

今日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证中最重要的理由，正如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日子一样，是货币主义的观点。据说，限制进口对于维持一个国家的货币均衡是必不可少的。诚然，已经没有人再提到流通中铸造的贵金属流失到国外的危险。但是无人提到这种危险的惟一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像战争爆发前那样控制金币的有效流通。现代的保护主义者却坚称，有必要保护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他所不愿意承认的是，兑换比率并不最终依赖于国际收支余额，而只要本国钞票没有过量发行，兑换比率就没有被降低的危险。

今日需要回答的问题，正好与西尼尔在“贵金属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与财富的重商主义理论”的演讲中所详细解释的问题一样。差别只在于表述，而不在于实质。问题是：国际收支余额是否会自动重新调整，还是注定由政府进行干预以免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西尼尔在证明政府干预是多此一举的推理过程中，考察了商品的进出

口决定国家间商业关系的状况。针对目前情况而言，有必要注意信贷的重要性，并相应地将重点不仅放在商品的价格上，对利率也要予以重视。这当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但的确严重地影响了问题的政治与伦理方面。

在公众眼里，这种性质的考虑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一般的想象。在讨论主要涉及到商品价格的贸易限制问题时，设想一个自私的生产商向穷苦的消费者索取高价。在这种情况下，同情心偏向消费者一边。但是事关利率时，同情心却偏向贷方。尽管在商品价格的问题上，舆论分裂为两派，以致赞成高价的一方对抗赞成低价的一方，但是，在利率问题上，却只有一种观点，也就是赞成低利率。引起争议的地方似乎在于下面的两难选择：要么以限制进口为代价在本土维持低贴现率，要么在自由贸易下让货币的价格上升，此刻，天平则向赞成进口限制的一方倾斜。每一个国家都有相当多的人反对进口关税，人们试图论证，要有利于本国的生产，就必须提高国内价格水平，以此证明关税的正当性。然而，当进口关税被作为借口用来维持较低的利率时，对它的反对就很无力了。

毫无疑问，要是没有机会向利率高的国家输出资本，在资本丰富的国家，利率就会更低。要是英国或法国在战前的五六十年里没有大量地投资于海外，伦敦和巴黎的利率就会比实际的低得多。如果这时英国有某公从劳工的角度要求限制对外投资，就如战后“自由产业报告”所要求的那样，那么，至少从的阶级政策之立场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奇怪的是，在这个时候，不是资本输出国，而是资本输入国却假定，国际资本流动必定导致更高的利率，而对其后果抱怨更多，尽管资本流动的结果与他们所言正好相反。说来奇怪，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奥地利，竟然出现了一种理论认为，奥地利的纸币使这个国家孤立在国际货币市场的大联合之外，因此，发钞行可以扩张信贷维持相对较低的利率，而不会有任何不利。这一错误的理论被时任奥地利中央银行总经理的威廉·卢卡姆适时地驳倒了。然而，这一理论却在奥地利留传下来，并且年复一年地在整个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甚至还有美国获得越来越大的声威。

今日人们通常认为：自从关于货币与外汇的古典理论被详细解释以来，事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以致不能将其结果应用于现代的情形。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伪称提高贴现率在今日不会对黄金的流动与汇率造成任何影响或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

这是完全错误的。没有证据表明，旧式的贴现政策不适用于当今的情况。事实是，统治阶级偏好本国货币贬值的后果甚于不对市场上货币兑换比率进行干预的后果。

让我们分别来考察几个偏离旧的黄金平价（old gold parity）的个案。1931年的英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英国不得不在提高贴现率以保卫金本位制（正如一再发生的那样）和贬值之间二者择一。英国决定贬值，因为这使得英国的价格与工资水平能够在全球黄金价格下落的情况下维持不变。对于这一政策的公正性看法不一，毫无疑问，从西尼尔的思想之观点来看，该政策是非常不公正的。即便是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不可以用西尼尔的理论学说来解释。当然，西尼尔的决定会与1931年英国统治者的决定大不相同。他会认为，名义工资不得不随着价格下落，而当英国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下降快于其出口的制成品价格下降时，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但是，西尼尔如果与诺曼先生和凯恩斯先生讨论这个问题，结束时他会说：“先生们，我明白你们在追求其他的目标。”但他没有理由这样说：“你们必须应付我的理论所没有包罗的情形。”

然而在另一方面，金融形势的一个根本变化发生了。在现代银行体系中，短期债务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债权国的银行借贷巨额资金给债务国。表面上他们有权立刻收回贷款。但是，实际上收回借款不可能即刻实现，因为借方的银行将借款转借给了根本不能偿还贷款或至少需要时日方可偿还贷款的企业。国际信贷关系基于靠不住的资金流动性之假定。当贷方试图行使收回贷款的权利之时，只有两个选择：债务银行公开宣称破产，或政府干预而暂停支付外债。1931年夏，一些大陆国家实行的外汇管制，只不过是走向正式的延期偿付的一个过场。

当从本土状况考虑时，今日的银行业并不更为健康。可凭支票提取的存款和储蓄存款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储蓄者希望将自己的钱委托给银行管理更长的时间，他期望得到利息。接受储蓄的银行必须将这笔钱借给企业。储户提取存款的方式，正与银行索回贷款的方式一样。当储蓄存款的总额在一国的企业中运行时，提取所有的存款是不可能的。个别储户能够从银行取回存款，但不可能所有的储户都同时从银行取回所有的存款。这并不意味着银行业是不健全的。只有当银行业明确地或隐含地承诺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也就是随时或即刻偿还储蓄时，银行业才会变得不健全。

可凭支票提取的存款服务于另外一个目的。这类存款是商人的现金，就像铸币与钞票一样。存款人打算逐日使用这些存款。他不要求利息，或即使没有利息，他也愿意将存款委托给银行管理。银行如果持有这类存款的总额而不放贷出去，自然也就无法获取利润，因而必须即刻将收到的这类存款放贷出去。如果所有的储蓄人同时要求提取存款，银行就无法满足要求。银行政策之棘手问题在于：一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或接受可凭支票提取的存款之总量，不可能等于流通中的货币与在其金库中的存款之总量，因此，永远不能立即偿还这类负债的总额。正是考虑到这一困难，才不得不监管发行货币或接受可凭支票提取的存款之银行的信贷政策。也正是这一考虑，导致了限制发行钞票和强制中央银行保持一定数量准备金的立法。

而储蓄存款的情形是不同的。既然储蓄者不会即刻需要取出他的存款总额，储蓄银行和其他接受这类存款的银行就不必承诺即期或立即偿付存款。然而，它们正是这么承诺的。这样，它们就暴露于恐慌的危险之中。如果它们接纳储蓄时就宣布需要提前数月通知才能提款，那这些银行就不必冒这个风险。

公众舆论以为，维系货币稳定性的真正危险在于资本抽逃。这是不对的。投资于不动产或工厂，或投资于持有这类资产的公司股票的资本是飞不掉的。你可以卖掉这样的资产并带着收益离开一个国家。但是这不过是——假定没有信贷扩张——买家取代了你而已。如果买家是外国人，那么，本国人的资本抽逃就由国外来的资本输入所补偿。如果买家也是本国人，那么，他只能通过卖掉他的资产——当新增信贷不是由信贷扩张而导致之时——才买得起这些股票，情况是一样的。这个或那个人可以将他的资本抽出一个国家，但是，这永远不会导致大规模流动。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储蓄存款可以即刻或短时间内就可从银行提取出来。当储蓄存款可以立即提取、发钞行通过为即将被提取的存款预留信贷而使得立即提取存款成为可能时，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就会导致兑换率上升。显然，不是资本外逃，而是照顾储蓄银行的信贷扩张，才是祸害的根源。

问题的核心在于储蓄政策。在没有中央银行的帮助之下，仅作可行承诺的银行从来就不会威胁本国货币的稳定性。即使是轻率地对其债务做出不能达到的承诺的其他银行，也只有在中央银行承诺对其提供援助的时候才算是威胁。如果中央银行让这些银行自生自

灭，这些银行的个别麻烦就不会对外汇造成任何影响。为偿还某国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而增发的巨额钞票会使外汇价格上升，这是容易理解的。能够危害到货币稳定性的东西，根本不是资本家携资而逃的欲望，而是货币流通额的扩张。

只要中央银行不相信它的职责就是掩盖储蓄银行的错误政策的后果，央行就不必采取人为的、同时又是无效的措施来维持兑换率，相反，它可以迫使储蓄银行与储户就应偿还的存款达成协议。通过这样的协议，储蓄银行可以根据应收款来调整应付款。“暂停支付协议”（*The Standstill Agreements*）应该明确无误地针对所有的债务，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概括而言，我们没有资格说：西尼尔在其关于货币和货币问题的著述中，必须研究今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之外的问题。货币和银行理论的任务与西尼尔所处的时代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所不同的当然是我们的银行组织结构的状况，而不是交易与社会合作的机制。西尼尔所面对的原则问题与我们的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完全一致的。在处理价值与交换的根本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与西尼尔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同样的问题需要解决。尽管有经济思维和论证的变化、社会状况与政治方面的变化、银行组织结构的变化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商业生活的变化，但任何人阅读这些古老的小册子都不会一无所获。<sup>[3]</sup>



## 第 三 部 分

# 贸 易

## 第九章 国际劳动分工的解体

### 导言

国际劳动分工是自由主义精神的一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说，国际贸易从最古老的时代就开始了。一些生产受限于特殊的地理条件的商品，一直进行定期贸易。当某些非常事件造成某些异常机会时，也会出现临时性的贸易。但是，不管这样的国际贸易的结果是多么的重要，也不管这样的交易规模在考虑到交通所要克服的技术困难之后是多么的重要，国际贸易在满足市场需求方面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在普通人的日常消费中，只有极小部分依赖于国外的产出。进口商品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奢侈品，人们不用它们也不必遭受多大的穷苦。在 19 世纪初期，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即使得到严格执行，也不会对中欧的民众消费造成任何显著的后果。在当时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糖（当然，当时只有蔗糖）和棉都是奢侈品。

国际贸易的增长在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基本上拆除了误导性的财政主义（fiscalism）和重商主义之谬误所树立起来的贸易壁垒。自由主义瓦解了这些障碍，从而为国际贸易关系的空前强化扫清了道路。当科布登（Cobden）和巴斯夏（Bastiat）于声望的顶峰时，人们普遍相信：贸易障碍就像过去的黑暗时代的其他残迹，如绝对论、迷信、不容异己、无知和战争一样，注定要永远消失。由李嘉图所阐述的外贸理论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保证经济活动的最高生产率，任何一种贸易保护主义都必定会导致资本与劳动之产出的减少。一百二十年以来，无数的书籍和小册子竭力想推翻这一理论，想证明贸易保护也会带来某些好处。它们都失败了。它们没能推翻：就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而言，自由贸易

比任何体制都更有效率。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任何足以动摇自由贸易学说之基础的定理。一度最著名的反对理由是保护幼稚工业。但是，对于新建立的工业无力与地位稳固的生产商成功地进行竞争，我们所能讲的一切，不论竞争者是来自本国还是外国，都同样成立。没有人敢于同样地要求为初创企业提供保护以免遭到来自于同城、同地区或同一国家内业已存在的公司之压倒性的竞争，这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证据，以幼稚工业作为反对自由贸易的理由，是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性的。当然，每一家新创工厂都不得不面对种种不同的困难，直到它能够顺利运作。存在着种种的障碍，使得业务在或长或短的开始阶段比较差劲。如果这些损失不可能为以后的成功所弥补并有所盈余，那么，这家新厂的建立就无利可图。那么，再增设新的公司或工厂就是浪费了。从这一方面来讲，新的生产中心位于本国或外国就没有区别了。众多的历史事例证明了，产业可以从一国内条件较差的中心向条件较好的中心转移，虽然没有为新中心建立的初创时期提供保护性措施。在这些事件中，在企业家的计算里，后来的预期收入会超过先期的损失。保护对于推动转移而言是不必要的。同样，如果转移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保护也并不更为必要。更进一步的审视会揭露，这种幼稚工业论纯粹是政治性的。它不能被作为赞成保护的经济学上的合理理由。在经济著述和政策中，幼稚工业论都曾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经济史却没有为我们提供哪怕是一个例子，在其中为幼稚工业提供的保护没有变成没完没了的保护。美国、澳大利亚和东欧国家的工业在幼稚时期充分地享受到了幼稚工业论所带来的保护。现在，这些工业成长了，它们仍旧受到保护，甚至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并且，根本没有可能宣告其已成年而取消保护。今天，幼稚工业论已经过时了。在当今的世界上，有些人不得不为保护主义及其逻辑上的结果——自给自足的目标——提出其他论证，这些论证是：国家的威望、战争、工资、人口过剩、货币或外汇。

## 一、国家威望论

在李斯特<sup>[1]</sup>看来，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经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到达最高阶段后，一个国家不仅拥有发达的农业，而且还有发达的贸易与工业。在一个国家达到这一最后的和最高级的阶段之前，它是不能和谐地发展它所有的生产力的。从这一哲学出发，世界上所有在工业生产方面落后的国家都推论认为，没有现代工业和大规模生产，就是落后的标志。尽管工业国的浪漫主义者希望回到业已

逝去的更有农业气息的日子里，农业国的浪漫主义者却渴望本国的工业化。他们认为：财富只能基于农业和原材料生产的国家，永远不可能达到只有西方世界领先的国家所具有的道德与智力文明的水平。他们渴望工业，因为他们想要现代文明的完美。

这种浪漫主义可以解释一个事实：在农业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政纲总是包括对工业的保护，而对农业的需求给予更少的重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向欧洲和海外工业国移民仍然是自由的，这一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欧洲许多国家试图使得过剩人口移居他国。中欧和西欧在工业生产方方面面的条件都要比巴尔干等地区更有利。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这些国家在农业中找不到工作的过剩人口就不得不移民到中欧、西欧和新大陆去。当这些东部国家的政府通过严厉的保护主义来鼓励工业生产时，他们却期望减少移民出境的数量。他们认为移民出境对本国的规模及政治和军事力量是有害的。他们担心这一事实：移居境外的国民在新的定居点生活的日子里会与他们的祖国、祖国的习惯、语言和文明失去情感上的联系。为工业生产提供的保护是民族的和种族的自我保护政策，其目标是使其公民远离西欧、美国及美洲的其他国家的大熔炉。时至今日，移民入境不再是自由的；过剩的人口不再能移居外国，因为移居到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在战前的日子里，移民的理由不但对于欧洲的农业国来说是成立的，而且对于最为发达的工业国之一的德国来说也是成立的。当德国农业特别是普鲁士东部省份的农业，不再能在没有保护的条件下与土壤更为肥沃的国家例如俄国、罗马尼亚、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等的农业生产展开竞争时，德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它希望尽可能减少移民出境的损失。但是，我们不必再详述这一点，因为今日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是不可能的。

对于人口数量的考虑影响了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即是移民输出的商业政策。人口论点对于人口相对不足的国家的影响正好与此相反。这些国家——首先是拉丁美洲国家——希望增加其人口数量；在他们的眼里，保护是吸引更多人手的手段之一。但是，这也是过去的事了。

在当前的形势下，移民将降低到最低水平，而且没有一个重要

的国家愿意打开国门接纳新移民，上面的考虑不再有任何作用。我们将在文章的后面讨论移民壁垒所发挥的作用。

## 二、战争论

今日世界上，贸易保护和自给自足的最重要原因是战争的动机。对于军国主义国家而言，开战的准备是政策的首要目标，战争本身是达到目标的常规手段。他们因此认为，和平只是用来准备即将来临的战争的那段时期。国家在和平时期的经济活动已经按战时服务于战争的方式来组织了。这套方案，当然包含着战争策源国所必需的所有产品的自给自足。

自由主义者推荐自由贸易和国际劳动分工，是因为所有文明国家之间的和平是自由主义者政治信条的基石。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由的国际贸易之前提是国家之间的善意与和平。劳动分工和战争是不相容的。一国之中的劳动分工预示着国内各地区间的和平。在中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当劳动分工还很不发达时，单个的城邦或国家互相开战是可能的。当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在生产战时所需要的一切时，战争的形成过程中并不会带来食品、装备、武器的供应问题。交战各方需要金钱来进行战争；但是，如果他们已经有了金钱，那么，他们就能够买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在国际劳动分工的现代世界中，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欧洲国家或多或少依赖进口的粮食与原材料。现代武器与战争物资的生产，只有在大规模专业化的企业才有可能实现，而为了在战时能顺利运作，这些企业在和平时期就必须运作起来。一个国家要是不在其国境内生产所有的原材料、食品和所有种类的武器与军事装备，在战时就会缺乏这些东西。

自从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德国就开始为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作准备，这时，它的经济供应品仅限于食品。国家在战时不依赖外国的供应之必要性，是促成保护农业的原因之一。但是，没有人认识到，一个好战的国家居然会遭受食品以外的物质匮乏之苦。世界大战<sup>[2]</sup>的经历才提供了这个经验教训。

今日，认为战争是满足“实现强大”的雄心的目标之手段的列强，都在追求实现自给自足，以便在未来的战火中不依赖于外国的

供应。正是这些强国，为了战争，以系统的方式发展了自给自足的理论与实践。国际联盟的《公约》<sup>[3]</sup>第16条规定，对走向战争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对这一点的考虑强化了自给自足的努力。

为实现战时的自给自足，这些国家希望尽可能地不依赖于它必须进口的原材料。这些国家意欲用本国的生产来代替进口的原材料和食品。用最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他们进一步地扩张了可产于本国境内的食品与原材料的生产。他们试图用本国制造的替代品来取代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在这样的努力中，是不计生产成本的。在这一政策的支持者眼里，这些替代品的生产成本是否比进口商品贵数倍是毫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替代品可以在国内生产。正是靠这种精神，他们接下去会生产合成橡胶、合成石油、合成棉等等。

在赞成自给自足的这种军国主义理由的论证中，却有一个显著的错误。无论何时，现代技术成功地用一种与自然产品相较至少同样有效率而并不更昂贵的合成商品代替使用迄今的一种原材料时，很明显，新商品或多或少地会将旧商品逐出市场。就这样，茜草被苯胺取代了，人工丝绸以同样的方式将丝绸和棉花逐出了市场。在这样的情形下，新商品不能再被称做替代品，正如汽车不是马车的替代品，或枪支不是弓箭的替代品。但是，这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此处考虑中的替代品是拙劣的，与所欲替代的商品相较，不但不能提供更优质或更廉价的服务，其效率反而更低，价格反而更昂贵。在寻找这样的替代品的努力中，可能有朝一日会发明一种新的产品，它比现在所用的材料能提供更大程度的满足。但是，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考虑空泛的期望，而必须考虑当前的情形。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某些国家期望通过国内生产来代替进口原材料而实现自给自足，而本土生产的替代品比本要避免进口的材料更昂贵更低效。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不利之处会得到弥补：这个国家不再依赖外国供应，因此，在战时，也不会遭受这种商品的匮乏之苦。他们认为，如果涉及到国防问题，生产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有独立才是重要的。

但是，以上的推理是错误的。战争中所需要的某种物质的生产是昂贵还是低廉，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更高的生产成本意味着同样数额的资本和劳动，产出更少。如果好战的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本和人力来获取一定量的物质，这个国家在这种物质的供应上就不如其敌对国那么充足。这个国家不得不将更多的人手投入到同等

数额的产品之生产中，这简直就是灾难。在战场上的人手就会不够，因为人们不能在作战的同时从事生产。在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已经感受到，战争装备的生产吸纳了过多的年轻人是一大妨碍。

然后是第二种强烈的不便。替代品比起它所替代的物质来是较不适当的。要不是替代品更差，它们就不成其为替代品而是正好合适的物质，敌对国也会采用它们。交战一方被迫采用较不适当的材料是一项重大障碍。装备更好的一方在士气和物质方面都会获得优势。即使是最好的军队，认识到他们的敌人有更好的食品供应和武器装备而且得到更好的保护，这支军队的士气也会受挫。没有人能够否认，协约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物资占有优势。

然后还要考虑到，替代品的生产也需要某些原材料。仅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这些原材料在国内的供应才是充足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原材料也不得不依赖于进口，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在本国生产的，或虽在国内生产但产量不足。德国人希望用纺织品来代替布，为生产纺织品还需要羊毛，然而，是否可以将德国羊毛的生产扩大到可以满足所有需求的程度，却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羊毛生产和扩张只能在限制其他农产品生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因为羊毛的生产需要土地，而土地在德国是稀缺的。如果德国或意大利试图用木材来生产替代品，那么，他们就不得不面对木材生产不足的事实。当遭受制裁的意大利计划从乳制品中生产布料时，它就不得不面对牛奶生产不足而且只有利用进口饲料才能扩大牛奶生产的事实。替代品的生产并没有消除原材料的问题，而只是将问题转移到了生产的其他部门。

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特征在于，它们不能不通过出口来进口原材料。因此，这些现代的工业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如这些国家内部的工业中心与同一国家内的生产农产品与原材料的地区的关系一样。正如一个城镇不可能向一个向其供应食品与原材料的地区发动战争一样，一个工业国同样也不可能向世界的其余地方开战。这就是今日欧洲的工业国所处的状况。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这一事实推断出国际和平的必要性。他们赞成这种观点：战争是与国际劳动分工的现状不相容的。但是，认为战争是一个国家最高级最高尚行动的军国主义者却相信：这样的国际劳动分工阻止了他的国家发动战争，而将奴役强加于他的国家。他所理解的独立自主的意思是，使他的国家进入能够向其他所有的

国家或一批国家开战而不依赖于外国供应的一种状态。德国和意大利希望能够经受住针对法国及其盟国的战争，而又不遭受食品与原材料匮乏之苦。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真的希望进攻法国或它们认为法国会进攻它们。我们不必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它们认为，有一种状态是不能容忍的障碍，即它们不能将诉诸于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它们所理解的自由，就是国家领导人认为必要时发动战争的准备之就绪程度。

显然，这样的自由概念只限于大国。一个小国从来不敢这样提出自己对于独立自主的要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强调，他们收复失地是正当的，因为大国不能满足于小国所满足的情形。他们对可以生产原材料的领土提出主权要求；当他们宣称本国的不满时，他们就通过论证殖民地与原材料的分配不公来证明他们的领土要求是正当的。特别是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关于原材料与殖民地的重新分配之协商，他们尤其希望能够享有自给自足，因为他们希望将刻意培植的武力作为谈判的筹码。

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给自给在这两个强国的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了。它们并不认为限于本国领土的实际边界内的自给自足是长期的，而认为，这样的自给自足只是为了争夺霸权而即将进行的战争之短暂的准备。这就是希特勒经常在其书籍《我的奋斗》中所暗指的战争。<sup>[4]</sup>

当然，自给自足的政策即使被认为仅是为下次战争所作的准备，也不会比被认为是一项长久的军事制度时显得更为合理。

一些军事专家认为，将来的战争绝对不同于过去的世界大战。他们设想：如果侵略者出其不意地攻击一个没有意识到危险因而没有准备好抵抗的国家，侵略者就会很快地成功。这样的“闪电战”可以一举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这样的突然袭击在未来的战争中是否会比它在过去的战争中更为成功，是值得怀疑的。突然袭击在 1756 年一举打倒了萨克森，在 1914 年击溃了比利时，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下，突然袭击既没有决定结果也没有结束斗争，相反地，只是点燃了战火。没有理由相信，在一次假想的新的世界大战里，事情会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在一场战争中，如果侵略者寄希望于进攻的速胜，那么，他的装备与武器的优越所起的作用就会比在其他的任何战争中都要大。为取得这样一个计划的成功，由于使用替代材料造成的武器质量低劣，可能会是毁灭性的。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用替代品来代替适当的原材料，似乎在各个方面都是不宜的。同盟国在 1914 年发动战争的时候，对于产于国外的原材料供应没有作多少准备，它们可以依赖于巨大的库存，这些库存商品属于正常的商业库存。这些库存足够满足战争头两年的需要。自给自足和经济上为战争作准备的政策之结果就会是，在一场新的战争中，这样的库存将几乎不复存在。

将自给自足作为战争的经济准备的两难困境在于：自给自足使得武器更为低效，从而削弱了一个国家的军事潜力。国际劳动分工的当前状况使得每一个敢于发动战争的国家面临一个没有解决办法的进退两难的局面。

在和平时期，每一个国家能够买到它所需要的而且能够为之付款的所有原材料和食品。当然，这使得这个国家依赖于国外的供应，并将它卷入到国际劳动分工中来。但是，因为这使得发动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认为它是一大缺点，却是陈腐的观点。

### 三、中立国的战争论

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决定在所有的战争中都维持中立。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而言，由军国主义者提出的以战争为由的自给自足毫无意义。这样的国家无意于征服，除了和平和永远不受干扰的商业，它们别无所求。但是，即使它们成功地执行中立政策，即使它们仍然是一片血海中的和平小岛，它们也可能遭受战争的后果之拖累。在这一方面，典型的是瑞士在世界大战中的情形。它的食品与原材料供应依赖于进口，必须仰交战国之鼻息。但是，要是与交战国一致，瑞士就会既没有燃料也没有食品，就会陷入饥慌之中。

在这样的国家，赞成自给自足以防新的世界大战之威胁的政策，看起来比希望发动战争的国家同一政策要合理得多。瑞士联邦不能防止它的邻国发动战争。它不得不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不仅包括武器，也包括为战时预备的食品。瑞士经济政策的许多措施在和平和合理的世界上会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它所处的国际环境里，却是正当的。其他一些国家所面临的情况并非十分不同，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像瑞士这样处于不幸的地理位置。

在这些情况下的自给自足倾向，也是现在感染整个世界的战争幽灵的后果。未来战争的威胁危及了国际劳动分工的持续；每一个

政府，即使是最为和平和最具有国际化思维的政府，都不得不为之作好准备。

### 四、基于工资的理由

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果之一，是它造成了工资在整个世界上的互相依赖。

如果劳动、资本、商品在整个地球上可以完全自由流动，那么，同类产业的工资和利润率就会趋同。资本和劳动会从生产的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向较为有利的地区转移，直至实现均等。在现实的状态下，如果有十分有效的制度性障碍来阻止资本和劳动从一国向另一国的转移，就会在利润率和工资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利润率和工资的相互依赖却仍然是事实。

决定日本国内工资的因素之一是：日本人不能自由移民出境，因为没有国家能够容忍这样的移民入境。决定美国国内工资的因素之一是：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是受到限制的。劳动力不能自由地从日本流动到美国。但是，两国工资的最高水平却仍有联系。这种联系是由劳动产品的可流动性所带来的。两国中任一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入竞争。在商品自由贸易的世界上，不考虑运输费用，这些商品会以同样的价格出售。因此，工会提高工资水平的能力似乎受限于国外更廉价劳工所生产的商品之竞争。生产条件更为有利而工资更高的国家之工会，将乐意看到条件较为不利的国家之工资上升。但是，除非从较为不利的国家输送劳工到较为有利的国家，这一点无法实现，而这种情况正是禀赋较好的国家的工会希望避免的。但是，如果劳工在地球上的分布没有改变的话，工资的平等就是不可能的。

在当前限制移民的体制下，均衡工资是不同于它在劳动自由流动的世界上本可以达到的水平的；均衡工资在一些国家较高，在另一些国家则较低。但是，在没有阻止劳动力流动之障碍的任何一个地区，每种劳工都会有一个一致的均衡工资。只要实际的工资不超过这一均衡水平，就业和失业都会是正常的。使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相符，是均衡工资率的本质。

生产条件较为有利的国家的工会如果限制自己阻止移民的行为，如果满足于因这些限制而导致的均衡工资上升，工会就不会使失业数字增加。但是，如果工会试图把工资提高到均衡工资率之上（他

们确实这样做), 工会就造成工人阶级中一大部分人的长期失业。当然, 在市场经济中, 这是工资率超过均衡工资率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企业家将他们不能以集体谈判商定的工资来雇用更多的人手, 归咎于国外竞争的压力。舆论因此认为, 阻止进口的壁垒是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对付失业的有效措施。赞成保护的最通行的一种理由是, 保护一国的生活水平免受由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倾销之苦。

现在, 人们将由廉价劳工生产的商品之进口称为倾销, 并将这类商品排除在外是正当的。这意味着, 有些国家, 一方面是自然禀赋良好而资本充足、生产条件最为有利的国家, 另一方面又排斥移民, 他们认为高额进口关税、配额和甚至完全的自给自足是正当的。

如果一个国家既不忍受劳工的移民输入, 也不容忍由国外廉价劳工生产的商品, 那么, 它就是在走向完全的经济孤立。

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应为一些人口过剩地区的低工资与低生活水平负双重责任: 首先, 它们使得移民实际上不可行, 其次, 它们反对进口制成品。它们在维持本国生活水平的努力中, 对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施加了压力, 特别是对中欧、东欧、南欧和日本。它们减少制成品的进口, 同时却增加食品、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出口; 结果是国际贸易总量的下降。

因此, 使贸易障碍更为有效和使国家在经济上出现越来越孤立的倾向, 是为实现保护本国生产以战胜失业的政策之结果。这种政策所基于的思想是误导性的。国外的低工资变得更低, 国内的出口随进口的减少而同比例地降低。

试图以贸易壁垒政策来消除失业是毫无希望的。只有在劳动力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未被雇用, 高于均衡工资率的工资才能维持, 这一点, 对于一个孤立的国家与一个和国外有买卖关系的国家来说是一样的。认为在长远看来外国竞争会造成失业, 这是一种谬论。外国的竞争, 或更正确地讲本国市场只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这个事实, 是决定均衡工资率最高点的因素之一。在均衡工资点, 失业只是短暂的现象。外国的竞争可能使得均衡工资较低, 但不能直接导致长期的大规模失业。

如果一个国家试图排除外国劳动力市场对本国市场的影响，那么，它就不得不从国际劳动分工中脱离出来。但是这样，它就剥夺了人民从国际经济合作中可以获得的所有好处。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商品工资将不得不下调。经济孤立的政策无论如何不是提高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正确方式。

## 五、人口过剩论

进行贸易保护的人口过剩论理由，其实就是从人口过剩的国家的立场所说的工资论理由。在这些国家，工资较低，而在当前的移民壁垒条件下，是没有希望通过向外移民提高工资的。

在这些国家，均衡工资较低。但是，只要实际工资不高于均衡工资，就没有持久的大规模失业。与国外相比，均衡工资当然可能降到极低的水平。

低工资总是令人不满的，政府和工会都在寻找补救方法。不幸的是，惟一有效的补救——向外移民——不能列入考虑之内。不管是由政府强制还是集体谈判所得到的最低工资，只会增加失业。为对抗失业，就得采取措施保护国内生产。但是，这样做却提高了商品的价格，在更大的程度上降低了生活水平。

人口过剩的国家对于更为幸运的国家之指责是有根据的。均衡工资高的国家以双重方式损害了人口过剩的国家：使得移民不可行、国内市场仅对本国产品开放。然而，人口过剩的国家闭关锁国，却使得本国的处境更糟。它们这样做，除了使得本国的生活水平更低之外，不会得到任何结果。<sup>[5]</sup>

在这种情形中，保护和自给自足也是抱薪救火式的补救。

## 六、货币或外汇论

基于货币或外汇而赞成贸易保护的理，与其他大多数理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纯粹是经济性的。不幸的是，它与其他理由一样，也是错误的。

维持一种健全的货币，与外贸没有任何关系。所有类型的重商主义之古老而根本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不利的贸易差额会使货

币流向国外。然而，贸易差额只是国际收支余额的一项而已。进口相对于出口的超额，是可以被其他项目的资产所抵消甚至超过的。国际收支余额总是平衡的。如果仅仅通过出口黄金使得国际收支余额的两边相等，那么，价格必定下跌。低价格会促进出口而阻止进口。在货币并非完全为金属的国家，黄金外流会迫使银行紧缩信贷。为更高的利率所吸引的外国短期贷款之流入导致调整。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均衡都会自动地建立起来。长远来看，一个不滑入通货膨胀与信贷扩张的国家，从来不会处于货币储备外流的危险中。相反，如果存在通货膨胀，如果因货币过量而发生价格上涨和本国货币贬值，那就无法阻止格雷欣法则所描述的机制发挥作用。如果政府赋予业已贬值的纸币与金币相同的法定性质，后者就会从流通中消失。因为，在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的情况下，自动的调整不能实现，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贬值越来越严重的纸钞就会取代金本位。

政府试图通过限制进口而终止贬值的努力是徒劳的。如果政府阻止公民购买外国商品，他们就会购买更多的国内商品。这些国内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其出口就会下降。因此，本来想通过限制进口而改善国际贸易平衡的政府干预，却会导致平衡的两边均下降。干预同时削减了进口和出口。结果是外贸总额减少。

如果政府希望其政策成功，那么，它就不得不从公民手中拿走他们持有的多余现金。政府不得不向公民征税或在国内发行贷款，然后将所获得的货币撤出流通过程。这意味着通货紧缩政策。当然，通货紧缩是降低外汇汇率和使货币单位恢复以前购买力的惟一有效的手段。但是，如果政府不希望通货紧缩，它就无法降低购买外汇的价格。

存在于很多国家的外汇管制，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些国家试图简单地维持外汇的市场兑换率。它们认为应该做点什么来防止进一步的贬值，它们认为外汇管制就是正确的方式。但是，它们不想强迫公民以低于市场价的兑换率来买卖外汇。在这种情况下，外汇管制的危害倒不大。由于没有将更低的外汇价格强加给市场，由于外汇是以市场价格买卖，此时，交易是自由进行的，还是属于中央银行这样的机构的特权，或者是外汇补偿账户（**Foreign Exchange Equalization Account**），都是无关紧要的。当然，如果政府或管理外汇交易的机构为了节省外汇的原因阻止某些进口，也就限制了进口

因，也限制了外贸交易额。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紧迫的理由在这方面采取激烈的措施，因为外汇管制并不直接限制可用的外汇之金额。

而当外汇管制的目标是将低于市场价的外汇价格强加于市场之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每位公民必须以低于市场价的法定价或官价将所有外汇卖入外汇补偿账户，这就好似征收出口关税一样。出口总额下降，因而外汇补偿账户可获得和购买的外汇也会减少。外汇短缺是将过低的黄金和外汇价格强加于市场的必然结果。这些管制被执行得越多，短缺就越严重。要不是〔出口商〕为了得到政府给予的出口奖励的话，出口会完全停止，而政府提供的出口奖励是为了补偿出口商被迫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外汇而遭受的损失。

如果一个采用了这种体制的国家抱怨外汇短缺，它就必须认识到，恶果正是由自己的政策所致。但是对于公民而言，无论他们买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商品，外汇管制的后果是一样的，不存在转移的问题。一个德国人是否希望买棉花或国产的什么商品（例如煤），对他本人或对国家的货币体系而言，不会有任何区别。在两种情形中，他都不得不放弃购买其他的东西。与他不买棉花或煤的情况相比较，他买了棉花或煤之后，就不得不为其他目的而少花费一点马克。问题在于，他是否足够富有，可以买得起棉花或煤，他是否会花掉必要的金额。如果他买更多的进口商品，他就得少买国产的商品。这样，国产的商品就会变得便宜而更容易出口，故而货币的流入弥补了流出。如果因某些原因出口不能上升，对外汇的更大需求会使外汇价格上升，因此，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约束了公民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在此处，市场的自动作用也发挥自如。

让我们设想一下：重新分配生产原材料的地区后，澳大利亚和美国南部的某些地区成为德国的领土。这样的安排不对经济与货币领域造成任何改变。德国消费者还是要为棉花和羊毛付出与他现在购买时一样的价格。对于英国人或美国人来说，这也不会使得他们在这些新放弃的领土上采购变得更为容易或困难。当然，在现在的情况下，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方式与英国和德国间的贸易方式并无不同，与德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方式也无二致。英国的国王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的统治者，或澳大利亚公民讲英语而且是英国人的后裔，这对于英国的羊毛购买者而言都不构成有利条件。羊毛市场上的德国买家是在同等的条件下与英国或丹麦或波兰的买家展开

竞争的。

另一方面，让我们假定，巴伐利亚被分离出德意志帝国。但是，由于政府对货币体系的干预和外汇管制，巴伐利亚与德意志帝国的其余部分间的贸易不受这一分离的影响。撒克逊人在巴伐利亚购买东西，必须要么由直接出口来支付，要么通过三角贸易来支付，不管巴伐利亚是否属于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

认为购买进口商品消耗了国家的外汇是误导性的。对一个人这样讲是错误的：你不能购买这件外国商品，因为购买这件商品的钱是国家外汇储备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的外汇基金。外汇的持有处于连续的流出与流入中，每日积聚起来又在当日耗尽。消费者在购买外国商品的同时，通过降低他对本国商品的购买而创造了他购买所需的外汇额。

贸易壁垒的存在并不能改变这一机制的作用。贸易壁垒当然使得出口和获得外汇更为困难。但是，出口和外汇流入的降低将自动地导致进口的萎缩。当出口行业的价格、工资、利润减少时，受其影响的社会集团就会削减购买外国商品量，否则，他们对本土商品的购买就会减少。在前一种情形下，对外汇的需求下降，在后一种情形下，这些商品在国内销售的数量减少而价格降低，因而更容易出口。

如果一个国家希望享受稳健的货币与外汇稳定的好处，它就必须避免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如果它偏好贬值的虚假好处，那它就不得不让市场来为其货币单位定值。在这两种情形下，它都不会发现在与外国交往中有任何货币方面的问题。正是通过外汇管制使外汇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目标，造成了外汇的短缺。

德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就像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地位一样，过去和现阶段都建立在工业之上。它们主要进口原材料而通常出口制成品。德国政府限制进口原材料的努力，实际上也限制了制成品的出口。将进口的原材料用于重整军备而非用于出口性工厂的生产，它降低了可用的外汇总额。不过，德国只是今日执行这种政策中的许多国家中的一个突出范例而已。

在一个基于仅发生于双方之间的易货贸易和直接交易的经济体系中，没有人怀疑双方都获得了满足。货币的功能是为三角贸易提



供同样的便利。货币的这种结算功能不仅仅只限于地方贸易，它在跨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最有效率的和最简单的结算体系就是货币体系。如果一个国家用双边结算取代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那它就丧失了自己可从三角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它因此而失去了在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而到最高价的地方出售的能力。它不得不到它需要出售商品的地方去购买商品，尽管那个地方价格高昂；它也不得到它希望购买商品的地方出售自己的商品，尽管那里的价格低廉。

金本位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三角贸易的国际组织的最好的甚至是惟一实际的解决方案。金本位制之所以不再发挥作用，不是由于它固有的某种缺陷，或由于它的先决条件改变了，而是政府不希望它的机制再起作用，才造成了目前的结果。政府与国际劳动分工对抗，因此，它们想要摧毁国际贸易的这件最重要的工具。不是金本位制的崩溃，也不是世界货币体系令人不满的现状，才使得限制贸易的政策因货币方面的原因而成为必要。相反，金本位制和国际货币体系之所以崩溃，正是因为政府为废除国际贸易而有意识地摧毁了它们。

## 七、国内政策立场导致贸易保护

一些国家之所以赞成贸易保护，是因为它们认为，在贸易中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因此，有必要保护本国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的侵害。但是，即使这些与国际立场相反的关于国家利益的错误考虑不发挥其作用，仅仅是本土政策的考虑，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在今日世界的许多国家，人们普遍地认为，保护低效率的生产商免受更有效率的生产商之竞争是国家的责任。政府以这种方式阻止更有效率的生产商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它为了小店主的利益而限制大商店的行动范围。它强迫整个行业按比例削减产量而不是让市场清除勉强够格的生产商。它使得汽车更难与铁路竞争。它试图通过干预来为供应量大于公众需求的商品创造更好的销路。

强调国家的使命是领导而不是被领导、强迫其臣民服从其命令的权威主义国家之强力政府，与它们斥之为软弱的民主政府没有什么两样，其行动准则都是政府干预和国家干预理论。每一个政府，不论是议会制或是权威主义制度，今天都准备为其所希望依靠的集



团之特殊利益而实行政府干预。甚至有些小集团有时也在统治者的政治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不管该统治者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白银在美国的事例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可用来说明特殊的战略地位如何赋予一个小集团影响一个大国政策的可能性。同样，在每一个国家，企业家的小集团和工会成员的小集团都支持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和贸易限制措施。

看起来，我们的同时代人认为，发现难以经受外国竞争的我们的同胞们，就应该对其加以保护。通行的观点是：政府如果不努力帮助缺乏效率的生产商，就是忽视了自己的首要职责。

说贸易保护的根本是对与公众利益相对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自我保护，是过于简单的解释。这些特殊利益总是某些少数团体的利益。每一种个别商品的生产商——企业家与工人——与消费者群体相比，总是少数。他们成功地以公众利益为代价而保护自己的利益，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舆论的支持，而舆论认为，这样的保护对国家是有利的。一百年以前，马车夫没有得到保护以免受蒸汽机的压倒性竞争，是因为当时自由主义的精神反对以大众利益为代价而保护小集团的特权。今日，铁路要求免受汽车竞争的主张对于立法者而言似乎是正当的。今日，每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必定会在舆论中找到支持。舆论的这种态度，而不是希望获得特权的那些人的欲望，才是造成特权的原因。从本国政策的角度来看，贸易保护只是政府干预体制中的各种措施中一类而已。

## 八、经济利益的国际冲突

在我们这个移民壁垒重重的世界上，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利益冲突。通过限制移民数量，一些国家成功地使得本国公民的工资更高，但这却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公民为代价。经济利益的国际冲突正是源于这一事实。在和平贸易的世界上，如果每个人都有权利与其他人一样以相同的条件买和卖，就不会有关于原材料和殖民地的严重冲突。但是，当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公民被阻止移民而不能进入他们可以比在本国赚更多钱的国家时，就有了冲突。美国和英国殖民地的高生活水平，是东欧、中欧、南欧、印度和日本的低生活水平的必然结果。

美国和英国领土上的人民向新来者关闭大门而维持了自己更高的生活水平。结果，他们的领土上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一直荒置，而

其他国家更为贫瘠的土地却不得不被耕种。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现状的任何描述，如果不强调这一事实，都是不充分的。

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当前的公众讨论中通常受到忽视，原因有三点。首先，我们的经济与政治考虑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所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只是资产阶级占优势的特殊阶级利益之结果。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憎恨、国际关系中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是资本主义统治所特有的。一个受欢迎的政体的世界应该是和平的、反对国际冲突的。无产阶级都是兄弟和朋友。这种教条使马克思主义者忽略了一项事实，即欧洲和亚洲的无产阶级大众之所以遭受贫苦（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示痛心），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居住、生活、工作于生产的自然条件较为不利的地区，因为条件较为有利地区的无产阶级拒绝他们进入自己的国家。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理论的一贯话语，我们不得不说：欧洲和亚洲的无产阶级被新大陆的无产阶级所剥削；现代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较为有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与较为不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经济利益冲突的“上层建筑”。与关于当前经济政策中其他措施的丰富出版物相比，关于移民限制的著述是何等之少，这是很特别的。

在我们的政治舞台上，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即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不准备讨论移民壁垒问题。他们的哲学是反对移民出境。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需要所有的同胞。他们希望征服更为富有的国家并吞并它们；他们不想将自己的子弟作为移民送往国外。他们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的补救是征服。意大利的人口压力因战后禁止移民而更加恶化，但这却没有促使墨索里尼批评不允许意大利移民入境的国家之政策。他为之气恼的事情之中并不包括移民壁垒。相反，由于渴望增强其军事力量，他本人反对移民出境，并且希望提高出生率。

低估移民壁垒之影响的，还有第三个原因。国际思维最杰出的支持者是英语国家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高尚见解，和平国际合作事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同情工会，而工会在英语国家是移民壁垒的坚定支持者。

移民壁垒的坏处是将被阻止资本流动的壁垒进一步地放大了。人们判断究竟是债务国的政策还是债权国的政策造成了资本流动性的丧失是困难的。输入资本的国家通过公开地拒绝偿还外债、实行

外汇管制而摧毁了资本的国际性。但是，资本输出国在限制资本外流方面也是有份的。结果就是：受移民限制被迫在生产自然条件较为不利因而工资较低的国家工作的人口，发现他们的生存因资本短缺而更为恶劣（资本的短缺降低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因而更大程度地降低了工资）。

这一点看起来是令人惊奇的：今日的舆论更关注原材料这一显眼的问题，而不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严重的问题，即劳动的可流动性问题。

但是，不管我们认为国际主义的关键是原材料的问题还是移民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国际贸易的压制或战争，都不是恰当的补救。一个国家，即使因地域贫瘠而处于不利境况，不能生产足够的原材料，阻止它的公民移民出境，它也不可能从贸易保护中得到任何益处。值得注意的是，李嘉图关于自由贸易政策优越性的不可辩驳的证明，正是基于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假定，资本和劳动并不像它们在一国之内那样自由地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资本和劳动不可流动的假定在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是成立的。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之初，这一假定就不再成立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再度成立。因此，说李嘉图的论点因情形改变而不再成立是错误的。相反，情形依然相同。

然而，战争也不是当前冲突的解决之道。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地理与政治条件，对于人口过剩的欧洲国家而言，运用战争的手段来迫使拒绝移民入境的国家改变政策，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不是提议将征服海外领土而是提议将征服欧洲版图作为德国的政策目标。但是，德国的这些欧洲邻国，除开那时人口密度已经过大这一事实之外，也不能给予德国移民所需要的东西。

否认我们的世界上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冲突，这是鸵鸟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战争或保护主义与自给自足均不能为所涉及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

## 结论

自由主义是有关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哲学。它的社会与经济理论的基本点是：得到正确理解的所有个人和国家的利益，在私有产权

和自由贸易的社会中是和谐的。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主与和平是有关生活、工作和人类合作的观念之结果。

但是，自由主义暂时还是一小群缺乏影响的少数人的特权。世界是由其他思想所统治的。这些思想导致了军备与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了阻碍商品、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导致了军国主义和独裁。

设想只要这样的概念盛行，降低国际贸易的障碍的任何努力就能够成功，这是错误的。如果赞成贸易保护和自给自足的理论被认为是正确的，那就没有理由清除贸易壁垒；只有坚信这些理论是错误的，坚信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才能动摇贸易壁垒。要么贸易壁垒是有用的，那它们再高也不过分；要么贸易障碍是有害的，那它们就只能完全消失。战前温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两种互相冲突的理论不稳定的均衡之结果；现在，当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已经将自由贸易的理论驱逐出舆论的领域时，贸易壁垒就再也不受任何约束了。

期待一项国际协定能带来变化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一个国家认为，更多的自由贸易于己有利，那它可能始终开放边境。但是，如果它认为自由贸易于己不利，那它在国际条约中就不会愿意继续支持自由贸易。今天，每一个国家都急于扩大出口，却没有一个国家准备牺牲一个业已存在的行业之特殊利益或即使是还在形成中的行业之利益。这种倾向正在继续降低国际贸易额。

国际联盟所获得的糟糕结果，世界经济会议及一些国家的更小团体之间更为专门的会议与协商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今日世界缺乏和平合作的心态。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国际合作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

世界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会议，而是精神状态的根本改变。<sup>[6]</sup>

## 第十章 自给自足及其后果

### 一、术语注释

在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术语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因此，似乎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清晰地定义一些术语。

沙文主义（Chauvinism）指对本国的成就与地位的过度好评和对他国的轻蔑。它本身不会导致任何政治性的行动。

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指对于本国的福祉、繁荣和自由的高度热忱。但是，对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爱国者却并无一致意见。

自由贸易论者（free traders，在“自由主义”一词之古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今天被自我标榜为“进步人士”的人贬斥为正统人士、反动分子或经济保皇主义者，被贬斥为曼彻斯特学派<sup>〔1〕</sup>或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希望通过自由贸易，通过和平地融入包容整个世界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求得自己国家的繁荣。他们宣扬自由贸易，不是为了其他国家，而是从得到正确理解的或长期的本国利益出发的。他们坚信：即使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坚持贸易保护，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最好地服务于它自己的福祉。

相反地，民族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要增进自己的福祉，必须以对其他国家的伤害为代价。进攻性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意在通过武力征服和镇压其他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意在通过经济措施（例如贸易和移民壁垒、没收外国投资、拒偿外债、货币贬值以及外汇控制）以损害外国人为代价，来增进本国或它所属的集团之福祉。

如果一些国家认为，它们强大到足以通过军事行动来废除它们认为于己不利的外国之措施，经济民族主义者就会导致战争。

自由主义者希望消除冲突的根源而获得持久和平。如果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地点，如果没有妨碍劳动、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壁垒，如果政府、法律、法院不区别地对待本国公民与外国人，公民就不会对政治边界划分于何处、自己的国家是大还是小感兴趣。他们不能从征服一个省中得到任何好处。在这样一个民主与自由贸易的理想的一——杰斐逊式的——世界上，战争就会得不偿失。

相反地，民族主义者认为，和平本身是一桩罪恶，而正如英国作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所言，战争是“艺术和人类所有的美德与能力的基础”。于是，纳粹党人认为，一个国家最合意的状态是“永远处于战争之中”，墨索里尼礼赞“危险的生活”，而日本人也坚持同样的信条。

和平主义有这样的信条：消除战争所需要的一切，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设立一个其判决由世界警察力量执行的国际法庭。

国际联盟的高尚创建者受这种和平主义的指引。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专制政府是好战的，而民主国家不能从征服中获得任何好处，因而会坚持和平。但是，威尔逊总统及其合作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的认识仅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自由企业和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成立。没有经济自由，事情便截然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时代，每个国家都急于自我孤立，致力于自给自足，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人能从征服中得益，其实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从取消外国政府可能损害到他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措施中获得物质利益。

自给自足或经济上的自足是完全没有贸易的状态；每个国家都只消费本国生产的商品。当代的国家没有一个愿意公开承认它正致力于自给自足。但是，当每个国家都急于限制进口而出口必定相应减少时，我们可以将战争前十年的经济政策之特征描述为自给自足式。

## 二、近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在 19 世纪 60 年代，舆论几乎一致认为，世界处于永久的自由贸易与和平的前夕。诚然，只有一个大国无条件地支持自由贸易原则：英国。但是，一股全面的趋势，即逐步废除贸易壁垒，似乎在整个欧洲大陆占据优势。文明的、政治上先进的国家之间，每一个新的商业条约都降低了关税，且包括了最惠国待遇条款。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学说以及科布登和巴斯夏的学说得到了大众的认同。人们如此地乐观，以至期盼贸易壁垒和战争注定要和黑暗时代的其他残余一起消失，例如专制、不容异说、奴隶制度与农奴制、迷信与酷刑。

然而，世界上更多的地方仍然存在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可分为两类。

一方面，欧洲大陆一些国家长期执行重商主义<sup>[2]</sup>的保护政策。人们坚信：这些国家很快就会认识到保护主义非但不能增进反而会严重损害其福祉，从而最终会转向自由贸易。

另一方面，也有前殖民地国家，即居住着欧洲殖民者后裔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更早的年代认为，进口关税是对本国公民最方便的征税方式。它们的关税起初只是出于财政目的而开征的。随着经济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关税的性质改变了，成为为国内增长中的工业提供的巨大的保护。在 19 世纪中期，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税比保护主义最为严重的欧洲列强（例如奥地利和俄国）还要有力。然而，乐天派希望，至少美国会摆脱他们所谓的美国殖民地时代的残余。

乐观者完全错了。保护主义国家没有放弃保护，反而提高了关税；更糟的是，自由贸易国家却转向了保护。英国和瑞士，一度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支持者，今日却狂热地醉心于实施经济民族主义的最激进措施。

### 三、对外贸易理论的评论

保护主义的回归，由于进口关税激增和阻止进口的新方法之实施而导致的贸易限制的进一步恶化，关税体制融入另一个体制中（在后一体制中，与外国人进行商业交易，即使是旅游、咨询外国医生、在外国就学，都要向当局申请特别许可证）——所有的这些演变——都不是外贸理论发生变化的结果。保护主义的鼓吹者们不

顾一切地试图驳倒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的后果之论断，却无可奈何地失败了。他们所能证明的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些利益集团可以从保护中获得暂时的好处。但是，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他们断言：

1.如果仅为生产的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提供保护，那么，享受特权的集团就是以损害国家的其他集团的利益为代价受益。

2.如果向国内生产的所有部门（德国人称之为 *lückenloser Schutz der nationalen Arbeit*）提供同等程度的保护，那么，没有人可以获得任何好处。以生产商身份获得好处，就会以消费者的身份失去这份好处。此外，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损害，因为，生产从其自然生产率最高的地方转移了；所有的国家和每个人都会受到损害，因为，较为不利的生产条件得以利用，而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却弃置一旁。

3.试图通过限制进口来“改善”国际贸易平衡是白费功夫。但是，对于资本交易（外商投资和外债以及由此产生的支付）、礼品与捐赠品而言，向外国人卖出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之价值总额，正好等于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之价值总额。

4.从外贸中获得的好处完全在于进口。出口只是进口的支付手段。如果有可能，只进口而不出口，进口国不会受损害而是享受繁荣。

一再有人断言：自从李嘉图的时代以来，情形已经改变，他的结论在当前状况下不再成立。然而，这也是错误的。

李嘉图假定资本和劳动没有流动性，但是另一方面，商品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如果商品也没有流动性，那么，每一个国家就完全处于自给自足中，也就谈不上外贸了。）李嘉图所假定的条件在 19 世纪发生了变化。数百万工人从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移民到人口相对不足的国家，这些国家为劳动力提供了良好条件，相应地提供了更高的工资。今日，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情势基本与李嘉图的时代一样。移民是几乎不可能的。国际资本市场分崩离析。因歧视性的税收、征用和没收、外汇管制和拒偿外债使得海外投资过于冒险，资本家避开了国外投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可以考虑国外投资，但其政府预备好了禁止资本外流，因为它们认为，资本外流与国内最



有影响力的压力团体（即劳工和农业）之利益背道而驰。

在资本、劳动、产品完全自由流动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物质条件平等化的趋势会占据主导地位。地球表面各个部分中生产条件较为有利的地方，比起较为不利的地方，会吸收更多的资本与人力。各地区的人口密度有的大，有的小。移民自由和资本转移自由，倾向于消除人口相对过剩和人口相对不足之间的差别。工资和利率会倾向于平等化，相应地，生活水平也会趋同。

在人不能自由迁移的世界上，一些国家比较而言人口过剩，而另一些国家却相对人口不足。因而，在工资与生活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资本流动性的严格限制更强化了这样的差异。

李嘉图已经证明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自由贸易的结果会是什么。即使所有其他的国家坚持保护，每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也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本国利益。

## 四、大企业与保护

在自我标榜的“进步人士”看来，大企业是一切罪恶的替罪羊。他们说，资本家和企业家自私的阶级利益推动国家走向了超级保护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剥削者的阶级利益之意识形态的伪装。

然而，大企业是不害怕国外竞争的。美国汽车生产商与德国电气公司不害怕任何竞争者会超越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地位。<sup>[3]</sup>它们也不要求在它们想要出口的国家开征保护性的关税，事实上，这些国家的进口关税严重地损害它们的利益。如果它们不准备丢失这些市场，它们就被迫在受保护的国家设立分厂并以更高的成本来生产。他们无法在提供最有利机会的地点进行大规模生产从而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相反，被迫在条件较为不合适的地点和较小的工厂来生产其相当一部分的产量。要不是保护主义，福特先生就本不会想到在加拿大、法国、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制造汽车。当今大企业的特征就是，企业在许多国家拥有子公司。它们对维持子公司的生产不感兴趣。要是没有保护，它们本可以将全部的生产集中于成本最低的工厂里。

要是大企业真的从贸易保护中受益，那么，在这个激烈反资本主义的时代，就不会有贸易保护了。无可否认，过去十年里，所有

国家的经济政策之一般趋势在于，尽可能地伤害大企业。企业的当前结构、工厂的位置与规模被迫适应贸易保护主义所导致的状况。向自由贸易的转轨会造成普遍的重新布局，因为，当前许多工厂位于生产成本如此之高的地方，以致如果取消保护，这些工厂就无法与处于更有利地点的企业进行竞争。因此，许多企业的既得利益就与自由贸易相违。但这不是贸易保护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要是没有任何贸易保护，资本家就不会将资金投资于需要保护方可获得利润的地方。

虽然一些企业受自由贸易的威胁，行业中大多数企业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却不是如此。恰恰相反，如果在投入较高的地方生产停止而在投入较低的地方生产扩张，每个人都将受益。

在产品和资本可以自由贸易而劳动却受移民壁垒妨碍的情况下，偏好那些工资只占总生产成本的较小部分的制造产业部门的倾向，就会在美国盛行。这个国家就会偏重于重工业的扩张，而不那么重视相对需要较多劳工的产业部门。其结果将是，进口就既不会导致企业业绩低下，也不会导致失业。在生产中充分利用了本国有利条件的商品之出口的增长，会弥补进口。进口则会提高美国和外国的生活水平。

美国加工业不需要任何保护。除开一些特别的产业部门，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最高的，就像法国成衣业和英国纺织业一样。生产的自然条件在这个国家极为有利，资本的供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丰富，企业家的独创性、发明家和设计师的效率以及工人的技能都是无与伦比的。工厂的技术装备和商业管理的方法是举世无双的。

造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理由是工资率。有人说，美国的生活水平必须受到保护，以免遭受以较低劳动成本生产的某些行业倾销之苦。

这个国家的实际工资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因为美国人口相对稀少，而绝大部分其他国家人口相对稠密。如果移民受到限制，工资率平等化的趋势就不会占主导地位。在那些生产的自然条件与美国相比较为不利的国家，工资率必定会较低。

在这个国家，市场实际工资率（也就是在没有工会压力和强制情况下的工资率）相对较高的状态，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也

不需要通过关税来保护。废除贸易保护措施，不会降低美国的生活水平，反而会提高生活水平，美国加工业就会集中于其优势最大的产业部门。它们的产品就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换回更多的产品，这一类产品在美国的生产将因美国在这类领域的优势较小而停止。美国的总消费就会增长而不是下降。

现金工资确实可能会下降。但是，它的下降比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要低，后者现在因贸易保护而人为地提升。

## 五、贸易保护与国防

曾经有人断言，国家致力于自给自足，是因为国家是好战的，并且希望不依赖于外国的供应。

事实是：德国争取自给自足，因而希望征服更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政府足够大而自然资源足够丰富的疆域，使得德国人可以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其生活水平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

而且，经济民族主义不是侵略性国家特有的现象。比起军国主义民族，热爱和平的国家受经济民族主义精神的影响并不为少。

将瑞士给予国内小麦生产的贸易保护（通过政府对小麦的垄断来运作）解释为一种国防措施，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可能将同样的解释用于瑞士对瓷器、玻璃器具和银器的进口限制。这个国家将配额制用于客车，尽管其国内并不生产客车，这样的生产也没有任何希望会发展起来。

## 六、贸易保护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

一国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密切关联，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体系。经济民族主义是政府干预企业与当前实行国家计划的政策之必然结果，正如自由贸易是国内经济自由的补充一样。国内自由贸易的国家确实也可能搞贸易保护主义，但没有国内自由贸易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必不可少的。一国政府的力量局限于其主权管辖的领土。它无权直接干预国外的情况。在贸易自由的地方，外国的竞争在短期内会使政府干预国内企业的种种措施受挫。当国内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与国外的市场绝缘，就没有政府控制的问题。一个国家在政府管制和严格控制的道路上走得越

远，它就在经济孤立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我们不必研究这个问题，即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就是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否能达到政府和支持这种体制的“进步人士”的预期目标。这种体制的支持者——德国的 *Sozialpolitiker*，英国费边主义者的右翼，美国的制度主义者、新政的拥护者和许多其他团体中的温和派——认为，国家干预主义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一种永久的形式是切实可行的。他们宣称：它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保持着同等的距离，它代表着对社会的经济组织问题的介于共产主义与放任自由之间的第三种解决之道，它兼具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短。然而，现代经济理论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这种所谓的第三种解决之道是与其目标背道而驰的，政府干预企业的种种措施，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从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者的观点来看——一会使得状况比他们想要改变的情况更为令人失望。

我们也不必谈及应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哪些教训。六十多年来，文明国家的所有政府都试验过经济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种种模式。结果无一例外：明显的失败。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之末、受到德国皇帝 1881 年 11 月 17 日<sup>[4]</sup> 圣谕宣扬的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政治方案，以及美国的新政，就是突出的例子。

从本文探讨的主题来看，我们还必须强调另外一点。政府干预企业的每一次动作都提高了国内的生产成本，因而扰乱了竞争的环境。在自由贸易下，它会立即导致国内生产商销售下滑、产量萎缩和工人遭解雇。人们会很快认识到，国家干预主义的体制不会起作用，它会导致失业和不景气的商业。人们会要求回到政府干预之前的状态，也就是废除有害的措施。

但是，如果存在着防止外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竞争或使得这种竞争更为代价昂贵的贸易保护措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国内的企业家就能用涨价来应付成本的增长。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者会获胜；他们确信：他们用以改善工人福利的方法奏效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公众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工人必须承受更高的价格。同样的逻辑适用于由工会压力所导致的工资上涨。在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新西兰除外。在这个国家，劳动的自然条件更为有利，资本更为丰富；另一方面，移民受到限制。如果美国的工会试图将工资率提高到这一市场水平——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其实已经相当高了——之上，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工会方法的迅速且明显的失败，只有通过贸易保护所必然导致的价格上涨才能避免。

如果贸易在美国是自由的，那里的价格——除掉适当的运输成本——不可能高于世界市场的水平。如果企业主受工会压力而被迫支付高于他的企业所能承受的工资，企业主就只能限制产量和解雇工人。

如果相关的产业出口其部分产品，它就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它不能自由地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但是，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国内的生产商结成卡特尔，在国内市场索取垄断价格，用垄断利润的一部分来弥补海外低价销售的损失。德国尤其如此。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被迫出售其相当一部分制成品的德国在 Sozialpolitik 和工联主义方面，远远走在各国的前头。其广受羡慕和颂扬的劳动安全 (Arbeiterschutz)，社会保险与集体谈判的体制之所以能够运作，仅仅是因为受到全面保护的德国工业成立卡特尔并以远低于本土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soziales Königtum der Hohenzollern 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谓的成功是表面上的。工人自己——作为消费者——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负担。卡特尔和垄断是德国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必要补充。

广泛流行的传说误传了事实。这些传说宣称，垄断的倾向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鼓吹政府控制企业的德国人一再重复：私人企业如果自由行事而不受政府控制，就必定走向垄断，这一不可避免的倾向使得企业的国有化成为必然。他们缄口不提这个事实：仅仅由于政府与议会通过了关税法令，卡特尔才有可能维持；如果企业家拒绝自愿结成卡特尔，法律就命令企业家组建卡特尔，就如碳酸钾行业；普鲁士政府本身就是煤矿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它加入了煤的卡特尔。

当前政府与政党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它们同时向消费者许诺低价和向生产商许诺高价。但是，由于任何政府也无力使得价格低于在没有政府干预之下竞争性市场上价格理应形成的水平，结果就向来只有提高价格的政策。政府假装在打击垄断，却从来不诉诸于可以使得在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建立垄断的企图落空的措施，也就是废除进口关税。

政府和议会都青睐垄断价格，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获取国际性

垄断的行动中清楚地看出来。如果保护性关税导致国家性的卡特尔之形成，那么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国家性的卡特尔就能够通过共同协议来组成国际性的卡特尔。政府另一种支持垄断的行动，也就是给予新发明以专利和其他特别权利，来很好地服务于这样的协议。然而，在技术壁垒阻止国家性卡特尔建立的地方——农业生产几乎总是这样——这样的国际性协议也不可能得以达成。这时，政府就又来出面干预。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就是政府通过国际条约来建立贸易限制与垄断的公开记录。有小麦垄断联营的安排，也有限制橡胶、锡和食糖贸易的方案，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其中的大部分图谋不久就失败了。但是，这种失败与其说是政府偏好竞争性企业的结果，不如说是政府无能的结果。

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贸易保护主义，也不能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奏效而取得其所期望的成果。政府的干预只能或长或短地推迟国家干预主义不受欢迎的结果显现出来。其失败最终必定会明白无误地显现。通过法令或工会压力来提高工人收入到高于自由市场确定的水平之上的种种方案，必定或迟或早地导致年复一年的大规模失业；保护只能推迟这种效应，却不能消灭它。但是，国家干预主义者所看重的正是这种短暂的延迟。这种延迟掩盖了国家干预主义者所钟爱的政策之无益与愚笨。如果措施的破坏性后果即时显现，公众就会很快地认识到其空虚性。但是，后果显现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支持政府控制与工联主义的人士就有机会吹嘘说：企业主曾预言，人为提高的工资与以歧视性税负和劳工立法形式强加于企业的负担，将使他们的工厂无利可图而妨碍生产，这是完全错误的。

经济民族主义是干预国内商业环境的努力之必然补充。

## 七、债权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债权国设置的针对进口的关税障碍特别地荒谬。如果债务国依据规定的条款支付利息与本金，如果债务国不阻止外国投资者带走所获得的商业利润，那么，它的贸易盈余就必定是出口大于进口，也就是变得“有利”。相应地，债权国的贸易盈余会变得“不利”。此处的“有利”和“不利”当然是误导性的。成为一个富国，从国外获取大量的利息、分红和利润，当然不是“不利”的。英国在上世纪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正是因为它有相当“不利”的贸易盈余。

美国在其辉煌的地理与经济扩张中，为外国资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投资机会。西欧的资本家为美国铁路的建设、采矿业和加工业提供了部分资金。后来，美国人开始返还外国人拥有的股票和债券；这些行动使得美国的贸易盈余变为正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事情改变了。美国成为了债权国，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的贸易顺差——在 1916 年至 1940 年出口超过进口的部分大约有 300 亿美元——现在有了另一重意义：它是向外国提供的贷款与在外国的投资之结果。

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关税政策使得债务国支付利益与分红更为繁难。其他的债权国，例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债务国对不得不付的款项确实并不积极；债权国通常并不急于遵守合同的条款。但是，债权国明显地偏袒自己利益的行为，为债务国拒付提供了极好的借口。债务国诉诸于货币贬值、外汇管制、延期偿付，部分国家甚至不惜公开废除外债和破产。

债权国的政策在德国赔款和盟国内部债务的事例中显得尤为荒谬。如果德国真的用本国资金支付赔款——而不是用国外（主要是美国）提供的信贷来支付赔款，那么，赔款的支付就可能使接受赔款的国家之贸易平衡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国家的进口就会超过其出口，因为它们接受了赔款。但是，从重商主义的谬论来看，这种效果是巨大的危害。盟国急于让德国支付赔款，同时又不想接受赔款。它们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是，德国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他们不想支付赔款。他们成功了。

盟国之间的债务也是如此。

## 八、极权主义与自给自足

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政府控制商业的雄辩的支持者，据称是“国家就是上帝”这句名言的作者。杰出的学者们，例如卡尔顿·海斯，则称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条。

人们区分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他们说，“进步人士”、政府控制商业的支持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属于前者；后者则是“反动分子”、民族主义者。其实两个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条只有略微的差别。他们都以政府全面控制商业为目标。这两种极权主义的群体中



哪一种才是当今“非正统人士”中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预言家，是很难判定的。毫无疑问，拉萨尔也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先驱，是第一个以元首（Führer）的位置为目标的德国人。法国人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他鼓吹“行动主义”（action directe），也就是鼓吹工会的暴力活动与总罢工，是墨索里尼的导师。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经济纲要，完全是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方案的翻版；其最明确的说明是英国费边主义者和积极地亲苏的作家西德尼·韦伯与比阿特丽斯·韦伯的一本书：《大不列颠国家的社会主义宪章》（*A Constitution for a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不仅是墨索里尼，而且还有很多著名的法国通敌者（collaborationist）和德国的纳粹分子（如维尔纳·桑巴特），在转变为“右翼”以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读者。

事实的真相是：现代民族主义是政府控制企业的国内政策之必然结果。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不是孤立于世界的其他地方，那么，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必定在短期内就会明显地失败。以全面地严格控制企业为目标的政府也必定以自给自足为目标。任何一种国际经济关系，都会削弱一国政府干预国内企业的能力，并限制其主权的行使。如果国家不得不为其公民与外国企业竞争的能力而烦恼，国家就不能装作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政府干预企业的结果是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又要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就是那些公开将所有经济性企业国有化的国家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如果不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就是不完美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仍得依赖从国外的进口，不得不生产一些商品用于在市场上出售。那些与之交易的外国是否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无关紧要的。社会主义必定总是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

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意味着歧视外国的劳工和资本。它们不仅降低了人类努力的生产率，也因此而降低了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此外，它们还造成了国际冲突。

有一些国家由于缺乏充足的资源，无法只靠国内的资源来满足其全部人口衣食的需要。这些国家不能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却致力于征服的政策。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好战和侵略的欲望是它们所坚持的政府控制企业的原则之结果。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是这样。它们说，它们希望得到地球上资源的公平的份额，因此，它们以重新分配生产原材料的区域为目标。但是，其他的国家并非渺无人烟，



那里的居民不准备将自己视为其矿山与种植园的附属物。他们不期望德国或意大利的统治。因此，冲突就爆发了。

## 九、当前世界上的主权

国家主权的原则并不妨碍国际劳动分工和所有国家在包含整个世界的大社会之框架内进行和平合作，只要每个国家坚定不移地坚持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政策即可。在市场型社会（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的社会经济框架内，国家不是全能的上帝，而仅仅是——正如拉萨尔惯常以轻蔑的口吻所讲的——“守夜人”。国家不是目的，更谈不上是惟一的和最高的目的，而只是促进公民福利的手段。承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和不受妨碍的市场交易，将限制主权的行使。

虽然行使主权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各国政府都受制于一条阻止国际冲突产生的原则之至高无上性。

如果国家根据经济干预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行政，主权就变得不受限制，就成了绝对的。极权主义国家假装成无所不能的、至高无上的，超越任何原则、法律、规则和对任何人或事的考虑。除了其“神圣的自我”之外，都不重要。国家宣称什么正确，什么就是正确的。

国家主权的这一过分概念与经济发展的当前状况是不相宜的。它不能与国际劳动分工共存。它不公正地对待其他所有的国家，必定导致冲突。

人类不可任意地从较高的劳动分工水平退回到较低的劳动分工水平。每个国家的自给自足会明显地降低所有民族的生活水平。时至今日，不再有这回事，即一个国家的国内事务不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福利。每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经济福利中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因为一国的暴政也会伤害到所有其他的国家。

如果一国政府阻碍了其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它就损害了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果经济落后，是在挑战那些能够通过更有效率地利用这些自然财富而改善自身境况的所有人。

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导致这样一种状况，即一国的资源利

用达不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本该达到的水平。例如，其土壤为小麦生产提供了最有利机会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关税，妨碍了制成品的进口。这一事实迫使欧洲人在本土种植小麦，即使欧洲没有对小麦课以关税，尽管这些土地的肥沃程度低于以上自然禀赋更好的国家的数百万英亩的未开垦土地。

一个国家的经济孤立不仅损害本国公民的福利，对外国人的经济利益也造成至少同等程度的伤害。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英国和法国一直在引诱中国开放它的港口，美国对日本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

## 十、美国和世界事务

不仅是经济孤立，政治孤立在当前世界上也是不可行的。

西半球一度不用担心侵略。数千英里的宽阔海洋将它与侵略者隔离开来。飞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态。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却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

他们这样争辩道：“欧洲各民族现在兵戎相见，他们已经毁灭了那辉煌的文明，他们注定要陷入饥荒和悲惨的境遇，这真是非常可悲的事实。同样可悲的是亚洲也是如此。十分不幸，我们不能将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他们必须自己认识到，和平合作比战争和互相灭绝对他们更有利。我们不能当世界警察。我们能做的一切是照顾我们自己，保持西半球的独立。我们将保持中立，不干预其他洲的事务，从而保存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

但是，对于美国人而言，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并非没有利害关系。两大极权主义帝国的建立，一个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另一个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本会成为美洲政治独立的极其巨大的威胁。德国民族主义者总是强调：他们雄心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征服美洲大陆上一片广阔的殖民地。笔者不熟悉日语，不知道日本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在出版物中是否同样地直言不讳。但是，笔者从与日本的许多教授和学生的谈话中知道，日本人视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为他们的主要敌人。

为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美国人不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中立，也不能生活在政治上的孤立中。美国必须认识到，每一次国际冲突

都会或迟或早地将它也卷入进来，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持久和平的战后秩序。

关于持久和平的安排，已经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计划。今日无人能够预言何种计划将会被付诸实施。然而，所有的这些建议必定意味着紧密和永久的合作，或者是在所有国家之间，或者至少是一组国家之间，也就是今日在战争中联合在一起的国家之间。如果不消除冲突，持久的政治联盟就无从谈起。但是，贸易保护主义会激起冲突，自给自足更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单是由纳粹主义引起的。在大灾难的发生上，其他所有的国家未能及时建立屏障以防范可能的侵略，与纳粹和轴心国列强的计划相比，至少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如果纳粹预期，从敌对的第一天起，就会遭遇到由后来参加抗击轴心国的所有国家组成的团结而充分的武装阵线，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敢冒险发动进攻了。但是，在经济领域苦斗的国家之间，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安全的。经济民族主义分裂了热爱和平的国家。如果联合国不能成功地清除经济民族主义，战后的局面就不会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有什么两样。那么，第三次更为可怕的战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每个国家都面临抉择，美国也是如此。二者必须择一：要么，热爱和平的所有国家团结一致，要么，回到新冲突将会发源的混乱中去。但是，团结一致与贸易保护是不相容的。我们每一天都会一再感受到美洲的各共和国之间的友好睦邻政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碰撞。如果拉美和欧洲人民遭受美国外贸政策之苦，这两个洲的民主国家怎能与美国达成密切的政治合作？

如果经济民族主义不被摒弃，最彻底的裁军也不能防止被击败的侵略国重施外交诡计，形成新的利益圈子，挑拨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武装和最终图谋新的进攻。经济民族主义是持久和平的主要障碍。<sup>[5]</sup>

## 第十一章 经济民族主义与 和平的经济合作

对于一个有幸向严肃而又尽责的公民讲述国际关系问题的人而言，他的任务是吃力不讨好的。如果他真心希望尽到职责，说明事情的真相，他就必须驱散幻想，揭露谬论，并展示所涉及的问题之复杂性。

人类今日遭受的磨难之唆使者是一伙流氓。历史上总是有坏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社会组织的主要目标是防止他们作恶。我们的年代在这方面已经失败，这证明我们的制度和政策有根本上的问题。如果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早生五十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成名。他们并没有带来混乱。混乱状况才使得他们成为两个伟大国家的元首，给予他们权力来折磨数百万计爱好和平的人们。

回首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实：杰出的学者们都在宣扬战争、暴力和侵犯的福音，贬斥促进各国之间和平与善意的努力。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德国。例如，苏格兰人托马斯·卡莱尔大肆美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那位残忍的暴君和侵略者。英国人约翰·拉斯金，狂热的艺术爱好者，宣称“战争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人类所有高尚美德与才能的基础。”法国人乔治·索列尔，法国工团主义的创始人，鼓吹暴力、野蛮和残忍。最后，还有德国教授们，他们声称一个国家最令人向往的状态是永远处于战争之中。

这些是无情的事实。然而，世界战争的爆发不是为了符合杰出学者们的学说。法国人朱利安·本达曾经用下面的话来概括文人：**La trahison des clercs**，即知识分子的背叛；这确实是令人痛心的历史现象。<sup>〔1〕</sup>但是，这种现象不是造成今日骇人听闻的事件的原因，

它没有引起那些导致这些战争的冲突。

许多人分不清沙文主义与民族主义，认为沙文主义是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沙文主义在于对自己的国家的地位与成就的自负和过高评价，而对所有其他民族则是带有偏见的轻蔑。在心胸狭窄的无教养的人中间，沙文主义并不比个人的自负或自大更为显著。它的确称不上美德，但是它并不导致行动和政治冒险。德国人开始征服，不是因为像法国人康特·亚瑟·戈比诺伯爵（Arthur Gobineau）和英国人休斯敦·斯图尔特·钱伯林（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所告诉他们的那样：德国人是惟一真正的人种，而其他所有的民族完全是垃圾和理应受压迫者。他们之所以具有侵略性，是因为他们认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最好的，是促进自己福祉的惟一方式。

曾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而现在担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卡尔顿·海斯先生，和曾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而今执教于加利福尼亚波莫纳学院的沃尔特·苏兹巴克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对沙文主义的精彩分析。<sup>[2]</sup>但是，他们二人都错误地将沙文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沙文主义并没有导致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者的政策纲要中，沙文主义所起的作用是装点民族主义的表演和节庆。当官方的演说者称呼人民为人类中的精英、赞扬人民的先辈之不朽功绩与国家武装力量的天下无敌之时，人民中洋溢着欢乐与骄傲。但是，当这些言语消逝、庆典结束时，参与者们回家去睡觉了，而不是跨上战马。

民族主义不能用沙文主义者的陶醉来加以解释或原谅。它是冷酷的马基雅弗利式政客的政策，是论证推理的结果，当然是被误读的论证推理之结果。洋溢着思想——当然是错误思想——的学术性书籍精心地详述了种种学说，这些学说的实施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冲突、血战和毁灭。

大约八十年前，世界舆论几乎一致认为：人类正处于所有国家之间不受干扰的和平合作的时代之开端。那个时代没有有组织的和平主义者的行动。人们不是将战争将会消失的信念基于和平主义理念，而是将之基于这一事实：自由主义会将战争的根源清除掉。他们说，在一个实行大众治理和完美的自由贸易的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存在冲突。战争将成为过去的事，因为战争和征服都将变得无用。

他们争论说，君主和国王急于征服，是因为合并省份可以增加

其权力与收入。但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能从领土的扩大中获得任何好处。缔造永久和平所需要的一切，是推翻反对民主政体的暴君。为完成这一任务，一些战争与革命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旦世界上民主有了保障，世界的和平也就有了保障。

以上就是威尔逊总统的信条。在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眼里，使世界上的民主获得保障，与使世界和平获得保障，其实是一回事。消灭奥匈帝国皇帝及其贵族<sup>[3]</sup>，你就建立了持久的和平。针对霍亨索伦王室（德国普鲁士王室）而不是德国人民的战争，是消除所有战争的战争，是最后的战争。

然而，不幸地是，威尔逊总统及其心灵高尚的合作者没有认识到：仅当完全的自由贸易占上风时，他们的主要命题才能成立。如果法律、政府和法庭对本国公民与外国人一视同仁，如果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与工作，如果劳动、资本和商品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不屈从于任何管理或税负，那么，任何个体的公民就理所当然地不必关心自己的国家是大是小，政治性的边界划分于何处。没有一个公民能够期望将另一国的一部分并入本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战争不再有收益，它们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所不得不生活于其中并在其中解决政治事务的现实，完全不同于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理查德·科布登所描绘和追求的自由主义乌托邦。我们所处的年代不是自由放任的年代，而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年代。所有的政府都急于以损害外国人为代价，来促进本国公民或本国公民中某些集团的福利。外国商品被排除在本国市场之外，或只有在交纳进口关税之后才获准输入。外国劳动力被禁止在本国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外国资本易遭受没收。这样的经济民族主义必定导致战争，只要当受害者认为，他们强大到足够通过武装的暴力行动来消除有损自己福利的措施。

一个国家的政策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外交与内政政策密切联系并互相调适。经济民族主义是当今政府干预商业和国家计划的国内政策之必然结果，正如自由贸易是国内经济自由的补充一样。国内贸易自由的国家可能会有贸易保护主义，但对国内贸易不自由的国家来说，贸易保护主义更是不可或缺的。一国政府的能量限于其主权管辖下的领土。政府无权直接干预国外的环境。在外部贸易自由的地方，外国的竞争即使从短期看，也会使得政府干预国内企业的种种措施达不到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国内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

与国外市场完全隔离，政府控制就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在公共管制与严格控制的方向上走得越远，它就越严重地被推向经济孤立。国际劳动分工变得不可靠，因为它损害了国家主权的充分运用。自给自足的倾向，本质上是国内经济政策的倾向；它是使国家在经济事务中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努力之结果。

在这样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世界里，每一位公民在消灭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外国政策的措施中，可以获取物质利益。每一位公民因此而急于看到自己的国家强大有力，因为他期望从国家的军事力量之强大中获取个人利益。小国不得不被其他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所牺牲，而大国则相信自己的英勇或者说是武装力量。当前的好战，不是国王和贵族寡头的贪婪之结果；它是压力集团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突出标志在于其应用的方法而不在其动机与目的。

因此，像和平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告诉侵略者“不要打仗”是没有用的；即使是获胜的战争，也是得不偿失的；你从征服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相反，这些侵略者确信，战争是有收益的。日本人说：如果我们征服澳大利亚，然后让 2000 万日本人定居在那里，我们就能提高所有日本人的工资与生活水平，包括移民出境的和居住在本土的日本人。他们觉得可以成立的惟一反对意见是：被攻击者的胜利。在我们这个经济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防范战争的惟一方式就是军备。日日夜夜看好你的边境！

日内瓦的试验没有成功，不是因为美国人没有加入国际联盟或者《盟约》<sup>[4]</sup>令人不能满意。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经济领域相互战争不停的国家之间谋求和平，本身就是徒然的。

这次世界大战不是仅仅由纳粹和日本人所引起的。其他所有国家未能及时阻止纳粹的兴起，未能建立防范德国再一次侵略的屏障，在导致这场大灾难方面所起的作用，至少与促使德国国内事态发展的事件相当。纳粹及其意大利和日本的野心本无秘密可言。纳粹党人自己就不计其数的书籍、小册子和报刊杂志上宣扬自己的企图。没有人能够谴责侵略者秘密地谋划了一切。了解其全部计划是相当容易的。如果纳粹预料到从开战的第一天起就会遭遇到由今日联合抗击德国的国家所组成的团结而装备充分的阵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但是，在经济领域永久开战的国家之间，是无法及时组建这样的联盟的。

详述过去的事件不是我的任务。我提到所有这些事实，只是为了表明未来需要做些什么。

如果一个人准备将注意力从严峻的现实中转移出来而沉浸在白日梦中，为战后重建和持久和平起草表面上非常出色的提案并不困难。要是没有经济民族主义，要是贸易是完全自由的，就根本不必为确保和平而规划任何特殊的制度与规定。没有利益冲突，也就没有战争。但是，当所有的国家决心不回到他们称之为国内的自由放任之状态，我们就不能期望经济民族主义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

这就是我反对由杰出的英国学者诺曼·安杰尔爵士所代表的和平主义纲领的主要理由。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冲突，安杰尔爵士的论证就是正确无误的。但是，这一假定却不幸是虚幻的。

和平主义提议设立世界政府和世界法庭以解决争端，建立国际警察力量来执行世界政府的统治和世界法庭的裁决。但是，这种世界政府如何组成？

国际联盟不是世界政府，而是各国的一个社交俱乐部。你可以自由加入，却不可以那么自由地退出。俱乐部中的多数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持不同意见的少数。这样的结社条款当然与政府是不相容的。政府的实质在于对不自愿服从者的强制。在民主政体下，多数有权将其意愿强加于持不同意见的少数身上。为将虚弱的国际联盟改造成更有效率的机构，第一步是要建立投票和决定多数意愿的程序。

但是，如何投票？如果一国一票，卢森堡和爱沙尼亚一起就有两票，英国却只有一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 20 个共和国就可得到 20 票来反对美国的一票。

另一种解决方法是根据各国人口数量来决定相应的票数。这将会达到真正的民主。但是，这样一来，亚洲和非洲的民族在数量上就会大大超过创造了西方文明的民族。如果多数方宣布移民壁垒与国际合作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应当予以废除，会发生什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公民会接受这样的裁决吗？

让我们不要沉浸在幻想中。文明和生活水平上存在着差别，这样的差别会使立即建立民主的世界政府的计划落空。世界上基督徒不超过 6 亿人，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却超过 15 亿人。世界人口的三



分之二几乎不识字。经济利益的冲突仍然存在。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之公民，不愿意接受来自人口相对过密的国家之移民。没有国家愿意向外国商品开放市场。

国际联盟的创建者、所有国家的共同体之类计划的支持者，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同时代的人完全缺乏一种心态，单是这种心态就可以缔造和平的国际合作。他们急于设置机构、办公室、法庭，急于起草盟约和条约的条款。但是，所需要的是改变舆论，是用相互合作的精神来代替互相憎恨与敌对的情绪。和平主义者正确地断言：我们的文明基于国际劳动分工，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消除战争，则我们的文明注定要毁灭。但是，我们的当代人受这种思想支配：禁止外国商品和移民进入本国，能最好地保护本国利益。回归到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可能。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改变这种心态。一小群经济学家决心证明：经济民族主义有害于所有个人与国家的得到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每一个人都应以自由贸易为目标，不是为了外国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同胞。即使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坚持贸易保护主义，通过自由贸易，一个国家也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本国的利益。我希望这样的努力将会成功。但是，意识形态的根本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形下，我们确实能够期望有这样的演变，但在此之前，多少年将会逝去，多少代人将会逝去，直到新的年代终于到来。我们不能放弃国家共同体的想法，但是，我们必须为过渡时期作好准备。不能仅仅因为遥远的将来才会带来完美的解决之道，我们就忽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今日我们必须面对紧迫的问题。我们必须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胜利的前夕，我们必须计划好一个体系，使得军国主义国家不能指望发动新的侵略。

这就是由杰出的学者们提出的种种提议之目标。这些人并不反对全球的国际联盟之想法，或反对诸如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所表述之想法。<sup>[5]</sup>他们只是足够地现实，以至认识到：如果没有适当的意识形态，全球性的方案只在相当长的过渡期后才会发挥作用。他们考虑到了—一个事实，即 2 亿 5 千万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侵略性心态，是不能在一夜之间得以改变的。他们在寻找权宜之计和应急措施，就好像为正在逼近的那天作准备。

我不想为任何专利药品作宣传。相反，我对这些提议相当怀疑。

但是我相信，仔细考虑这些提议，是每一位严肃负责的人的责任。克拉伦斯·史翠特先生为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尽管对他的计划之分析表明：在当前的意识形态条件下，他的计划是不可行的。他已经努力想寻求一条走出当前困境的道路：回到完全的自由贸易，否则就是无穷无尽的战争。

史翠特先生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为了避免新的侵略行为，有必要使得今日联合起来反抗德国与日本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合作持续下去直到永远。当前的军事和政治联盟必须改造成永久的联盟，改造成外交阴谋不可破坏的铁板一块似的联盟。这样强有力的联盟能够防止被击败的侵略国重新武装因而保护和平。另一方面，很明显，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状态，则最终会导致一场新的战争。

为了使联盟具有超国家的权威，加入这个联盟的国家不得不放弃其国家主权的根本要素。它们必须共同处理外交政策，共同管理武装力量，并停止在经济领域的你争我斗。它们必须加入永久的关税同盟和军事同盟。简言之：它们必须组成新的联盟。

没有必要更详细地论述史翠特先生的计划或由世界其他地方提出的其他类似计划，例如，针对整个欧洲——**Panurope of Count Coudenhove-Kalegi**——或针对东欧或多瑙河流域的各种计划。所有这些计划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们都是建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同盟。

现在，我们该回到开始的地方。维护经济民族主义，不仅与信奉所有国家联邦之理念的世界不相容，甚至与一小群国家之间的联盟也是不相容的：当今政府干预企业的种种学说，使得为求更好的战后秩序的所有计划不具成效。任何一个国家，总有强有力的压力集团，反对对其既得利益的任何触犯。

我根本就没有夸大经济民族主义的有害后果。相反，我很希望不要提及移民壁垒的微妙问题。我相当乐观，甚至相信移民这种壁垒本身不一定会挫败国际合作的努力。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却会如此。如果政府干预企业，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就是不可缺少的。

我不是指好战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不管它们的野心何在，只要美洲所有的共和国，英国、英国的自治领和欧洲更小一些的民主国家结成爱好和平之民族的紧密同盟，它们就永远不能发动新的战争。但是，如果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同盟就不能长

久维持。如果阿根廷的家畜饲养商感觉到被美国的牛肉进口政策所伤害，如果巴黎女装裁缝师遭受英国管制进口成衣的措施之苦，他们就不会坚持留在联盟内。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当前其本国政府所拥有的几乎所有权力被转移到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手中。他们已经对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于本国的政府感到憎恨了。建立一个比其本国政府大一百倍的新的超国家的权威当局之官僚机构，将使他们更为震惊。

如果每一个国家都确信妨碍资本、劳动和商品流动的主权实际上是在伤害本国利益，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就有可能。要有国内的自由贸易（在今日通常被贬为“自由放任”），就要先有这样的自由贸易政策。政府控制企业导致国家利益间的冲突，而至今还没有找到和平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

相信这样的冲突可由公正的法庭仲裁解决，无异于幻想。法庭只能根据法规的条款伸张正义。但是，正是这些规定与规则处于争辩中。让我们暂且从移民壁垒中抽身，而将我们的讨论仅限于贸易壁垒问题。欧洲和亚洲人口相对过密的民族，也就是地球上人口的绝大多数，认为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之贸易壁垒是他们改善福利的主要障碍。他们说，他们无法得到原材料，无法进行世界性的贸易。我不想引用侵略国的代表所提出的关于这一不平之事的陈述。现在的世界上有一位高于各方的权威。教皇置身于任何冲突之外。在冲突的两方都有天主教徒，而教皇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因此，罗马教廷的最显要人物对于未来的世界秩序持何种想法至关重要。教皇在1941年10月24日，也就是这个极为重要的天主教国家卷入战争中数日之后的圣诞前夕广播中，讲道：

在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的新秩序的界限之内，不容那种冷漠的为自己打算的自我主义。这种利己主义倾向于囤积理应于全人类所用的经济资源与物质，甚至到了不允许自然条件较为不利的国家使用它们的程度。

在这点上，看到所有国家分享地球上自然资源的必要性得到承认，甚至于那些在实践这条原则中属于“给予者”的行列而非“接受者”行列的国家也是如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教皇断言所有国家，包括他称之为“给予者”和“接受者”的国家，都承认这些原则，他并没有犯错。《大西洋宪章》<sup>[6]</sup>第四点

提供了证据：它们，也就是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考虑到它们现在的义务，将致力于促进所有国家，不论大国小国、战胜国或战败国，以平等的条件享受贸易和得到其经济繁荣所需要的原材料。

当然，教皇不是经济学家。如果他是经济学家，就不会认为自由贸易是一些国家向另一些国家的排他性利益所作的让步。他就会强调自由贸易能最好地服务于双方的利益，强调谈及自由贸易的“给予者”与“接受者”是不恰当的。

尽管如此，问题的核心在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政府和世界上信众最多拍宗教团体之领袖就贸易问题的重要性持有一致意见。从对问题的学术上的认识到满意的解决方案之间，仍有巨大的距离。需要克服的障碍不计其数，对普遍接受的经济学说进行完全根本性的变更正是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乐观主义有任何根据的话，那就是：人们终于开始认识到，自由贸易是持久和平的不可或缺的条件。<sup>[7]</sup>

## 第十二章 不发达国家的困境



海外投资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一大成就。它在 19 世纪才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李嘉图在 1817 年著述时，仍然断言：绝大多数有财产的人“满足于本国的低利润率，而不是将财富在国外作更有利可图的投资”。<sup>〔1〕</sup>

驱使企业家和资本家进行海外投资的当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以尽可能好而低廉的方式向国内消费者供应需求最迫切的商品而获利的欲望。他们进入外国是为了间接或直接（也就是通过三角贸易）为本土市场提供原材料和食品，这两种商品本来以其他方式无法获得，或只能以更高的成本才可获得。如果消费者更急需能够不需外国资源就可在本土生产的更大数量的商品而不是进口的食品和原材料，那么，进一步扩展国内生产，就比投资于海外更为有利可图。

但是，海外投资有益于接受国的程度，不亚于其有益于投资国的程度。在发展对资本的大规模积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性环境方面，吸纳投资的国家一直进展缓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落后和不发达的国家。尽管拥有极好的自然禀赋，但这些国家缺乏开发其潜在资源的资金。由于可利用的资本极为稀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很低，因此，工资率也很低。外国资本的流入提高了工资率，改善了大众的平均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在他们看来，企业

是为了不公平地剥削工人而想出来的鬼点子。企业的存在和运作与道德的客观法则南辕北辙。只有一种方式可以结束这种剥削，也就是社会主义化，即没收私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财产，将他们所有的工厂、矿山与农场收归国有。这就是英国工党政府急于要做的事情，就是浸淫在真正的费边主义精神之中的伊朗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如果英国将其煤矿国有化是正确的，那么，伊朗将其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就不会错。如果艾德礼先生<sup>[2]</sup>的立场始终如一，他就会祝贺伊朗人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

英国没有希望可以通过指出国有化必定造成的对伊朗人的害处而劝阻伊朗将英国人拥有的矿井、炼油厂和管道收归国有。当英国许多行业的国有化问题尚在争论中时，他们自己也不曾留意这样的“反动分子”的言论。

根据当前的国际法，各主权国家可以任意处置境内的所有财产。外国政府可以提出外交抗议，并支持公民本人提出补偿的主张。但是，如果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无意屈服于这样的外交建议，那么，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要看看诸如 1917 年俄国的事例和墨西哥没收石油工业的先例就够了。

外国政府可以向国际法庭申诉。但是，这个法庭的判决在实际中却是不可执行的。

如果外国政府诉诸于最后通牒，诉诸于军事干预，在联合国宪章下，这就成为明目张胆的侵略。

通晓国际法的学者和联合国的律师一定会就英国与伊朗的冲突写出很多深刻的报告与论文。然而这样的言论却是徒费纸张。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如果伊朗政府不是因为期望得到政治和物质上的收益而自愿地改变主意，就无法阻止它没收石油工业。很明显，英国通过军事手段不会赢得任何东西。即使英国出人意料地取胜，英国也会发现，在一家刺刀保护下的企业办公室中工作是很不舒服的。除此之外，俄国占据着伊朗更大的地盘是挥之不去的心头之忧，还有更具威胁性的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危险。

## 二

伊朗没收石油工业的直接后果的确相当令人悲哀。这一行动严

重影响了西方列强的军事计划，并在国际石油市场中引发了根本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事件的更为深远的后果。私人企业和公民在国外的投资在数年前已经几乎完全停滞了。私人投资者从经验中领悟到，海外投资事实上等同于丢弃自己的财富。的确，不是所有吸纳投资的国家都诉诸于公开地没收财产和拒偿贷款。但是许多“好”国家也有效地通过外汇管制和歧视性税负掠夺外国投资人和债权人的财富。一个美国人或瑞士人在某一国家的银行持有不能提取的存款是没用的，特别是当他注意到，其存款的购买力和对应于这个国家的货币单位之硬通货的购买力同样在越来越急剧地下跌的时候。

美国政府建议，作为海外私人投资之替代的公共投资和贷款，要么直接由政府性的（国家或国际的）银行提供，要么由这样的银行担保。其思想是：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应该弥补不发达国家的反资本主义政策蓄意造成的损失。但是，伊朗的事例表明，这样的政府投资与贷款，面对掠夺的危险也是不安全的。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议会可以任意处置外国流入的资金，美国政府为何要将美国的资金源源不断地送入这个国家？难道美国就没有别的投资机会了吗？假定国会将继续容忍以美国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补贴外国的政策，这是相当不现实的。自欺欺人毫无益处。希望广为谈论的《大西洋宪章》第四点<sup>[3]</sup>可以满意地替代分崩离析的国际资本市场而运作，这已经由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 三

国际资本市场的解体造成了不发达国家的困境。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些不发达国家受惠于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所开发的对付流行病和其他疾病的现代方法。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提高，人口上升的数量相当可观。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妨碍了本来就不充分的国内储蓄和资本积累之扩张；有时候，这样的政策甚至直接引发资本的耗散。因为外资的流入微不足道，人均投资资本下降。结果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但是，与此同时，政府与工会试图强求高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工资率，结果就是失业的增长。

由于不明了失业问题的原因，政府试图通过种种措施来消除失

业，尽管这些措施完全无效，而且，其成本远远超过国库的财政收入，于是政府不得不发行不能与金银兑换的法定货币来为之筹措经费。通货膨胀更进一步地打击了国内的储蓄和资本形成。

所有这些不发达国家的政府不屈不挠地谈论“工业化”和使农业生产的落后手段现代化的必要性。但是，它们的政策才是生活改善与经济进步的主要障碍。如果没有资本可用，根本就没有可能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规程。如果国内的资本形成和外资流入受到妨害，资本究竟从何而来？

大约二百年前，英格兰的情形不比今日的印度更好，甚至可能更糟。当时主流的生产体制是可悲的落后。在其框架内，没有人口增长的余地。成群结队的叫花子食不果腹。拥有土地的统治贵族不知道除贫民院、贫民习艺所和监狱之外，还可以用何种方式应付这些可怜的人。但是，接着就迎来了“工业革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使即将饿毙的乞丐变成了能自食其力可养家糊口的人。资本主义逐步地改善了当时的状况，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末期，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欧洲是最高的，比以前各代的人所认为的小康水平都高得多。

如果不发达国家真诚地希望根除贫穷和改善贫苦大众的经济状况，它们必须采用丑陋的个人主义的政策，正是个人主义造就了西欧和美国的福祉。这些国家必须实行自由放任；它们必须废除束缚创业精神、阻碍国内资本积累与外资流入的所有障碍。

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今日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背道而驰。它们不去模仿创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与福利的政策，而是选择使资本积累进一步放慢下来的西方现行政策，并将重点置于它们所认为的财富与收入的更公平的分配上。先不管这些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发达的国家，这里必须强调这些政策被付诸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显然就是无意义的。当没有什么可分配时，所谓的“更公平”的再分配是完全无用的。

## 四

19 世纪下半叶，不发达国家最机敏的爱国者开始比较本国的糟糕状况与西方的繁荣。他们不得不认识到，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战胜贫困与饥饿方面比自己的民族更胜一筹。使他们自己的民族与西方



的民族一样的繁荣，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因此，他们将青年中的佼佼者送往欧洲与美国的大学去学习经济学，也就是学习提高生活水平的秘诀。印度人、非洲人和其他落后国家的人士群集于讲演厅，急切地倾听英国、美国和德国的著名教授所讲的一切。

这些教授——马克思主义的、费边主义的、凡勃伦式的、社会主义的讲席教授，全能政府与全面计划的支持者，鼓吹通货膨胀、赤字支出与没收性征税的事佬——向学生传授的是：丑陋的个人主义、自由放任政策和私人企业是降临到人类头上的最糟糕的不幸。它们使得强盗式的资本家更为富足，却使得正派人士中的大多数陷入日益严重的贫困和退化。但是幸运的是，资本主义的黑色年代即将来临。人民不会再为资产阶级的阿谀奉承和明显不公的社会秩序的邪恶卫道士之欺骗性的学说所愚弄。我们，正义与财产公有的坚决提倡者，已经一劳永逸地推翻了正统学者们的错误与谬论。福利国家会为每个人带来繁荣与安全。丰富和充裕的经济将代替稀缺经济。为使用价值而生产，将代替为利润而生产。不会再有匮乏，也就是人人可以各取所需。

这些教授们从来不曾提起——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显然荒唐——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除开提高人均资本投资之外，别无他法可以改善任何国家或整个人类的状况。相反，他们沉迷于详述凯恩斯理论的教条，也就是储蓄和资本积累的种种危险。他们也从不提起这一事实，即自然——而不是资本家——使得人类的生计资源成为稀缺之物。在他们看来，国家及其可以支配的无穷无尽的资金，可以使政府无限制地支出。即使到今日，他们也没有认识到，累进税已经在所有其他的国家耗尽了所谓的盈余，而且，即将耗尽美国所谓的盈余。

被灌输了这些原则之后，从西方大学毕业的学生回到他们祖国，试图一展平生所学。他们真诚地相信：为了为所有人造就繁荣，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应用西方的伪进步主义的规则。他们认为工业化意味着工会、最低工资和失业救济金，而贸易和商业意味着各式各样的控制。他们希望，在他们允许企业建设可被没收的工厂和企业之前，先进行国有化。他们希望在一些国家建立新的公平交易，而这些国家的穷困，正是由于它们仍不知道今日被贬斥为旧式和不公平的交易是什么。

不发达国家的所有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指责，欧洲和美国是他

们自己民族落后与贫穷的原因。他们是正确的，但却是因为与他们心中所指的原因相当不同的理由。欧洲和美国并没有造成不发达国家的困境，但它们向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灌输了妨碍取得任何改善之最严重障碍的意识形态，从而延长了困境持续的时间。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和国家干预主义者毒化了东方人的头脑。他们应为东方人的反资本主义偏见负责，为东欧知识分子视苏联体制为马克思主义之最完美的实践时所具有的赞同心负责。

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都大量出版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译文，大量出版了非马克思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书籍。但是，只有极少数的详述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情况并批判性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纲领的教条之书籍，以这些国家的一种语言出版。毫不奇怪，读者大众认为，《共产党宣言》描述的资本主义与当今美国的情况极为相符，例如，随着工业的进步，劳工日渐“沉沦”，以及“资产阶级无力保证其奴役的奴隶之生存”。毫不奇怪，他们将苏联体制看作更好的未来之模范。

我们必须理解：向不发达国家赠款是不可能改善其经济状况的。如果我们为它们提供食品以战胜饥荒，我们不过是缓解了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放弃其灾难性的农业政策的紧迫性。在过去，例如，南斯拉夫的主要问题是为其相当可观的过剩的谷类、猪、水果和木材寻找国外市场。今日，这个拥有在全欧洲除俄国和罗马尼亚之外最肥沃土地的国家，却正遭受严重饥荒。如果我们向穷国输送制成品或“借给”它们美元，我们事实上是在为它们的国有化交通与通讯体系及其社会主义化的矿山与加工业之赤字付账。事实是：美国正在全球补贴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即社会主义。但是，正是由于这些过于慷慨的经济援助，社会主义的种种方案在无法实行之后，仍然继续存在相当之久。

使不发达国家更为繁荣昌盛的问题，不可以通过提供物质援助来解决。这是一个精神和思想问题。繁荣不仅仅是资本投资的事情，而是意识形态的事情。不发达国家最需要的是经济自由、私人企业和首创精神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与维持，有利于将现有的资本以尽可能最好和最廉价的方式用于满足消费者最急迫的需要。

除开向不发达国家传播经济自由的思想，美国别无他法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其经济状况。<sup>[4]</sup>

## 第 四 部 分

# 比较经济体制

## 第十三章 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



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对于所谓“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正义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只要有人缺乏维持生命、健康和欢娱的所必需的物品，就不应当有人享受过量的奢侈品。他们谰称，人类的理想状态将是所有可得的消费品实行平均分配。作为达到这一目的最实际的方法，他们鼓吹由社会，或者说，由社会的强制与强迫性机构，即一般所说的政府或国家，没收所有物质生产要素，并严密控制全部的生产性活动。

这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计划的追随者们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一系列原因。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不仅仅不正义，是对永恒的神授自然法则的悖离，而且，还是天生低效的，因此，是困扰人类的全部痛苦和贫困的根源。一旦邪恶的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大众所有制所取代，人类的就将进入极乐状态。每个人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将人类从这种尘世事务的完美状态隔离的罪魁祸首，正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这种对人类物质与精神福利的根本问题的处理方法的关键谬误在于分配的概念。这些作者及其教条认为，经济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给予每个人以应得之物，给予上苍注定要赋予所有人使用的东西中他应得的那一分。他们没有看到，贫穷才是“人类的原始状态”<sup>[1]</sup>。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人类的有计划的活动，使得其生活水平高于畜牲。人类的经济任务不是分配慈善捐赠者的礼物，而是生产。他试图改变其环境，使之更有利于其生命力的持续与发展。

所以他从事劳动。

准确地说，这些批评社会现状者太过肤浅。能带给人类所有的物品的，只有劳动，而别无他法，而正是对这些物品的使用，令人类的生活状态高于畜牲的生活状态。正如所有的产品都是劳动的产物一样，只有那些劳动的人，才有资格去享用它们。

它对于某些神话般的非人类的状态与环境的描述，听起来似乎还有些道理。但是，当谈到智人的时候，它却变成了所有流行的错觉中最致命的一个。人类的杰出之处在于其充分认识到时间的流逝。人类在变迁的宇宙中有意识地生存；他能辨别出迟或早、过去、现在<sup>[2]</sup>以及未来。他制定计划以影响历史的未来状态，并努力将这些计划变为现实。对未来有意识的计划，是人类的独特特性。为未来的需要适时提供物品，正是人类行为有别于野兽与野人的狩猎动机之处。预先策划，即对未来需要提早关注，引致了为以后的消费而进行的生产，产品的生产与享用被时间隔开，形成了庞巴维克所说的迂回的生产方式（**round-about methods of production**）。消费的推延在生产自然因素中增添了人为的因素。人类的物质环境及其生活方式急剧地改变。所谓的人类文明就这样产生了。

这一文明并不是君王、将军或其他元首的成就。它也不是普通人的劳动结果。它是两种类型的人合作的产物：一类是那些储蓄的人，即延迟消费的人。他们使费时而迂回的生产方法成为可能。另一类是知道如何引导这种方法加以应用的人。没有通过储蓄而致的积累，没有明智地使用这样积累之储蓄的成功努力，就不可能有适宜人类的生活水平。

单纯的储蓄，也就是说，为未来有足够的消费而节制当前消费，这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有一些动物也这样做。在本能的驱使下，一些动物也致力于我们所谓的资本积累活动，但并非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对其行为后果有清楚的意识。但是，只有人类将消费的有意推延上升到基本行动原则的高度。他暂时放弃消费，目的是为了在稍后享有运用它的持续服务，而如果没有这种推延，这种享受将是是不可能的。

储蓄往往是为了稍后可能的消费的增长或改善而抑制当前的某种消费。正是储蓄积累了资本，而动用储蓄则使得资本的可能供给缩减。人们在行动中面临选择：是通过进一步地储蓄而增加其能力，

还是将其消费保持在高于就其收入而言的正常比率之上而减少其资本。

储蓄以及抑制消费已积累下来的储蓄，绝不是自动的，它往往是对即时消费的有意识的节制。在放弃即时消费时，储蓄者希望得到充分的回报。他要么保留一些物品以利未来消费，要么获得资本品的所有权。

在没有储蓄的地方，也就没有资本品存在。任何储蓄都是有目的的。人推延消费是为了改善未来的状况。他可能想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某个确切的他人的状况。他不可能仅仅为了某个他不认识的人的愉悦而节制自己的消费。

不可能存在一件不被某一明确主人所拥有的资本品。资本品作为个人或群体的财产而存在。这些个人或群体本可以消费这些物品，但是，为了未来的使用，他（他们）节制了这种消费。资本品作为私人财产而存在，这决定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制度形态。

当然，资本主义文明今天的继承者也构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体制，这一体制要求人人温顺地服从其指令。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之下，每件事都由最高权威进行计划，对个人——“同志”——而言，除了无条件地服从其主人的意愿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行动自由。同志们卖命地劳作，但其辛苦所得却由最高权威任意处置。每个同志享受最高权威分配给其消费与享用的物品。其他的东西，所有物质生产要素，都由权威所有。

这是另一种选择。人类必须做出抉择：选择之一——物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决定要生产什么，以什么质量生产，以及需要生产多少。选择之二——所有物质生产要素由中央当局所有，因此，每个人完全依赖中央当局的意愿并服从其指令。这一当局还决定生产什么，每位同志能使用或消费什么以及使用或消费多少。

如果我们不允许个人拥有其暂时推迟消费的生产品，那么，人就不会再有任何动力去创造这些物品，这使得行动中的人不可能将其生产状况改善到高于牲畜的状态。因此，反对私人所有权的人不得不设计这样一种社会，其间所有的人被迫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当局发布的指令，或服从伟大的神——国家、社会或人类的指令。

## 二

私有财产的社会含义与经济功能遭到人们普遍的误解与错误解释，因为人们将市场经济与被含混地称为封建主义的军国主义体制混同起来。封建主是征服者或其同伙。他致力于剥夺任何不属于自己团体的人的任何其他生存机会，使他们只能恭顺地服务于他或跟他同一等级的人。所有的土地——这在原始社会里事实上意味着所有的物质生产资料——都由特权阶层的成员所有，而对其他人，那些被轻蔑地称为“恶棍”的人，除了无条件地服从有武装的世袭贵族以外，他们一无所有。不属于贵族阶层的人便是农奴或奴隶，他们必须服从，辛苦地劳作，但他们劳作的成果却由其主人享用。

欧洲居民及其移往其他洲的欧洲人后裔们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们废除了这一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的自由与公民权。这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一再为反动的插曲所打断，甚至到了今天，我们地球的大部分仍然只是在表面上受到它的影响。18世纪末期，这一新的社会制度的胜利进程加速了。它在道德与思想领域最壮观的表现就是启蒙运动，其政治与宪政改革的表现是自由运动，而其一般被提及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则是工业革命及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

研究这一迄今为止人类进化史上最重大和最有分量的阶段的不同层面的历史学家，往往将其研究局限于历史过程的某一方面上。他们大多忽略了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中的事件是如何彼此相联并为同一意识与物质因素所决定的。有时，他们又过于关注不重要的细节，而未能正确地看到最重要的事实。

这一方法上的混乱最不幸的后果就是最近出现的对于近来文明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致命的错误解释。

18世纪与19世纪的伟大自由运动的目的在于废除世袭王公贵族，建立起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统治。各种奴隶制与农奴制都应被废除。国家的全体成员都应享有市民的全部权利与待遇。法律与行政官员不得歧视公民。

这一自由主义的纲领很快就与一种源于过去的共产主义派别的纲领发生了冲突。这些都深为宗教思想所鼓舞的共产主义者，倡导国有化及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平等主义或原始的共产主义。现在，他们的继承者宣称，只有在物质生产要素由社会所有和管理的地方，

经济活动的成果在所有人之间平均地分配的地方，才能达到充分适合人类的生活状态。

这些共产主义<sup>[3]</sup>学者与改良家们大多相信，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仅完全合乎于代议制政府及全民自由，而且是其逻辑的延续，只有这一进程完全达到，才能给予人类完美的福祉。大众舆论大体上乐于接受这种阐释。反对自由主义者<sup>[4]</sup>通常被代议制政府支持者称为“右派”，自由主义者被称为左派，而共产主义者（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被认为较自由主义人士“更左”。公共舆论开始相信，自由党只代表自私的“剥削的”资产阶级利益，社会党却在为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而战。

但当这些改革者们只是在空谈并为政治行动起草虚幻的蓝图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益的事件——工业革命——出现了。新兴的商业原理——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事务，其变革的程度是以往任何宗教、伦理、法律或技术创新所不及的——是大规模生产以供大众消费，而不仅仅是供富裕阶级消费。这一新兴原理并不是政客或政治家发明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甚至不为贵族、士绅及城市显赫们所注意。然而，生活在汉诺威王朝时代的英格兰人开始从美国殖民地进口棉花时，人类历史的新的更好的时代就此开始；一些人将其转化为棉花制品以供中等收入的人使用；还有一些人则将这些制品出品至波罗的海港口以换取谷物，然后运回英格兰，以填饱那些饥肠辘辘的肚子。

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在于交易者无条件地依赖市场，即最好地、最廉价地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求。对每一种生产活动来说，人的劳动都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但是，如果劳动力的使用不是为了生产出产品与服务以备消费与使用，并以最便宜的方式最好地满足公众最迫切地需求，那么，这样的劳动，无论多么精湛或尽责，只是对时间、物资和人的努力的浪费。

市场是所谓民主制度的原初型态。买者拥有最高权力，卖主只能通过以最好方式满足买者需求才能获得成功。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迫使其所有者——企业家——服务于消费者。著名的经济学家一直称市场是一种民主制度，每一分钱就是一票投票权。

### 三



政治或者说宪政民主，与经济或者说市场民主，都服从多数的决定。消费者通过购买或不购买而成为市场中的最高权威，正如市民们在大选或官员的选举中通过投票而成为决定国家事务的最高权威一样。代议制政府与市场经济是同一演化进程的产物，它们彼此映衬，而在今天看来，在我们的极端保守的时代，它们也将会一同消失。

然而，提及这一显著的同质性，并不应妨碍我们认识到，作为表达个人真正需求与利益的工具，市场的经济民主迄今为止是优于代议制政府的政治民主的。常识告诉我们，买者在其面临的多种选项之间进行选择，要比在国家与高级政治事务上做出选择容易得多。普通的家庭主妇在获取她所需要的衣食方面可能十分精明，但在选择处理外交政策及军备方面事务的官员时，她可能就没有那么精明了。

这里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在市场上，不仅仅大多数人的需求与愿望得到照顾，那些少数派的需求也能得到照顾，只要他们的数量不是微不足道。书商出版大众爱看的书，但也出版不同领域内的小群专家爱读的书。服装商不仅为普通身材的人供应衣衫，也为那些身材异常的人供应。但是在政治领域，只有多数人的意愿才有价值，少数人被迫接受他们基于相当严肃的理由而憎恨的东西。

在市场经济中，买方决定生产过程中所花费的每一分钱，因而，决定着所有商业活动的本质特征。消费者为每个人分配其在经济机制中的位置与作用。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事实上是消费者的委托人或托管者，其委托地位通过每天的重复投票而被确认或废止。如果他们不以最便宜的方式服务于消费者，他们就会遭受损失，并且，如果他们不及时变革的话，就会失去其财产。

封建社会的财产是通过征服或者是征服者的恩赐而获取的。一旦得到，就能为其所有者及后裔永久享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必须反复获取，方式是财产的利用要能以其最好的方式服务于消费者。物质生产资料的每一个所有者被迫调整其所提供的服务以最好地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某人可能以一大笔财富的继承者而开始自己的商业生涯，但在与新进入者竞争时，这并不必然会对他有助益。汽车、卡车及飞机的出现给铁路系统带来了新的冲击，为适应这一冲击而对现存铁路系统进行调整，比起那些新建立的企业要解决的问题而言，无疑困难得多。

使资本主义的企业活动方式出现并盛行的，正是其提供给大众的卓越服务。没有什么比娱乐业在现代商业中的所占的比重，更能体现出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改善。

资本主义急剧地改变了所有的人类事务。人口数量成倍增长。在少数一些国家，不管是政府的政策，还是市民固守传统方式的心态，都没有对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显著的改进。以前闻所未闻或从未想到可以拥有的奢侈品的设备，如今也能为普通人所享用。教育及物质精神福祉的一般水平逐年递增。

所有这些，并不是政府或任何慈善方法的成果。更经常发生的反而是政府阻碍着有益的发展，而这一发展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正常运转的产物。

让我们来看一个特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储蓄，以及个人经济状况确实是有可能改善的，当然这不包括职业借贷者（银行家），而只是对那些拥有农场或商店的人而言。他们可以将其积蓄用于投资，以改善或扩张其财产。而其他人，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只能将几个硬币藏于他们认为安全的角落里来进行储蓄。资本主义使得人人都可以通过储蓄而积累资本。人寿保险机构、存储银行和债券给了中等收入的大多数人以储蓄的机会与利息，这些人可以充分地利用它们。在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上，大量这类人提供的资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使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转过程为那些本身并不从事商业事务的金融活动的人所熟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管怎么说，它们能够越来越多地改善多数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

不幸的是，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策都以最可耻的方式破坏着这一演化进程。美国政府、英国政府、法国政府，以及德国政府，更不用说许多小国家的政府了，都曾经或仍然在采取最激进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口头上表明其对普通民众的关心的同时，他们毫不羞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政府制定的通货膨胀掠夺那些或参加了保险、或在养老金计划下工作、或拥有债券及存款的人。

## 四

18 世纪末及 19 世纪初曾在西欧勾划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学者们，并不熟悉中欧的社会思潮和环境。他们并未注意到 Wohlfahrts-

staat，即德国 18 世纪君主制政府下的福利国家。他们也没有读过 1800 年出版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经典读本费希特的 *Geschlossener Handelsstaat*。当很久以后——19 世纪末期——西方国家，首先是英格兰，开始采用费边社的逐步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案时，他们并未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所鄙视的落后专制的大陆国家，很早以前就采用了这个社会变革的所谓新的进步原则？

而 19 世纪中期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他们必须面对俾斯麦的政策，亲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曾称他们为“他的时代对国家社会主义最重要的阐释者”<sup>[5]</sup>。拉萨尔则与这种观念勾勾搭搭，他与霍亨索伦王朝最坚定的拥护者合作，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但拉萨尔的早死使这一计划结束，同时，也宣告了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团体的活动的终结。在马克思信徒的领导下，德国社会党转而强烈反对君主政体。在国会，他们对政府提议的所有法案都投反对票。当然，作为少数派，他们的投票并不能阻止国会通过各种亲劳工法案，包括制订著名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法案。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们能阻止政府支持的社会化措施的产生，即政府烟草专卖。但所有其他俾斯麦时代的国有化措施，都无视社会党人的强烈反对而被采纳。由于其军队的胜利，那些年，德意志帝国的国有化政策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空前的威望。其国有化政策亦被东欧和南欧的许多国家所采用。

德国教条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徒劳地解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狂热鼓吹以及对所有现实的国有化措施都持顽固反对立场之间明显的矛盾。<sup>[6]</sup> 尽管官方的国有化和收归市政当局所有的政策，得到了自称保守党和基督徒的支持，但它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中间很快就不流行了。国有化企业在官方任命的管理者的管理下经营状况堪忧。他们所提供給消费者的服务令人非常不满，他们所收取的费用却越来越高。最糟糕的是公仆管理下的财政状况一塌糊涂。财政赤字成为国库的沉重负担，一再导致税收增加。到 20 世纪初，我们不能再否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公共当局在试图经营管理他们在其“国家社会主义”的局面下获得的各种各样的商业组织的活动中，悲惨地失败了。

一战使中欧和东欧的社会党人的地位日益重要，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其在西欧的影响力。这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后果正如上文所示。在欧洲，那些年里即使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计划，也没有遇到真正

的反对。

德国革命政府于 1918 年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组成。较列宁的苏俄政府而言,其权力并不见弱,而且和苏俄领导人一样,它视社会主义为解决所有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惟一合理和可能的方法。但它也很清楚这一事实,即德意志帝国在战前所采取的国有化措施的财政结果很难令人满意,所提供的服务难以让人满意,战争年代所诉诸的社会主义措施亦是不成功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万能仙丹,但似乎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指的是什么,以及该如何正确地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胜利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时,采取了所有政府都做的事情。他们任命了一个由教授和其他被视为专家的人组成的委员会。五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宣称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其纲领的焦点,是治疗所有尘世邪恶的良方,是引导人类进入新伊甸园的妙策。现在,他们大权在握,所有的人都期待着他们能承兑自己的诺言。现在,他们必须社会化。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们请专家们告诉他们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实践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与计划在西欧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费边社成员与其在欧洲大陆的朋友一样迷惑。和欧洲大陆上的朋友一样,他们完全相信资本主义注定会灭亡,社会主义最终会统治全世界。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没有行动计划。所有人都不得不很快承认,大肆渲染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蓝图,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它很快从英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但是,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转而进行了全面的国有化。对他们而言,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还是所有国有化实验的失败,都没有任何意义。

东方政治学说倡导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彻底迅速的社会化。这一学说获得了西方国家许多政党及有影响的政治家的同情与支持。“与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建立联系”是盛行于许多西方政府的任务。对一些势利小人而言,赞扬苏俄等国的独裁统治是很时尚的。而且,最糟糕的是,一些政府,首先是美国政府,把从私营企业中征收的税款,大量用以援助因国有化而面临巨额财政赤字的政府。这些政府将铁路、邮政、电报电话服务,以及许多其他企业都国有化了。

在我们地球上完全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在西欧、中欧、北美,

私有企业制度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还持续地改善并扩展着其所提供的服务。政客、官僚、政治家都歧视商业活动。多数记者、小说家及大学老师都在宣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新生代在学校里就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只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能听到批判社会主义的思想、计划及行动的声音。

但是，对工业社会的人而言，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已经不再有人谈论对企业部门进一步的国有化了。<sup>[7]</sup>

很多同情社会主义哲学的政府，今天，没有一个敢于认真地提出进一步实现国有化的措施。例如，如果美国新上任的行政管理当局<sup>[8]</sup>能废除以低效与亏空著称的邮局，美国政府以及每个理性的美国人都有理由感到高兴。

社会主义开始于圣西门时代，旨在表明高加索人的西方文明已经成熟。其后在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为其主要目标时，它试图维持这一地位。今天，它是反对西方意识形态但却急于模仿其技术的东方人的战斗口号。

## 第十四章 平等与不平等



催生 18 世纪人权宣言的自然法思想,并不是指这样一种明显谬误的主张:所有的人在生理上是平等的。它只是宣告,所有人在权利上是生而平等的。这一平等不能由任何人造法废除。只有个人自由与自由意志的致命敌人,集权主义的拥护者,才会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解释为是从所有人的精神上与生理上的所谓平等引申出来的。法国 1789 年 11 月 3 日发表的《人与公民的权利宣言》宣称,所有的人在权利上是生而平等的,且永远是平等的。但是,在恐怖政权就职典礼的前夕,在 1793 年 6 月 24 日的宪法之前的宣言宣称:所有人“*par la nature*”。从此后,这一文本,尽管明显与自然经验相悖,但一直是“左倾主义”的教条。因此,我们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里读到下面的句子:“婴儿在出生时,无论其遗传特征如何,与贵族是平等的。”<sup>[1]</sup>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种事实,即出生时,人在体能与心智能力上是不平等的。有些人或在健康和活力上,或在才智上,或在意志与精力上胜过常人。他们因此而较其他人更适宜追求俗世事务——这一事实,连马克思也承认。他提及“个人天赋的不平等及因此形成的生产力的不平等(Leistungsfähigkeit)”是“自然特权”,他还提及“不平等的个人(如果不是不平等的话,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体了)”<sup>[2]</sup>。根据流行的心理学学说,我们可以说,一些人较其他人更能调整自己适应生存斗争的环境。因此,我们无需进行任何价值判断,就能从这一点上区分出优等人与次等人。

历史表明，远古以来，优等人利用其优势攫取权力征服大量的次等人。在身份社会里，种姓将人分为各种等级。一面是地主，拥有所有的土地，另一面是其仆人、臣下、农奴、奴隶，一无所有的下属。次等人的义务在于为其主人做苦工。社会制度仅仅服务于少数统治者及王公贵族的利益。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及保守党人告诉我们的、在“资产阶级的征服”之前世界各地的境况，资产阶级的这一征服过程延续了数个世纪，如今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在继续，破坏着“美好的过去”的政治、社会及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急剧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和政治组织。

请允许我在这里扼要复述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优等人是主人，占人口多数的次等人得侍候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有天赋、更有能力的人为了从其优势中获利，只能尽其最大可能地服务于大部分天分较低的人的愿望。在市场经济中，权力授予了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或不购买最终决定应该生产什么，由谁来生产，如何生产，以什么质量和数量生产。企业家、资本家及土地主如果没能以最好、最便宜的方式满足消费者愿望中最迫切的部分，就会被驱逐出局，失去其有利地位。在企业办公楼里，在实验室里，最聪明的头脑正忙于用科学研究最复杂的成果制造更好的机器或机械装置，以服务于那些对其制造原理一无所知的人。企业越大，它就越要根据大众——它的主人——的怪念头或幻想来调整自己的生产。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大规模生产，以供应大众。正是大众的恩赐使企业成长起来。普通人在市场上是至高无上的。他是顾客，是“永远正确的”。

在市场中，消费者至上，这一事实 in 政治领域的结果则是代议制政府。担任公职的人依赖选民，正如企业家和投资者依赖消费者一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取代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同一历史进程，也是用大众政府——民主制度——取代王室集权及其他少数人的政府形式的过程。在任何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地方，我们都看到权力的集中。

没有什么比将资本主义者和企业家称为意欲“剥削”正直大众的“统治”阶级更容易造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误解了。我们不会提出下面的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在可以想象得到的其他形式的生产组织中，怎样才能利用其优越才能？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他们为更好地服务那些天赋不及他们的大众而彼此竞争。他们全神贯注于提供消费者以完善的方法。每年、每月、每周，市场上都会有前所未闻的东西出现，并能迅速为大众所享有。

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是体力劳动者的某种程度的努力，而是储蓄者的资本积累及企业家对资本的合理使用。如果技术发明的使用所必需的资本没有通过储蓄而积累起来，技术发明将成为毫无用处的雕虫小技。没有体力劳动，人确实不可能作为不同于牲畜的人类而存活下来。然而，使人不同于兽类的，不是体力劳动及常规作业，而是为——往往是不确定的——未来的需要所做的投机、远见。生产活动的特征在于它是由大脑指挥的行动。这一事实不可能因“劳动”一词仅指体力劳动这一语义学错误而被抹杀。

## 二

承认人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人们或多或少地不情愿承认，他们与艺术家、文学家及科学家的不平等，至少在其专业技能上是如此。他们也不及体育冠军。但他们却不愿承认自己在其他人类事务上的劣势。他们认为，那些在市场上优胜的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们，仅是因为邪恶的本质才能取得这种优胜。而他们自己，谢天谢地，因为正直和良知，而不愿意借助如此不忠的行为手段。如他们所言，正是这种手段使得某人得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取得成功。

然而，越来越多的文献将普通人描写为次等，如关于消费者行为以及所谓广告之邪恶的书。<sup>[3]</sup>当然，赞赏这些作品的作者或公众都公开声称或相信，那才是其所报导的事实的真正含义。

所有这些著作告诉我们，典型的美国人是天生不适合从事日常家庭生活的简单劳作的。他（她）并不知道家庭事务所需的合适东西是什么。由于其固有的愚钝，他们很容易被商人的花言巧语所欺骗，购买一些无用的或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商人所关注的不是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其所需要的产品而获取利润，而是强加给他们一些东西，而如果他们能抵制“麦迪逊大道”的心理攻术，是永远不会接受这些东西的。普通人意志及智力的固有的、无可救药的脆弱，使得购物者的行为很“幼稚”。<sup>[4]</sup>他们极易成为推销商欺诈伎俩的猎物。



这些激昂地斥责的作者和读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观点隐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国民的大多数都是低能儿，不适合照料自己的事务，迫切需要长辈的保护。他们非常地憎恨和嫉妒成功的商人，以至于忽视了其对消费者行为的描述与所有“经典”社会主义文献曾对无产阶级卓越性的描述是多么格格不入。早期社会主义者对于“人民”、“辛苦劳作的多数”、“体力劳动者”给予智力与品格上的极高评价。在他们看来，人们不是“幼稚的”，而是整个世界上伟大和善的创造者，是人类美好未来的构筑者。

当然，普通商人在很多方面优于普通人。但普通人的这一劣势首先体现在其思考、工作，以及更多地奉献于人类的生产努力的有限能力上。大多数满意地从事着例行事务的人，可能希望给其工作增添少许创造性和思考。但他们并不是迟钝到无法恰当地处理其家庭事务。被妻子派往超市购买面包的丈夫回来时“抱满各种自己爱吃的小食品”<sup>[5]</sup>，这些人显然不具有代表性。同样，家庭主妇也不会仅因为她“喜欢包装”而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都买下来<sup>[6]</sup>。

我们一般承认，普通人的品味较差。因此，完全依赖这些人组成的大众帮衬的商人，被迫供应一些低劣的文学和艺术品。（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在“普通人”至上的社会环境下，使高质量的发展成为可能。）我们还知道，许多人沉湎于一些会带来不可取之结果的习惯。伟大的反资本主义战役的煽动者说，人民的低劣品味以及不安全的消费习惯以及我们时代的其他邪恶，都是由资本的各个分支的公关或营销活动造成的——军需品供应商、“死亡的商人”造成了战争；酒业、威士忌托拉斯及酿酒厂造就了饮酒狂。

这一观点将普通人视为天真无邪的幼儿，极易为狡猾商贩的诡计所骗。此外，它还隐含着另一荒谬的理论，即销售没有受商贩欺骗时消费者真正需要也愿意购买的物品，将是无利可图的，只有销售那些对买者毫无用处、甚至完全有害的物品，才能有丰厚利润。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在市场的竞争中，出售劣质产品的商人将会战胜出售优质产品的商人。圆滑的商人用以说服公众购买的老练手段，也可以用来推销市场上的优质商品。但优质商品与劣质商品在平等条件下竞争的时候，没有理由对优质商品持悲观态度。当优质商品和劣质商品的销售都同样得到商贩的所谓伎俩的协助时，那么，只有优质商品才能享受到优质的优势。

我们不需要分析大量认为消费者愚钝及其需要慈父般政府保护的文献所提出来的全部问题。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尽管相信人人平等，但相当多的“左派”文献都仍然支持这一论点：普通人不适合处理自己日常生活的事务。

### 三

人在生理与心智上生而平等的种种学说，必然合乎逻辑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后天的影响所致。它尤其强调教育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据说，高等教育只是“资产阶级”的子女才能享有的特权。迫切需要的是给予每个孩子进入任何一所学校的机会，给予每个人受教育的机会。

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美国启动了使每个男孩和女孩都成为受过教育的人的高尚的试验。所有年轻的男女在 6 到 18 岁都必须在学校度过，尽可能让更多的人进入大学。这样，受教育的少数和未接受足够教育的多数人之间的智力与社会上的区别就消失了。教育不再是优势；它成为每个市民与生具有的权利。

社会统计显示，这一工程产生了实效。高校、老师及学生的数量倍增。如果目前这一趋势继续延续数年，改革的目标将会完全达到，每个美国人都将从高校毕业。

然而，这一计划的成功只是表面上的。这种政策只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结果，“高校”将徒有虚名，其学术与科学的价值将遭到完全破坏。传统高校只将其学位授予那些在某些基础学科至少掌握了最低程度的确定知识的学生。没有能力或品性满足这些要求的人因低分而被淘汰。而在新的高校体制下，选择学习科目的机会被愚蠢懒惰的学习者滥用。基本科目如基础算术、几何、物理、历史、外语被大部分高校学生遗弃，每年，有很多读写英文都不过关的学生从高校拿到学位。一些大学甚至发觉，有必要为提高其学生的阅读技能而专门开设课程。对于高校课程设置持续多年的激烈争论清楚地证明，只有有限数量的青少年在心智上适合于接受学校教育。对其余人而言，在教室里完全是磋砣岁月。如果为了让大多数天分较低及不勤奋的年青人取得学位而降低高校的学术标准，那只是在伤害那些有能力利用这些教学设施的少数人。

美国教育界近十年的经验表明，人类在智能上天生是有差异的，

这种差异是不可能通过任何教育努力而消除的。

### 四

所有人生而平等的论题，已然破产了，但仍有人不顾无可置疑的证据而在绝望地想拯救它，这是由大众政府与多数统治者的错误而站不住脚的理论所驱动的。

这一理论试图通过借助于假想的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而使大众政府合法化。所有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具有天分，经常加以教育和激励，能够成为人类思想、艺术与政治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只是不利的后天影响，才使得无产阶级无法具有与最伟大的人相媲美的才华与功业。因此，正如托洛茨基告诉我们的<sup>[7]</sup>，一旦糟糕的资本主义制度让位于社会主义制度，“普通人将站到亚里士多德、哥德，或马克思的高度上”。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它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人民之间有了分歧，我们当然得假定，是他们中某些人错了。我们很难避免这一推论，即少数人较多数人更容易犯错。多数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多数，因而也能经受得住“未来的浪潮”的考验。

直陈这一理论必定会导致将对群众的思想与道德之卓越性的任何怀疑，视为企图以专制统治取代代议制政府。

然而，19世纪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自由党人——备受中伤的曼彻斯特学派及自由放任的卫士们——的观点，与这一观点毫无相关之处：人生而平等，但多数人受超人的指引。他们的观点基于这一为大卫·休谟所阐明的事实：相对于服从其指令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掌舵的总是少数。在这一意义上，任何政府都是由少数人统治的，且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这一信念支持时才能维持下去：比由其他采用不同管理方式的人来取代这些公职人员而言，忠顺于当前的公职人员对自己更为有利。如果这一观点不复存在，那么多数人将起而反抗，通过武力推翻不受欢迎的公职人员及其体制，并以其他人员及体制取而代之。但是，要维持现代社会的复杂工业活动，就不可能将革命作为执行大众意愿的惟一方式。代议制政府的目的在于避免这种对和平的粗暴破坏及其对道德、文化及物质福祉的损害。人民的政府，即民选代表组成的政府，使和平的变革成为可能。它确保公众意志达成一致，处理国家事务所依循的原则得到实施。对那些相信自由的人而言，多数统治并不是源于对自然事实的歪曲的形而上原理，而是保证人类文明成果持续平稳发展的一种手段。

## 五

所有人生而在生理上平等的观点，在 19 世纪导致了似宗教的关于“人”的神秘论，最后演变为“普通人的”优越性的信条。所有人是生而平等的。但是上等人不幸为权力所诱惑，沉湎于奢侈享受中而不能自拔。困扰人类的邪恶，正是由于这少数败类的恶行所造成的。一旦这些人被驱逐，普通人与生俱来的崇高品性将指引他们管理人类事务。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上将是惬意的，人民无穷尽的善及其天生的才能是至上的。每个人做梦亦未曾想到的幸福，正在等待着人类。

对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而言，这一神秘论是俄罗斯正教虔诚修行的替代品。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这些最危险的对对手狂热的异想天开感到不适。但马克思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sup>[8]</sup>的幸福状态的描绘甚至更为乐观。在社会革命党人被消灭后，布尔什维克自己也将这一关于普通人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主要意识形

我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国家资本主义，或你愿意使用的任何其他同义词）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制度、经济自由）之间最典型的区别在于：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作为消费者是第一位的，他们通过其购买或不购买而决定应该生产什么，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下，这些事务是由政府规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供应商努力寻求消费者的垂青，他们会在售后说“谢谢”及“请再光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志”得到“老大哥”恩赐给他的东西，他得为自己所得到的心存感激。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一般生活水平绝对高于共产主义的东方。然而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那些所谓知识分子——向往政府控制的所谓福祉。

向这些人解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普通人无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消费者的处境如何，这纯属徒劳。大众在智力上的劣势在这一点上是表露无疑的：他们致力于废除一个自己是至高无上、而最有天分的人中的精英为他们服务的制度，向往回到精英将之踩到脚底的制度中去。

我们不要再自我愚弄了。体现了集权主义信条之胜利的，并不是在那些落后的、从未超过原始野蛮状态的以及那些数世纪以前文明就已停滞的民族中社会主义的发展。相反，正是在我们西方，社

会主义制度迈出了最大的步伐。每一个压缩经济组织形态中所谓“私有部门”之范围的方案，都被人视为是极为有益的，被视为进步，而且，只是在短期遭到怯怯地反对，如果有反对的话。我们正在向社会主义的实现而大踏步前进。

## 六

18 世纪与 19 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将其对人类未来的乐观理解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少数杰出诚实的人总是能通过劝说，引导多数普通人沿着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大道前进。他们相信，精英总能阻止大众盲从言而无信的领导和煽动者，防止他们采纳最终必将导致的灾难政策。暂且毋论这些乐观主义者的谬误是否在于对精英或大众或对两者都过于乐观。至少这是事实：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数人都盲目地服从这样一些政策，这样的政策旨在最终消灭那种迫使最有才能的市民以最好的方式服务于大众的社会秩序。大众——包括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热情地鼓吹这样一种制度，其中他们不再是下达命令的消费者，而是受全知全能的权威监护的人。这种经济制度可能会被冠以“按需分配”的标签而被兜售给普通人，在政治和宪政上，导致标榜“人民民主”的、由自我任命的公职人员组成的不受约束的政府。

在过去，社会主义者及其拥护者、形形色色的国家干涉主义者的狂热宣传，曾受到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家及商人的反对。但即使是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软弱、笨拙的捍卫，也逐渐销声匿迹。美国附庸高雅之徒与“贵族”的据点，能够接受到丰厚捐赠的大学及富裕的基金会，是今天社会激进主义的温床。百万富翁，而不是无产阶级，是罗斯福新政最有力的煽动者，他们策划了“进步的”政策。众所周知，俄罗斯首脑在首次出访美国时，更多地受到的不是其他美国人而是银行家和大企业总裁的欢迎。

此类“进步”商人的论点大体如下：“我在本行业所以能胜出，应归功于我自己的效率与勤奋。我的天分，我对大企业运行所必需的知识的热忱追求，我的勤勉，将我送到今天的高位。这些个人优点使我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能成为执牛耳者。作为一个重要生产部门的首领，我应该享有令人欣羡的社会财富。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日常工作，应不那么令我精疲力竭，不那么令我不愉快。我不再被迫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某个竞争者能通过在市场上提供更好

或更便宜的商品而取代我。我不再被迫迎合消费者反复无常、不理智的愿望。我将给予他们我——一个专家——所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将以公仆有尊严的、优雅的工作，取代商人紧张的、心神不宁的生活。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将会更加类似过去贵族对庄园的管理，而不是现代企业如同被溃疡折磨的主管那样。让哲学家们去为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或所谓的缺陷去烦恼吧。我，从我个人立场来看，找不到任何理由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管理者以及来访的俄罗斯官员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当然，这些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诡计并不比各种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的梦想更有道理。

## 七

就今天的意识形态趋势来看，在今后几十年里，甚至是在那个不祥的 1984 年之前，每个国家可能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普通大众将从引导自己生命轨迹的乏味工作中解脱出来。将由政府告诉他做什么以及不做什么，政府将喂养他，给他住所，给他衣服穿，教育他，并给他娱乐。但是，首先，他们将使他不必使用自己的大脑。每个人“按需”得到一切。但个人的需要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正如疫情的情况那样，政府此时不再服务于大众，而是支配和统治他们。

然而，这一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当前世界所盛行的趋势所指向的目标。但是，这一趋势是可以改变的，且目前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趋势也可以为完全不同的趋势所取代。完成这样的改变，正是新一代人的任务。

## 第十五章 集团利益的冲突



用“集团紧张”这个词来表示当代的对抗，毫无疑问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我们面对的冲突被视为是不可调和的，甚至带来持续的战争、内战及革命。有时会出现和平，但那肯定不是因为基于哲学原理而形成的对和平的爱好，而是因为有关集团尚未准备好战争，或因为权宜之计，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以先发制人。

人们在彼此争斗时，不可能就当代各种社会理论达成共识。存在着的集团利益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认同的真理。就哪种集团应被视为是真正的集团以及哪种冲突是真正的冲突这一问题上，大家意见往往相左。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在欧洲意味着语言群体）是真正的集团，种族主义者认为是种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社会阶级”。但在一点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除非损害其他真正的集团，否则一个真正的集团是不可能兴旺发达的。根据这一观点，群体间关系的自然状态就是冲突。

这一社会哲学因宣称多元主义（polylogism）而使自己躲避过了一切批评。马克思、狄慈根（Dietzgen），及“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中的激进分子教导人们说，不同社会阶级思想中的逻辑结构是不同的。如果有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诲，要么是因为他不是无产阶级的一员，因此根本就不适于掌握无产阶级的哲学；要么是，即使他是一名无产阶级，他也是一个叛徒。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是无效的，因为他们都是“布尔乔亚的马屁精”。德国种族主义者同样宣称，不同种族的逻辑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非雅利安的”逻辑的原理

及由此产生的科学理论，对“雅利安人”是无效的。

如果上文所言为真的话，那么，人类的和平共处将是毫无希望的。如果不同群体的成员甚至在物理与数学定理及生物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他们当然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平稳运行的社会组织模式。

我们当代绝大多数人在宣称所谓逻辑多元主义时，并没有像种族主义者等人那样极端。但邪恶的学说并不会因其表达上的怯弱或温和而较少引人厌恶。当代社会与政治科学的确是广泛使用了多元主义，尽管其拥护者并未公开清晰地阐明多元主义教义的哲学基础。例如，有人仅仅指出李嘉图的外贸理论是 19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上层意识形态结构”，就把它打发了。任何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或劳工联合主义的流行思潮，都被视为是对不公平的“剥削”阶级利益的捍卫。

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编辑以及政治家使用“资本”或“劳动”一词，或者处理经济民族主义问题的方式，恰恰证明了，他们完全接受了集团利益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观点。如果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确存在，那么，不管是国际战争，还是国内战争，都将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战争和内战与今天广为接受的社会思潮并不矛盾。他们正是这些思潮的逻辑产物。

## 二

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将我们所讨论的互相冲突的集团整合在一起？

在等级社会里，答案很明显。社会被分为严格的等级。等级身份使每个人都具有特定的特权（*privilegia favorabilia*）或特定权利被剥夺（*privilegia odiosa*）。按规矩，人从其父母处继承其等级，自己终身保有这一等级，并将之遗传给其子孙。他的个人命运与其等级地位密不可分。他不可能指望其境况有所改善，除非他所处的等级或阶层的境况有所改善。因此，同一等级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不同等级之间则是利益的冲突。每一等级期望在保有旧特权的同时取得新的特权。在等级社会里，不同等级的利益之间的对抗是不可



调和的。

资本主义制度以法律面前的平等取代了旧日的等级制度。在自由市场社会里，自由主义<sup>〔1〕</sup>经济学家认为，从来就没有特权者。没有等级，因此也就没有等级冲突。所有个人与所有集团的（长远）利益的和谐是主旋律，且这一点为人们所正确地理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于下面的事实是没有争论的：赐予某一集团的特权为该集团带来的短期利益，是以本国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的。对小麦征收进口税，将使国内市场上小麦的价格上涨，因此，增加了国内农民的收入。（由于这不是一个经济论文，因此，我们不需要指出产生这一关税效果的特定市场环境。）但消费者、绝大多数人不会对这种仅为小麦种植者的利益而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永远保持沉默。他们会要么废除这一关税，要么努力为自己也营造类似的贸易保护。如果所有集团都享有特权，那么，只有那些特权程度较其他人更甚的人能真正受利。当每一集团都享有同等特权时，每个人作为生产和销售商的盈利，将会为其作为消费者和购买者所必须支付的高额物价所抵销。除此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受损者，因为关税将生产从具有最佳生产条件的地方，转移到差强人意的地方，因此降低了国民收入总量。特权给某一集团带来的短期利益，是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得到正确理解的，即长远的利益，在没有任何特权的情况下，当然能得到更好的满足。

在自由市场社会框架内，每个人具有同样的地位，这并不会导致其短期利益的一致。相反，正是由于他们在劳动分工与社会合作体系中地位的相似性，使他们成为竞争者与对手。竞争者之间的短期冲突，可以被与资本主义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一致性的正确理解所取代。但是——在缺乏集团特权时——它绝不可能导致利益共同体或该团体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对抗。在自由贸易之下，制鞋厂之间仅仅是竞争对手而已。只有特权存在时，如，对鞋课以关税（*privilegium favorabile*），或存在为某些其他人的利益而歧视他们的法律（*privilegium odiosum*）时，他们才会团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马克思对其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的观点的阐述是与此相悖的。在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确实是没有等级的。但是却存在社会阶级，存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无产阶级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废除工资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另一

方面，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完全基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分析及其对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赞颂之上的。马克思在说明社会主义是较资本主义较好的制度时，合理的地方在于，他相信发现了历史演进的法则，即社会主义终将随着“不可更改的自然法则”而出现。他完全相信，历史进程是由社会生产的低级的、不可欲的模式，向着高极的、较可欲的模式持续地推进，因此，社会组织的每一新阶段当然必然较前一阶段为优越，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深信不疑。他认定“未来的浪潮”，正将人类推向社会主义，他相信，为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已做了所有需要做的事情。马克思不仅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任何分析，他甚至宣称，这样的研究完全是“乌托邦”、是“不科学的”。

过去百年的历史的一页都证实了下述说法的虚假：无产阶级要有国际性的统一思想，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不可动摇的共同利益；不同国家的“劳工”党代表在各种国际工人联合会中协力合作，但就在他们沉溺于对国际同志友谊与兄弟情般的空谈时，不同国家的劳工压力集团却斗得正酣；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的工人通过移民壁垒保护自己的高工资水平，以反对劳工跨国自由流动制度必然导致的工资率的平均化趋势；他们试图通过阻止国外制造的商品进入自己国家的国内市场，来捍卫“亲劳工”政策的短期成功，因而，他们制造了紧张关系，一旦为此类政策所伤害的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那些外国政府使用过的暴力废除那些不利于他们福利的政策时，必将最终导致战争。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经济利益集团的严重冲突。但这些冲突并不是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所内在固有的。它们是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政策的必然产物。它们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冲突。它们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类又回到了集团特权，因此，又回到了新的等级制度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产阶级是由那些成功地服务于消费者之需求的人及其后裔组成的。然而，过去的功绩与成功只给予他们暂时的优势，且这一优势持续地受到挑战。他们不仅仅彼此之间无休止地竞争，而且，每天都得提防觊觎其位的新来者。市场运行稳步地淘汰那些能力差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由新贵们取而代之。它不停地使穷人富裕，使富人变穷。有产阶级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其成员组

成频繁地变化着，对每个人开放，但成员身份的继续依赖于不间断的一个接一个成功的商业行为，成员本身因竞争而四分五裂。成功的商人对保护能力较差的资本家及企业家使其免受市场兴衰变迁影响的政策并不感兴趣。只有不合格的资本家和企业家（大多数是近代人）在这种“稳定”措施中才会有自私的利益。然而，在纯粹资本主义世界里，服从消费者政策的原理，将使他们没有机会取得这种特权。

然而，我们的时代是生产者政策（producers' policy）的时代。今天“非正统的”学说认为，良好的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于在成功创新者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以利于那些低效率的竞争者。这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在工业国家里，这一政策主要是保护国内农业免受具有更理想资源禀赋的外国农业竞争的影响。在农业国家里，相反，则是保护国内制造业免受低生产成本的外国工业竞争的影响。这是倒退到了 18 世纪和 19 世纪自由国家已经废除的限制性经济政策。如果当时的人们没有摒弃这一政策，那么，资本主义时代不可思议的经济发展将永远不可能实现。如果欧洲国家没有将其边疆对美国产品——棉花、烟草、小麦等——开放，如果美国的那代人严格禁止欧洲产品的进口，美国绝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经济繁荣。

正是这一所谓生产者政策将人们的利益整合起来——否则，人们只会将彼此视为竞争者——他们组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压力集团。当铁路出现时，卡车司机不可能考虑到要联合起来反对这一新的竞争。舆论环境会使这一努力徒劳无功。但今天，黄油生产商成功地抵制了人造黄油，音乐家成功抵制了录音音乐。今天的国际冲突莫不源于此。美国农民意欲阻碍阿根廷的谷物、牲畜、肉类进口，欧洲国家以同样方式反对美国与澳洲的产品。

今天的集团对抗之根源就在于我们正倒退到严格的等级制度中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民主国家。如果我们不管下面的事实，即他们的国内政策正在滋养彼此争斗的国内压力集团的话，那我们或者可能说，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同质社会。但其移民法不仅为有色人种设置障碍，也为白人移民设置壁垒。这使得其全体市民成为一个特权等级。其市民工作于这样一种环境之下：该环境能保证个人工作的高生产率及高工资。未被允许人住的外国工人与农民被排除于此种特权的享受之外。如果美国工会禁止非白人的美国人进入其行业，那么，它就是将种族差异变为了等级制度。

我们无需讨论西方文明的维护和进一步发展，到底是否需要使不同种族群体在地理上互相隔离。本文的任务在于讨论集团冲突的经济层面。种族的考虑确实无法为人口相对过剩的有色人种聚居区提供一种出路，这并不违背这一论断：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集团利益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种族因素使得不宜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原则推行至极点，各种种族之间的冲突因一般所谓的非经济原因而不可调和。它当然并不推翻自由主义者的这一观点：在自由企业与人员、商品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社会里，个人及个人组成的集团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 三

对集团利益不可调和的冲突的信仰已经过时了。它是重商主义者的核心主张。重商主义者由此推演出，战争是人类关系固有和永恒的模式。重商主义是战争的哲学。

在此我想引用该观点的两种新的表述。其一是伏尔泰式的。在伏尔泰时代，重商主义的魔咒已被解除。法国重农学派正被英国的政治经济取而代之。但伏尔泰对这些新思想还不太熟悉，尽管他的一个朋友，大卫·休谟是该新思想的最早拥护者。1764年，他在其《哲学辞典》中写道：“être bon patriote, c'est souhaiter que sa vilie s'enrichisse par le commerce et soit puissante par les armes. Il est clair qu'un pays ne peut gagner sans qu'un autre perde, et qu'il ne peut vaincre sans faire des malheureux.”<sup>[2]</sup> 这就是以优美的法语陈述的现代战争公式，包括军事的和经济的战争。八十多年后，我们又看到了另一说法。语言不那么优美，且表达更为粗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后来的拿破仑三世说：“La quantité des marchan- dises qu'un pays exporte est toujours en raison directe du nombre des boulets qu'il peut envoyer à ses ennemis, quand son honneur et sa dignité le commandent.”<sup>[3]</sup>

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我们必须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及自由主义政策的成就，还是受到了他们的启发。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哲学，它认为，所有人及群体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只要这种利益得到了正确的理解。首次出现了人类和平合作的哲学。它代表着对传统道德观的彻底否认。它建立了新的伦理规则。

所有古老的道德学派都主张他律（heteronomous）。它们将道

德法则视为由深不可测的天命强加于人的限制。尽管某一强有力的集团能通过损害较弱群体而改善自己的尘世福祉，但它仍要遵从道德法则，克制自己不将自己利益之增加建立在牺牲弱者之上。遵守道德法则就意味着牺牲集团或个人的某些利益。

如果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事情则完全不同了。在充分发展的市场社会里，各种个人及集团的利益——如果得到正确理解的话——是不存在冲突的。短期来看，个人或集团可能受益于对其他集团或个人利益的侵犯。但长远看来，从事这类行为时，他们对自己利益的损害，不会少于他们对别人利益的损害。某人或某群体放弃短期所得——否则将危及社会合作机制的和平运转——他们做出的牺牲只是暂时的。对眼前微小利益的放弃，换来的是无比大的长远利益。

这是 19 世纪功利主义道德理论的核心观点。为你自己，请遵守道德法则。这样做，既不是因为害怕下地狱，也不是为了其他人，而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摒弃经济民族主义和征战，不是为了外国人或异族人，而是为了你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这一哲学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与经济发展，这是其所取得的成就的一部分。今天地球表面生存的人口，远多于工业革命前夕，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里，大众比早年富人的生活要好得多，这些都是其功劳。

这一功利主义伦理的科学根基在于经济学的理论。功利主义伦理与经济学共进退。

当然，因为我们希望将经济学应用于维护和平问题上，因而事先设想这种经济学是可能和必要的，这样的推理模式是荒谬的。经济现象之规律性本身的存在及对经济法则的科学系统研究的可能性的存在，是不能先验地假设的。要解决一般所说的经济学问题，首先会提出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是否存在经济学。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如果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进行考察，目的是要确证德国历史学派与美国制度学派的命题，即不存在经济理论这样的东西，经济学家赖以构建其体系的原理是虚幻的，那么，各种族、国家与阶级之间的猛烈冲突就将是不可避免的。永恒的战争及血腥的军国主义将会取代和平社会和合作的信念。和平的倡导

者们是傻瓜。他们忽视了人类关系的基本问题。

除了“保守的”与“反动的”经济学家的学说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学说能得出和平是可与可能的这一结论。当然，纳粹允诺我们，他们最终胜利后，当所有其他国家与种族知道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就是服务于优等民族的奴仆之后，世界就会和平。马克思主义者许诺我们，在无产阶级最终胜利之后，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经过整个历史进程，完全改变了环境和人”<sup>[4]</sup>之后，和平就会到来。

事实上，不管怎样，这类言辞并不能使以下观点失效：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集团利益的激烈冲突是我们时代的必然现象，国际战争及阶级战争都有道德价值。

#### 四

我们的时代最显著的事件是对理性主义、经济学与功利主义社会哲学的反感。这同时也是对自由、民主及代议制政府的反感。一般将这一运动分为左翼与右翼。这一区分是虚伪的。证据在于，我们不可能辨认出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属于哪个派别。黑格尔是左翼还是右翼？左翼黑格尔派和右翼黑格尔派在将黑格尔指认为其领袖时，毫无疑问都是正确的。乔治·索列尔是左派还是右派？一般认为俾斯麦是反动分子。但他的社会安全纲领是今天进步主义的极致。如果费迪南·拉萨尔的父母不是犹太人，纳粹会称之为第一个德国工人领袖及德国社会主义党的创建者，德国最伟大的人之一。从真正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所有冲突学说的支持者，形成了一个同质的党派。

左右翼反自由主义者所使用的主要武器都被冠以对方的名字。理性主义被称为肤浅的、非历史的。功利主义被称为股票投机商道德规范的低劣制度。在非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还被称为英国“小贩心态”和美国“美元哲学”的产物。经济学被耻笑为“保守的”、“反动的”、“经济保皇主义”及“华尔街意识”。

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数人不了解经济学，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今天政治争论的重大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即使我们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搁置起来，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政治舞台上每天讨论的话题只能通过经济学的推理而得到理解。但是人们，

甚至民权领袖、政治家、编辑，都不愿意进行任何严肃的经济学研究。他们以其无知为荣。他们担心，了解经济学可能会有损于他们天真的自信及其因重复随手捡来的口号而产生的自满。

一千个选民中能听懂经济学家解释政府法令或工会压力与强制规定的最低工资率的影响的，不会超过一人，这是极其可能的。大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将最低工资率强制规定在不受拘束的劳动力市场所确定的水平之上，是会对所有想赚工资的人有利的政策。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最低工资率必然会导致相当多的潜在劳动力的永久性失业。他们并不知道，即使是马克思，也曾直截了当地否认，工会可以提高所有工人的收入，因而早年那些比较讲究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任何制定最低工资率的尝试。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为所有“进步论者”积极支持的凯恩斯的充分就业计划，实质上是降低了实际的工资率。凯恩斯推崇扩张信用的政策，因为他相信，“价格上涨带来的实际工资逐步而自动地降低”，与降低货币工资率相比，不会导致劳工强烈的反抗。<sup>[5]</sup>下面的说法也许并不算太大胆：对于这一基本问题，“进步主义的”专家与被贬为“欺骗劳工的反动分子（labor baiters）”，其实并无二致。但这样一来，关于雇主与雇工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学说，就丧失了任何科学根据。所有渴望赚取工资的人想实现工资水平的持久上涨，只能通过新增资本的积累，通过改进生产的技术方法而使新增财富得以形成才能实现。雇主与雇工之间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因此就一致了。

同样可能的是，只有一小群人认识到这一事实，即自由贸易论者之所以反对各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措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此种措施对于自己的民族而言是有害的，而不是因为他们急于为外国人而牺牲其同胞的利益。毫无疑问，在希特勒当权前关键的几年中，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能明白，那些反对侵略性民族主义并渴望阻止战争的人不是叛徒，不是打算将德意志的重大民族利益出卖给外国资本主义的叛徒，而是希望使其同胞免受无谓屠杀折磨的爱国主义者。

将人们划分为劳动人民的朋友或敌人，划分为民族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的常用术语，表明了这一事实：对经济学基本学说的无知，几乎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冲突哲学牢牢地占据了这代人的头脑。

一种反对自由主义哲学的意见认为，自由市场社会是这样运转



的：“人类永远不可能退回到任何过去的制度中。资本主义完结了，因为它是 19 世纪的社会组织，这一时代已经过去。”

然而，这些自诩的进步主义者所支持的，恰恰是倒退到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组织中去。经济民族主义的各种措施是重商主义政策的复制品。工会的地盘之争与中世纪的行会及旅馆间的争斗，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如同 17 世纪及 18 世纪的欧洲的绝对君主一样，这些现代人旨在追求一种制度，根据这样的制度，政府指挥其公民的一切经济活动。如果认为倒退回路易十四和让-巴布蒂斯·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的政策并没有任何不妥，预先就排除了对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与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sup>[6]</sup>的政策回归，这恐怕有点不够前后一致吧。

## 五

我们时代活跃的哲学，是不可调和的冲突和分裂的哲学。人们认为，自己的党派、阶级、语言集团或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相信，自己集团的繁荣必须以其他群体为代价，他们不准备容忍任何在其看来可能会妨碍其群体重大利益的一切措施。因此，和其他集团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想一想不妥协与不和解的法国整体民族主义（nationalisme integral）或纳粹主义吧。在国内事务上，亦是如此。没有一个压力集团能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而放弃哪怕是一丝要求。

幸运的是，有几股强大的力量确实正在抵销着这种瓦解和冲突的趋势。在这个国度里，宪法的传统威望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将各种地方压力集团企图通过建立洲际贸易壁垒来打破国家经济统一的努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一种社会哲学的支撑，即使这些高尚的传统也将会无效，这种社会哲学肯定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利益的优先性，并相信，大社会的利益与每个人被正确理解的利益之间是和谐的。<sup>[7]</sup>



## 第十六章 马克思社会主义百年



1967 年，芝加哥大学在庆祝其建校 75 周年的时候，世界上目前最强大的政治运动，即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在庆祝其历史上的两个最重要的日子。一百年前，《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也是马克思亲自审定的唯一一卷的出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基础。五十年后，即 1917 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在受俄国沙皇所统治的广袤的地区建立。选择这两个重大的节日，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仍将在现代世界的演进中继续发挥的作用而言，看起来是恰当的。

卡尔·马克思终其一生只是在一个影响力微弱的小圈子里才为人所知。而在他活动于其中的这个革命鼓吹者的小圈子里，他的政敌反而要多于他的朋友。1883 年，当他去世的时候，很多报纸甚至觉得没有必要报道此事。

从结局上看，马克思所有的经济与社会学说，及其对历史的诠释，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了。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巨大的势不可挡的成功，即在俄国和东欧其他的斯拉夫国家以及中国都宣称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形成了对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驳斥。因为根据这些原则，要么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同时转入社会主义，要么是西欧和北美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

所有这些，还有更多的事实，据说都证明了马克思所取得的所

有科学成就均属无用。但即使人们都这么说，依然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这个一贫如洗的作家，尽管其名字不为其同时代的大多数国务活动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知，但其思想却要比任何一种哲学更为深远地影响了历史进程或者世界事务长达七八十年之久。无论你怎么看待马克思，你都不可能贬低他在我们的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或者也许是人类所知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之一。

文献史保存下了众多的名字，有时也保存下了一些毫无影响力的空想家们的著作，这些空想家热衷于设计地球乐园的各种规划，而所有这些规划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些乌托邦中的居民都必须无条件地首先服从于其创建者，尔后还得继续服从于其继任者。乌托邦能够预想到的结局，事实上就是在公众怀抱中的监禁状态。也许我们可以因其精神上的变态而原谅某些乌托邦作家。

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批评精神摧毁了所有乌托邦的设想，当然也包括共产主义理想。而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传授了一种认识论，为这种声誉扫地的理想包裹上一层死而复生的光环，并使其具备了似乎可以稳当地抗拒任何反驳的本事。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归纳为三条教义：

〔1〕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出现，人类就会分裂为彼此间利益不可调和地相互对立的社会阶级。

〔2〕人的思维总是要受其阶级关系所支配。人的思想反映其所属阶级的特殊利益，并与所有其他各阶级成员的利益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sup>〔1〕</sup>

〔3〕阶级利益的冲突导致了无情的阶级斗争，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最广大的、最受虐待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胜利。于是，光明的社会主义时代就将永久存在下去。

正如这一学说所指明的，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对任何严肃问题的和平的讨论，也绝对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思维结果属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是由其各自阶级的特殊利益所决定的。阶级之间的战争是永恒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剥削阶级”及其“寄生虫”，即那些背叛其阶级同志的可怜虫们的彻底“灭亡”。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很久，就一直存在着传授各种彻底灭绝

或奴役战败者的全面战争的学说。然而还有一种学说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着，那就是认为没有人能靠损害他人而真正得利的学说。准确地讲，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业已被一连串无可辩驳的理性论证所证实，它正确地表明：所有的个人以及由个人所构成的阶级之间，其利益都是彼此休戚相关的，而无论这些个体化的阶级成员贴上了什么样的阶级标签。

然而，所有这些为人类在社会结构中得以开展和平协作提供理性基础的努力，都由于马克思认识论的出现而成为徒劳之举。按照这样一种认识论，只要还没有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没有建立起“无阶级”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被所有理性的人们所共同承认的真理。只有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存在，也就是说，这位思想家所属阶级的特殊利益，将无情地对抗所有其他阶级及其成员的利益。更不能够存在对出自某位剥削阶级成员的思想体系表示赞同或反对的意见讨论，必须做的只是揭露其作者的阶级出身，然后毁灭之。

马克思所有学说的根本要旨可以说是这样：历史发展的趋势将不可抗拒地导致一个理想的、在所有方面都趋于完善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而否认这一主张的人就是心存恶毒偏见之人，必须被无情地“消灭”掉。这些人的前途只有毁灭，而按照不可抗拒的宇宙发展规律，未来只属于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政治上的成功显然也使其他极端激进的团体野心复燃。其中就有社会主义的死对头，他们声称要用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所主张的同样手段，为他们的种族或者他们的语言共同体而在全世界建立专制霸权。

在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时期，最为团结一致的自由主义团体，即曼彻斯特学派，曾预言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普及将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制止战争”这样的论题已不会再有任何疑问。而整个人类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厌恶一切战争和革命的阵营，另一边是对本民族或种族要求和平而对所有外国人则主张无情的全面战争的阵营。

启蒙运动哲学认为其最值得珍视的成就就是宽容原则，自由主义主张，一个人持什么样的宗教和哲学观点，政府无权干涉。他们同样急切地要求赋予每个人选择的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如何将自己融入社会协作体系的方式。古典自由主义时代伟大的理想就是自

由权，就是每个人为自己的生活制定计划的自由权。而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所渴望和争取的则是市场经济“计划”的代用品。按照他们使用这个词的方式，“计划”的意思是指：由他人所制定的计划将规定我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我要过的生活就如同寄宿学校的学生，军队中的士兵，牢房中的囚犯一样。我观看、听闻、阅读和学习的，都是我的上级认为适合于我的。我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其转动的方向得由当权者来定。只有一种哲学，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准宗教可供人们自由地信仰和传播。任何背离这种教条主义信条的行为都会带来灭顶之灾。

## 二

于是，马克思主义就成了对所有关于自由和自由权理想的最彻底的和无条件的否定。它不许可有对存在的持任何异议的权利。它力图灭绝任何被它视为异端观点的痕迹，在此方面它丝毫不亚于中世纪最黑暗时期的任何一位宗教迫害狂、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或是政治迫害狂。

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内在缺陷，马克思主义还是在今日的世界上获得了强大的地位，这是因为国务活动家、政治学家以及为数众多的知识界和商界的人们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明显的缺陷。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论题，即伟大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看看资本主义将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永恒天堂。

马克思说，社会革命的到来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必然地会造成工人阶级“悲惨的、被压迫、被奴役、生活退化以及被剥削的惨状”，这种状况一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无产阶级就将起而反抗，剥夺其压迫者，建立起永世不坏的社会主义体系。而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这个被指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毒瘤，将会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由此将引发最终的彻底革命，而永恒的幸福社会也将由此诞生。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马克思的这些无可置喙的预言和一百年来历史事实的演变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谁都无法否认，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薪阶层的平均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始料不及的改善。这个阶层舒适宜人的生活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中哪怕是最富有的王公贵族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马克思以及创建了类似学说的所有其他理论家们都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资本主义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而建立的一种大规模生产体制。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商业贸易主要服务于富人的需求。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创新则产生了服务于大多数人需求的各类工厂。例如，纺织业和成衣业根本不是先前那种为普通人纺线、织布、裁剪的手工匠生产活动的替代产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这样一个销售商品给“较低阶层”民众的商人阶层还不存在。纺织业和成衣业的生产活动取代的是家庭中女性成员的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工厂所生产的消费品几乎全都是为了满足较贫困人口的需求的。就是在今天，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业品是被高收入阶层消费掉的，而绝大部分工业品都是由在工厂、商店和办公室工作的同样的人群消费掉的。

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可避免的日益贫困化，这样一条已被历史引人注目地证明为错误的规律，对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来说，却是其学说中两条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中的一条。另外一条与之相伴随的规律，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很久就已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工资铁律”，尽管马克思出于纯粹的个人原因不喜欢使用这个术语，但他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阐述的理论，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条铁律的。然而现在，关于这条所谓的铁律有两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可以申说：第一是这条铁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尚未出版之前就已被所有明智之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与事实不符的；第二是这条铁律从逻辑上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基本规律，即工薪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规律不相一致。

这条所谓的工资铁律宣称，工人的工资绝不可能上涨到劳动者作为劳动者必须维持其最低限度生存的最低工资水平以上。超出这一水平的任何工资增长都会导致人口的增加，从而加剧就业人口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将会强迫工资再次降低到最低水平。我们不算论述这条伪规律内在的谬误。我们只想说明，如果想用这样一条规律指出在长时期内平均工资率上升到最低工资水平以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也必然表明，平均工资率下降到这一水平之下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之，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末尾所作出的那些著名的言论，即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也就不可能在马克思于本章之前所描述和分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发生。马克思伟大预言的主题即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主题即工资铁律，是相互矛盾的。此外，已如上述，这个预言显而易见地已被历史事实所

驳倒。

### 三

要想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和历史作用，就必须将其与十九世纪中期的各种流行的经济学说进行比较。那个时候的经济学大师们普遍认为，人类各个阶级物质福利的改善全在于资本的积累。不光是资本家阶级，所有其他阶级的人们也都可藉助于人均可用资本份额的增长而获得好处。这种增长不能只靠出卖劳动之人工资的增长而实现，而要靠资本与人口相比较而言的快速增加才有可能。

只要没有因受到侵占而完全绝望的人都明白，日常经验在向他们表明，否认上述事实的所有企图都是徒劳的。资本主义生产（其繁荣激起了反资本主义理论家们的嫉恨）的基本事实一直就是，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辛勤的劳动者。就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没过几年，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等人就发展了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边际效用理论，该理论清晰地说明，劳动者在可用资本的增加过程中也有贡献。今天，已没有人敢于否认，丰富的资本供给是改善人类物质福利水平最迫切急需的要素。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对付贫困的方法就是施舍。富人或是因求告或是因强迫而对穷人施舍。而资本主义的方法就是生产量大而价廉的产品；这一方法还要求通过节俭积累大量的资本。施舍不可能提高平均生活标准，但节俭和资本积累却可以做到。

即使社会主义也无法改变这些本体论的事实。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里，平均生活标准的任何提高同样也是由于先前的资本积累所致。因此，唯一成功的“反对贫困的战争”就是一方面扫清各种可能妨碍节俭的障碍，一方面废除各种可能导致资本负积累的环境。

我们人类由于自身存在着各种弱点和谬误，所以不可能知道，通过某个超人类智慧生物的角度来看，我们俗世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但我们能够观察到这样的事实，所有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众都心照不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方式在推销其产品方面的优越性。

当布尔什维克掌管了俄国政权的时候，他们及其友邦都完全相信，经他们大肆渲染的五年计划将会把俄国改造成世上的乐园。然

而半个世纪过去，全世界都已看到共产主义管理东欧和西北亚洲各国的结果，这些国家最适宜于农业生产，而且在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上也是非常富有的。但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管理方式所带来的只有灾难性的局面。相反地，没有必要做任何宣传，也没有任何理智健全的观察者会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远远地优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各政党所鼓吹的那些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是按照每个人对其他人所贡献的满意程度来给付酬劳的。因此在这个社会分工体系内，这种体系会激励每个人去竭尽所能。一个人为他人服务的越好，他所获得的酬劳就越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至高无上的。而他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为大众提供服务的身份又会迫使他为其他消费者提供服务。

挣薪酬的人，其酬劳是消费者按照他所提供的产品按质论价的。如果雇主付给工人的酬劳多于后者所应得，那么他就得承受销售损失；如果他付的酬劳少于工人所应得，他虽能获得额外盈余，但这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挖走他的工人，从而使工资水平又回升到损益平衡点。

至于人们如何依据或多或少存有偏见的观点来评价这个薪酬体系并不重要。有人可能会认为一位歌剧演员或拳击冠军之所得比一个码头工人或打杂女工之所得高出了很多倍，所以这样的薪酬体系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要怪也只能责怪大自然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具备歌唱或拳击比赛的才能。

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利用资本品，也就是各种生产工具和半成品。资本进入生产是因为节俭，也就是说是因为暂时抑制消费所致。资本品所有者获得的收益并非自工人或消费者处掠得，而是资本家因为延迟消费而获得的酬劳。

不存在一般的生产。生产的主要问题是计划：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什么质量生产，怎样生产，在哪儿生产。生产往往都是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假如未来的处境不确定，那么生产就总是有风险的，可能获利也可能亏损，这取决于企业家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为其他人提供服务的方式。不存在强迫个人必须选择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或者为其



指定某个特定社会地位的力量——这正是资本主义体系与以往的身份社会以及现代的专制极权社会的区别所在。拥有市场主宰权的消费者，由于对更多商品“贪得无厌”的喜好，总是会将企业家的职能委托给那些最适合经商的人；而企业家也总是会不断地寻求最佳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可以为消费者亦即他的同代人服务的工作。任何资本主义制度都不会对消费者的这种主权地位存有异议。而所有的资本品也必须投入各个行业，以便能够满足公众最急需的但至今尚未充分得到满足的需求。

资本主义之所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是因为在这一体系中，个人的长期利益总是与其他个人的长期利益相互一致的。因此，出于一己私利的个人也可以为他人提供服务，至少不会损害到其他人的私利。社会主义社会的无能则是因为在过于僵化的管理体制下，个人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不相一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工人的报酬水平决定于他的工作为商品所附加的价值。一个人工作得越好，其报酬就越高。因此他个人就很乐意去做好一份工作。

然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却不存在什么个人诱因激励个人去发挥全力。假使他想更热情地工作，那么他为此而付出的所有辛苦和烦劳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他的“过分努力”充其量也只能给极其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产品增加些许的价值而已。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不同劳动者的一切成果均归生产管理当局所有，然后在他的同志们之间进行分配，至于每个人的贡献到底有多价值根本无关紧要，因而也就不存在激励个人去努力发挥才能的诱因。日常生活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陈述的正确性。关于这一事实，没有谁会比共产党俄国的管理当局知道得更清楚的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公民都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与其他公民的物质福利做的越多，贡献越大，那么他自己就会生活得越好。在满足他人需求的工作中，他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资本家、企业家还是工薪族都没有区别。

所有反资本主义的理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错误地歪曲了资本主义的节俭及其结果，还有资本积累在人类的生存努



力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知道，动物和野蛮种族仅能勉强糊口。而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他积累了财富，使其有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沉迷于能够满足其多方面需求的间接（roundabout）方式。人类一切文化和精神的卓越成就都是以资本积累为其前提条件的。而要让这些间接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节俭是基础，而且是改善人类体能、智力以及道德状态的唯一方式。某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和那些贫困、落后、不发达，或野蛮的国家有差别，就是因为它具有更高的人均资本积累率，并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这些资本（即投资）。

地球上有很多地域，大自然为其所分配的初始资源都要比创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白种人所居住的地域好得多。西方文明一切成就的取得，只是因为建立了道德的和法律的制度，只是因为这种制度保护了个人的财富积累，保护了个人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巧取豪夺而进行的生产投资。在东方，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出于官员的恩赐，而在西方的法律制度下，私有财产却是社会构成的基石。

## 四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消费者的民主，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有权投票。<sup>[2]</sup>这样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还是可取的，但如果我们真要接受这个比喻，就还需要指出被称为民主体系的两种体系间的某些非常重要的区别。

第一：在代议制国家的政治民主中，人们投票选出一些代表，这实际上是选举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将其交给了被选出的官员。而在市场民主体制下，投票选举的目标并不是人，而是人所达致的成就，即他努力的产品。选举人在此处并不需要对候选人未来的表现表示盲目的信任，只需对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表示赞同或是不赞同即可。

第二：普通的选举人虽然有选举权，但却可能没有能力对政府的政策问题作出切中肯綮的判断。然而一般的家庭主妇却有着很强的能力，可以判断出哪个产品是好的，是对其家庭有益的；哪个产品是不好的，对其家庭是无益的。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政体是小农经济的原始社会或者市场经济在政治发展上的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体制则意味着领袖人物拥有无限制的专制权力。在西方文明国家中，代议制政

府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地取代了正在瓦解中的封建社会体制。而血腥的独裁专制政体则是由于政府一步步地加深对商业干预的结果。

社会主义体制还不只是废除了市场民主，它还与政治民主毫不相容。由于目前在政治术语使用上的混乱，很多人被所谓的“政治民主”引入了歧途，因而在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产生了欺骗性的区别。在 19 世纪初期的欧洲各国议会中，反对专制主义、支持议会制度的政党通常都要坐在议会主席的左边，而他们的对手，即专制制度的走狗们则通常坐在主席的右边。而今天在美国，人们却把支持宪政和经济自由的党派称为“右派”，而将支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的人称为“左派”。这真是巴别塔式的语言的混乱！

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成就，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还有很多东西可说。然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根本性的批评，那就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创立任何一种经济学的核算体系，因而在满足人类的需要方面也就缺少衡量这种满意度多寡的任何一种有效的方法。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受到多数人拥护的社会主义体系并没有什么长处。社会主义尚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社会主义生产管理者的观点以及其人民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尚无法对社会需求的数量关系进行核算。到目前为止，这种计算能力的缺失还没有给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带来麻烦，因为他们依然可以利用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之上的价格理论。

市场经济之所以伟大并且具有无可比拟的效率，是因为可以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换句话说，它能够计算出每一种活动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将每种活动所需物品的价格换算成货币成本我们就可以确定哪些活动可以做而哪些活动必须放弃。当然，还有很多活动，其成本还不能仅用市场上有确定价格的物品来衡量，它还需要一些无价格的物品。不过这些无价格的物品，其价值可以由喜爱它们的人直接决定。如果某市政当局的一项工程，除了正常的货币成本外，还需拆除一座历史遗迹，此时就应充分考虑到人们对该遗迹所怀有的情感因素，而不能只简单地为其确定一个货币价格。

经济学计算具有一种超凡的力量，它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以及在一般经济事件上开展协作的激励因素。它是人类智慧的伟大成就，正是这种智力工具方使得人类超脱动物的生活而不断提升自身生活

的一切努力成为可能。

人类经济活动和技术成就的历史向我们展示的只是一些根本性的变革与创新，是人类智力以及牟利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转折点，比如关于蒸汽动力的利用，历史只不过记录下了蒸汽动力时代出现的一些前提条件而已。如果只求助于这样一种简化的历史，那人们就很容易忘记“蒸汽动力”这一概念其实还涵盖了在利用蒸汽的过程中人类所采用的大量的方法。最老旧、最原始的蒸汽机是在经历了一长串的演变和改进之后，才成为可适用于各种用途的蒸汽机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学范畴中，不存在任何永久的或固定不变的技术，而只存在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趋势：追求最佳效能和最低成本，经常更新生产手段，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正是成千上万种技术上的改进——大多数都是微小的改进，只有某些改进产生了重大的结果——才使得出现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的汽车演变成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汽车的商品。而将这种改进转变成成为人类思想上固定习惯的则是依照复式记账法的簿记系统。采用这种系统，企业家可以计算其产品构成上的每一项成本，并由此找出管理其生产经营的最佳方法。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智力手段，才有可能对各种生产方法的效用进行量化的比较。有了这种手段，才有可能消除一定数量的劳动或生产资料的技术性浪费，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抑制劳动或生产资料的某种用途而将其转移到另外的生产用途中，从而可能以更恰当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最近的两个或三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为这种资本主义手段的有益作用提供了大量的例证。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西欧和中欧地区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是令人震惊的糟糕。而使这种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并非出于当权者的政令，而是出于一批有进取心的人的理想和行为，是他们在赢利动机的激励下发挥了才能和勤勉的结果。幸亏在这一目前仍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有这样的一群人，正是这些人把他们国家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变成了工业体系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把各自孤立的经济区域转变成了全球市场。这些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准与美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相比已非常之高，这全赖于制造品的出口，而绝大多数制造品则是用进口的原材料生产的。经济学计算使所有这些生活的改善成为可能，并对商业行为进行调整使其能够持续不断地改变需求状况和各种商品与服务的供应状况。

## 五

马克思并非社会主义理念的创造者，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赖以立足的经济计划的完善性和实践性的各种无效的试验也没有说过任何话，事实上他激烈地反对这类非科学的尝试。只有对他自己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的预言，他才冠之以科学的称呼。按照他的看法，这样一种科学解决了达尔文和麦克斯韦尔<sup>[3]</sup>的同代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又有哪位体面人士真会去质疑其科学思想究竟如何呢？通过批判和贬低所谓被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玷污了的每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神圣的光环，似乎成了未遭玷污的卓越的纯科学的代表和黄金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

马克思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论调。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能受到欢迎，这类民族主义情感又恰恰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而西欧和中欧的沙文主义者对于本国人民只能做大不列颠所发明并加以完善的资本主义方式的模仿者总是感觉不很舒服，随着资本主义方式在全世界各地的普及，这种愤懑情绪便越积越多。欧洲的斯拉夫各族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居民也在仿效欧洲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饱受着文学、艺术、社会、科技和经济等领域内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折磨和困扰。于是有人谴责资本主义为降临人世的罪恶渊薮，而马克思主义则能够为他们重新建立道德上的平衡。由于马克思的哲学不必为资本主义这个最不公平最有害的制度的出现负什么责任，所以它不会被视为道德和智力低下的证明，相反地倒成了优越的象征。

在社会主义理想的影响下，国家和市政当局对各类企业实施国有化或市有化。执行这类政策最力的就是俾斯麦首相所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政府，《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称其为“他那个时代国家社会主义最杰出的范例”。<sup>[4]</sup>当然，这种社会主义趋势在其他国家也很盛行。费边派社会主义的领袖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声称，社会主义哲学“不过是关于社会组织原理的思想和明确主张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早已被人们无意识地加以采纳了。”他认为，19世纪的经济史其实就“几乎是社会主义不断进展的纪录史”。<sup>[5]</sup>几年后，一位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爵士也说：“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sup>[6]</sup>1913年，一位美国作家埃尔默·罗伯特（Elmer Robert）就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定义为“君主制社会主义”。<sup>[7]</sup>

准确地说，正是各国政府和市政当局的这类社会主义措施首次引起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对企业公有化管理的天然无效率问题的关注。服务不善和赤字增加几乎是所有国有化或市有化企业的最显著特征。人们普遍认为必须对企业的经营方式进行根本变革，但是却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毁灭性失败使德国人丧失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心理平衡，这就让他们在 1918 年甚至要比俄国更急切地想实行全盘社会主义化，他们认为这是向获胜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大不列颠和法国实施复仇的最佳办法。但是他们首先需要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如何才能找到令人满意地管理社会公有化企业的方法。德国革命将这个任务委托给了一个由社会主义专家和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这真是一个荒唐的场面。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左翼，他们充分自信其革命行动是人类历史上所实现的最重要的转折，并且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后终于获胜之时，却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知道随后的进程该如何开展，因而不得不期待一个由专家和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来告诉他们该如何做！当然，这个委员会并未能解决建立该委员会的初衷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不过其中最著名的成员希尔菲丁（Hilferding）博士和熊彼特（Schumpeter）教授倒是撰写了一批处理各类经济问题的著作。该委员会始终未能找到一种能够合理地而且成功地指导企业运营的方法，一种能够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的方法。

如果想要理解过去 50 年间的历史进程，就必须牢记这些事实。西方文明国家和工业国家的群众很容易被一些狂热的宣传家们说服而去接受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学说，或者去投那些主张一切经济活动均应受中央计划支配的政党的票。在铁幕这一边的文明国家中，大多数选民和政府官员都将社会主义信条视为同调，而教育界和新闻界也很少能够容忍针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批评。然而，我们指出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个无可补救的痼疾却依然确凿地存在，也就是说，在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经济计算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任何企业和商号的集体管理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务上的失效和服务提供上的贫乏。对经济事务的官僚化管理，其效率低下早已有目共睹。而将工业上的集体管理原则加以无限制扩张的思想甚至让那些心胸最为偏狭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也会感到不寒而栗。

俄国在 1917 年实现了社会主义，许多半文明国家也紧步其后尘，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光靠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不能了解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因此，列宁认为他既然已经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像邮政那样运转的原则，那么他就完全有把握驱散一切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正常运转的疑虑。<sup>[8]</sup>在他看来，“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就是“计算和监督”，他并且断言，这类工作“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sup>[9]</sup>

这样一种极其明显的毫无意义的断言也只可能说给俄国那些无知的、但却自封为知识分子的人听，正是这些人自豪地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部队，正是他们推动了进步和文明。这种论调会让所有落后民族的沙文主义者心理上感觉良好，因为这些人将本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文明加以比较时总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然而这种论调却不可能诉诸西方的工业国家。美国人就不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将会成功并且会让所有人幸福这样的蠢话，因为这样的制度竟把邮政当作其经济运行模式，而且要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sup>[10]</sup>

这就是西方文明国家今天的处境：民众总体而言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热情崇拜者，而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们也很少会错过任何一个场合来宣泄他们反资本主义的激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效能。但是一旦真有机会给了他们，可以让他们全面实践其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时，他们又都缩回去了。没有人再指望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或者英国的工会会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规划施加任何影响。他们要做的就是骚扰商人，并从蓄意破坏生产方法的改良中取乐。

今天各民族的分裂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造成的，因为在一些非共产主义国家，其政府和绝大多数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也同样服膺社会主义信条。而阻止了这些自称是自由主义政党和进步政党的人士采纳列宁全面社会主义化主张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认识到，在向企业的社会主义化道路上每深入一步都将会严重地损害每个产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每个人都明白这样的结果将首先会损害全体工人的利益，因为他们大量受雇于企业和工

厂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主要受益者。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勇气公开揭示这一事实，虽然人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马克思之前的一些社会主义作家曾经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和运转设计了详细的规划。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很容易指出这些规划的荒谬性和不切实际。但马克思则小心地避免了这个问题，并且批评早期社会主义者处理这一问题的所有尝试都是乌托邦的空想。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道，社会主义必定要作为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而出现，而且会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安排和组织一切。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主义理想的每一步实现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并且将会永远导致经济运行的失效，而社会主义者又根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样的结局。

社会主义政策之所以在一些国家已经终止并在另一些国家正在终止，是因为人们今天已经有机会可以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状况。自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德的社会主义者们则更以特殊的方式承认了马克思主义梦想的破灭：他们修建了一堵墙试图阻止他们的同志逃亡到非社会主义的西德。<sup>[11]</sup>



## 第十七章 俄国改革运动之观察

俄国政府的首脑们备受这一事实的困扰：没有采用共产国际方法的国家的经济状况，远远比自己国家要令人满意得多。如果他们能成功地让其“同志”完全无视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他们将不会在意自己的企业与农场的低效率。但当关于西方国家的富裕的一些零星信息传到俄国后，统治者因惧怕国内亲资本主义的反动运动而心烦不已。这迫使他们一方面在世界的“资本主义部分”煽动骚乱，一方面启动各种对其管理方法进行修正的计划。

今天，无人比铁幕后国家的“生产沙皇”更坚定地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

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是消费者至上的社会制度。在其架构内只有一种谋生和取得财产的方法，即必须努力以最佳方式服务于其同胞，消费者。日日时时重复的公民投票一再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所得与地位。通过购买和不购买行为，消费者将所有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授予那些成功地以最佳、最低成本的方式满足了他们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中最紧迫的需求的人。只能通过比其他人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才能取得与维持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它是一种可撤销的公共委托。

就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即劳动者而言，消费者的至上同样适用。工资率由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准备为工人对产品生产所作贡献而支付给雇主的价格决定。这样，消费者的估价决定了每个工人的



报酬的水平。<sup>[1]</sup> 我们不要忘记：消费者的绝大多数自己本身就是挣工资和薪水的人，他们本身就在决定自己的收入。

资本主义制度独一无二的效率要归功于它激励每个人竭尽全力服务于其同胞。不是模糊不清的利他主义，而是被正确理解的利己，促使人们竭尽所能地服务于其同胞。以货币——常用的交换媒介——体现的经济计算制度，使得预先精确计算所有项目及回顾每一行为的结果成为可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可以衡量每一要素对结果的贡献之大小。

社会主义制度的典型特征在于，它用“计划”制度取代消费者至上的市场制度。在计划经济下，个人不是受改善自己状况的动机驱使，而是受义务或对惩罚的恐惧所驱使。工人加大努力是不可能的，他们独自承担着这其中隐含的牺牲，而其额外努力的成果中，只有极小一部分能使他们自己受益。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时充分享受粗枝大叶、懒懒散散的乐趣，由此导致的国民总产值下降对个人的影响也是极微弱的。

经济学家经常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固有缺陷。他们提出的所有改进经济产品与服务质量和增加其数量的方案，都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旨在寻找一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个体成员对其集体努力的个人贡献结果产生自发兴趣的方案，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是徒然的。

社会主义者承认这一事实并急于寻找解决方案，这本身已经是对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个被人最狂热地提出的论点的极好反驳。一方面，社会主义者断言，在市场经济下，员工并无兴趣改善自己工作的结果。他们期待社会主义制度能史无前例地改善个体工作者的贡献，因为，当知道他不是为剥削者而是为自己的最好利益工作时，人人都会受到激励。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抵毁逐利行为，认为它是最邪恶的和最有害于“社会”的制度，他们陶醉于其所谓的以“为使用而进行生产”取代“为赢利而进行的生产”的空想中。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害性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承认来自于一些小块自留地，在实行这一制度后，仅靠农业工人的计算（被错误地冠以“私人利润”），就防止了这个国家发生饥荒，这个国家本来具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可耕地。苏联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生产率难题在于：在加工工业中，没有类似的自留地可供使用。

## 二

李伯曼(Liberman)<sup>[2]</sup>教授与其他俄国学者提出的、多次被讨论的改革计划,并没有触及到苏联对通称为“经济性”的一切活动实行的中央计划制度的根本特征。它同样也没有涉及到经济计算的问题。(对今天的俄国计划人员而言,这一问题尚不紧迫,因为,在世界性的价格制度下运转,他们可以依赖由西方市场所决定的价格。)

改革者想通过采用新的方法支付主管、监督者或工头的工资而改善生产消费品的工厂和车间的绩效。此后支付这些人薪金的方式能使他们对于生产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有金钱上的兴趣。

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用到“利润”概念或宣称所提出的支付方式带有“利润分享”的意味,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制度里,根本没有给建立与计算能被称为利润或亏损的量值留有任何余地。

生产的任务是为最好地满足未来需求而使用可以得到的人与物质的生产要素。对于未来的需求,今天不可能有任何确定的知识。

技术指明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分别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如果这些目的被认为是可达到的话,它则指明可以达到的程度。在众多错综复杂的可能生产方式中选出那些最适合于满足消费者未来最紧迫需求的生产方式,是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的特殊任务。如果所有的企业家在理解市场的未来情况时都是正确的,那么,各种互补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今天就已经达到与未来情况相应的水准。而在此情况下,没有企业家能以低于或高于其后的正确的价格,来获取一些或全部互补的生产要素,这样,就不会出现任何赢利或亏损。

如果人们的支出少于其日后从产品的购买者手中所得到的收益,他就会有赢利。如果出售的产品价格并不能填补生产成本的耗费,那他就会亏损。决定赢利或亏损的,是企业活动设定的目标以及为完成目标而选择的方法。

是投资导致了赢利或亏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社会”才进行投资,只有社会才能赢利或亏损。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生产要素是不能用来交易的(res extra commercium)。这意味着:它们既不能购买也不能出售,因而,也就没有定价。因此,不可能

知道一个特定的生产活动是否带来了赢利或亏损。

资本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正体现在，它将生产方向交由那些最成功地满足了消费者需求的企业家来决定。在计划经济下，缺乏这种内在的选择程序。计划当局是否犯了错误无关紧要。消费者不得不接受当局给他们的东西。计划当局所犯的错误是不为人所知的，因为没有发现错误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下，赢利意味着在消费者眼里某个企业家比其他人更好地服务于自己。利润与亏损因而是对不同供应者的绩效进行比较与测量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什么可以对计划及其执行者制造的产品与提供的服务和源于它的东西进行比较。计划及其执行者供应人们商品的做法，并不能显示，是否还会有满足其需求的更好方法。如果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时提及利润，那么就会造成混淆。在“赢利与亏损制度”之外，根本就不存在利润。

如果当局承诺根据其销售额给予制鞋厂主管以奖金，他们给予他的并不是“利润”的一部分，更不能称为利润返还制度。利润只有在从总收入中扣除总耗费后才能计算出来。而这种计算在前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已经完全建好的整个工厂，由当局交给主管打理，包括所有需要的材料，以及在被分配到这些工厂的工人的协助下，生产多少数量的鞋子并运往指定商店的指令。无法确定在主管首次干涉之前的运营成本。因此，给予他的奖金不可能和总成本与成品销售所得之间的差额有任何关联。

### 三

事实上，今天人们激烈讨论的改革问题，并未涉及各种工厂和生产过程的利润率。它处理的是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可能根据消费者——人民——对于工人对产品与服务的评价，来给工人，尤其是工厂的最高主管付酬？

在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下，雇主必须根据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准备支付给他的价格而付给雇工薪金。如果他要多付一些的话，他就会承受亏损，从而丧失资金，并从企业家队伍中被淘汰出局。如果他想少付一些的话，其他雇主的竞争将会使得他招不到工人。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中的花费与消费者的评价之间没有这种关联。因此，一般而言，不可能存在根据消费者对工人的评价—

—“生产率”——来支付工人报酬的问题。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可能将某一工人的贡献和其他人的贡献区分开来：消费者对之进行独立评价，因此，根据这一评价的报酬成为可能。例如：歌剧院的所有席位以正常价  $m$  出售，但如果世界知名的男高音将表演大部分曲目，那么，即使价格上涨到  $m+n$ ，票也会售罄。很明显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定工资率时不可能采用。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理可以确定各个行业的劳动者必须完成的“正常”任务，一方面，奖励那些超额完成的人，另一方面，惩罚那些未能完成任务的人。但这样的标准决不依赖于任何市场现象。它是当局或多或少武断决策的产物。

在市场经济下，支付给生产了那些不能在市场上出售、因而无价格可言的商品或服务的人的薪水，是由这个市场的结构间接决定的。雇主——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是政府——必须给人们支付足够高的薪金，以阻止他转到市场中寻找位置。这种间接决定工资率的办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行不通的。

当然，政府总是可以自由地根据其元首或计划人员对其所雇用的官员所提供的服务之估价而付给他某一水平的薪金。但是这和这里所讨论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关系。<sup>[3]</sup>

## 第十八章 合作社运动之观察

### 一、合作社的理念

#### （一）合作社不是世界重建的方法

尽管合作社在缓慢扩张，其营业额在增长，但今日所存在及运营的合作社，不过是其最早鼓吹者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希望其扮演的角色的暗淡影子而已。罗伯特·欧文、威廉·金和费迪南·拉萨尔曾计划把某种工业生产合作组织作为一种“新社会体制”。他们要求完全消灭企业家和资本家。在那之后，这些工人自己的社团将经营工厂，“他们自己的工厂”，而不需要“无用的剥削者”掺和。

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消灭工资制度，以生产者合作社的形式组织产业。每位工人都将在他所就业的工厂、工场或农场中拥有等额股份。他将平等地分享其产品或其收益。他将成为他自己的雇主，控制其运营，享有该单位的收益。

没有人能否认，实现这些宏伟计划的所有努力，都令人痛心地上失败了。假如今天还存在着什么生产者合作社（**producers' cooperatives**），其数量也微不足道，没有人会注意到它们。甚至研究合作社运动的大多数著作都避免提到建立合作性生产者社团的方案。

农民是生产者。但是，农民的合作社并不是组织具有农业生产者身份的农民，它们只是组织作为生产所需之各种设备及材料的购买者，及产品的销售者的农民团体。个体农民仍然是独立的企业家，而在涉及到其生产活动时没有被整合为一个合作性生产单位。

采购合作社(purchasing cooperatives)的不少业务涉及到生产领域。但这些工厂不是生产者合作社。它们不是由在其中就业的人拥有的。它们是由各种合作社或合作社组成的协会所拥有的。雇员是被雇佣的人手,跟其他企业雇佣的挣工资者一样。他们不能参与企业的经营。收益归所有者,也即合作社或合作社组成的协会,而不归其成员。根本谈不上废除工资制的问题。

合作的光荣倡导者雄心勃勃的计划目前所剩下的,只有三类合作性组织:消费者合作社,农民的购买合作社,及农民的营销合作社(consumers' cooperatives, farmers' purchasing cooperatives, and farmers' marketing cooperatives)。提到这些合作社时说合作的道路是世界重建的方法,实在是言过其实了。<sup>[1]</sup>

## (二) 经济进步的先锋不是合作社而是追寻利润的私人企业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追寻利润的私人企业体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劳动分工之下的社会合作。各种专业化的企业和产业部门彼此合作。每一个的目标都是协作生产消费者愿意使用商品和服务。在每一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和次级部门合作生产出产品,这些产品送到其他企业,该企业再用它们生产出更为精细的产品。最后,当所有这些合作过程结束,最终的产品送到消费者那里。从这一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看起来就是一个覆盖全世界的合作组织,在其中,每个人都通过服务他人而享有自己的财富。

现在,合作社却把“合作”的称号据为己有。意思好像是,只有他们是合作的,所有其他企业都不是合作的。这实在是一个糟糕的语义扭曲。

面对各种合作社那种自命不凡的态度,实有必要强调一个事实:它们对于真正改进人们的物质条件,没有多少贡献。数十年来,它们一直得到当局授予他们的慷慨的帮助。但是,看不到有什么创新可归功于合作社。私人企业尽管承担着合作社不用交纳的沉重税负,但年复一年地改进着产品质量,提高着产量,将前所未闻的新产品投入到市场中,而合作社却一无贡献。推动经济进步的不是合作社,而是那些被人横加指责的利润追逐者。假如我们到普通美国工人或农民家中看看,考察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就可以明白私人企业的运转带来的巨大变化。而对这奇迹般的变化,合作社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消费者的崛起”<sup>[2]</sup>不是合作社的成就。这个成就

来自“粗鲁的个人主义者”(rugged individualists)和“经济学保皇派”(economic royalists)所推动的“为追求利润而进行的生产”。

### (三) 农民的营销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

在所有国家的合作社运动中，都能够分辨出两大类型：农民的合作社与非农人口组成的消费者合作社。

农民合作社的目标是，一方面销售农产品，另一方面，分配农民所需要的农业供应品和消费品。这两个目标本身是完全正当的，除了税收和信贷特权问题外，每个人都会对其予以认可。

不过，我们不可能把农民合作社看成一种孤立现象，而不注意到，它们只是农民组织的开展复杂的农业政策和政治活动体系中的一个工具。作为一个压力团体，组织化的农民追求提高农产品的价值。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中，营销合作社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是为了提高粮食价格而打造的政治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其目标与非农人口组成的消费者合作社截然相反。

如何缓解粮食生产者与广大的粮食消费者的政治组织之间的这种涉及各方面的直接对立，不是一项关于合作社的研究的任务。但我们必须要说，农民合作社的目标与消费者合作社宣称要追求的目标是不可调和的。消费者合作社说，他们想让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低廉一些。农民合作社则公开地致力于提高粮食及棉花、烟草、木材等商品的价格。因此，这两类合作社之间竟然存在着友善的联合与友谊，它们竟然组成合作社同盟，这实在令人惊奇。

消费者合作社消解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指出，合作社运动的这两翼有一个共同点，都渴望取消多余的中间人(middleman)。这样，就有可能做到，一方面提高农民可用其产品换取的价格，同时又降低消费者在购买时必须支付的价格。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取消私人企业家即“中间人”会降低销售成本，这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这会提高成本。证据是，农民的营销合作社没有能力与没有享受税收减免和廉价信贷的私人企业进行竞争。其次，在农业压力团体的整个计划中，取消中间人只是一个小事。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借助政府的各种措施，提高食品及其他农产品价格。

大量关于合作社的宣传性文献主要讨论的是消费者合作社，而不是那两类农民的合作社。它悄悄地放过了城市的农产品消费者与

农民合作社之间致力于让政府调整这些的产品价格的冲突，后者制订种种限制性措施。为了支持合作主义而提出的大部分论点几乎只涉及城市消费者的合作社。在美国，这一点看起来特别荒谬，在这里，相比于农民合作社，城市消费者的合作社无足轻重。

#### （四）消费的哲学和神学

资本主义既不需要宣传者也不需要布道者。它的成就就能说明一切。资本主义用商品说话。

而如果没有充满激情的宣传，合作社就一事无成。他们将他们的推广宣传活动称为“合作社教育”（cooperative education）。

生产的目标与惟一宗旨就是消费。追逐利润的企业所追求的全部目标就是不断地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廉价的商品以服务于消费者。商人充分地意识到了，除了增加产出之外，没有办法增加消费。由于消费活动会带来愉悦，其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所以，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论说消费的快乐。教导人们实现心满意足的办法就是消费更多更好的令人舒适之物，这是完全多余的。即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完全知道较高的生活水平的妙处。

但是，生产所需要的辛苦和麻烦却是让人痛苦的。几乎没有人不去利用增加其消费的任何机会。但有很多人却轻蔑地对待工作。懒惰的天性是非常强大的，对社会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正因为此，从没有历史记载的时代起，父母和教育者就一直希望向后代教导勤奋的哲学。年轻人必须知道，为了享受到好生活的舒适，必须付出努力和艰苦工作。他们必须认识到，想要消费，先得生产。不可能有什么“消费者经济体”（a consumer economy）这回事<sup>[3]</sup>。经济必然总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的生产的经济。

谈论“消费的至上性”是没有意义的<sup>[4]</sup>。生产无一例外地总是先于消费。宣传一种所谓的消费哲学，以反对生产的哲学，这是没有意义的。

合作主义的鼓吹者也以其过多的热情进入了神学领域。他们要让我们相信，“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社会学说自然地导向组建合作社”<sup>[5]</sup>。他们在“合作社的实践和原则”中发现了“耶稣的至福”<sup>[6]</sup>。让各种教会的神学家及拉比们来考察这样的宗教理论问题，可能比较合适。



### 〔五〕合作社运动的真正目标

消费者合作社与农民合作社公开宣称的目标是，向其成员提供商品和服务，其价格将会低于没有这些社团时必须支付的价格。这是一个完全正当的使命。我们应考察一下合作社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

在买东西时省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从减少支出中所能获得的满足。我们也衷心地祝愿他取得成功。但合作社鼓吹者用高调的措辞来谈论这些贪财者的算计，事情却完全不同了。合作社成员是那些希望以最低价格买东西的人。合作社的雇员则相信，他们所能找到的报酬最多的岗位就是他们的雇主即合作社给他的岗位。当这些合作社的社员及雇员为政府授予合作社的税收特权和其他特权辩护时，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战斗。他们想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他们渴望消费更多东西。此时，他们就不适合说那些人们描述虔诚的僧侣照顾麻风病患者时那种忘我工作的话。

合作社的生意活动旨在降低肥皂与汽油的价格，它并不是“人间兄弟情谊的一种具体表达方式”<sup>[7]</sup>。在进行采购时，合作社供货商进行讨价还价；在雇用帮手的时候，他们与雇员讨价还价。合作社协会与其成员之间彼此的合同关系，恰恰是由律师仔细起草的法人条款、内部章程、法规条例所决定的。用“兄弟情谊”一词来形容受“互惠”原则指导的纯粹追逐利益的事情，是对公众理解力的一种羞辱。假如这是兄弟情谊，那世界最大的药品制造商**I. G. Farben**的经营活动，就同样在表现人间的兄弟情谊。合作社运动的宣传性文献如此使用术语是令人厌恶的。它们谈论什么精神价值<sup>[8]</sup>、文化和自由<sup>[9]</sup>，但事实不过是把各种东西的价格降低那么几分钱而已。

柏拉图在他的乌托邦中提到古代的说法，“朋友就是财物共享”<sup>[10]</sup>。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合作社社员把他们的社团称为友谊的结社，就是大错特错。因为他们没有做到“财物共享”他们有一个一丝不苟的会计与审计制度。合作社成员的权利、义务也界定得十分清晰。<sup>[11]</sup>

## 二、合作社的原则和方法

### （一）合作的起源

涵盖整个世界的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起源于邻居彼此偶尔提供的协助。老王加工铁的效率较高，他为在这方面效率较低的老李造犁。反过来，老李擅长皮革加工，他为在这方面天赋不高的老王加工皮鞋。这完全是友谊和邻里守望之情。从这一最原始的开端就发展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可思议的产业专业化。

在研究今天的产业状态时提起劳动分工的这一遥远源头，没有多大意义。没有一个人会如此地不讲道理，以至于会把商品与服务的交换最初显示的纯粹的兄弟之谊这一事实，作为自己主张权利和提出要求的依据。没有一家现代钢铁公司会说，在原始人时代，有一位神秘的老王曾经自愿地向他的那位同样神秘的邻居老李提供过服务，因而要求获得特权或补贴。

不过，在研究合作社问题时，却经常看到这样的做法。

为论证便利，我们可以承认，合作起源于邻人的友情。老王到镇上去买 5 磅咖啡。他的邻居老李请他为他也买上 5 磅。老王回来，把 5 磅咖啡交给老李，老李向老王报销那笔开销。这两人也分摊老王所花费的交通成本。另一方面，如果这 10 磅咖啡是以批发价格购买的，老王把其间的差价还给老李，那老李也就享受到了批发采购必然带来的好处。

这当然是兄弟情谊，是友情。但在讨论今天的合作社问题时，提到这些神秘的人物老王、老李，却过于天真了。这些合作社都是大买卖，有上百万会员，他们永远都见不上面。它们的营业额达到数十亿美元。它们组建了一个从简单的合作社到超级合作社又到最高级合作社这样的复杂层级体系。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垂直组织。它们与政府打交道，也活跃于国际贸易中。它们拥有工厂、油井和交通设施；它们从事金融活动，并进入各个商业与工业活动领域。它们的事务十分复杂，因而，要处理这些事务就需要雇用一大群理事、经理、办事员、会计和律师。有专门学校培训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很多大学都设立了教席来教授合作社的管理和会计方法及合作社的法规。

在研究这些庞大的企业的时候却用魔法召唤神秘的老王、老李的鬼魂，未免过于离奇了。

那些为维护合作社的特权而斗争的著述，把合作社描绘成会员

的代理人 (agent)。不过, 不管律师们如何从有效的国家法律——立法机构必定会对该词的含义进行篡改——的角度来定义“代理人”这个词,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很显然, 合作社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被描绘为其成员的代理人或受托者, 似乎它真的有别于依据劳动分工运营的其他企业。假如因为合作社把它所需要的汽油转交给其成员所以就称之为会员的代理人, 那么, 这个词也就适合于描述任何其他企业的活动。这样, 钢铁公司就是利用钢铁获得其收入的那些人的代理人。假如没有钢铁工人, 每个人将不得不自己生产他所需要的钢铁。钢铁工厂的运转使个人不用再自己操心为自己生产一种重要产品。钢铁公司不是为了自己的使用而是为了所有人的使用而生产其产品的。在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日常活动没有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 没有合作社提供的那些服务, 人们也能够生活。然而, 如果专业化的产业退出, 那他们就会倒退到原始的野蛮和贫困状态。

在合作社购买某些商品的时候, 它关注的是需要这些商品的成员的利益。不过在商人和农民打算生产普通人消费所需要的所有东西时, 也同样如此。

为顾及体面, 合作社的鼓吹者最好不要再吹嘘他们自己的理想主义和无私。所有那些为合作社的生意出过力的人都是靠这份工作养活自己的。证明这一真理并不是在贬损这些人。与其他商人、农民或靠薪水生活的人一样, 他们也是诚实而有用的公民。但不能把他们称为任何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 除非把这个词适用于从事有益职业的所有其他人。市民社会的基础不是单纯的理想主义和无私。它的驱动力量是每个明理的人正确理解的自利 (rightly understood selfishness)。正确理解的自利要求每个人把自己融入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向他的同胞提供服务, 他就增进了自己的根本利益。

对农民的合作社, 尤其不适合说什么理想主义、无私等等唱赞歌的词。农民是一种商人和企业家, 合作社的文献曾斥之为讲究实际的、冷酷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不是为获得天堂的报酬, 而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耕种土地的。他们让粮食充斥市场, 不是在进行对消费者的慈善活动, 而是为了自己赚钱, 并购买加工业生产的产品。为了获得增进收入的特权, 他们运用他们的政治实力, 组建压力团体。他们总盼望着比其他人少交税, 又获得公共资金的补贴, 让国家用进口关税保护他们, 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和特免权。在反人造黄油法时, 农民当然没有什么理想主义。

农民合作社省钱的努力，是完全正当的，只要他们不要求获得特权让其他人付出代价即可。农民也制造商品，他们致力于降低生产成本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他们想通过躲避税收或其他沉重义务而让其他从事生产的公民替他们承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 （二）生产者与消费者

自由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是消费者不受限制的主权。资本家，即土地的所有者与企业家受不可逃避的市场法则驱动，不得不运用他们所具有的独创性和生产的物质要素，尽可能好地、也尽可能廉价地满足消费者尚未得到满足的最迫切需求。商人并不是不负责任的生产沙皇（production tsars）。他们要无条件地服从于消费者的至上地位。假如他们未能遵守进行消费的公众的命令，那他们就会蒙受亏损。假如他们没有尽可能迅速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以适应公众的需求，那他们就不得不丢掉生意，丧失他们的显赫地位。消费者通过购买或不购买，而使穷人变富，使富人变穷。他们决定谁将拥有资本、土地，谁将经营企业。他们决定应当生产什么，何种品质，生产多少。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消费者的民主制（democracy of the consumers）。

确实，有一些险恶的力量试图破坏不受妨碍的市场经济，用生产者至上取代消费者至上。在当前的各国政府与政党中有一种普遍的趋势，保护低效率的生产商不受高效率的生产商的竞争。政府干预企业的本质就是影响不受妨碍的市场的正常运转，而这个市场本来趋向于实现今天所说的——尽管不是十分恰当——“免于匮乏的自由”。占据政治职位的那些人尽管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关心大众的物质幸福，但他们却总是坚定地致力于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会减少人们可以消费的商品的数量。他们把这些害人的措施称为“社会政策”、“社会政治”（Sozialpolitik）、“新政治”、“进步主义”，而把所有反对者污蔑为“反动分子”、“经济学保皇派”（economic Bourbons）。

限制政策最热情的支持者正是农民和工薪族组成的有组织的压力团体。由于受到荒谬的伪经济学说的鼓惑，这些压力团体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形形色色的限制政策和限产超雇（feather bedding）、借助补贴和其他特权增进自己的物质福利。

授予某个特殊生产商群体以某种特权，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改善

这些以损害他人为代价而享有特权的人的物质状态。在一个以劳动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每一个专业化群体都是少数。如果把某种特权授予这样的少数群体，其成员的状况当然会获得改进。但这样的少数根本没有指望永远维持这样一种特权地位。相反，其他人可能受骗，但他们最终会发现，这些人是吸血鬼，他们自己承担了向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授予特权的负担。他们不会情愿容忍继续维持这种状况。他们要么会废除授予其他人的特权，要么会让自己也享有类似的特权。

不幸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二种情形。面对特权问题，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不是要求废除所有特权。他们也为自己索取特权。他们的理解过于迟钝，而不明白，这套体制如果走到其最终的逻辑后果，将是十分荒唐的。一个人作为生产商可从授予其所在行业的特权中得到的收益，作为消费者在购买享有特权的其他行业的产品时却会损失掉。最后的结果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所有人的物质福利变坏。

奶牛农场主促使政府禁止人造黄油、音乐家让政府禁止音乐录音，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如果其他生产领域也如法炮制，那就可能阻碍进步，没有人受益，所有人都蒙受损害。奶牛农场主和音乐家的收入会提高，但他想购买的所有其他物品的价格也同步提高。结果是，所有人都得不到他们本可从技术进步中所获得的好处。

今天，在误导性的“生产者政策”的名义下，这种荒唐的、自拆台脚的政策大行其道。生产者特权的鼓吹者声称，资本主义最坏之处就是，它赋予“懒惰的”消费者而不是“勤劳的”生产者以至上地位。他们没有认识到，生产者与消费者是同一群人。只是这种经济学分析的思想把人区分为作为生产者的人和作为消费者的人。在生活与现实中，每个人的这两面都永远相连在一起的。你不可能在照顾作为生产者的一个人的时候，不伤害作为消费者的他。在资本主义市场不受妨碍的运转中显示出来的消费至上，是下述事实的最高表现：消费是生产的惟一终点和目的。

如果合作社运动批判这一所谓的“亲生产者”政策的错误，那就大大地有助于其福利的增进。但是，尽管他们在嘴上大谈他们所说的消费者至上，但消费者合作社却并没有提出反对我们这个时代种种限制政策的任何理据。相反，他们就是最热情地支持这些最有

害的措施的人。他们的很多成员恰恰就是冒失地呼吁生产者政策的人：农民和工人成员。

夸大其词地谈论合作的所谓好处，是徒劳的，因为合作社默许了大量生产者特权。农民作为合作社成员可以省下几分钱，但由于限产超雇和工会所表现出来的对技术进步的敌意而损失好几块钱。工薪族至多在合作商店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省下几分钱，但赋予农民的特权却会让他们损失几块钱。

增进消费大众的利益，只有一种真正高效的办法，那就是自由的私人企业之道。不去妨碍高效率的生产商取代低效率的竞争对手，是让城市消费者和农民得到更低价格、提供更充分供应的最好办法。合作社运动让公众不去关注主要的经济罪恶，比如限制政策和生产者特权，而让人们在涉及到几块钱的地方仅仅关注于怎么样省下几分钱的那些事情，其造成的损害多于其带来的好处。

合作社成员当然没有资格把自己说成消费者的卫士。与那些成功地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廉价商品的商人相比，他们的成就实不足道。

### （三）合作社在竞争体系框架中地位

经济自由主义——今天被贬称为曼彻斯特主义<sup>[12]</sup>主张，政府不应当在那些希望服务于其同胞的人的前进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根据自由主义者对消费者主权原则的解释，只应由消费者来决定一个商业单位是好是坏。这就是频遭批评的“自由放任”口号的含义所在：让消费者自己进行选择，而不是让一位大家长为他们选择。

市场经济给了每个人机会。一个人要成为产业领袖，所需要的只是好点子和实施这些好点子的能力。要获得成功，不需要任何继承的财富和资本。资本家受其自身利益驱动，渴望为其资金找到最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因而他们总是在寻找有创造性的人，把他们的资金委托给他使用。

有些人鼓吹全权主义政府是全知全能的，这些人想让我们相信，在目前的条件下，在他们所说的“成熟”资本主义时代，已经不再是这么回事了。他们说，今天，条件更苛刻了。一个身无分文的新进者已经没有机会挑战老企业和大集团的既得利益了。穷人注定了永远是穷人，富人则会天天发财。

这种谎言与凯恩斯主义的谎言及其他谎言一样，扭曲了真实的事态。确实，今天，政府的各个部门联合起来，努力阻止技术进步和新企业、新百万富翁的涌现。但是，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障碍，自我奋斗的人仍有机会取得成功。今天，相当多一部分企业领导人并不是以前的百万富翁的儿子，更不是其孙子。假如一个家庭成功地在几代内维持了其在社会阶梯的顶尖地位，那应当归功于其年轻一代的能力和热情。在不受妨碍的市场经济中，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赋予既得利益者以安全保障，使其不受改进后的生产方法、新产品、更好质量和更低价格的竞争。恰恰是因为在不受妨碍的市场中不存在这种保护，所以，那些由于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能力欠缺、懈怠、疏忽而使自己的财富陷入危险中的人，就会要求政府的保护。

不干预市场状态、给予每个人机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企业组织的新方法。经营性企业的合作形态在目前所享有的地位，并非法律和行政管理官员所赐。相反，自出现之始，它就不得不面对掌握权力者的敌意。在过去几十年，这种敌意发展成了不加掩饰的迫害。当局在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在税收领域，歧视股份公司（corporations）。股份公司承担着非股份公司不用承担的沉重税收负担。但面对破坏力量的冲击，企业的股份制形态的巨大效率仍使其成功地生存下来。

合作社登上生意场，就激烈地攻击商人，尤其是零售商。假如零售商曾经要求当局压制这些新兴的竞争对手——它们看起来似乎不是指望通过服务其社员而是压制现有企业——这样做还可以理解。零售企业要求禁止合作社、完全压制其活动，与农民禁止人造黄油、削减肉类和谷物进口的要求，是同样恶劣的。但是，除了少数性格暴躁者愤怒地说了一些话之外，零售商人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在面对合作社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充分地体现了遭到严重中伤的商人的公平和他们对自由竞争原则的完全认可。他们没有要求警察干预，让这些阴险的诽谤者和中伤者闭嘴。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不能用特权和特免权娇惯这些合作社。私人企业经营者完全忠于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只是平等地对待各种形态的经营性企业。他们既没有为自己索要特权，也没有要求对其他竞争群体采取敌意的歧视措施。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政府保持中立。没有特权，也没有歧视。不应当通过给予低效率企业的实质性补贴，妨碍公众在日益增多、相互竞争的销售者中



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及光顾那些最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商店的自由。为了消费者主权，为了整个民众的利益，应当平等地对待各种类型、各种形态的经营性企业。

#### （四）合作社的利润的性质

在日常语言和统计学通常使用的利润概念中，包含三个不同要素：投资性资本的利息，对企业花费在企业经营上的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以及严格意义上的利润。对于股份公司和合作社来说，第二个要素是不存在的，因为，依据法律，企业的所有者不得在企业经营中运用其劳动，即使后者在公司中有股票，或者是合作社成员。

严格意义上的利润是企业通过以超出所花费的成本之上的价格销售产品所得的剩余。此处不需要详尽考察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利润所需要的条件及利润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所有经济事务的正常运转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样的分析是研究经济理论的专著的任务。

合作社主张，它们经营生意的目的不是赚取利润，它们按照每个人的购买量成比例地分配给客户的不是红利，而是“光顾返还金”（*patronage refund*）；它不是利润，而是经营生意节约下来的钱。正是基于这一学说，合作社主张它们应当享有特权地位，尤其是享受税收减免。

完全可以想象经营合作社生意的办法，据此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剩余。合作社可以按照某个价格出售每种货物，该价格只包含合作社本身为获得它而发生的成本，加上对于处理这种货物而发生的成本的全额补偿。其实没有一个合作社采取这种作法。合作社总是以高出成本的价格卖东西。到一个确定的时间结束时，假定经营是成本的，就会出现净利润，也即通过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而获得的剩余。

那位为布尔什维主义热情辩护的比特丽斯·波特·韦伯夫人（帕斯菲尔尔德女士）（*Mrs. Beatrice Potter Webb, Lady Passfield*）曾试图解释，合作社为什么没有实现“欧文设想的消灭企业交易过程中的利润的理想”，为什么它们没有按照“成本价加管理支出”的价格销售货物。按照韦伯夫人的看法，罪魁祸首必须归之于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她提出，按成本价销售小宗货物，“得使用目前的硬币中尚没有的小额货币”。



<sup>[13]</sup> 货币确实不是无限可分的，但这一事实从来都没有阻止企业灵活地调整价格，以适应市场的结构所要求的水平。在水果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零售业中，像“五只卖七分”或“三只卖十一分”这样的价格，是很常见的。合作社没有理由不采取同样的做法。假如绝对必要，它们也确实采用过这种办法。但它们这样做时，目标不是消灭利润，而是为了与其竞争对手进行竞争。

雅各布·贝克尔先生（**Jacob Baker**）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合作社的这些做法。在他看来，要核算批发成本和运营成本在每打鸡蛋或每磅黄油中所占的比例，得进行大量工作。<sup>[14]</sup> 然而，一位商人如果不算清他的成本是多少而在黑暗中摸索，他就是个笨蛋，必然走向破产。竞争会迫使每位销售商——不管是追逐利润的商人还是所谓的利他的合作商店或加油站——不能要求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但每位销售商也必须知道自己的每笔生意究竟是赚了还是赔了。如果他忽视了一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货物，他就很快会丧失自己在劳动社会分工的框架中的位置。如果经济核算向一位商人显示，如果不赔钱，就卖不出某种商品，那他通常就不会继续从事这项买卖。在某些例外情况下，他可能基于某些特殊的考虑而有意继续进行这项买卖，比如，为了让他的顾客继续光顾本店等等。但即使这个时候，他也必须充分地意识到他的措施的意义。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容不得无知与大意。尽可能清楚地计算成本是生意之本。

实际上，大多数运转正常的合作社都完整地采纳了多少代商人发展起来的久经锤炼的清算账目的方法。他们甚至吹嘘自己在簿记和财务报表领域的成就。<sup>[15]</sup>

当然不能通过声称合作社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成本而原谅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货物的办法。

采取这种办法的真正理由截然不同于这些辩论性学说所提出的理由。

只有当交易成功时，以高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而得的剩余才会出现。即使最机灵的商人也不可能总能避免亏损。有时他可能错误地判断了价格趋势，为得到一宗货物花了太多钱，事后的事态发展却证明不应如此。生意总是投机性的，因为它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期，利润和亏损正是因此而产生的。在一个没有变化、明天无异于今天的世界上，就不会有利润，也不会有亏损。条件在不断变化，至少

在美国有一种持续地改善的趋势。在这种事态下，价格就在不停地波动。一个人如果是为了出售而进货，那他要想获得利润，进货时的价格就必须低于销售时的价格，销售后价格要减去销售总成本。

合作企业也不例外。它也遵循这一市场法则。如果一个合作社用 2000 块钱购进 10000 磅东西，要想不亏损，其经营性销售成本是每磅 5 分钱。但是，假如在进货与销售期间，零售价格下跌到 18 分，它被迫每磅亏损 7 分出售，总共亏损 700 块。当然，总是做这种不明智的买卖的合作社，很快就倒闭。至于生意兴旺的合作社，在确定的时间段内，其利润总额必然至少等于其亏损总额。而在每家经营性企业，不论是合作社还是其他企业，每单笔交易都对确定时间段内生意的最终结果相应作出不同的贡献。有些单笔交易相对利润丰厚，有些利润微薄，甚至导致数额不等的亏损。

正是这些确定的事实，使得合作社不能按照与每宗货物各自的总成本（批发进货价加运营或销售成本）相应的比例出售货物。如果它们非得这样做，它们就根本不可能售出一些存货，其进货价格从目前的零售价格结构的角度看已经不合理了。

对于上述事态的认识，完全推翻了关于提供返还金或提供红利的合作社理论。这些返还金与单个成员的购买量根本没有关系。它们并不与合作社以超出成本的价格卖给各个成员所获得的利润相对应。它们是合作社在确定时间段内所赚取的总利润的分配。它们与个体的购买额没有任何关系。只购买了合作社亏本销售的那类东西的成员，跟其他成员一样有资格按照与其购买量相应的比例获得返还金。

如果合作社只是成员的代理人，成员就有义务买走合作社采购货物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并补偿合作社为此所发生的一切成本，不管这对他是否有好处。他们也应当有义务购买东西，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以高于别处的价格来购买。这个结论也可以从人们热衷谈论的老王、老李的故事中推导出来。假如老王请老李为他在纽约购买一条领带，他必须拿着领带，找老李去偿还自己在购买时所花的钱。老王是否发现他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可以以更低价格购买到这样的领带，这无关紧要。他已经给了老李作为他的代理人在购买领带时的自由裁量权，也必然承担其后果。

因而，显然，合作主义者的学说纯属荒唐，据此，私人商店向

其顾客出售商品，而合作商店则为其成员购买商品<sup>[16]</sup>。合作社跟商店一样是在出售商品，它必须利用私人零售商所使用的那些办法诱导其社员光顾合作商店，即低于竞争价格。跟每一家私人零售企业的采购、销售一样，合作社的采购也与其销售有密切关系。

一个合作社的成员并不能向任何成员强加一种在合作商店或加油站购买某种商品的义务，更不要说报销合作社在采购他可能购买的产品的过程中为获得该具体商品而花费的全部成本加运营开支。各个合作社成员都有权利以每个人——社员及非社员是一样的——有权在每家私人商店买东西的方式，在合作商店买东西。“合作社是为其社员采购”这样的说法，与“私人零售商是为其顾客进货”的说法相比，并不是一种对于实际事态更正确的描述。

事实的本质是，合作社将销售总额高出总成本而得到的剩余在其顾客中间分配，并不是由于每个社员具体的购买量，而是由于合作社在某一确定时间段内经营成功了。只有在合作社的管理者技能出众，足以以较低价格进货，这一价格在后来的销售中能够获得报酬，才会出现这种剩余。

合作社的这种经济性质与私人商店并无不同。合作社是成功还是失败，其结果与私人零售店是相同的。成功了就有净利润，失败了就会亏损。

#### （五）合作社利润的分配

如果一家合作社的商业经营在一定时间段内成功了，因而，其资产负债表显示了净剩余，即一笔利润，则这笔钱的处理，就与每家私人企业处理其利润的方法没有什么区别。这笔利润要么被分配，要么被重新投入到生意中，补充运营资本，或者部分分配，部分再投入。

可以诉诸什么样的法律方式来积累未分配的利润，这种追加的运营资本在会计账目中叫做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惟一重要的是，挣来的全部或一部分利润未进行分配，而重新投入到了资本存量中。合作社通过不分配利润来积累新增资本，这跟其他类型的经营性企业是一样的。资本积累向来都是不消耗挣来的利润的结果。

合作社从简单的单个商店演变为大企业，带来了社员权利中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一些社员积极投票，拥有法人的共同股份

中的某些股份。有一些社员没有投票权，不活跃，因而，不能分享合作社的控制权。一边是获得全额支付的股份，另一边则是只得到部分支付的股份。这样，有时所选择的积累新增资本的方法看起来似乎是在支付红利，这是有可能的。假如该红利以股份方式支付，其结果就是，再次投入合作社的资本增加。不管利润由合作社保留下来，还是为每个社员增加股份，都不会影响社员的资产的价值。在这两种情况下，单个社员在合作社总资产净额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变的。

合作社只是把其部分资本性资金用于自己的业务经营。它们已建立了大规模的批发企业和生产机构。他们已经把这些企业组织成一个层级体系，从超级合作社，到超级的超级合作社，到超级的超级超级合作社。这些协会的每一家都自己赚取利润，并且要么保留给自己作为未分配利润，要么在其成员，即低一层次的合作社协会中间分配。

#### （六）合作社运动在经济上健全吗？

关于合作社的大量宣传性文献以极端的措辞吹嘘合作社运动的成就。借助丰富的资本供应，合作社从不起眼的开端发展成大企业。它们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社员，有成千上万组织，有上百家打磨厂、工厂、油井、炼油厂和传递渠道。它们每年的营业额很大。这种繁荣景象不止局限于美国。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国际合作社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 38 个国家拥有七千万社员。多少辉煌的成就！

但仔细考察一下，人们就会发现，在这幅迷人图象中有一些瑕疵。首先，股份公司在美国要比合作社强大得多。战前，芬兰的消费者合作社处理了该国 30% 的零售生意，在瑞典是 12%，在大不列颠、法国和丹麦是 10%。但在美国，它只占到 1%。<sup>[17]</sup>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恰恰是在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合作社在零售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与外国相比，还是与国内零售总营业额相比，却相对地微不足道。美国是世界上大众物质福利领先的国家，而消费者合作社的发展却很落后。因而，显然，普通人的富裕并不依赖合作社的繁荣，而要靠别的因素。

公平的观察者会得到的第二个想法是，合作社不敢面对在平等

的竞争环境中,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对照,检验自己的效率的机会。在全球所有国家,他们都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尤其是税收减免和廉价信贷。它们不用与私人或股份制零售企业、与私人或股份制制造商使用的手段和取得的成果进行竞争。让公共财政买单而享有的事实上数量巨大的补贴,足以使它们即使效率再低,浪费再严重,管理再混乱,也能够繁荣发展。合作社运动的漫长历史并不能证明了支持合作社的任何东西,而只是证明了,在这个没收性税制(**confiscatory taxation**)时代,税收减免是很值钱的,会使享有此特权的人发达起来。合作社的代言人热情地为维护这些特权而战斗,他们不断声称,取消这些特权将会毁灭合作社运动,这些就已经表明,他们自己对合作社能否经得住私人企业的竞争,并无信心。

私人零售商能够经得住合作商店的竞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追逐利润的自由企业的经济优势。合作社享受着丰厚的税收特权;支持它的组织的资本远远超出普通零售商,该组织也享受着很多其他特权。在进行竞争的过程中,私人企业在制度与政治的每个方面都受到妨碍。它的繁荣只能归功于其优越的效率,及它最好地服务于消费者这一事实。

支持合作社的宣传提出了无数论点,意图证明,为什么追逐利润的零售业必然会造成浪费,成本高昂,为什么合作社更经济,能以低廉价格卖东西。假如这些说法是正确的,那合作社早就该——即使没有以税收特权形式享有的丰厚补贴——消灭私人零售业。但事实却是,不管是在价格水平方面(即购买者的净支付),还是在提供给顾客的其他服务方面,合作社都没有能力打败私人销售商。绝大多数美国家庭主妇光顾私人零售店,顾客每花销的一块钱中大体上只有一分钱花在合作商店,这一事实就足以给国民以深刻印象,使其承认私人店铺的优势。没有必要再去费心揭露隐含在那些喋喋不休地论证私人企业的所谓论点里的荒谬之处了。家庭主妇们绕过合作商店,走进私人销售者的商店,就已经推翻了那些论点,这比任何理论家都更让人信服。

合作社学说的根本错误是,错误地理解了分销商和零售商所扮演的角色。按照合作社理论的鼓吹者的看法,零售是无益的,因为它没有给商品增添任何物理或化学性质的东西。分销商不过是多余的中介,它们的介入提高了价格,而没有改进产品的质量,或带来任何有价值的服务。人们可以轻松地抛弃这些懒人和他们不应得的

收益。

假如合作社没有享受那些丰厚的税收补贴，那它们很快就会从经验中得知，这种看起来有点道理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零售商并不是可以抛弃的中介。零售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必需的一种功能。它是不断调整生产以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的一种机制。尽管通常情况下，零售商并不改变商品的物理或化学性质，但他在人们最迫切地需要商品的时候，将其置于正好需要用的地方，从而为其增添了价值。零售商提供给公众的服务不可能要价太高，因为，竞争——在销售领域总是十分激烈的——会把他们的价格控制在利润最为微薄的程度。在研究消费者合作社时，人们通常未能充分地强调一点：合作社尽管享有税收豁免，却并没有能力取代私人商户。这一事实就推翻了合作社文献连篇累牍的论证。

#### 〔七〕合作社运动中的政治因素

从一开始，合作社运动就主要是一场政治运动。在其创始人的计划中，它与其说是改善其成员的状况的工具，不如说是打击“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武器。因为他们从这一角度重视合作社，所以，社会党通常都同情合作社运动。除了农民合作社外，消费者合作社的很多成员都是社会党人。在信奉这种理想的合作社成员的想象中，未来的天堂就将组织成为一个消费者合作社协会所组成的大社团。新合作商店的建立及原有合作社的扩张、发展，都是在通往人类社会拯救之道路上迈出的一步。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在生产全面由国家控制的体制下，合作社根本无从谈起。这种体制正好是自由及消费者裁量权的对立面。它会消灭市场、市场交换和购买者的一切权利。在这种体制下，个人只能接受当局分配给他的东西，“生产沙皇”则居于主宰地位。

当然，全面国家控制体制可能保留“合作社”的名义，并将其销售商店称为“合作社”。苏联人就玩了这种把戏。但这种术语戏法是蒙骗不了人的。

资本主义体制〔有人把这种体制称为“工资奴隶制”，因为在这里，“劳动是商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工薪族可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花费自己的收入。消费者的购买与不买最终决定着应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生产什么样质量的产品。消费者的这种至上性由竞争性工业生产秩序保障，在这里，所有生产者尽管所生产的产品不同，但都在为了尽最大可能挣消费者的钱而彼此竞争。假如只有一个生产机构，即政府，那这种竞争就不复存在了；那时，家庭主妇就只能到政府机构为她开设的商店中去买东西。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商店主，不论是私人销售商，还是合作社雇员，都渴望服务顾客，一旦交易完成，他们就会感谢顾客光顾他的商店，并请他以后再来光顾。而在全面国家控制体制下，店铺经营者渴望讨好政府，那是他的上级；他会把出售商品当成对顾客的一种照顾，会劝告买到商品的人感谢那庄严的赠予者，伟大的独裁者。

有些人把整洁的合作商店、丰富的商品货架及礼貌的售货员迎接顾客的景象与全面国家控制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搞错了。合作商店之所以清洁，货架之所以满满当当，服务人员之所以负责任，仅仅因为，他们必须与追逐利润的私人零售业竞争。全面国家控制体制下的商店却完全是另一副景象。

#### 〔八〕合作社运动中的垄断与极权趋势

合作社的管理者充分意识到了，合作社如果必须在平等条件下与私人企业竞争，就不可能经受得住。这种洞见一方面使他们充分激情地捍卫以前获得的特权，另一方面则推动他们趋向垄断和极权事业。

合作社宣传的著述和言论从来不想掩饰其垄断的野心。它们贬损竞争，并夸大其词地称赞它们所说的“团结”的好处。在每个国家，地方性合作社都趋向于联合组建全国性组织。各国的协会则联合起来组成国际合作社联盟。合作主义的鼓吹者公开宣称的理想就是不仅消灭私人的自由企业，也消灭国家拥有和经营的商店，从而取消所有竞争。他们梦想着一个包括“合作社联盟”的世界，让它实际上在即将到来的“消费者合作社时代”享有一种超级权力。<sup>〔18〕</sup>这个在生产与销售领域同时无以伦比的“联盟”，将会在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享有垄断地位。它所拥有的将是一种与纳粹授予德国经济部（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或苏联授予其国家计划当局类似的极权主义的权力。

但是，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合作社被迫让它们的主张较为温和一些。它们急于联合起来，合谋消灭竞争，限制商业。它们的



活动既是水平合并也是垂直合并的经典例证。它们趋向于扩张到所有领域，甚至是那些与其主要活动关系很松散的领域。在此过程中，它们通常能得到喜欢它们的联邦和州政府各种部门的直接与间接支持的鼓励。但合作社经营方式内在的劣势抵消了所有这些特权和优惠。消费者合作社在通往其最终目标——对零售市场的垄断控制——的道路上取得的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因为，家庭主妇可不那么容易蒙骗。美国的消费者合作社与欧洲很多国家相比弱小得多，这一事实证明了，美国的消费者更精明，更有能力分辨好东西与坏东西。

### （九）合作社是民主的吗？

为支持合作主义而提出的经济学论据的弱点越明显，其积极参与者就越强调合作社所谓的民主性。他们说，合作社是民主的，而追逐利润的企业是反动的；建立政治民主需要建立经济民主，即让合作社处于支配地位。

事实的真相是，市场经济是经济民主原则最完美的体现，也是惟一可能的实现方式。市场过程是每天都在重复进行的投票活动，在这里，每分钱都有一个投票权。购买者通过购买那些价格和质量最好地满足他们需求的商品，决定着每家企业是赢利还是亏损，他们让小企业做大，让身无分文的新入行者致富。在市场上，归根到底，除了购买者手里的钱，什么东西都不管用。确实，这些货币选票（ballot papers）在公众中不是平等分布的。富人投入这种选票箱的票，要多于不那么富裕的人。但一个人致富本身就是这样投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不仅获得财富，连保有财富都要求要最好地供应消费者方面的需求。那些不把资金投入满足公众最紧迫需求的领域的资本家，会受到亏损的惩罚，假如他不能及时地改变自己的做法，那就会损失掉全部财富。

体现为代议制政府的政治民主是市场经济民主的必然结果。有些人站在辩证唯物论的角度，必然把议会统治、人民进行治理和权利法案授予的所有自由，描述成“私人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与政府的上层建筑”。有些人始终如一地抨击和贬低民主制是“富人的民主”，议会统治是“资产阶级的骗局”。苏联曾经最激烈地反对民主制度。只是在面临纳粹的危险，他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宣称自己也是民主的。只是到了那之后，西欧和美国的一些人才发现，合作社是民主的机构，甚至是经济民



主的典范。

借助这一语义学创新，支持合作社的宣传家们采用了一个术语，它的源头可追溯到比特丽斯·波特·韦伯夫人那里。这位韦伯夫人曾经把工会运动描述成“产业民主”，把合作社运动描绘成产业民主的一个方面<sup>[19]</sup>。没有必要详尽考察这些说法。西德尼·韦伯夫妇所说的民主和自由，正好是与其对立的東西。在他们眼里，苏联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冷酷地消灭那些没有与领袖完全保持一致的人，是真正的自由。

合作社作为一种企业组织，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反民主的。它是集团所有权的法律形态之一。自由社会允许合作社发挥作用，就如同允许其他商业性股份公司发挥作用一样。假如合作社不享有政府的任何照顾，那人们就有权宣布，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及其营业额的增加，乃是其顾客自愿支持的结果，体现了市场的民主过程。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借助政府的偏袒性措施，合作社获得了大量补贴。让合作社成员人数得以膨胀的，不是其成就，或它们供应给顾客的服务，而是政府优惠政策的积累。消费者之所以加入合作社，不是因为自己同意合作社的理念；相反，他的目的只是分享政府给予合作社成员的好处。

合作社的宣传总是在强调一个事实：合作社是自愿结社。这样的说法完全扭曲了真相。

首先，在选择是加入还是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政府以十分重要的方式干预了人们的决策。合作社享有特权，所有没有加入合作社的纳税人就处于劣势。假如有两条竞争性公交线路，红线和蓝线，前者的票款得交税，后者则免税，这时，说乘客偏爱蓝线是自愿作出的选择，就是误导性的。他是在强迫之下这样做的，由于政府的干预，选择红线会遭到惩罚。

其次，还有一个不幸的事实：在很多社区，为了扩大会员，合作社成员诉诸社会压力，及多少有点公开的威胁。确实，在美国，这种滥权行为比欧洲要少。但这不能证明，美国的合作社成员就具有更为民主的心灵，更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它只是表明，美国依然还是一个严格执行法律和法律义务的国家。

比起其他企业组织来，合作社的民主既不多也不少，民主的市

场经济向它们提供了机会来证明，它们能够成就什么。但是，合作社却不敢冒险接受这样一项考试，而是寻找照顾的盾牌。

### 三、合作社的特权、特免权和豁免权

#### （一）政府照顾合作社的偏见

无人能没有偏心，无人会一点都没有青睐某些人、机构或东西的种种偏见。政府总是由凡人组成的，因而绝不可能与人际、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冲突绝缘。只有那些国家偶像崇拜者（state idolatry）才会把统治者描绘成不受偏见影响的世俗事务的仲裁者和指导者。现实的观察家都知道，真实的官员和行政管理人员是如何与此不同。

当代政府的错误不仅在于，它们的成见和先入之见太多，更大的错误是，它们受盲目的偏见指挥。结果是，其最好的意图落空，总是带来破坏。

近代经济发展的整个结构是以两大类企业组织的正常运转为基础的：一类是个人企业、独资企业和合伙制，另一类则是股份公司。现代工业化前所未有的成就让不断增加的人口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而它正是受那两类企业组织决定的。正是追逐利润的企业把马、帆船、风磨的世界变成了蒸汽机和电力的世界，为满足大众的需求而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世界。正是追逐利润的私人企业积累了资本，即工具和机器，只有这些东西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提高工资率的力量。即使是最顽固地为合作主义辩护的人，也不敢把这些功劳记在合作社头上。要赞美合作社，最多也只能说，它们——当然利用了授予它们的种种特权——多少复制了追逐利润的企业屡经试验的技术方法。如果不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给私人企业每天向普通家庭供应更新、更好、更廉价产品的努力，历史学家就不可能写出我们时代的历史。然而，历史学家即使不提有些产品是通过合作社分销或销售的，有些简单的制成品加工是在合作社协会所拥有的工厂中进行的，也不算遗漏了重要的东西。如果有人曾经禁止私人企业做在过去一百年中所做的那些事情，那任何一个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都会变得不舒服。但是，即使不存在合作社，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也不会变得更糟糕。

尽管如此，政府现在的做法却让人觉得，私人企业是一种讨厌的东西，人类的救赎得靠合作社。各国政府公开地、赤裸裸地歧视

私人企业，对其剩余课以沉重税负，而合作社获得的剩余却可以免税。政府特别歧视股份公司，对股份和获得红利的股东同时征收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没收性税率减少了可用于经营私人企业的风险资本总额，而合作社却可以积累资本，它不会被征税，即使征税，税率也达不到私人企业的水平。

在世界各国，合作社都享有大量特权。

在美国，州和联邦法律都规定，合作社协会的正常活动不算违犯反托拉斯法。农业部让农民合作社可以得到免费的法律、统计和技术咨询服务。政府各机构以低利率向合作社供应贷款。

最值钱的特权是在税收领域获得的。有些税收减免额不算大，比如，减免每年的特许税（franchise taxes）。但所得税的减免却是非常重要的。

从一开始，联邦所得税法律就豁免合作社。后来的法案又拓宽、强化了这些豁免。另一方面，由于税率提高到近乎没收的水平，这些豁免对它们就更有用，更有利可图了。在目前的税率下，它们等于获得了大量补贴，而全体纳税人和国民则付出代价。

#### （二）关于税收特权的本质问题

在捍卫其税收特权并为其论证的时候，合作社为了转移公众对本质问题的关注，故意纠缠一些琐碎的技术细节和法律推论。

我们已经指出，联邦所得税立法出台之初，就有意地豁免合作社的税负。国民和国会中的政治格局是，如果没有某些参议员和众议员的票，就不可能通过法律，而对他们减免这些税收特别重要。因而，税法中所有定义和规定的表述，都让合作社不用操什么心。如果法律适用和法院裁决的实际经验证明，这些特权不像合作社所期望的那样广泛，如果税负不断加重，合作社希望减免的欲望上升，那这些表述就会一次又一次修改。尽管有些国会议员试图做到法律面前平等的基本宪政原则，但合作社的特免权实际上总是随着这些修订而扩大。

在这种事态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合作社成员渴望让讨论围绕着下面的问题进行：合作社究竟是否获得了所得税法所定义的技术意义的利润。目前法律对收入的定义受到让合作社免税的意图的

影响。一点也不奇怪，这种定义可以被合作社解释得有利于自己。

当然，这些解释是矛盾的、站不住脚的。任何辩证法的技巧也不可能得出这样一个收入定义，据此，收入包括了股份公司获得的剩余，却不包括合作社的剩余。不过，合作社的豁免并不依赖写在法律上的收入定义。联邦与州的法律明文要求减免合作社的税收。

关于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讨论，截然不同对于现有法律的解释。尽管后一个问题严格地局限于法律的文字和精神，前者则只知道一个尺度，比如公共福利和经济上的便利。

征税是为了筹集管理政府事务所需要的资金。向这些资金贡献自己的一份，是一项公民义务。它不是一种惩罚。政府不是因为公民拥有房屋、香烟和乘坐火车而惩罚他。政府是按照这些情形所规定的标准对它们征税。

所得税同样如此。它不是对拥有赚到的利润的惩罚。它的理念是，收入较高的人比收入较低的人有更高天赋或更大支付能力。（不需要探究这种征税的能力原则是否健全，它是否还没有到必须证明它自己的荒唐的地步。）但是，合作社成员却始终带有一种先人之见：商人所挣到的私人利润是必须予以消灭的罪恶，因而他们把所得税视为对“获利者”收取的一种罚款。在他们看来，所得税是冲刷追逐利润的企业、给予合作社成员所追求的那种目标的法律工具，这个目标就是，在供应消费者所需要的所有商品和服务时享有排他性垄断，并控制生产这些商品的工厂。

合作社这种论点的实质是这样一种理念：以超出所付出之成本的价格出售一件商品是不公平的，应当予以惩罚，至少没收一部分剩余。然而，如果这种论点是正确的，那它在适用股份公司所赚利润的同时也应当同样适用于合作社所赚的利润。

我们详尽地评论一下合作社提出的支持其税收特权的种种论据：

1. 合作社与其成员之间的交易不是销售和购买。合作社的主要代言人——美国合作社联盟名誉主席詹姆斯·彼得·瓦巴舍（**James Peter Warbasse**）先生说，这种过程是“简单的。一群人把一定数额的钱汇集到一起，他们用它购买货物，放到他们零售商店的货架上。他们拥有这些货物，因而不可能是自己向自己出售。若一位成员需要其中一些，他就走到商店，拿走比如说一罐碗豆。这罐碗豆本来

就是他的他已经为其付过钱了。”<sup>[20]</sup>然而，这种说法从头到尾都是不适当的、误导性的。

瓦巴舍先生所说的那一群人不只是把一定数额的钱汇集到一起。他们还建立了一个社团，按照他们自己州的特定制成法的规定组织起来。他们之所以在充分地考虑了法律之后以这种方式有目的地活动，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个社团能够被法律和法院承认为一个法律实体，只以法人的名义起诉及应诉，而个体成员不对社团的债务承担责任。其结果是，并不是这些成员“拥有这些货物，因而不可能自己向自己出售”。这些货物是由该社团拥有的，而不由个体成员拥有。假如一位成员想以法律上正确的方式获得它们——而不是通过盗窃或挪用——那他就必须从该社团那里购买。他绝不能“从货架上拿走它们”。在这一点上，股份公司跟合作社没有任何区别。合作社的成员没有权利从合作商店的货架上拿走一罐碗豆，同样，百货商店的股东也没有权利从该商店的货架上拿走东西。

这不只是一个法律的技术性细枝末节而已。合作社的生命就在于，它被法律视为一个人，它的资产和责任有别于其成员的资产和责任。假如抛弃了这一原则，整个合作社企业体系就会立刻瓦解。

2.即使人们承认上面那个错误的论点：合作社在向其成员出售东西时实际不是在销售，那这也不适合于合作社经常向非成员出售的情形。从事各种批发与零售交易，从事出口贸易，承接政府合同的社团，却诉诸这样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实在荒谬。

3.以超出总成本之上的价格出售而获得的毛利润之使用，可以归入下列三个用途：

- a.一部分拨备为折旧基金，用来更换已经损耗的设备；
- b.一部分重新注入业务中，作为新增资本，或者投资于现有机构，或者用于其附属机构。
- c.一部分从业务中退出，到那些有权利的人手里：私人企业的所有者，股份公司的股东，及合作社的成员。

b 和 c 部分从法律的角度看也是净利润。那些声称“光顾返还金”不是利润的合作社鼓吹者只涉及 c 部分。但 b 部分绝非不重要。它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创利的主要社会与历史功能就是积累新增资本。

利润再投资和利润投资于新企业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正是这种利润提供给超级合作社，尤其是其生产和交通企业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股本。

4.对合作社据以管理自己的经营活动的原则和方法及它们用于簿记和会计的规则进行详尽考察，也会清晰地揭示出，它们——跟其他类型的经营性企业一样——也是由创造剩余、避免亏损的强烈愿望所指引的。它们不愿容许使用“利润”一词来谈论他们的事务，纯粹是咬文嚼字，而没有实质性基础。

我们来考察一下美国合作社联盟的一份官方文件，标题是《了解联盟》<sup>[21]</sup>。在这里，作者自愿承认，“我们”，即合作社，“是赚钱的业务。”他们说，因而，很多合作社成员都问了一个私人商人问过的同样的问题，即“我们是赚了还是赔了？”私营商人把向我们汇报的报表称为“赢亏报表”。但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却不喜欢这种说法。他们说，合作社会计和合作社成员应当避免使用“赢亏报表”，相反，要么说“收支报表”，要么说“运营报表”。<sup>[22]</sup>

这纯粹是文字游戏。这些作者甚至没有费心证明，这种不大中听的“所得”——他们希望让其躲开税收——不是收入或利润。他们所做的不过是给这些钱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假如“赢亏报表”的名字变成“运营报表”就足以逃避所得税，那所有私人企业和股份公司也都会这样做。

合作社联盟建议用“折扣”、“光顾红利”或“购买返还金”等词替换“储蓄回报”，也同样是文字游戏。<sup>[23]</sup>

5.合作社不承认，它们享受着税收减免，因而相对于追求利润的企业享有特权。它们说，它们的税收减免不是一种特权，因为，私营商人也可以轻松地享有同样的自由。如果像合作社所说的那样，把成本价与销售价之间的差价返还给顾客，那问题就解决了。<sup>[24]</sup>显然，这种推理并不适用于没有分配而是再投资的那部分合作社利润。它也不适用于向非社员销售及从以前对设备的投资而获得的那部分利润。不谈这些琐碎问题，人们也必然注意到，对合作社和对商店或加油站的私人所有者来说，成本价的概念是不同的。对合作社来说，它包括了支付给合作社企业的官员和管理人员的薪水等支出。对于私人店主来说，它却不包括店主自己劳动的应得报酬。假如私人店主或加油站主也得把成本价与销售价之间的差价返还给顾客，

那他就根本没有收入了。他就是在无偿劳动，而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却可以得到报酬。

### （三）合作社如何浪费资本和劳动

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优越之处在于，它不断趋向于将生产手段转移到那些以最经济的方式最大可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手里。它趋向于清除低效率的生产者，将生产管理的控制权交给最有效率者。要理解市场的这种功能的含义，就有必要认识到，假如在使用生产要素或者人的劳动时，不能使其带来它们被合适地管理时所能得到的最高产出，则每个人的物质福利都将受到损害。与更经济的经营方法相反，不经济的方法会导致总产出受到限制。这会让整个国民及其成员都变穷。

在不存在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的情况下，在给定条件下，一家企业所需要的资本与劳动量若超出其所必需者，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为它的经营成本较高，所以，它最终会被效率较高者所淘汰。只有最有效率的企业能维持存活下来。

然而，一旦政府通过补贴、廉价信贷或税收减免等措施进行干预，事态就完全变了。如果效率较低的店铺 A 豁免了一种税，而它的一位更有效率的竞争对手 B 却必须交这种税，那 A 与 B 竞争的力量就得到加强。A 严格意义上的经营成本（即不包括税的经营成本）仍然高于 B。但严格意义上的经营成本的这种差距，必然会被 A 从税收减免中所得到的优势所抵消。尽管 A 的经营活动存在浪费，尽管它占用了一定数量的资本与劳动——这些资本与劳动在不减少公众所能得到的服务的情况下本来还可以用于满足其他需要，但现在，由于 A 的浪费这些需要不可能得到满足了；即便如此，他的店铺依然能够继续营业。政府保护 A 使其不必承担自己低效率的后果。

因而，A 的税收减免不只是一件只关乎它和 B 而不会对所有其他人利益产生影响的事情。政府通过仅对 B 征税而不是平等在 A 和 B 之间分配税，不仅打乱了 AB 之间的相互竞争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其主要社会与经济后果是以牺牲低成本单位为代价维持了高成本单位，让那种十分无益而且显然有害的浪费稀缺生产要素的行为得以维持下去。

政府为了使之能与 B 竞争而给予纵容的 A 就是合作社，它们因



其身份而获得政府的税收减免及其他照顾。不管合作主义的支持者用什么样的形而上学论据来证明这种税收减免的正当性，都是无用的。简单的事实就是：为了让合作社能够经受得住私人企业的竞争，政府进行了干预，而如果合作社没有得到这个帮手，它们肯定不可能维持下去。

合作社观念的创始人和第一批合作社的创建者相信一个错误的信念：合作社可以以低于私人企业的价格服务公众。然而，一个世纪的合作社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这种想法是完全虚幻的。合作社经受不住考验。在其繁荣的地方，即使它们真的繁荣，其存在也得归功于政府给予的各种特权，尤其是税收减免和廉价政府信贷。

这种特权对合作社越来越重要，对国民的整个产业活动和经济福利越是有害，而合作社越是积极地参与生产活动。

在不受妨碍的市场经济中，存在一个趋势，可用于实施新项目的资本只投资于那些提供了最好预期——它们将避免浪费和低效率——的企业。但给予合作社的照顾却阻挡了这些趋势。政府一方面对私人企业征收沉重税收，对股份公司征收双倍的税，另一方面，让合作社不交一分钱。这让合作社的工厂表现出虚幻的效率，让它们有机会积聚剩余。合作主义的鼓吹者吹嘘说，今天，在美国，工厂主跑到合作社，提出出售他们的工厂，银行也到合作社告诉它们，哪儿有一家可以廉价收购的工厂，它愿意为收购提供贷款。<sup>[25]</sup>然而，这样的表示，并不像合作主义的鼓吹者所想的那样，证明了生产的合作社模式的优越性。这只是表明了，那些由于生产成本较高而注定了无法在自由市场上存活下去的工厂，一旦合作社给予它们以丰厚的特权，就可以存活下去。

联邦和州政府的税制都抑制着股份公司、私人企业 and 个人的资本积累，却鼓励合作社的资本积累。合作社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巨大潜力。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工厂是免费的。”<sup>[26]</sup>他们最出名的代言人在报告一家消费者合作社的一桩交易时说，“对于合作社成员来说，这是一桩好生意，因为他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成了一家制造业企业的所有者。”<sup>[27]</sup>世上本来没有可以无偿获得的东西。但合作社成员确实“自己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了这家制造厂。之所以会这样，仅仅是因为，政府强迫其他人为合作社的利益做出了牺牲。它为了去除合作社的税收负担，强迫着其他人交纳了更多的税。合作社通过以税收减免形式获得的补贴，获得了这家工



厂。

合作社在进行扩张时也悄悄地扩张着它们的特权。而它们把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功于“他们不用赚取利润”这一事实<sup>[28]</sup>。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详尽考察隐含在这一利润问题中的所有问题。我们只从纯粹实用的角度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合作主义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物的推理的根本出发点是：零售商和销售商，这些无益的中间人，提高了商品的价格，因为他们渴望赚取利润。合作社消灭了利润，所以，能够以低于追逐利润的私人企业的价格出售商品。由于人人都希望在价钱最低的市场上买东西，所以，合作社的发展很快就会取代私人零售商。

历史经验已经完全驳倒了这种学说。合作社根本经不住追逐利润的私人企业的竞争。假如没有享受政府给予的诸多特权，它们早就完全消失了。

尽管享有这些特权，合作社在零售领域也并没有占有多大份额，这一事实本身也证明了合作社内在的低效率。

合作主义者争论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热衷于对利润、储蓄、赢利、剩余、成本等等概念进行精细剖析，从而避开对根本问题的讨论。在自由国家，比如美国，购买东西的绝大多数公众都喜欢光顾私人企业，而不是合作社。合作社总是坚持说，它们把成本价与销售价之间的差价，以光顾红利方式返还给了其顾客，而私人企业却保留了这一差价作为利润。然而，在私人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之间进行选择的明智的顾客除了考虑商品价格和销售商提供的进一步服务之外，肯定也考虑到了合同的所有条款、商品的质量；在考虑到合作社购物时，他们也必然会考虑到预期可以获得的光顾红利。但事实却是，在美国，在对比了私人商店与合作商店之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顾客的决定是青睐私人企业。美国人的购物行为证明了下面的事实：尽管合作社有光顾返还金，但人们在私人商店购物，或者物美，或者价廉，或者物美又价廉。这就证明了，私人企业的利润并不是因为向顾客多要钱而获得的。它是企业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好于也廉价于“利他的”合作社的服务而挣到的。合作社根本没有理由吹嘘自己的光顾红利。私人零售商给顾客的更多，或者表现为更好的商品，或者表现为更低的价格或其他服务。

#### 〔四〕制造业及其他生产性企业的合作业务

上文已提及，合作社和各种合作社协会在制造业与其他生产、运输活动领域大举扩张，是下述事实的产物：合作社的税收特权越来越值钱，不享有税收减免的群体的税收负担越来越沉 Mo

由合作社或合作社协会所拥有和经营的生产性工厂与股份公司或追逐利润的私人企业拥有、经营的生产性工厂的差异是双重的：

- 1.前者的管理效率低于后者。
- 2.前者在税收和信贷领域享有特权，而后者则没有。

那些准备质疑第一点的人士恐怕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些享有特权的企业的竞争没有完全清除不享有特权的竞争对手？一位著名专家，前农业信贷管理局局长布莱克（A. G. Black）先生在第二次大战前宣称，“由于税收吸收了私人企业的大量赢利，所以，合作社形态的企业确实获得了巨大的优势。”<sup>〔29〕</sup>但这一巨大优势与合作社官僚机构管理过程的低效率相抵消，而完全不存在了。这些优势没有一点被消费者享有，因为，消费者肯定十分关心的产品或服务质量，是合作社不可能以低于不享有税收减免的私人企业的较低净价格（这是指价格减去惠顾红利）提供的。合作社工厂所雇用的工人也不可能获得高于别处工人的报酬。

国库则因为向合作社的生产活动授予税收特权，而丧失了一笔本来可以得到的财政收入，如果这些工厂由股份公司所有或者没有向合作社授予特权，是可以得到一笔财政收入的。公共开支必然相应地减少。预算补助本来可以带来的一些好处必然会丧失。谁能从中获益？答案是：无人受益。财政收入的那笔损失就被不称职、疏忽和笨拙而浪费了。

若事情不是这样，则合作社要么会以与其他企业相同的价格出售商品，而获得大量利润，要么以较低价格出售，则会击败所有竞争对手。不论哪种情形，它们也早就已经达到了其心目中合作社运动的终极目标，即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合作社在自己的工厂中生产它们的成员所需要的所有东西。但它们远没有如此成功，仅这一事实就证明了，合作主义自身内部就存在着某种因素，它阻碍合作社的发展，尽管它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扶持。我们不禁要把这种因素称为经济劣势。

##### 〔五〕政府的偏爱怎样伤害了合作社

政府的偏爱对被偏爱者的损害，一点也不小于对为这些偏爱付出代价的企业。这种偏爱腐蚀受庇护者，使其弱不禁风。

合作社主要指望政治庇护，所以经常忽略了任命较有效率的官员、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进行经营管理，而偏爱那些精通政治事务、宣传、院外游说、受政客和官僚欢迎的人。美国合作主义者对欧洲大陆国家盛加称赞，将其树立为自己活动的样板，而在那里，合作社完全依附于各个政党。每个最重要的政党，尤其是社会党、天主教社会党、非天主教的基督教政党、各个民族主义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合作社体系，它们与政治领袖有密切联系。

私人企业希望通过提高其产品质量、降低价格获得成功。为了让它所要销售的商品广为人知，它会去作广告。追逐利润的商家的广告活动以实现客户自己的成就和未来的消费者可以从中得到的好处为目的。它从来不贬损竞争者。合作社的宣传却难以在合作社自己的业绩中找到足够值得赞扬的东西。它的主调是诋毁私人企业，它暗示说，私人企业的利润是通过欺骗顾客挣到的。

私人商户如果对自己的店铺赢利不满意，会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但合作社的工作如果不那么让人满意，负责官员和管理者的第一个想法不是对经营活动进行恰当改革。它们可以很轻松地争取更多税收减免，争取更多廉价政府信贷。

合作社为进行宣传而出版的无数书籍、小册子和期刊热衷于宣传合作主义政治，因而它们从来没有提出一个问题，而如果不彻底推翻合作社运动的基本教条，就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它们从来没有问过：合作主义的创始人假定，消灭了利润就能够以低于追逐利润的企业的价格向消费者供应商品，这种看法究竟是否正确？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不可能解释，私人企业——哪怕不考虑授予合作社的所有特权——何以能够与合作社进行竞争？严肃而诚实地讨论合作主义的著作应当研究的惟一问题是，美国城市人口聚居区的消费者合作社的这种引人注目的失败。这种失败是如何发生的，尽管私人企业必须交纳各种税，而合作社却享有诸多特权？

合作主义的鼓吹者以恶毒的、侮辱性语言对待所有不同于他们

看法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充分地回避回答这一问题找到了借口。支持合作主义的文献在其辩论中所使用的肮脏的措辞是完全误导人的。但它们诉诸如此丑恶措辞的做法本身恰恰证明了，它们充分意识到了自己没有能力反驳经济学家提出的反对意见。

向人们的眼里掺沙子，大谈合作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成功，是没有用的。冰岛按其人口比例是“世界上合作化程度最高的国家”<sup>[30]</sup>，这一事实并不能压倒下面的事实：美国这个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就消费者合作社而言，却是合作化程度最低的。合作主义在东欧国家的扩张，在自由国家公民的眼里，当然没有多大意义。

合作社文献完全缺乏自我批评和现实地对待事实的精神。其中充满了妄想、自负和自我吹嘘。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早已被一再驳斥过的古老的谬误，而从来没有严肃地去思考过任何新观念。因而，它真实地反映了一场完全依靠政客的慷慨偏袒才获得发展的运动的思想之贫乏。

### 结语

合作社运动完全基于十分流行但完全错误的观念：利润是商人对其顾客征收的一笔不公平的费用；它也基于以下论点：商人不当索取高于商品成本的价格。合作社就是作为全面废除高价销售的恶劣做法的工具而设计出来的。

合作性社团一百年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证明了：合作社没有能力在自由市场上碰运气。仅靠自己的努力它们维持不了生存。至少不能否认，人们还没有看到过合作社不靠政府照顾而经受住私人企业竞争的事情。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和目前的扩张，不管到何种水平，都要归功于税收减免，廉价的政府信贷及其他特权。合作社运动的代言人充满激情地断言，取消这些特权就等于压迫合作社，这等于公开承认，他们自己也认为，这些特权对于合作社运动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本身不是目的。它的存在和运转是为了公众受益。经营企业的惟一理据是，有足够数量的人自愿地光顾它那里。假如人们不光顾一家自愿开办的商店，而仅仅因为成员们希望分享政府各种照顾政策的好处，就用公共财政收入扶持它，并让它生存下去，那当然不是政府的任务。一家经营性机构，如果其生存要靠政府照顾而

不是靠购物的公众的自愿支持，那它就是寄生性的。维持它，会导致劳动和生产的物质要素的浪费，会减少可用于消费的物品总量，从公众福利的角度看，这是有害的。

合作社类型的商业组织只有在放弃了它今天享有的特权后，才有可能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只有在合作社有能力不靠税收减免、廉价政府信贷及其他照顾错误地维持自己的生存，合作主义才能被视为自由社会中一种做生意的正当方式。<sup>〔31〕</sup>

## 第十九章 当前经济学方法与政策之观察



如果盛行的政治趋势和倾向没有迅速发生急剧的变化，政府对人类活动的全面控制制度在几年内将会在铁幕这一边的所有国家内获胜。

今天所有这些并不公开接受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全部教义的政客和政治家们认为，政府的责任在于，当发现市场的运行出现了政府眼里不合“社会”所欲之结果的时候，就对其进行干涉。这意味着：个人在从事生产活动与在市场中购买和销售时，是自由的，只要他们完全按照政府的指令去做；但他们不允许偏离当局批准的轨道。这一全能政府的信条，当然，今天并未被完全采纳。政府尚未取得控制价格与工资率的正式权力。但是，对实施这种权力的抵制，却越来越微弱。美国政府在努力继续其通货膨胀政策，持续使国家面临全面控制价格与工资的威胁时，只能听到微弱的反对声。

赞同维护市场经济的人被为“极端主义者”，他们的观点被视为不值一驳。甚至少数民族也加入到全能政府的狂热队伍中来，尽管这一制度将会剥夺他们惟一克服多数人仇视的机会——他们可以给公众、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几乎一切的教育机构，都小心地避免使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微妙的词汇，都在宣传全面计划和“为使用进行的生产”。

人们，首先是年青人，崇尚自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

代人向往“计划”，向往家长式独裁者通过命令管辖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及休闲。

## 二

生产的惟一目的是满足需求，即消费。市场经济的卓越之处在于所有的生产活动最终都是由消费者决定的。人作为消费者是至高无上的。作为生产者，他必须受制于消费者的愿望。

通过购买和取消购买的行为，消费者决定着所有在通称为经济事务领域内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行为最终决定着每个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他们将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给那些成功地将自己引入最好地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求的雇佣关系之中的人。在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中，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只能通过更好地、更便宜地服务于消费者而获取或维持。这种所有权是一种公共委任，只有在所有者能以最佳方式使用该财产而服务于消费者利益之时，才会被授予。资本主义绝无可能在更好更便宜地服务于公众方面一劳永逸。如果他觉得他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必须挑选足够的帮手或将其资金借予这些人。因而，市场经济体制中就形成了一种机制，它是一种无情的力量，它迫使所有物质要素的所有者，将这些要素投资于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消费者的生产线中。

同样地，消费者决定着那些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的工资和薪金水平。雇主必须要向每个帮手支付消费者准备为该工人对该产品所作贡献相应的全部价格。他不可能支付得更多，因为那样的话，雇用工人就会蒙受损失；但他也不可能支付得太少，因为那样的话，他的竞争对手将会吸引那些找工作的人离开他的工厂。让受欢迎的演员、运动员获得高收，让清洁工人和女佣只能得到低收入的，不是雇佣者的评估，而是消费者的评估。

这一制度造福于所有民族和每一国家中之所有人，这一点已被它所带来之人口数量的空前提高这一事实给予精彩的证明。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诉诸暴力行动的政府和压力集团尚未完全成功地阻碍市场的正常运转，工业就可以向大众提供过去那些最富裕的君主和贵族甚至做梦都想不到的种种便利设施。

假如我们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与所谓的欠发达国家进行一番比较，我们就不得不得承认 19 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之正确性。

与左翼煽动家的胡思乱想和革命幻觉相反，经济学家相信，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改进全体人口的状况，即加速资本的积累，使其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使全体人民更为繁荣富裕的惟一方法是提高劳动的生产率，也即提高每小时的产量，而只有通过将更多、更好的工具和机器交给工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在人们通常所说欠发达国家所缺乏的正是储蓄与资本积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资本投资。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基本原理的话，那就看看所有落后国家是多么渴望为他们的工业搞到外国资本。

### 三

在研究支持和反对社会主义管理的时候，很不幸，人们忘了对普遍被认为属于非经济的因素给予足够重视。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人性的一面。

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于他的主动性（initiative）。一只动物的生命十分精确地遵循它所属的种的全体成员所特有的那种模式。让其偏离这样的模式的，只能是外部的力量，人的意志的干预。而人却能够在他所面临的多种行为方式中做出选择。他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环境做出反应的模式、他将自己整合进和平合作的社会体系中的模式。在自然为他划定的范围内，他是他自己的命运的创造者。除了和他的同伴同样的自由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限制他去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自由。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沉湎于种种残暴行径，自由与“国家”之活动并非对立，因为国家是对于不遵守规矩之个体或帮派诉诸的残忍暴力的行径予以暴力镇压的社会机构。相反，只有在和平合作的个体不受这样的压抑和扰乱的地方，自由才有存身之所。

由选举出来的官员所执掌之宪政政府——即代议制政府——乃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给予其公民以管理公共事物的尽可能多的权利，类似于他们作为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所享有之至高地位。这样的政府取代了封建时代的贵族王公统治，及一切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在西方文明国家，它与家庭、村庄、郡县、国家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格局之解体、与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之进化，同时发育成熟。它是市场经济的经济民主制度在政治上的逻辑结果，而任何时候，在建立了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取消了自由市场下人们的资源合作的任何地方，这样的政府就会让位于非独裁统治。



计划经济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严厉的控制制度。它的支持者们将计划经济称为一种社会工程，就隐含地承认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这种制度对待人——只有计划者自己除外——就仿佛工程师处理他们用以建造房屋、桥梁和机器的材料。对于个人来说，要么无条件地服从，要么进行绝望的反叛，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没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偏离计划指派给他的角色。从摇篮到坟墓，一个人的一切活动，还有他在休闲时间的一切行动，都由当局予以严密的规定。

这就是我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正在充满激情地渴望着的那种制度下的状况。曾经对于自由充满全副热情的那代人的孩子和孙子们，却为某种乌托邦的景象欣喜若狂，而在这样的乌托邦中，他们不过是他人手中的玩物而已。那些熟悉人类追求自由之漫长历史的人士，一定会对今天看到的景象留下奇怪的印象：老年人和年轻人、教授与文盲、艺术家与粗人，都在向往着“大哥”（big brother）的不受限制的统治。

知识分子和文盲民众的这种糊涂观念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于任何反面的经验都不能弱化他们的立场。西方国家获得的有关计划经济国家的真实状态的信息越多，那些渴望“阶级专政”队伍越来越壮大的人士越是充满幻想。

## 四

从用来描述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几乎所有术语的含义的变化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那种已经埋葬了自由的理想、并对“计划”无条件地服从和赞美有加的激进变化。

在 19 世纪，自由主义者〔从“自由”衍生出来的〕一词指这样一些人：他们追求代议制政府，追求法治而非人治，希望将政府权力限制于维护人们之间和平及免受国家任何帮派或外敌之攻击的范围内。今天，在美国，自由主义却是指，鼓吹政府在国内政策中全面控制人的活动，而在对外政策中则同情旨在建立左翼政府的一切革命。没有保留下一个用来指那些赞成维护市场经济和生产资料之私人所有权制度的人士。这些“反动分子”已经被认为不值得有一个党派称呼了。

在 19 世纪欧洲的某些国会的议院中，鼓吹人民进行治理、鼓吹完整的公民自由的党，坐在议长的左侧。于是，人们就用左派来指他们，用右派来指他们的政敌，即鼓吹专制政府的人。而在今天的美国，这些词的含义都掉了个个儿。鼓吹“阶级专政”的人，现在被称为左派，而鼓吹宪政政府和公民自由的人被称为右派。根据这样的术语，不仅曾经在 1918 年 1 月 6 日用军事力量驱散议会的俄国革命党人被称为左派，就连这之前曾经无情地对待议会的克伦威尔和两位拿破仑，也都成了左派。而曾经在一本最著名的小册子中激烈地抨击波拿巴以这种手法镇压反对派的马克思<sup>[1]</sup>，反倒完全可以被称为“极右”。

事实是，任何全权计划制度都是与公民自由和代议制或宪政政府之继续不相容的。代议制政府和公民自由是自由市场在政体或政治上的必然结论。任何语义学的狡辩，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20 世纪的左翼运动并不是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的延续，而是对它的极端的反动。全权国家是各个时代的一切暴君的理念之集大成者。

## 五

一个人在说话与写作时选择使用的词，可以在不经意间透露某些他准备直接表达的想法。

“革命”这个名词最初是指某种循环重新的变动，后来被用来指某种转变。但自美国及法国革命以后，它就首先是指暴力、内战、反抗当权者的战争。阿诺德·汤因比在其题为《工业革命》（首版于 1884 年）的书中，对英国现代工业化的发展过程进行了一番充满偏见的描述，他于不经意间暴露了，他把历史解释为连续不断的暴力冲突、谋杀与毁灭。

同样的倾向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用“市场的征服”一词来描述浪漫国民（Ruritanian）商人能够成功地在幻想国（Laputania）售出他们的货品这一事实。

我们可以找到更多例子。不过，提一下下面一个就够了：美国的“反贫困战”。减少贫困、向人们供应充裕的消费品的惟一办法是生产更多、更好、更廉价的消费品。这正是追逐利润的企业所追求并实现的目标，只要储蓄能够提供充足的资本。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所能做的不过是保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不受暴力或欺诈活动的侵

害。减少贫困不是从保罗那里拿走一些东西然后给彼特，而是通过生产更多、更好、更廉价的东西，从而使得每个人都更容易得到这些商品。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适合用“战争”一词来容易。一个每年花费纳税人几十亿美元，从而使基本食品、棉布等种种商品价格飞涨的政府体系，丝毫无助于推进所谓的反贫困战争。

## 六

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与其祖父辈的精神状态截然区别的正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政府的关系。对于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和政府只是能够给予人们以和平地生活和工作的机会的机构。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物质福利的发展，人的道德、知识与艺术天分的培育，都是个人的事情。

公民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他们也必须纳税以支付国家机构的花费。在他们的家庭账目中，国家算一个开支项目。而今天，个人却把国家看成一大收入来源。他跟自己的同伙组成一个压力团体，希望从政府手中得到物质资助。他确信，国家的资金是取之不尽的，可以像羊毛一样从富有的羊身上不断地剪。

公民靠纳税支撑的国家才能是民主的，而国民能够搞到补贴的国家则不可能再是民主的。人民如果为获取政府资金而彼此争夺不已，则必然会卑躬屈膝地服从于那些承诺给他们最多资金的独裁者。

那些渴望获得政府资金的民众不明白，他们自己要为政府给予他们的“礼物”买单。圣诞节老人式国家的资金的主要来源就是通货膨胀，而这将使他们的储蓄化为乌有。尽管在通货膨胀期间，投资于房地产和股市的投资者可以从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不断下降中受益，但主要由储蓄、债券和保险单构成的财富更少的阶层的投资却会逐渐缩水。但通货膨胀措施却在工人阶级——相比于其他阶层而言他们正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中获得广泛的支持，这一点清楚地显示了他们没有能力看清他们的真正利益到底是什么。<sup>[2]</sup>

## 第 五 部 分

# 思 想

## 第二十章 学说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

### 一、思想与行为

较早期的历史学家几乎只研究国王与战士的行为与功业。他们只是略为注意或根本就没注意社会与经济状况中缓慢发生作用的变化。他们未曾为学说、信条、心态的演变费过心。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甚至连基督教的扩张这样前所未有的事件都几乎没有提及。

大约一百二十年以前，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出现了。文化史研究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研究技术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研究生活方式的变更、风俗与习惯的转变。这些研究必定导致发现指导人类行为的思想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说、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历史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占据人类精神领域的思想体系之变化。习惯与制度是心智的产物。

作为动物，人能够自己调整以适应地球上的自然环境或其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但是，这种调整是头脑运作的结果。对历史所作的地理学解释没有认识到这决定性的一点。环境只能通过人类头脑发生作用。印第安土著居民即便库轮子或马车也未能发明，但白人殖民者在同样的土地上却发展出了现代的美国文明。在斯堪的纳维亚和阿尔卑斯山两地，自然条件都使得滑雪成为一项非常有用的运输方式，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发明了滑雪橇，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居民没有做到这一点。数百年来，甚至在数千年间，在漫长的冬季，阿尔卑斯山的农民被困在山上的房子里，充满渴望地凝视着山谷中无法到达的村庄和邻舍。但是，这种愿望并没有触发他们的创造精

神。大约四五十年前，市镇居民将滑雪作为一种户外运动引入山区，当地人却报之以看待滑稽玩具的讥笑。只到很久以后，他们才认识到，这些“玩具”对他们是多么有用。

并不比这种自然环境理论更有用的，是由 19 世纪形形色色的社会学家所发展的普遍环境理论。任何一个人受其生活与工作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条件之影响。但是，这些制度和条件本身已经就是支配其前人行为的信条之产物。它们本身就需要被解释，诉诸于它们并不可替代解释。在研究艺术史时，泰纳正确地提及了艺术家与诗人取得其成就所处的环境。但是，通史（**general history**）必须走得更远；它不能只是将环境状态认为是不能更进一步追溯过去的的数据。

我们并不想否认：人类心智受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说到“我们必须将人类思维作为人类行动的最终源泉”时，我们并不是想说：心智是某种不可分割的东西，或是某种无所超越其上的终极事物，或是某种不受物质界约束的事物。我们不必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只是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当前的知识状态没能让我们认识到人的精神对外部事物如何反应。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候，对于同样的刺激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为什么有些人在神像前屈膝而另外一些人宁死也不愿崇拜偶像？为什么亨利四世改变宗教信仰以求统治法国，而他的后代尚博尔堡的亨利（**Henry of Chambord**）却拒绝用三色旗取代白旗，尽管他知道会因此而失去王位？除控制人类行为的思想之外，别无解释。技术状态和生产力，与其说是决定心智状态的因素之一，不如说是心智起作用的结果。人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合生活于斯的自然环境，这种调整是由思想来实现的。非洲黑人为何未发现某些方法以战胜威胁其生命与健康的细菌，而欧洲学者却发现有效的方法来对付这些疾病？唯物主义根本就不能满意地回答这样的问题。

## 二、学说的社会作用

科学不能为我们提供对万事万物的全面解释。知识的任何一个分支，都不得不停步于某些特定的事实，而将这些事实视为一至少在目前，或许永远——终极的且无法超越的。这些终极事实只能诉诸于我们的经验，而不能追溯到其他的事实或力量，它们是不可解释的。我们以电或生命之类的名字来称谓它们，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知道电或生命究竟是什么，尽管我们知道水或雷鸣为何物。

独特性（individuality）就是历史学中的一个这样的终点。每一次历史研究，或迟或早地到达除诉诸于独特性之外就无从解释的某一点。

我们充分认识到一个事实：每个人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是其过去的产物。人在出生之时，与生俱来的天性是其祖先的历史、命运与兴衰三者之积淀。我们称之为他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或其种族特征。在其一生中，个人稳定地受到其环境的影响，包括自然与社会环境。但是，我们不能解释所有这些因素如何对他的思想发生作用。总有某些事物我们不能更进一步地分析。我们不能解释笛卡尔为什么成为一名伟大的哲学家，而阿尔·卡蓬（Al Capone）却成了一名恶棍。我们的最后一句是：独特性，个体是无法言传的。

研究学说及其起源、发展、逻辑含义和它在社会中的功用时，我们不想承认它们是终极事实。学说本无自己的生命，它们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它们只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或许可以假定：它们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有理由将之排除在因果律之外。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人创造或产生思想与精神的方式，我们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

我们或许可以假定：有些学说的应用有利于人生的奋斗，而另外一些学说则是有害的。一些学说增进了社会合作，一些毁灭性的思想导致社会的解体。但是，我们无从获得权利来相信，因为毁灭性思想的有害后果，它们就必定会失去其号召力。理性需要实现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功能：它是人在适应自然环境时最重要的工具。但是，相信生物在生存斗争中总是胜利，却是错误的。一些动植物物种灭绝了，因为它们未能调适自己。一些种族和国家消逝了，某些社会和文明则分崩离析。自然并不能阻止人的思索引起偏见的观念，也不能阻止人创建有害的学说。某一学说被付诸实施，以及这一学说成功地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这种事实不能证明该学说不是破坏性的。某种学说或许是现代的、时髦的、受到普遍接受的，但对于人类社会、文明与人类延续来说，却仍然是有害的。

我们必须研究学说的历史，因为，只有它们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变化的线索。

### 三、经验与社会学说

在自然科学领域，特别在物理学领域，我们有运用实验方法的机会。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将不同的变化情形分离出来，观察这些情形的变化。每一个论断都能用实验的结果证实或推翻。

在人的行为科学领域，我们无法借助于实验的方法，也不能进行实验。我们从来不能享有保持其他所有因素不变而观察惟一个因素发生作用的便利。因此，经验不能证实或驳倒我们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断和理论。

未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从来没有发展到文明的某个略高的阶段，这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没有人乐意主张，私有产权是文明之必要和必不可少的前提。社会的和经济的经验对我们了无教益。事实须由我们的理论加以解释；它们可以任意解释或用以得出任何结论。对于历史事实的意义之讨论，很快就退回到对演绎理论的分析，对这些理论的细察，根本就用到经验。这些理论有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它们先于历史经验，我们只有借助于它们，才能掌握这一经验的意义。

这些理论或学说，不管是否正确，也不管对于生存是有利还是有害，不仅指引的行为，它们同时还是我们用来思考其在历史上作用的思维工具。除了借助于我们的理论和学说予以揭示之外，我们无法观察社会事实。同一组历史事件组合，依我们观察的立场之不同而会显示出不同的方面来。

某些非常流行的观点对这些目标做出了严重的错误的判断。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认为，社会事实能以物理学确立物理事实的方式得以确立。（我们不必详察一些最新发现的意义，这些发现让我们看到，即使物理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观察的结果依观察方式不同而不同。对路易斯·德布罗伊、沃纳·海森堡和其他当代科学家的贡献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他们认为，事实独立于观察者的思想，社会经验在逻辑上和时间上先于理论。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行动，也就是我们通过它从一系列事情引发某些事件并认为这些事件是确定事实的行动，必定是由我们理论上的洞见所指引的，或像某些人愿意讲的那样，由我们学说上的偏见所指引的。为什么我们认为美国的国际收支余额是一桩事实而不曾对马里兰州或波士顿市或曼哈顿区的收支余额给予任何关注？为什么我们在研究德国的货币问题时，要考虑德国的国际收支余额？因为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受到非常明确的（同时，正如我不得不指出的，是



错误的) 货币理论所指引。

当统计学家认为, 他们研究的对象仅仅是纯粹的事实时, 他们实际上是错误的。当统计学家的理论推断让他假定, 在不同系列的数字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 他就试图发现其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论上的假定, 他就根本不会注意到明显的相关性, 尽管当他的先入为主的理论假定有某种相关性时, 他能很快证明这种相关性确实存在。杰文斯认为, 他成功地证明了, 在经济危机和太阳黑子之间存在关系。另一方面, 没有一位统计学家曾经注意到一个发现, 即鹤的数量和出生率的变化有关系。

在生活与现实中, 所有的事物都和其他的事物相互联系。历史就缠绕为一个结构中事件奔腾不息的川流。我们智力上的局限使我们无法通过一次感知就能从整体上领会这些事件。我们不得不从分离出细枝末节开始, 慢慢地前进到对更为复杂的问题之研究, 这样一步一步地分析这些事件。我们将某些变化从生活潮流之整体环境中剥离出来并将其视为行动, 这并不是现实的功能, 这是我们的头脑发挥作用的结果。在社会科学领域, 没有所谓的纯粹事实。我们所认为的事实, 总是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之结果。一个具有完美智慧的超人将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样的事物。20 世纪的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不同于柏拉图、圣托马斯或者笛卡尔。我们的事实不同于他们的事实, 一百年后的世人眼中的事实又会不同。

一个社会事实是由人类智力所感知的现实之片断构成。构成事实的不仅是现实, 还有观察者的心智。

被分离出来的某个数字或一系列数字毫无意义。分离出来的任何其他事实——例如, 布鲁图刺杀凯撒——也是如此。组合一堆关于分离事实的论断, 并不能深化我们的洞见, 也不能代替理论和哲学。相反, 结合不同事实的任何努力——不管是通过建立联系还是以其他方式——是我们的理论与学说的结果。在不同学说的背景下, 对理论没有达成一致的人看待同样事实的方式颇不一样。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 在自由主义者(这词原来的意义)和社会主义者看来, 是不同的, 对于自由思想家和天主教徒来说, 是不同的, 对于纳粹党人和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来说, 是不同的, 对于经济学家和这一铁幕的支持者来说, 也是不同的。对于美国新政、法国的崩溃、凡尔赛条约以及其他所有的历史事实而言, 莫不如此。当然, 各方都坚信: 惟有自己的解释, 才是合理的而且能解释事实的, 所

有其他的解释在根本上都是错误的，且由于错误的理论而带有偏见。但是，学说之间的冲突不能通过压制所有持不同看法的人而解决。成功地将本派观点定为合法而置其他所有观点于非法地位的一方，也无从改变其信条的特征。学说就是学说，即使它得到广泛接受且无可置辩。即使没有同时代的人挑战这一学说，它也可能是错误的。

为了拓宽我们在人的行为领域的知识面，我们必须一方面研究人类行动学与经济学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研究历史。但是，研究历史必须以研究思想与学说的发展为中心。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任何努力之第一步，必须是研究指引入实现这些变化的思想之变化。

### 四、学说与政治问题

政治家所要处理的问题，不是由自然或自然环境所决定的，而是由对理论信念的状态所决定的。

在 16 和 17 世纪，宗教似乎没有满意的解决方法。在那个年代，人们无从掌握这样的思想，即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和平共处于一个国家。美丽的国家遭到摧毁，血流成河，以达成宗教一致性为目的的战争毁灭了文明。今日，我们在宗教上没有看到任何问题。在大不列颠、美国以及其他的许多国家，天主教徒和种种信仰的新教徒没有磨擦地合作共事。问题业已解决，它随着关于文明政府的任务之学说的演变而消失了。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解决一个新问题，也就是操不同语言的群体在同一地区的共存。一百年前，这不是问题，现在，它在美国也不是一个有威胁的问题。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它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人仍然发现，认识到这也算一个问题是困难的，因为他们不熟悉使之成为一个问题的学说。

说这些导致冲突、战争和革命的重大政治事务只是明显的问题，这是不恰当的，也低估了这些问题。比起人类行为的其他问题，它们同样真实。它们是指引当今政治的思想与思考的完整体系之结果。简单的方法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某个时候，这些问题可能随着创造它们的思想的完整体系之消失而消逝。

我们必须将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来。人针对生活的自然条

件进行调整，是他研究自然之结果。神学家或形而上学者或许会声称：自然科学不足以解决世上的迷惑或回答生命的根本问题。但是，无人能够否认：自然科学成功地改善了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地球上今日的人口比数百年或数千年前多得多，各个文明国家的每一位公民都比其先辈生活得更为舒适，证明了科学的有用性。每一次成功的外科手术都与久经世故的抱怨者的怀疑论相抵触。

但是，科学研究及其在人类生活斗争中的应用，只能在社会中也就是人们通过劳动分工而合作的世界上实现。社会合作是理性和头脑的产物。可以认为它是上帝的恩赐，或自然现象，也就是说我们仅仅承认，思考能力是人的自然天赋。人通过恰当地运用其能力而创造了技术和社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技术能力和社会合作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相互联系。两者都是心智的产物。

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一件事：自然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实验方法可以发挥作用的范围内，自然科学可以得出无可辩驳的论断。自然科学通过试错而前进。实验室里安排的实验影响所希望的结果，机器向我们期望的方面行驶，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物理学知识体系的正确性。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不享有实验方法的便利。我们不得不再重复这一事实，因为其重要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当前的认识论与经济学完全忽视了这一事实。促进或瓦解社会合作的理论，只能通过纯粹的推理来予以证明或推翻，而不能借助于实验的简单考查。

这充分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学说的冲突似乎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当拉瓦锡用更令人信服的理论取代燃素论时，他首先遇到了旧观点的支持者的固有的反对。但是，一旦实验和新理论在技术实践中的应用证明了新理论，他所受到的反对很快就一劳永逸地消失了。却没有类似的试验可以用来验证休谟、李嘉图和门格尔在经济学上的伟大成就。

还有第二种重要差别。在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框架内，新想法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投入少量资源予以实施。因此，富尔顿和贝尔能够成功地实现他们的同代人所嘲笑的计划。但是，社会演变须由需要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措施来实现。自由主义者不能依靠几位朋友就实现自由贸易，和平也不能由热爱和平的一小群孤

立的人来确立。社会学说要发挥作用，民意的支持必不可少。如果社会要令人满意地运作，千百万的人民——尽管他们在作为火车乘客和电台听众时，可能对铁路的修建和营运以及无线电的工作原理一无所知——必须理解远为困难的社会合作的问题。因此，社会底层的芸芸大众，不愿思考与反思的群众，以及掌握复杂新思想时较为迟钝的人们，必须做出决断。他们对学说的信念，不管可能会多么肤浅和天真，决定了事件的进程。社会状态不是得到一小群知识精英支持的那些理论的结果，而是普罗大众认为合理的学说之结果。

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由于集团利益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人类合作的事业就没有希望了。如果因为得到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互相冲突，或如果因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对立，而导致不能达成全体一致，那么，人和人之间的持久和平与友好合作就无法建立。那么，要求和平的文明之当前状态就不能得以维系，人类就注定要毁灭。那么，认为战争是惟一正常、自然和令人神往的人类交往形态的纳粹党人就是正确的。那么，不与对手争论而干脆消灭他们就是正确的。那么，西方文明就一无是处，只是无耻的谎言，而其成就则如维尔纳·桑巴特所言，是魔鬼的得意之作。

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问题是社会学说状态的结果。我们要考察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存在一种社会组织之状态，从每个人的正当利益出发，都会认为该状态是满意的。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必须看到，今日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解体之前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必须研究，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一直在制造冲突，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本来是可以想象存在另一种结局的。

无论如何，这样的冲突是学说冲突的结果。即使那些相信冲突是利益的真正和必然的对抗之不可避免的结果的人，也没有否认，要指引人的行为，这些真正的对抗须由理性来认知。仅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利益之所在以及需要做什么以改善自己的福祉时，他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同意，某种思想状态能够并且确实曾经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状态中，阶级、国家和个人未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真正利益而坚持对其利益有害的学说。尽管他们一再重复断言，生命以某种神秘的过程创造了正确的思想，他们赞扬他们伟大的同胞发现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但他们也承认，某些人想到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想法，他们还认为，为了使人民沉浸

在与其生存相适合的学说中，宣传是必要的。因此，他们也承认，是学说而不是事实本身造成了冲突。

还有另一种广泛流传的谬论。根据这一谬论，人天生或因环境而倾向于某种特定的哲学。不同哲学的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有一致意见；他们的观点永远也不能调和，从来也不能达到一致。如果他们是正确的，这将会使得社会和社会合作成为泡影。但前述谬论是不成立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将人民按党派路线分裂，但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追求同样的东西。他们希望保护自己以及家属的生命免受伤害，他们期望增进自己的福利。他们互相争斗，不是因为他们的想达到不同的目标，恰恰相反，而是为了追求同样的目的——他们认为，另一个人得到的满足阻碍了自己状况的改善。一度有禁欲者真诚而全心全意地谴责任何世俗的雄心而知足于如鱼得水的生活。我们不必详究这样的事例，因为这些罕见的圣徒当然不必费心谋求更多的食物或奢侈品。当人们就在社会学上说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时，他们的世界观却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的分歧表现在对获得更多财富与欢乐的方法有不同看法。在历史舞台上表演的所有政党都向支持者许诺更好的世间生活。他们辩护说，为得到更多的财富，要求其党徒做出牺牲是必要的。他们宣称，这些牺牲只是暂时的，就如一本万利的投资。学说的冲突是关于手段的，而不是关于最终目的的。

政治冲突是那些主张幸福的惟一途径是伤害他人或以暴力威胁他人的学说之结果。另一方面，和平只能经由坚定的信念，即和平合作比你争我斗能更好地提供满足来达到。纳粹党人之所以致力于战争，是因为他们的学说教导他们，一场获胜的战争对于其幸福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五十州的人民之所以和平共处，是因为他们的学说教导他们，和平合作比开战更适合他们的目标。大约一百年以前，当一种不同的学说占据美国人的心灵时，一场血腥的内战就爆发了。

因此，历史研究的主要目标是研究社会、经济、政治学说。在制订法律和宪法时，在组织政党与军队时，在签署或破坏条约时，在和平生活或发动战争与革命时，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些学说的应用。我们生于这个由学说塑造的世界上，我们生活于因变化着的学说之作用而不停演变的环境中。我们播种，但是，我们的土地和费心的结果不仅依赖于上帝的旨意；对我们的收成起至少同样重要的作用的是其他人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由学说所指引的。

## 五、学说的适宜性

科学研究的任务不是从先入为主的信念或个人偏好出发来判断种种学说。我们无权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审查别人的思想。我们必须从自己的推理中剔除对终极目的和价值的考虑。科学的责任不是告诉人们，他们应当将获取什么来当作自己的主要利益。

在研究学说时，我们应用的标准必须是惟一的。我们必须问道：这些学说的实际应用是否能实现人们预期的目标？我们必须从运用这些学说的那些人的观点来仔细研究学说的适宜性。我们必须探究它们是否适合于它们理应服务的目的。

我们不相信有人会从字面上来理解古老的原则，“为了实现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他们真正想说的是，“正义的目的只能通过正义的手段来实现”（*fiat justitia ne pereat mundus*）。他们不想通过正义来毁灭社会，相反，他们希望保护社会免于毁灭。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他们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毁灭文明以将人类降格为穴居人，那么，我们就不禁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我们可以加上一句：我们及同胞中的大多数不想这样疯狂，我们不再向往毁灭而是向往文明的进步，我们准备好了来保卫文明免遭其敌人之攻击。

仍有第二种观点可用来判断学说。我们能够问道：学说在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还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这一评估只是次要的，必须服从于上面提及的适宜性标准。自相矛盾的学说之所以是错误的，仅仅是因为其应用不能达到所寻求的目的。

断言判断学说的这种方法为实用主义是错误的。我们不关心事实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学说也就是行动的方案，为此，除开这些方案是否有用之外，别无标准可以应用。将我们的观点划入功利主义也不会更为正确。功利主义已经抛弃受制于外的道德法则的所有标准，而在我们的观点中道德法则必须被接受和遵从，而不论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什么。从功利主义的立场来看，一件事之所以是罪行，是因为其结果是对社会有害的，而不是因为某些人相信，他们在灵魂深处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告诉他们这是罪行。我们不讨论伦理问题。

我们要强调的惟一一点是：未应用适当手段的人们，不能达到

他们追求的目的。

## 六、深奥的学说与通俗的信念

研究人类行为和历史演变的任何企图，必须为人的智力之参差不齐留有充分余地。在创造新思想和确立详尽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和学者，与只能掌握最简单事情的气量狭小的愚人之间，有许多渐进的跃迁。我们不知道什么导致了智力的差别；我们只需要承认差别的存在。不能将其归结为由环境、个人经历和教育的差异所导致而就此了事。毫无疑问，差别的根源在于个人间的异质性。

只有一小群精英有能力理解更为微妙的连贯思维。大多数人面对更为微妙的隐含问题或推论时束手无策。他们只能理解初步的计算题；通往数学的大道对他们而言是不通的。试图使他们熟悉复杂的问题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想出来的理论，是不会有作用的。他们以笨拙的方式简化和修正所听到或读到的一切。他们断章取义，曲解前提和结论。他们改造任何理论和学说，以图使之适合于自己的智力水平。

天主教教义对红衣主教纽曼和轻信の善男信女来说是不同的。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不同于其人是猿变来的流行版本。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与作为其大众版本的泛性论不是一回事。这样二分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所有学说。所有的学说至少以这两类不同而且相互冲突的方式被教导和接受。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开了深奥的学说和浅显的教义。

由于研究学说本身不是目标，因此，对流行的学说，与对哲学家及其书籍，至少应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当然，流行的学说产生于学者和科学家在逻辑上得到详细阐述和提炼的理论之中。它们是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但是，当社会学说之付诸实施需要民意支持时，当民意在很大程度上转向某种学说的大众版本时，对后者的研究，至少与对正确观念的研究同等重要。对于历史而言，某个流行的口号有时可能比学者提出的思想蕴含更丰富的信息。一些受到广泛欢迎与普遍接受的信仰是如此地自相矛盾且明显站不住脚，以致没有严肃的思想家敢于系统地描述这些信仰。但是，如果这样的信仰引发了行动，那么，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样的信仰就与被付诸实施的其他学说同等重要。历史不必自限于研究健全的学说，或自限于仅在学术著作中得到优雅而详细论述的学说。<sup>[1]</sup>



## 第二十一章 自由的思想 源自西方



文明的历史，就是争取自由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合作，是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为尽可能地改善个人物质状况的努力得以成功的终极和惟一的源泉。但是，正因为人性如斯，如果没有措施阻止蛮横的人做出与社会生活不相容的行动，社会就不能存在。为了保障和平合作，必须准备好诉诸于武力来镇压扰乱和平的人。社会不能没有强制力的机制，也就是不能没有国家和政府。如此则产生了更深一层的问题：防止掌控政府职能的人滥用权力并使其他所有人沦为事实上的奴隶。为自由而进行的所有斗争的目标，是约束保护和平的武装力量、统治者及其警察。自由总是意味着：免受警察权力恣意妄为之害。

自由的思想现在是、并且过去一直是西方独有的。区分东西方的首先是这一事实，即东方的民族过去从来未曾有过自由的理念。古希腊人不朽的光荣，在于他们最先掌握了保障自由的制度之意义与重要性。近来的历史研究正本清源，证实原来归功于希腊人的某些科学成就，其实源于东方。但是，没有人挑战这一点：自由的思想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将自由的思想传入罗马，后来又传入现代欧洲和美洲。它成为试图建立美好社会的西方人所有纲领之根本考量因素。它催生了自由放任哲学，而人类在资本主义时代取得的所有成就皆归功于自由放任哲学。

所有的现代政治和司法制度之意义均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免受政



府的吞食。代议制政府、法治、法院独立而不受行政机构的干涉，人身保护令状，司法审查，行政行为的救济，言论与出版自由，政教分离，以及其他许多制度，都只有一个目的：约束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保护个人免受官员恣意横行之苦。

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度与奴役的所有残余。它结束了残暴的惩罚，将犯罪的处罚降低到打击罪犯的最低必要限度。它废除了对付嫌犯和违法者的刑讯逼供和其他理应反对的做法。它清除了所有特权，传播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它还使暴政下的臣民脱胎换骨，成为自由公民。

物质状况的改善是政府事务运作方面的改革和革新的成果。当所有特权消失而人人皆可挑战其他任何人的既得利益时，有聪明才智的人就得到莫大的帮助，可以来开发当今使大众的物质生活状况更为美好的所有新兴工业。人口数字成倍增长，却仍然可以享受比其祖先更好的生活。

同样，在西方文明国家，总有暴政——一方面是独裁者或贵族阶层绝对专断的统治，另一方面是所有其他人的臣服——的支持者。但是，在启蒙运动时代，这些反对者的声音越来越小。自由大业胜利了。在 19 世纪的上半叶，自由原则的突飞猛进似乎是不可扭转的。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确信，历史发展倾向于建立保障和平的制度，而暴政的倡导者将无计可施，无法阻止自由主义的趋势。

## 二

在研究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优势时，有一种倾向，就是忽视了一个有利于自由思想的重要因素之力量，即古希腊的文献在精英教育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希腊学者中也不乏政府万能的倡导者，例如柏拉图。但是，希腊思想体系的根本要旨，却是对自由的追求。从现代自由与民主制度的标准来看，希腊城邦只能称为寡头政治。希腊政治家、哲学家与历史学家所礼赞的作为人之最可宝贵的自由，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拒绝给予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和奴隶以自由，他们事实上是在宣扬寡头政治的世袭传承。尽管如此，如果认为他们对自由的赞美与追求是虚伪的，却是严重的错误。与两千年后的上层人物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相较，他们至少同样地真诚。正是古希腊的政治文献触发了 Monarchomachs（反君权运动）的思想、辉格党人的哲学、阿尔图休斯（Althusius）与

格老秀斯（Grotius）及约翰·洛克的学说、现代宪法与权利法案之父的思想体系。正是古典研究，即文科教育的根本特色，才使得斯图亚特和乔治三世治下之英国、波旁皇族治下之法国、屈从于一大堆君主之专制下的意大利，自由之精神得以被唤醒。

身份煌赫如俾斯麦者，19世纪政治家中自由的最大敌人，亦亲身证实了一个事实，也就是，即使在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治下的普鲁士，高级中学（the Gymnasium）仍是共和主义的要塞。<sup>[1]</sup>从文科教育的课程中清除古典研究因而实际上想摧毁其本质的热切努力，是奴役的意识形态复活的主要体现之一。

事实上，一百年以前，只有极少人预见到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注定要在很短时期内获得不可抵挡的力量。自由的理想似乎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人人都认为，任何反动运动都不能成功地清除它。诚然，公开攻击自由和诚心倡导回归臣服和奴役是无谓的冒险。但是，反自由主义却假装成超自由主义，伪装成自由理念的实现与顶峰而得到了民心。

社会主义者的绝大多数坚信，他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就是在为自由而奋斗。他们过去称自己为左派和民主人士，今日则更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这些知识分子和追随其领导的人民大众，在潜意识里完全清楚一个事实，即他们之所以无法达到其雄心所系的遥远目标，正是由于自己的缺陷。他们要么不够聪明，要么不够勤奋。但是，他们不愿意向自己以及同胞暴露自己的劣人一等，急于寻找替罪羊。他们自我安慰，还试图使其他人相信：他们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自身的低劣，而是社会的经济组织之不正义。他们宣称，在资本主义，自我实现只是对少数人而言才有可能。“自由放任社会的自由，只是那些拥有财富或有机会购买自由的人才可以享有的自由。”<sup>[2]</sup>因此，他们断言，国家必须进行干预以实现“社会正义”。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必须让垂头丧气的平庸者“各取所需”。

### 三

只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还停留在辩论阶段，缺乏清晰判断与理解的人们可能相信这种幻想，即这种体制下，自由仍然可得以保持。既然苏联的经验已经向所有人表明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真实状况，这样的自欺欺人不再能生根了。

已故的拉斯基教授——自我标榜为非共产主义者甚或是反共产主义者——告诉我们说，“毫无疑问，在苏联，共产党员享有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完全意识到，在法西斯的意大利，他被完全剥夺自由。”<sup>[3]</sup>真相是，俄国人有服务大独裁者之所有命令的自由。但是，只要他从当局规定的正确思维方式上偏离百分之一英寸，他就将遭到无情的清洗。遭到“清洗”的所有政客、官员、作家、音乐家和科学家，确切地讲，不是反共产主义者。相反，他们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遵守一切规则的党员，最高当局为了奖赏他们对苏维埃信念的忠诚而将之提拔到高位。他们惟一的过错，在于他们未能足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思想、政策、著作或音乐作品，以适应斯大林思想与口味的最新变化。如果不赋予自由一词以与所有人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截然相反的意义，难以相信这些人有“完全意义上的自由”。

法西斯的意大利当然是一个毫无自由的国家。它采用了臭名昭著的“一党原则”，并相应地压制了所有的反对意见。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别。例如，在法西斯的意大利，生活着共产党在议会的党团代表成员，安东尼奥·顾实泰教授，他对共产主义可谓至死不渝。他定期接到作为退休教授享有的退休金，他也可以借助意大利最显赫的出版公司，自由地撰写和出版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之缺乏自由，与拉斯基教授精心构思所讲的“毫无疑问”享有“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之缺乏自由相较而言，还没有那么严重。

拉斯基教授乐于重复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即实践中的自由总是法律之内的自由。他接着讲道，法律总是以达成“保障那些掌控国家机器的人们认为满意的生活方式之共识”为目标。<sup>[4]</sup>如果这意味着，法律以保障社会免受发动内战和以武力推翻政府的阴谋之累，那么，它就是对自由国家的法律之正确描述。然而，当拉斯基教授继续说道，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以激进方式改变富人财产权的努力，立即就将使整个自由体制坍塌”，就是严重的谎言了。<sup>[5]</sup>

以拉斯基教授及其所有朋友的伟大偶像卡尔·马克思为例。在1848和1849年，他积极参与革命，因此他——从法律上讲是一个外国人——与他的妻子儿女及女仆前后被驱逐出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州而先后到达巴黎和伦敦。<sup>[6]</sup>后来，当和平重新降临，他又可以自由返回德国的任何地方，他也经常利用这一机会。他不再是流亡

人士，他自己决定定居伦敦。<sup>[7]</sup>当他于 1864 年创建以准备伟大的世界革命为惟一目标的国际工人协会时，没有人去骚扰他。当他代表这一协会访问欧洲大陆各国时，亦未曾受到阻挠。他可以自由写作和出版书籍与文章，用拉斯基教授的话来讲，这些书籍和文章当然是“以激进的方式改变富人的财产所有权”的努力。1883 年 3 月 14 日，他安静地死于自己在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的寓所。

或以英国工党为例。他们“以激进方式改变富人财产所有权”的努力，正如拉斯基教授所深知的那样，没有为不合乎自由原则的行动所阻碍。

马克思这位持不同政见者，可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自在地生活、创作、倡导革命，正如英国工党能够轻松地投入到后维多利亚时代之英格兰的政治活动中去。在苏联，即使最轻微的对也不可容忍。这就是自由与奴役的区别之所在。

#### 四

对法律与宪政意义上的自由概念和为真正实现自由而设计出来的制度进行批评的人士正确地断言说，免受政府官员恣意妄为之苦的自由本身不足以保障个人的自由。但是，在强调这一不容置疑的真理时，他们事实上是在大撞空门。自由的拥护者从来不曾主张说，约束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是保障公民自由所需要的一切。正是市场体系的合作，才赋予个人尽可能多的与社会生活相容的自由。宪法和权利法案并不创造自由。它们仅仅保护竞争性经济体制为个人提供的自由免受警察权力的侵蚀。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有机会在社会的劳动分工体系中追求他们期望获取的地位。他们可以自由选取他们用以服务同胞的职业。在计划经济中，他们缺乏这一权利。在计划经济中，当局决定每个人的职业。上级随意决定提升一个人到更高的地位或拒绝给他这样的提升。个人完全依赖于当权者的善意。但是，在资本主义下，每个人可以自由挑战其他任何人的既得利益。如果他认为自己有能力为大众提供更好的或更廉价的产品或服务，他就可以竭力展示自我的效率。缺乏资金不会让他的项目被淹没，因为资本家总是在寻找那些能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运用资金的人们。他的商业活动的结果如何，只取决于购买最适合自己的商品的消费者之行为。

工薪阶层也不必仰雇主之鼻息。如果企业家未能聘用最适合相关工作的工人，未能开出足够高的工资以防他们另谋高就，他会因净收益降低而受到惩罚。雇主也没有向工人施予恩惠。他以和购买原材料和工厂设备一样的方式，将他们作为自己的商业成功之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加以雇用。工人可自由地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决定每个人的地位与收入的社会选择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连绵不断。一边是巨大的财富正在缩水直至最后烟消云散，另一边是出身贫穷的人们攀升到显要地位，获取可观收入。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特权，政府没有为既得利益者提供保护，使他们不受新来者的更高效率之威胁，则在过去获取了财富的人，就必须在每一天重新和其他所有的人进行竞争，才能够获得财富。

在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之框架内，每个人依赖于他所属的大众对他的服务之认可。或购买或不购买的每一个人，都是为所有的人——也包括他自己——指定在社会中的明确位置的最高法院之一员。在为某些人指定较高收入而为另外一些人指定较低收入的过程中，每一个都可发挥作用。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出贡献，而他的同胞则准备为此给予他更高收入的补偿。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意味着：某人依赖于他人决定的程度，正好与他人依赖于某人决定的程度不相上下。当生产在分工体制下进行时，其他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在经济上，每个人也不可能完全地自给自足。

## 五

我们在研究自由时，不用涉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根本性经济问题，相反，我们想指出，西方人与亚洲人的不同完全在于，西方人已经调整得适宜于自由生活，而且是由自由生活所塑造。日本、印度、近东伊斯兰教国家在以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以前，不能认为他们的文明是未开化的。这些民族在数百年以前，甚至是数千年以前，就已经在工艺美术、建筑、文学、哲学、教育机构的发展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们组建了强大的帝国。但是自此以后，他们裹足不前，他们的文化变得麻木和迟钝，他们自己则失去了成功应对经济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精英与艺术天才枯萎了，艺术家和作家明目张胆地沿袭传统模式，神学家、哲学家、律师沉浸于对古老著作一成不变的注解中。先辈所树立的丰碑轰然倒塌。他们的帝国分崩离析，公民失去活力与精神，变得对日益严重的衰落与

贫穷无动于衷。

东方哲学与诗歌的古典之作能与西方最有价值的作品相提并论。但是数个世纪以来，东方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书籍。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几乎没有记录任何东方作者的姓名。东方不再为人类的智力活动做出任何贡献。使西方激动不安的问题与论争，在东方却仍是不得而知。欧洲出现骚乱；东方则是停滞、懒惰和漠不关心。

原因是明摆着的。东方缺乏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免受国家强制的自由之思想。东方从来未曾举起自由的大旗。它从没试图强调个人免受统治者权力侵害的权利。它从不质疑专制暴君的霸道。首先，它从未建立保障公民私人财富免受专制统治者没收的法律框架。相反，受富人财富造成了穷人之贫穷这种思想的蛊惑，所有人都赞成统治者没收成功商人财产的做法。因此，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受到抑制，国家被迫放弃需要大量资本投资的改进。资产阶级不能发展壮大，结果，大众得不到激励，他们也不会去惠顾作家、艺术家和投资者。

普通民众的后代想要出人头地，只有华山一条道。他们可以凭借侍奉君主得以向上爬。西方社会是个人可以竞争最高奖赏的群体。东方社会是完全依赖于君主善意地对待臣民等乌合大众。西方社会的精明青年将世界看作是他可以获取名望、地位、荣誉、财富的竞技场；相对其雄心而言，万事皆不是困难。东方父母的温顺后裔除开遵循所处环境中的惯例外，茫然无知。西方人引以为荣的自立，在索福克勒斯所写的赞美人及其进取精神的合唱诗《安提哥涅》（*Antigone*）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可以找到欢欣鼓舞的表现。同样的东西在东方可谓闻所未闻。

西方文明之建造者的后裔，是否有可能放弃自己的自由并自愿屈服于全能政府的权力？他们是否有可能在一个体制中寻找满足，而在这个体制中，他们惟一的任务将是在由万能的计划制定者设计和运作的庞大机器中充当齿轮？停滞不前的文明之思想状况是否会数千百万人牺牲生命才取得支配地位的理想冲击得荡然无存？

“*Ruere in servitium*”（他们陷入奴役之中了），塔西佗谈及台比留时代的罗马人时，曾经发出了这样的浩叹。<sup>[8]</sup>

## 附 录

# 米塞斯的精髓

穆雷·罗斯巴德

在政治和思想领域，我们常常只有两个选项，于是，我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在一个给定的框架中做出抉择。1930 年代，左翼分子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在苏联的体制与法西斯主义之间进行抉择：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惟一的选择；现在，在当代美国经济学领域，人们又说，我们只能在自由市场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进行抉择；我们只能在联邦政府应当扩张货币供应还是应当将预算赤字维持在一个确定的水平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此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也即超然于政府政策关于货币/财政“比例”的无谓争论之外的方案，却差不多被人遗忘了。这就是连根拔除政府对货币供应或对经济体系的任一部分或整体可能施加的任何影响或控制。这是一条通往真正的自由市场的否定性道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一位著名的、具有辉煌的创造性、但一直在论敌的围困之中奋战的经济学家，终其一生都在倡导这一路线，并为之而奋斗，他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如这个世界想走出国家统制主义的泥潭，假如经济学专业真想回归某种更健全、更正确的经济学分析发展，那么，两者都必须断然走出当代的泥沼而走向米塞斯已向我们指出的正确方向。

## 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米塞斯于 1881 年 9 月 29 日出生在当时还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贝尔格，他的父亲阿瑟·艾德勒·冯·米塞斯（Arthur Edler von Mises）是一位就职于奥地利铁路部门的著名建筑工程师，总是临时安家在



铁路沿线。米塞斯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在世纪之交进了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与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他于 1973 年 10 月 10 日在纽约市去世。

米塞斯出生和成长在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高潮迭起的时代。离开他学习、研究的奥地利学派传统，是不可能理解米塞斯本人及其对经济学思想的贡献的。

很显然，到 19 世纪后半叶，以李嘉图和密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英国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使其成为沙滩上的大厦轰然倒塌。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古典经济学试图用“阶级”而不是用个人行为来分析经济。结果，古典经济学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解释决定商品和服务之价值和相对价格的根本力量；他们也没有能力分析经济中消费行为和生产活动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由于古典经济学家用“类”的概念来看待商品，所以，他们无法解决“价值悖论”，也即下面的事实：面包对人极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市场价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因而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却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如果面包比钻石用处更大，那为什么面包在市场上这么廉价？

由于根本无法解释这一悖论，古典经济学家不幸地决定把价值人为地彻底分割为两种：面包的“使用价值”比钻石高，而由于某种理由，它的“交换价值”却比钻石低。正是根据这一人为的价值分割，随后几代学者都激烈抨击市场经济，说市场令人痛心地把资源错误地引导到“为利润而生产”，而没有被用于更为有益的“为使用而生产”。

由于没有分析消费者行为，奥地利学派之前的经济学家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市场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他们误打乱撞，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a) 价值是商品内在固有的某种东西；(b) 价值是由生产过程加之于这些商品上的；(c) 价值的最终来源是生产成本，甚至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时间数量。

李嘉图的这种分析后来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既然所有的价值都是一定量劳动时间的产物，那么，资本家和雇主所获取的全部利息和利润，就必然是从本应属于工人阶级的收入中榨取的“剩余价值”。



后来李嘉图的门徒努力辩解，资本设备是生产性的，在利润中理应获得其应有的份额；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反驳说，资本也是劳动的“具体表现”或者“固化”，因而，工资应当包括从生产中所得到的全部收入。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利润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不能论证其正当性。李嘉图学派仅仅研究各“阶级”在生产收益中所占的份额，于是，他们看到的就是“工资”、“利润”、“地租”间持续的斗争，工人、资本家、地主为扩大自己的份额而永远斗争着。李嘉图学派仅仅用总量概念进行分析，必然可悲地把“生产”问题与“分配”问题分开，认为分配就是这些不断斗争的阶级间的冲突。他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要提高工资，就必然以降低利润和租金为代价，反之亦然。

古典经济学家只看到了阶级而没有看到个人，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分析消费，而且，对价值和价格做出了错误的解释；他们甚至不能搞清如何确定各种生产要素——特定单位的劳动、土地或资本品——的价格。19世纪中叶以后，李嘉图学派经济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本身似乎已经走入穷途末路。

人类发明创新的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远隔千里、条件各异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完全独立地发现同一件事情。上面提到的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就是在同一年，1871年，由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形式，完全独立地提出了解决之道，他们是英国的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瑞士洛桑的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奥地利维也纳的门格尔（Carl Menger）。这一年，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了。杰文斯的思路和他的经济新观点比较零碎，不很完整，而且，他得跟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在英国经济学界积累形成的无所不在的声望进行搏斗。结果，杰文斯的影响很小，只有极少数追随者。瓦尔拉斯的理论体系最初也影响不大，不过，我们下文将会看到，后来它又不幸地复活了，构成了如今的“微观经济学”种种谬误的基础。在这三位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观点和思路中，当时最为突出的是时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门格尔的理论<sup>〔1〕</sup>。正是门格尔创立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门格尔开创性的著作在他最有才华的学生、也是他在维也纳大学教授职位的继承者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那里结出了最丰硕的成果。正是庞巴维克里程碑式的著作、主要写作于1880

年代、代表着他的学术研究巅峰水平的三卷本《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sup>[2]</sup>，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已经成熟。另外一些富有创造精神的大经济学家在 19 世纪最后 20 年也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做出了贡献，但庞巴维克的贡献显然要比这些人都大。

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所提出的解决古典经济学悖论的奥地利学派思路要比李嘉图学派复杂得多，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正确地将其分析重点放在个人身上，侧重于分析活动着的个体，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正是个人在根据其偏好和价值进行选择。由于立足于个体，所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能够将其对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分析建立在个体消费者的价值和欲望之上。每个消费者都是按自己选定的偏好和价值采取行动；正是这些价值彼此互动、组合，构成了消费者需求，从而构成了一切生产性活动的基础和方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将其分析建立在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个体之上，所以他们洞悉到，生产活动乃是建立在服务于消费者需求预期的基础上的。

因而，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显而易见的是，任何生产活动，不管是劳动还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活动，都不可能赋予商品或服务以价值。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一句话，我可能花了三十年时间及种种资源来完善一台巨型蒸汽动力三轮车，但是，如果把这台机器拿到市场上却没有一个消费者问津，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我就这上面投入了多少心血、劳动。价值是消费者的评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与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sup>[3]</sup>

由于明确地关注个体而不关注大而无当的“阶级”，所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就可以轻松解决曾经难倒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悖论”。市场上的任何个体永远都不可能面临在作为一个类的“面包”和作为一种类的“钻石”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商品的数量越多——商品件数越多——那么，他对每一单位的该商品的评估就越低。一个在沙漠中跌跌撞撞口渴难当的人对一杯水的“效用”将赋予极高的价值，同样是这个人，如果身居供水丰富的维也纳或纽约城内，对随便哪杯水都会赋予很低的价值。因此，同样是一杯水，他在沙漠中支付的价格将远远高于在纽约城中。一句话，活动着的个体总是面对着并且总是根据特定单位或者说“边际”进行选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的发现可以概括为“边际效用递减律”。面包之所以要比钻石便宜得多,原因就在于,可以得到的面包的数量要比钻石的数量要多得多,因而每块面包的价值,以及价格,就要比每克拉钻石的价值和价格小得多。不存在什么“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如果可以得到的面包数量很充裕,那么,对于个体来说,每块面包的“用处”要比每克拉钻石小得多。

注重分析个体的行为因而侧重“边际分析”,也解决了市场上的收入“分配”问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证明了,每单位生产要素,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劳动、土地还是资本设备,在自由市场上的价值都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简单地说,就是取决于一单位该要素为消费者购买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实际做出了多大贡献。它的供应越多,该要素数量越多,则其边际生产率越低,其价格也就趋于降低;其供应减少,其价格就会趋于上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因此而揭示了,不同类型的要素之间不存在什么毫无意义的、无缘无故的阶级斗争,相反,每类要素都和谐地服务于生产最终产品,以最有效率的方法(也即以最节约资源的方法)满足消费者最强烈的欲望。因此,每一单位的各种要素都形成其边际产品,都会对生产结果做出自己具体的贡献。事实上,如果说存在着什么利益冲突的话,那也不是发生在不同类型的要素,即土地、劳动、资本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要素的竞争性供应商之间。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发现了一种增加铜供应的新方法,供给增加将压低铜价;对消费者、对合作的劳动、对资本要素来说,这只能带来好处,带来收益。惟一不高兴的只能是那些现有的铜矿所有者,他们发现自己产品的价格下跌了。

据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在自由市场上,“生产”和“分配”根本就不可能分割开来。消费者的价值和需求决定着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消费品——的最终价格,正是消费者决定着生产活动的方向,因而也决定着彼此合作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每个人的工资水平,资本设备的价格,等等。收入的“分配”不过是每种要素的价格的结果而已。因而,如果铜的价格是每磅 20 分,铜产品供应商出售 10 万磅铜,就可以获得 2 万美元的“收入”;如果一个人的工资是每小时 4 块钱,那么,一周工作 40 个小时,每周就能获得 160 块钱的收入,依此类推。

利润和“凝固的劳动”(所谓的体现在机器设备中的劳动)又是什么样的呢?再一次从分析个体入手,庞巴维克发现,人的行为的

一个基本规律是，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地实现其欲望和目标。因而，每个人喜欢眼前的商品和服务而不喜欢等待相当长时间才得到这些商品和服务。一只已经落入我的手掌心的小鸟，要比还在树丛中跳来跳去的小鸟更值钱。正是由于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时间偏好”，人们不会将其全部收入投资于资本设备以提高未来可以生产的商品之数量。因为他们首先得用于购买当下需要的消费品。不过，每个人由于环境和文化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时间偏好水平，也即当下商品优先于未来商品的程度不同。他们的时间偏好水平越高，他们收入中用于当下消费的比例越高；时间偏好水平越低，他们收入中用于储蓄并投资于未来生产的比例就越高。正是由于时间偏好，形成了利息和利润。时间偏好的程度和强度决定着利率和利润率有多高。

以一笔贷款的利率举例说明。中世纪和近代初期的天主教会经院哲学家确实是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家，但有一件事他们却一直没有给予解释和正当性证明，也即为什么贷款需要支付利息。他们能够理解具有风险的投资为何应当获得利润，但他们却让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思想给迷惑了，亚里士多德说，货币本身是没有效用的，非生产性的。那么，如何论证贷款利息的正当性？由于无法找到答案，教会和经院学者将贷款利息贬斥为罪孽深重的“高利贷”，结果，他们的研究在俗人眼里名誉扫地。只有到了庞巴维克，才用时间偏好概念找到了答案。当债权人将 100 块钱借给债务人时，自当日算起一年后将获得 106 块钱，这两个人所交换的不是同样东西。债权人给债务人的 100 块钱是“现货”，拿到这笔钱后，债务人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拿出来花。而债务人给债权人的，并不是钱，而是借据，是一年后才能得到的钱的前景。一句话，债权人给债务人的是“现货”，而债务人给债权人的是一种“期货”，债权人必须得眼巴巴地等上一年才能花这笔钱。根据人们普遍的时间偏好，现货要比期货更值钱，因而，债权人就觉得，必须收取一笔高于现货的溢价，而债务人也乐意支付这笔溢价。这个溢价就是利息。溢价到底有多少，取决于市场中所有人的总体时间偏好水平。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因为庞巴维克进一步深入揭示了时间偏好如何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企业的利润率。实际上，企业“正常的”利润率就等于利率。因为当劳动或土地被用于生产过程时，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他们不用苦苦等待他们的收入了，而如果没有资本家雇主的话，在产品生产和销售给消费者之前，他们就不得不等待他们

的收入。如果没有资本家雇主的话，劳工和地主就不得不苦苦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都得不到收入，直到最终产品——汽车或面包或洗衣机——销售给消费者之后。而资本家从他们先前的收入中节省出来的钱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动和土地投入使用的时候，马上就给劳工和地主开了钱；因而资本家承担了等待的功能，一直得到最终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之后，他们才能收回自己的钱。正是由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这种区别，劳工和地主也就乐意向资本家“支付”利润或利息。简而言之，资本家就相当于债权人，他进行储蓄，并拿出钱，然后，就等待最终的回报；而劳工和地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债务人”，他的劳务只有到未来某个日子之后才能结出成果。于是，正常的企业利润率将由多方面的时间偏好水平之高低决定。

庞巴维克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这一点：资本货物并不仅仅是“凝固的劳动”，它们也是凝固的时间（和土地）；只有立足于至关重要的时间因素和时间偏好，才能对利息和利润做出解释。他也极大地推进了对资本的经济学分析；他不仅与李嘉图学派大不相同，也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他认为，资本并不仅仅是同质的一团<sup>[4]</sup>，或者是给定的量。资本是某种结构，是某种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的网络（lattice-work）；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动力并不是简单地增加资本的数量，还要增加其时间结构，“使生产过程不断延长”。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越低，他们就越乐于牺牲眼前的消费而进行储蓄，将其收入投资于这些越来越长的生产过程，从而形成未来可以获得的更大数量的消费品回报。

## 二、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货币与信用理论

年轻的米塞斯于 1900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于 1906 年获得法学与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庞巴维克持续举办的研讨课上，他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最有才华的学生。米塞斯浸淫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不过他很快就认识到，庞巴维克和其他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走得还不够远：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分析推到极致，因而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依然有不少重大的空白。当然，这是所有科学学科发展的道路：学生站在他们伟大的导师肩上更上一层楼。不过，导师不能看出其继承者的理论进展的价值并表示不满，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米塞斯觉察到的主要空白在货币分析领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确实已经对消费品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形成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然而，从古典经济学时代起，货币就被搁置到一边，没有人用分析其他经济问题的同样方法来分析货币。在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欧美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断裂格局依然继续着，对货币和“价格水平”的分析也与对市场经济其他领域的分析截然分割。我们现在依然在吞食这种令人痛心的分割状态的苦果，即“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断裂。最起码，“微观经济学”乃是对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的分析；而一旦经济学家涉及到货币问题，立刻就陷入到某种虚幻的总量概念构成的想象世界中：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国民生产，政府开支，等等。由于脱离了个体行为的坚实基础，“宏观经济学”就从一个谬误走向另一个谬误。在 20 世纪头十年，这种误导性的分割就已经在美国人费雪的著作中急剧发展，他精心阐述了“价格水平”和“周转率”理论，而根本不理睬个体行动，也没有努力把这些理论整合进比较可靠的新古典“微观”分析体系中。

米塞斯则着手改变这种分割局面，将货币及其购买力（常被人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经济学构建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行动和市场经济的分析基础之上，试图最终形成一种完整的经济学，从而能够解释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米塞斯在其第一本杰作《货币与信用理论》<sup>[5]</sup>（*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 1912）中获得了这一不朽的成就。这是辉煌的成就，值得庞巴维克本人另眼相待。至此，经济学终于实现了圆满，成为基于个体行动的完整的分析体系；货币与相对价格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不再存在分割局面了。机械的货币与价格水平关系、“货币周转率”和“交换方程”等等机械论的费雪理论，被米塞斯明确地清除了，代之以应用边际效用理论分析货币自身的供需。

米塞斯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揭示了，由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其可以供应的数量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之紧迫程度（根据它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因而，货币单位的“价格”也即其购买力，也是同样由这些市场因素决定的。对货币的需求乃是人们对握有现金余额（cash balance）的一种需求（钱装在人们的钱包或银行账户上，以备或迟或早用其来购买有用的商品和服务）。货币单位（美元、法郎或金盎司）的边际效用决定着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之强度；可以供应的货币数量与对它的需求之间的互动，决定着美元的“价格”（也即美元可以购买多少其他商品）。米塞斯赞成古典的“数



量理论”，他认为，美元或金盎司供应量增加，将导致其价值或价格下跌（也即其他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但他深入地细化了这一粗糙的方法，并将其整合到一般经济分析中。首先，他揭示了这种波动是不可能成比例的，货币供应的增加趋向于降低其价值，但下降多少，或者是否真的下降，则取决于货币的边际效用，因而也取决于民众欲维持其现金余额所需之货币数量。米塞斯也证明了，“货币增量”并不是一古脑撒进经济中，增发的货币总是注入经济体系中的某一具体的点，只有当新钞票在经济体中像波纹一样扩散开来，才会导致各种商品价格上涨。比如，如果政府印刷出一批新钞票，并用它来购买曲别针，结果并不是奥地利学派之外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导致整体“价格水平”上扬，而是首先推动曲别针生产商的收入增加，曲别针价格上涨，然后是供应曲别针产业的各种商品价格上涨，这样不断延续下去。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至少会暂时地改变相对价格，而最终有可能导致相对收入的持久变化。

米塞斯也证明了，李嘉图本人及其最早的一批追随者早已被人抛诸脑后的一个洞见是完全正确的，即除了用于工业生产和消费的黄金之外，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社会不会有任何益处。诸如土地、劳动和资本之类的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会生产出更多产品从而提高生活水平，与此相反，货币供应的增加只能稀释其购买力；它不可能增加产量。如果每个人钱包或银行里的钱都在一夜之间增加了三倍，社会不会有一点点改进。而米塞斯则揭示了，“通货膨胀”（货币数量的增加）的巨大吸引力恰恰在于，并不是每个人同时立刻得到了同等数量增发的货币；相反，政府本身及幸运地享受政府采购和政府补贴的那些人首先得到了增发货币，在很多商品价格上涨之前，他们的收入先提高了；而在这一货币传导链条最末端的不幸的社会成员，却必将蒙受损失，因为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在他们拿到增发货币之前就已经涨起来了。简而言之，通货膨胀的吸引力就在于，政府及受政府照顾的集团可以悄悄而又非常有效地获取好处，其代价则是牺牲无权无势的民众的利益。

米塞斯证明，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一种征税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在一个不受政府诱导之货币供应量增加之冲击并正在发展的自由市场经济中，随着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扩张，价格将趋于下降。事实上，价格和成本日趋下降是 19 世纪多数时间标志着工业扩张的一个让人高兴的特征。

在把边际效用应用于分析货币现象时，米塞斯必须解决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循环”（Austrian circle）经济学家都能理解鸡蛋、马匹、面包的价格如何由这些商品各自的边际效用决定；人们需要这些东西，是为了进行消费，与此不同，人们需要货币，人们保持现金余额，是为了用来购买商品。因此，除非市场上已经存在货币，并能标定价格，具有购买力，否则，没有谁会需要货币（它也就不会具有边际效用）。然而，如果要使货币刚一出现就被人们需求，它就必须出现在之前即具有价值，那么，我们又如何用边际效用概念充分解释货币的价格？米塞斯用他的“回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克服了这一“奥地利学派循环”，这是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他论证了，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一直向前推到古代某个时刻，当时，充当货币的实物还不是货币，而仅仅是一种有其自身用途的交换物品，也就是说，当时，人们之所以需要充当货币的商品（比如黄金或白银），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可供消费、可以直接使用的物品。于是，米塞斯不仅从逻辑上完美地解释了货币的价格或购买力，他的发现也具有另一层重要的含义。它表明，货币只能有一个起源，只能是在自由市场上，从该市场对于某种有用的商品的直接需求中形成。这意味着，货币不可能起源于政府指定某种东西为货币，也不可能是某种一次性社会契约的结果；它只能从某种具有普遍的用处和价值的商品中发展出来。门格尔此前就已经揭示了，货币可能是这样形成的；但只有到了米塞斯，才论证了货币必然是起源于市场。

这一点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它意味着，与当时及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相反，在米塞斯看来，“货币”并不是由政府随便规定的纸币单位，比如“美元”、“英镑”、“法郎”等等。货币只能起源于有用的物品，诸如黄金、白银，以及别的什么东西。最初的单位，核算和交换单位，并不是“法郎”或“马克”，而是黄金克或白银盎司。从本质上说，货币单位就是市场上生产出来的某种特定的珍贵物品的重量单位。因而毫不奇怪，今天所有的货币名称，美元、英镑、法郎等等，实际上都源于黄金或白银的重要单位。即使到了如今的货币混乱状态，美国法令全书中还把美元规定为  $\frac{1}{35}$ （现在为  $\frac{1}{42}$ ）金盎司。

米塞斯对政府任意印制“美元”或“法郎”增加货币供应带来的无法缓和的社会恶果的论证，及上面的分析，向我们指出了一条将货币体系与政府彻底分离的道路。因为他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就



是一定重量的黄金或白银，这意味着，再次以黄金白银的重量作为核算和货币交换媒介，是完全有可能的。金本位制远不是野蛮的拜物教，也不是政府专断的工具，它完全有可能提供一种只有市场能够制造的货币，从而可以摆脱强制性政府内在固有的通货膨胀和再分配倾向之影响。一种健全可靠的、不由政府控制的货币将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的价格和成本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再次出现下降。

这些，不过是米塞斯里程碑式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的一个成就而已，米塞斯还论证了银行在货币供应中的作用，揭示了自由货币制度（free banking），即不受政府控制和支配的银行业不可能导致货币疯狂的膨胀性扩张，相反，这些自由银行将在兑付压力下不得不奉行一种健全可靠的、没有通货膨胀倾向的“硬货币”（hard money）政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为了限制私人银行的通货膨胀倾向，必须得设立中央银行（由政府控制的银行，比如联邦储备系统）。而米塞斯则论证说，中央银行的作用历来恰恰相反：它使银行摆脱了自由市场对其活动的严格约束，刺激并且推动它们的贷款和存款出现膨胀性扩张。最初倡议设立中央银行的人士了解得很清楚，中央银行是并且一直是使私人银行摆脱市场约束、制造通货膨胀的工具。

《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彻底根除了曾经削弱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概念的某些违反个人主义的漏洞。当时有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顾本学派侧重个人行为分析的基本方法论，而附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效用理论，这种理论竭力要将边际效用变成一个可以测量的数学上的量。直到今天，每本经济学教科书都是用效用单位（utils）来解释边际效用，因为它可以加减乘除，可以进行种种数学运算。假如有学生觉得，说“我赋予每磅黄油 4 个效用单位的价值”这样的话简直是胡扯，这位学生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米塞斯立足于他在庞巴维克研讨课的同学、捷克人弗兰茨·居赫尔（Fmz Cuhel）的洞见，无情地驳斥了边际效用可以进行测量的想法。他认为，边际效用确实可以进行排序，个体可以根据偏好次序（我对 A 的喜爱超过 B，对 B 的喜爱超过 C）排列他的价值，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虚构的效用单位或效用量。

如果以为一个人可以“测量他自己的效用”是胡扯，那么，试图比较社会中不对人的效用，更是不着边际。然而，就在这个世纪，“国家统制主义者”（statist）和平等主义者却一直想这样使用效用

理论。如果你可以认为，一个人每增加一个美元的收入，这一个美元的边际效用都在递减，那么，你当然也可以说，政府可以从富人那里拿走一个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效用的美元而将其给一位穷人，这一个美元对他来说有更大效用，岂不是可以增加“社会效用”吗？米塞斯则证明了，效用是根本不可能测量的，从而使边际效用再也不可能为国家制定的平均主义政策辩护。然而，尽管经济学家嘴上都说不可能比较不同个体间的效用，但他们却依然冒失地要去比较“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

### 三、米塞斯论商业周期

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至少已经包含了米塞斯另一个杰出的贡献——长期求索的对于神秘的、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商业周期进行解释的初步想法。早在 18 世纪后期工业和先进市场经济发展之初，观察家们就注意到，市场经济似乎就是一连串的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的过程，先是经济扩张，以至于达到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地步，然后就是严重的恐慌和大萧条。经济学家尝试做出过很多解释，但即使是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也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失误：没有一位曾经把商业周期的解释、对经济体系的一般分析与价格和生产的“微观”理论融为一体。要做到这一点确实非常困难，因为一般经济分析显示，市场经济是趋于均衡的，即充分就业、预期错误最少等等。那么，交替出现的繁荣和衰退是从何而来的？

米塞斯洞悉到，市场经济本身是不会导致繁荣与衰退的不断循环的，因而，经济周期的根源就在市场之外，在于某些外部干预。他那伟大的商业周期理论建立在三个从前互不关联的因素上。

一是李嘉图对政府和银行系统常见的扩张货币和信用、从而提升价格（繁荣）导致黄金外流，随后出现货币和价格收缩（衰退）这样一个过程的论述。米塞斯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初步解释，但它却没有解释，生产体系是如何深受繁荣影响的，或者说为什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萧条？

另一个是庞巴维克对资本和生产结构的分析。

第三个理论的来源是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对生产体系的重要性和“自然”利率（不受银行信用扩张影响的利率）与受银行贷款影响的实际利率间存在差距的论述。

根据这三个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论，米塞斯构建了一个杰出的商业周期理论。由政府及其中央银行所鼓励、推动的银行信用和银行货币的扩张，将更多货币注入到运行平稳而和谐的市场经济中。随着银行扩张其货币供应（现金或储备），把增发的货币借贷给企业，这些货币推动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或时间偏好水平（即反映公众自发的消费、投资比例的自由市场利率）。由于利率被人为压低，企业获得了新货币，拓展其生产结构，增加资本投资，尤其是将更多资金投资于比较“遥远”的生产：投资过多的项目、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等等。这些增发货币总是会抬高工资和其他成本，将资源转移到这些更早或者说“更高级”的投资中。然后，当工人或其他生产者得到增发货币时，他们的时间偏好仍然保持不变，他们仍然按原来的比例花这些钱。这就意味着，公众不会储蓄足以购买新的高级投资的资金，于是，这些企业和投资陷入崩溃就是必然的了。因此，衰退或者萧条就可以被看成生产体系的某种不可避免的调整，通过这一过程，市场清除那些膨胀性繁荣时期形成的不健全的“过度投资”，恢复到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消费/投资比例。

于是，米塞斯头一个把对商业周期的解释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分析融为一体。政府控制的银行系统造成的膨胀性货币扩张，导致资本品行业出现过度投资，消费品行业却投资不足；而“衰退”或“萧条”就是市场清除繁荣期的比例失调、回归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自由市场生产体系的必要过程。当这一调整过程完成后，就会出现复苏。

从米塞斯的理论中我们得出的政策结论与当前时髦的“凯恩斯主义”或“后凯恩斯”恰恰相反。如果政府及其银行系统正在扩张信用，米塞斯开出的药方就是：（a）停止急急忙忙的信用膨胀；（b）不要干预衰退调整，不要人为维持工资、价格、消费或不健全的投资，让必要的清除过程尽可能迅速、平稳地自行进行。如果经济已经处于衰退中，对策也完全一样。

#### 四、两次大战之间的米塞斯

《货币与信用理论》使年轻的米塞斯跻身欧洲一流经济学家行列。这之后，1913年，他就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米塞斯在维也纳的研讨组成为全欧最聪明的年轻经济学家的一盏明灯。1928年，米塞斯出版了他对商业周期理论

深入研究的结果*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sup>[6]</sup>, 1926年, 他创建了声望极高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然而, 尽管米塞斯的著作及他在维也纳大学的研究课非常著名, 但米塞斯非凡的理论贡献和他的《货币与信用理论》却从来没有被经济学界真正承认和接受。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生动地说明学术界对他的排斥: 在维也纳大学, 米塞斯一直是无薪教师, 尽管他是很有名气的教授, 但却没有薪水。<sup>[7]</sup> 他的收入来自充当奥地利商业委员会经济顾问的薪水, 他从1909年即担任这一职位, 一直到他于1934年离开奥地利。经济学界之所以普遍地拒绝米塞斯的伟大贡献, 有翻译的原因, 而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经济学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方向。英美学术界一向孤高自赏, 凡是没有翻译成英语的理论, 都不可能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不幸的是, 《货币与信用理论》直到1934年才翻译成英语, 到这时, 为时已晚了。德国从来没有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至于奥地利本国,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已经开始衰落, 1914年庞巴维克去世, 及早已不大活跃的门格尔在战后(1920年)去世, 就是这种衰落的象征。正统的庞巴维克弟子强烈地反对米塞斯对庞巴维克理论的发展, 也反对他把货币与商业周期融合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分析中。于是, 米塞斯就必须重新创造出有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的“新奥地利学派”。

语言不是英国和美国面临的惟一问题。在新李嘉图主义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无所不在的、密不透风的影响下, 英国学界对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从来就没有过好感。而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念曾经相当稳固的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其经济理论水平也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衰落局面。美国两位最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康乃尔大学的赫伯特·达文波特(Herbert J. Davenpor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费特(Frank A. Fett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就没有再为经济学理论做出过任何贡献。在1920年代的这一理论真空期, 出现了两位明确地不属于奥地利学派的、思路不怎么健全的经济学家, 他们协助形成了“芝加哥学派”: 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 他信奉一种机械的货币数量理论, 强调政府操纵货币和信用以提高和稳定价格水平是可以接受的; 另一位则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 他强调“完全竞争”的虚幻假设, 否认时间在资本分析中的重要性, 也不承认时间偏好决定利率。除了经济学界之外, 现实的经济世界也越来越敌视米塞斯的立场。米塞

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实行相对自由放任和金本位制度的制度日近黄昏时，写出他的巨著《货币与信用理论》的。而战争很快就招来了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经济制度：国家统制主义，政府计划，干预政策，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通货膨胀，及恶性通货膨胀，通货崩溃，关税及贸易控制。米塞斯毕生都在以坚强的勇气 and 人格尊严抵制他周围日益阴暗的经济世界。米塞斯从来没有向他认为是带来不幸和灾难的时髦观念屈服过；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科中的变化也从来没有让他对自己眼里的真理之追求和阐述松懈一丁点。法国经济学家、著名的金本位提倡者雅克·吕厄夫（**Jacques Rueff**）曾在颂扬米塞斯的文章中谈到了米塞斯“决不妥协的态度”，他正确地写道：

他〔米塞斯〕具有永远不知疲倦的热情，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和信念，对论证我们新制度之正当性的错误理论和谎言，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激烈的抨击。他证明了——完全是名副其实地——这些都声称要为人带来幸福的制度，其实直接地导致了种种苦难和不幸，最终则导致了种种冲突、战争和奴役。

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使他偏离他冷静的理性向他指引的那条艰巨的正道。在我们这个反理性主义的时代，他是一个依然保有完美理性的人。

凡是聆听过他的言谈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被他那理性的力量引导到一个自己由于人性的胆怯而从来没有敢去探索的领域。<sup>〔8〕</sup>

## 五、社会主义与经济计算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向是支持自由市场政策的，但在 19 世纪后期平静而相对自由的世界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来就不用操心去分析什么自由或政府干预问题。而在国家统制主义和计划经济日益盛行时，米塞斯在继续发展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同时，把更多精力转向分析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的经济理论问题。他于 1920 年发表在一份学报上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sup>〔9〕</sup>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仿佛一颗巨型炸弹，它头一次论证了，对于工业经济来说，计划经济根本就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体制。米塞斯指出，由于完全抛弃了自由市场价格体系，计划经济体制根本不可能理性地计算成本或配置其生产要素以有效地完成其最迫切的任务。尽管米塞斯的这一著作迟至 1934

年才被翻译成英文，但他的论证对欧洲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们不得不花几十年时间竭尽全力反驳米塞斯，拿出一大堆模型来支撑计划经济。米塞斯将他的洞见融合在一本全面批评计划经济的著作《社会主义》（1922）中。就在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批评被翻译成英文之前，美国经济学界盛传，波兰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已经“驳倒”了米塞斯，社会主义松了口气，根本就没有费心去读米塞斯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而被人公认日益失灵，生动地证明了米塞斯的洞见之深刻——尽管米塞斯本人的论证又被人们遗忘了。

如果不可能正常运转，那么，米塞斯称之为“政府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的种种政府干预市场的活动，也不可能达到其目的。在192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米塞斯研究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国家统制主义经济措施，这些文章被收入*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sup>[10]</sup>（1929）一书中。如果计划经济或政府干预主义都不可能切实可行，那么，我们只能实行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市场经济，米塞斯在其著名的《自由主义》（1927）——书中扩展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优势的分析。在这本著作中，米塞斯证明了国家和平、公民自由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互相之间的密切关系。

## 六、米塞斯论经济学方法论

因而，1920年代，米塞斯已经成为国家统制主义和计划经济著名的批评者，自由放任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坚定的捍卫者。但仅此是不足以满足他那具有无穷创造性的心智的。米塞斯看到，经济理论本身，包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没有十分系统的方法论，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提出其方法论基础。他也认识到，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被两种不健全的方法论迷惑住了：一种是“制度学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它越来越明显地误入歧途，想把经济学理论构建在与物理学类似的基础上。古典经济学家和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正确的方法论之上的，但他们对方法论的个别的洞见通常比较杂乱，不成体系，他们没有建立起一种比较明确、自觉的方法论，因而不足以抵御新兴的实证主义或制度学派的冲击。

米塞斯决心为经济学打造某种哲学根基和方法论，以使奥地利



学派的方法最终完满、系统化。他在*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1933) (迟至 1960 年才翻译为《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sup>[11]</sup> 出版) 中首先发展了这一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制度学派渐趋衰落, 而实证主义如日中天控制了整个经济学界之时, 米塞斯在《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1957) 及《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1962) 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方法论, 驳斥了实证主义, 米塞斯尤其侧重于驳斥实证主义方法, 它用物理学的方法观察人, 把人当作石头或原子。在实证主义者看来, 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就是观察人类行为中可计量、可统计的规律性, 构造出一些规律, 然后, 可以据其进行预测, 并用更进一步的统计证据进行验证。实证主义方法当然只能切合那种认为经济可以由社会工程师支配并进行计划的理念, 在这些社会工程师眼里, 人仿佛就是没有生命的物体。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前言中写道, 这种“科学”方法是

……用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根据这种研究人类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 他们计划发展出“社会工程学”, 这是一种新兴技术, 可以使未来的有计划社会中的“经济沙皇”以工程师处理没有生命的物质的技术来处理人。

米塞斯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方法论, 他称之为“人的行为科学”, 即关于人的行为的一般理论, 其理论来源有二: (1) 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演绎的、逻辑的、个人主义的分析; (2) 20 世纪之交以李凯尔特 (Rickert)、狄尔泰 (Dilthey)、文德尔班 (Windelband) 及米塞斯的朋友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德国西南学派” (Southwest German School)。从本质上看, 米塞斯的人的行为科学的基石是行动着的人: 他是个体的人, 而不是可以精确地用数量表示的、遵循物理学规律“运动”的石头或原子, 相反, 人有其努力实现的内示意图、目标或目的, 人也会形成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想法。简而言之, 与实证主义者相反, 米塞斯首先肯定了人是有意志的这一最基本的事实; 人具备心智, 正是这种心智让他决定目标, 并采取行动争取实现这些目标。这种行动之存在, 除了通过观察行动着的人之外, 也可以通过内省 (introspection) 的方法发现。由于人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这个世界上行动的, 因此其所采取的行为决不可能总结成量化的历史规律。因而, 经济学家企图为人的活动搞出可据以进行预测的统计规律和相关性, 就是徒劳的, 是误入歧途的。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事件、每个行动, 都是各不相同、独一无

二的，都是自由行动且互相影响着的个人行为之结果；因而，不可能搞什么统计性预测，经济理论也不可能进行验证。

如果人的行为科学证明了，不可能把人的行为归类总结出量化的规律，那么，又如何会存在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米塞斯回答说，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必然并且确实完全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物理方法。古典经济学家和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已经揭示了，经济学一开始可以把自己建立在少数几个获得广泛认可的、显而易见的公理之上，这些公理可以通过对人的行为之性质和本质的内省而获得。我们可以从这些公理中推导出其逻辑含义，从而构成经济学上的真理。比如，人的行为本身最基本的公理就是：个体具有目标，采取行动实现这些目标，行动必然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要采取常见的偏好值，等等。

尽管直到二次大战后很久才翻译成英文，但米塞斯关于方法论的见解当时就通过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之笔，以一种被高度稀释的形式，传播到了英美经济学界。罗宾斯在其《论经济科学之性质和意义》（*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1932）中承认，他“特别受惠于”米塞斯，而在英国、美国，这本书很多年中被公认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名著。不过，罗宾斯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将稀缺资源配置到可供选择的目的，这种说法是对人的行为科学的一种高度简化和稀释。它根本没有提米塞斯对于演绎方法之性质的洞见，也没有提米塞斯对经济理论与历史学之本质区别的洞见。而米塞斯本人的著作迟迟没有翻译，于是，罗宾斯的著作根本不足以抵挡日益强大的实证主义潮流。

## 七、人的行为

能够阐述正确的经济学方法论当然很好，但依据这一基础，运用这一方法，实实在在地构建经济学，即经济分析的体系，则是另一回事，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通常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人会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先创建出方法论，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纵观米塞斯长长的工作和成就记录，我们几乎不可能再额外要求米塞斯去完成这一极端困难而又辛苦的使命。然而，米塞斯孤军奋战，在被自己的追随者几乎完全抛弃之后，在逃离法西斯统治下的奥地利、流亡日内瓦期间，在一个自己的观



念、方法和原则不为人知的社会和学术界，完成了这一使命。1940年，他发表了最伟大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Nationalökonomie*，但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长期不为人们所关注。幸运的是，*Nationalökonomie* 于 1949 年扩充之后翻译成英文，名为《人的行为》(*Human Action*)。光是写出《人的行为》这样的著作，就是一个杰出的贡献；而米塞斯是在那么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构思写作的，这使他的成就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人的行为》是经济学的极致；它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它立基于行动着的入，即在现实世界中有目的地行动的个体的分析之上。它是用某种演绎的方法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充分地发掘了人的行为的逻辑含义。笔者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曾有幸读到，一读之下，竟改变了笔者的生活和理念历程。这本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套我们有些人曾经梦寐以求、但却觉得永远难以企及的经济学思想体系：一门经济科学，完整而合乎理性，一门早就应该出现但却始终没有出现的经济学，一门由《人的行为》展示的经济学。

米塞斯巨大的贡献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略窥一二：《人的行为》不仅是奥地利学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奉献给学术界的第一本综合性经济学专著，也是整个经济学传统中第一本真正综合性的专著。一战后，经济学越来越支离破碎，破裂为许多不完整的、零敲碎打的专业。自战前费特、克拉克 (Clark)、陶西格 (Taussig) 和庞巴维克等杰出人物写出了一批综合性著作之后，经济学家就不复将他们的学科看作一门一致的演绎的完整体系。今天，惟一试图呈现这门学科的完整体系的学者是那些入门教科书的编写者：但由于他们缺乏自己一致的逻辑，所以他们只能如实照录经济学令人痛心的现状。而今，《人的行为》则指出了一条走出这支离破碎的泥潭的道路。

任何赞誉之词对《人的行为》都不过分，这里，我们只想点明这本经济学巨著中无数具体贡献中的几个。尽管庞巴维克发现了时间偏好，并强调这是利息的基础所在，然而，他本人却并没有再在此基础上完整地构建出自己的理论，给偏好问题留下很多暧昧不明之处。费特 (Frank A. Fetter) 曾经改进并深化了这一理论，在其写于 20 世纪头 20 年的出色但却遭忽视的著述中，建立了一套纯粹从时间偏好角度解释利息的理论。费特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看法是，消费者的效用和需求决定消费品的价格，而每种要素都获取其边际生产率，因而，所有这些回报都是利率或时间偏好之贴现，债

权人或资本家获得这一贴现。米塞斯使费特被人遗忘的贡献再度复活，并进一步指出，时间偏好是研究人的行为之行为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范畴，他将费特的利息理论与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他本人的商业周期理论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米塞斯也对当今经济学中时髦的数学和统计方法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及时而深刻的批评，这种方法源于瑞士新古典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它把普通语言和叙述逻辑完全排斥在经济学理论之外。米塞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他们中很多人其实都受过完整的数学训练）明确反数学的传统，他指出，数学方程只能用来描述没有时间维度的、静态的、虚构的“一般均衡”。一旦我们离开这一理论天堂，分析在具有时间和预期的现实世界中抱有希望又会出错的行动的个人，数学就不仅无用，反而会令人误入歧途。米塞斯指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本身就是实证主义谬误的一种表现，这种实证主义把人当作石头来研究处理，因而也相信，跟物理学一样，经济学可以用测绘导弹飞行轨迹的那种精确的数学方法来描述人的行为。而且，由于每个行动者都只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估价，因而对于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来说，微积分是完全不恰当的工具，因为微积分以无穷小的数量变化为其预设。

使用数学函数也意味着，市场中的所有事件是“互为因果”（mutual determination）的，因为在数学中，如果  $X$  是  $Y$  的函数，那么， $Y$  也同样是  $X$  的函数。这种“互为因果”的方法论在物理学领域中是完全适当的，在那里，我们不能说某个东西从来只能是原因。但在人的行为领域，是行不通的，这有一个“惟一的”原因：每个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据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出，举个例子，消费者的需求是原因，它确定了生产要素的价格，而决不能反过来说是要素价格决定消费者需求。

同样时髦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无疑也是谬误百出，它企图把统计事件和数学融为一体；它企图运用统计学得出可以让经济学家进行预测的规律，这种方法的预设是，在分析个体行动的时候，可以像在物理学中一样，发现确定不变的、恒定的数量规律。然而，米塞斯强调指出，没有人曾从人的行为中发现适用于所有人的常数，任何人也不可能发现，因为每个个体内在具有意志的自由。这种计量经济学谬误导致了当今时代人们对“科学的”经济预测的狂热，米塞斯则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古老而又必然是徒劳的抱负之根本性谬误。

过去若干年，计量经济学运用了高速计算机和种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然而，其预测结果却每每令人大失所望，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米塞斯的先见之明。

令人痛心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方法论理论之外，米塞斯的经济学思想中仅有一个方面的内容传到英语学术界。米塞斯根据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预测到了一次萧条，当时正值 1920 年代的“新时代”（New Era），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费雪都宣称，借助政府的中央银行对货币的操纵，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永远繁荣下去的时代。当大萧条降临的时候，经济学界，尤其是英国经济学界对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米塞斯才华横溢的弟子哈耶克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更进一步激发了这种兴趣，三十年代，哈耶克深入发挥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很快就译为英文。这期间，哈耶克在伦敦学院的研究班培养出了很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包括约翰·希克斯（John H. Hicks）、阿巴·勒纳（Abba P. Lerner）、路德维希·拉奇曼（Ludwig M. Lachmann）和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还有罗宾斯、弗雷德里克·本汉姆（Frederic Benham）等米塞斯的英国信徒也在英国发表了用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解释大萧条的著述；米塞斯在奥地利的学生，比如弗里茨·马赫鲁普（Fritz Machlup）、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等人的著作也被翻译成英文，罗宾斯也在 1934 年指导了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的翻译出版，这一刻来得太晚了。1931 年，米塞斯发表了他对这次萧条的分析 *D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tskrise*<sup>[12]</sup>，很快就被译成英文。很显然，1930 年代前期，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似乎如日中天，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米塞斯其他方面的经济学理论也应该很快就会被人接受。

美国在接受奥地利学派理论的时候比较迟缓，但英国经济学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当有助于米塞斯的周期理论在这个国家的广为传播。哈贝尔勒率先在美国介绍了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梗概<sup>[13]</sup>，不久，正在崛起的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转而采用奥地利学派的学说。除了商业周期理论之外，哈耶克、马赫鲁普，及年轻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美国经济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文章，使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再度为学界关注。

似乎越来越明显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要成为未来的潮流，米

塞斯最终也将获得他早应得到而始终没有得到的承认。然而，就在将要胜利的那一刻，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异军突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其中对通货膨胀和政府赤字的正当性、合理性做出了混乱而不怎么成熟的全新论证，这种理论就像一把野火席卷整个经济学界。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精心构筑了一道不那么受人欢迎的防波堤来反对政府搞通货膨胀和赤字支出；而凯恩斯之后，经济学家们则用他们那令人费解的晦涩语言和半通不通的数学行话，争先恐后地与急于扩张其影响力和权力的政治家和政府结成某种令人惬意、有利可图的同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为现代福利国家、国家干预主义及无所不在的国家统制主义量身定做的知识保护层。

就像社会科学历史上通常发生的那样，凯恩斯主义者根本就不屑于反驳米塞斯的理论；他们干脆就不提他，米塞斯完全被人遗忘，在自命不凡的凯恩斯主义革命的洪流中，米塞斯被彻底淹没了。米塞斯的周期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其他理论，被简单地灌进奥威尔所说的“记忆之洞”，从那之后，经济学家和整个世界就将其完全遗忘了。在这场大规模的失忆潮流中，最大的悲剧可能是米塞斯最有才华的追随者也开了小差：投入到凯恩斯主义怀抱中的不仅仅有哈耶克在英国的学生们，不仅有汉森——他成为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还有那些更深入地掌握了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人士，他们也飞快地抛弃了奥地利学派，跑到美国去谋求高级学术职位去了，并且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温和的一支。经历了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灿烂之后，只有哈耶克和相对名气较小的拉奇曼仍然忠心耿耿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而没有变节。就是在这种众叛亲离的环境下，在自己完全正当的期望破灭之后，米塞斯奋力完成了他的巨著：《人的行为》。

## 八、米塞斯在美国

由于在祖国奥地利受到迫害，米塞斯也成为欧洲很多著名流亡者中的一员。他先到日内瓦，从 1934 年到 1940 年在国际研究院（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任教。1938 年，在这里，他与挚爱的玛吉特（Margit Sereny-Herzfeld）结婚。1940 年，米塞斯来到美国。<sup>[14]</sup>然而，就在无数信奉左翼激进思潮的欧洲流亡者在美国学术界大受欢迎之际，在米塞斯以前的追随者获得很高的学

术地位之时，米塞斯本人却遭人忽视，被人遗忘。由于在政治哲学和经济学方法上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坚持个人主义，所以他被标榜“不受限制地追寻真理”的学术机构拒之门外。不过，靠纽约市几家小基金会资助，米塞斯依然在 1944 年出版了两本用英语写作的名著《全能政府》<sup>[15]</sup>和《官僚制度》<sup>[16]</sup>。《全能政府》揭示了纳粹政权并不是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相反，是一种全权主义的统制体制。《官僚制度》则对利润管理与官僚制管理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异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官僚制度严重的低效率是任何政府活动所内在固有不可避免的。

米塞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支薪的、全日制大学教职，这实在是美国学术界的一个可耻且不可饶恕的污点。自 1945 年起，米塞斯就只是纽约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他经常被大学管理当局视为二等公民，远离声望卓著的学术中心，身边净是些研究会计或企业财务、趋炎附势、理解力低下的人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米塞斯还是恢复了他在维也纳时著名的周末研究班。不幸的是，在这样的职位上，米塞斯不可能指望培养出大批年轻的理论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指望重新恢复维也纳的研究班那种灿烂的成就。

尽管环境是这样恶劣，米塞斯仍然举办他的研究班，充满自尊，而没有任何怨言。我们这些在纽约大学结识米塞斯的人，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表露辛酸、怨恨的话。米塞斯无限地亲切而和善，对学生们哪怕是一丁点思想的火花也尽一切办法予以鼓励和激励。每周，他都会向学生们提出一大串学习研究方案的建议。他的每堂课都像是一颗精心打磨的珠宝，充满了洞见，展示出他整个经济思想的风采。对那些心里发怯、不大发言的学生，米塞斯总是目光中闪烁着他那典型的幽默，说：“别害怕，说出来。记住，不管你谈论哪个问题，即使你说错了，也有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同样的问题犯过同样的错误。”

米塞斯尽管身处绝境，但从他的研究班中还是涌现出一小群研究生，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传统；而且，研究班也成了纽约市区很多没有注册的学生的一座灯塔，每周，他们都来参加米塞斯的研究班。还有一件赏心乐事是，研究班结束后大家到一家小餐厅相聚，令人隐约记起当年著名的米塞斯圈子在一家维也纳咖啡馆侃侃而谈的情景。米塞斯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当时的种种趣闻轶事，其间不时迸发出种种洞见，从这些趣闻轶事中，在这种氛围中，我们清楚地觉得，

米塞斯仿佛就是那个高贵、迷人的时代的老派维也纳的化身。我们这些有幸参加过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班的人都从中明白了，米塞斯何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导师和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尽管当时处境艰难，米塞斯依然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巍然成为捍卫自由、自由放任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孤独的灯塔。我们也都看到，在新世界，米塞斯惊人的创造才能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幸运的是，很多好心肠的人士翻译了米塞斯的经典，并继续出版他新撰写的著述。米塞斯是美国战后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运动的核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是一位领路人，是一种永远鼓舞人心的力量。尽管备受学术界的忽视，但米塞斯的所有著作都在市面上有售，阅读这些著作的学生和追随者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即使在壁垒森严的学院经济学家当中，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开始信奉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的传统。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美国；通过他的学生和同事，米塞斯在二战后西欧抛弃集体主义，转向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在西德，米塞斯当年在维也纳时的学生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是德国从集体主义转向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主要思想动力。在意大利，总统路易吉·埃伊诺蒂（*Luigi Einaudi*）曾与米塞斯一起阐述自由市场经济学，他为二战后意大利摆脱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米塞斯的追随者吕厄夫在戴高乐将军勇敢地、几乎是单枪匹马为恢复金本位制而奋斗的战斗中，是将军的主要经济顾问。最后，我们要向米塞斯坚忍不拔的精神致敬，他一直坚持每周举办他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班，从未间断，直到1969年他退休为止，当时他已届88岁高龄，依然思路敏捷，充满活力，毫无疑问，他是美国仍在活跃的最年长的教授。

## 九、摆脱困境的出路，对未来充满希望

米塞斯思想和学术贡献事实上被长期孤立。现在，终于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显示，这种孤立有望结束。近年来，社会科学和政治领域转向错误的方向所导致的内在矛盾和惨重后果，已经越来越彰显出来。<sup>[17]</sup>在东欧，人人皆知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计划其经济，由此而引发了一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实行自由市场的运动。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和通货膨胀论者的灵丹妙药已经宣告破产。奉行“后凯恩斯主义”的美国政府拼命地要控制通货膨胀，而这种通



货膨胀似乎已经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即使是在衰退时期，通货膨胀率也依然居高不下，这是对正统的经济学理论的无情嘲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崩溃，暴露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明显缺陷，目前，凯恩斯主义的整个理论框架不得宁日。政府支出和官僚统治导致的引人注目的浪费，使凯恩斯著名的格言如今听起来格外刺耳：政府是把资源投入生产性活动还是用来修建金字塔，根本无关紧要。面对国际货币秩序的彻底崩溃，整个世界的后凯恩斯主义政府束手无策，只能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因为他们提不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不管是对法定货币实现浮动汇率，还是通过汇率管制实行固定汇率，都将损害对外贸易和投资。

必须从国家统制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危机这样更广泛的框架、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来看待凯恩斯主义的危机。美国已经证明了，信奉现代国家统制主义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应对它自己造成的危机的：国家军事集团的冲突危机，公立学校的财政、内容、人员和结构危机，持续的通货膨胀与公众对越来越沉重的税收负担日益强烈的抵触情绪之间的冲突。现代福利一战争国家（Welfare-Warfare State）的福利和战争都遭到日益严重的挑战。在理论领域，人们也日益强烈地反抗由一个“讲究科学的”技术官僚组成的精英群体统治我们，把我们当作他们进行社会工程的原材料的理念。政府能够并且必须采取种种强迫手段，使不发达国家和先进国家都实现人为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想法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批评。

简而言之，在所有地方，在思想和实践的所有领域，米塞斯毕生与之斗争的现代国家统制主义正在遭到铺天盖地的猛烈批评，越来越多的人也已经从对它们的迷信中醒悟过来。人们不再愿意温顺地服从自命不凡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法规和命令。然而，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不能找到一种可靠的、连贯的替代性思想理论体系，就不大可能彻底清除国家统制主义的乌烟瘴气。而我们迄今仍然没有意识到，米塞斯所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替代性思想体系；他已经提出了我们摆脱折磨着现代世界的危机和困境的正确道路。终其一生，米塞斯都在预言我们可能会觉悟，并在揭示我们应当觉悟的理由，他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我们应当遵循的建设性的道路。因而毫不奇怪，当他那辉煌的人生走过第 92 个春秋之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并走上了他指引的道路。

在他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英译本（1962）的前言中，米塞

斯写道：

三十五年前，当我试图对曾经被称为自由主义的这种观念和社会哲学进行一番概括的时候，我并没有自负地相信，我的研究可以阻止欧洲各国采取的政策所导致的显然已经迫在眉睫的大灾难发生。我希望达到的全部目标不过是向少数愿意思考的人士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大致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奋斗目标，从而为大灾难之后自由精神之复兴铺平道路。<sup>[18]</sup>

在颂扬米塞斯的文章中，吕厄夫说：

米塞斯一直在捍卫一种理性的经济科学的基础……通过他的学说，他播下了重生的种子，一旦人们开始更多地接受揭示真相的理论，而不是献媚的理论，这种子就会结出果实。当这一天来临之时，所有经济学家都将认识到，米塞斯值得他们赞美和感激。<sup>[19]</sup>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家统制主义正在分崩离析，这个重生似乎正在降临，而米塞斯曾寄予厚望的愿意思考的少数人的队伍正在急剧地扩大。如果我们确实已经处于自由精神复兴的起点上，那么，这场复兴运动就是为这位高贵、伟大的人物的生命和思想树立起的高大的纪念碑。<sup>[20]</sup>



补充

## 自由与财产权

—

18 世纪末的时候，有两种占主流地位的自由观念，不过，它们都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liberty and freedom）概念大相径庭。

第一种自由概念纯粹是学理性的，从来就没有运用于任何实际政治中。在这些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式的学者看来，自由当然是某种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属于所有人的东西，它是少数人的特权，多数人不能享有。因此，古希腊人所谓的民主，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并不是林肯所说的“民治的”政府，而只是一种寡头政治，只有完全意义上的公民（full-right citizens）才能进行统治，而群众则是 *metèques* 或奴隶。不过，就是这种公元前四世纪的有限的自由，此后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雄辩家也从未将其视之为实有其事的宪政制度，在他们的时代，这种制度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他们哀叹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回这个黄金时代。

第二种自由的概念则不是寡头政治，虽然它也是在受到文献中关于这种政体记述的鼓舞下出现的。野心勃勃的土地贵族，有时也包括城市贵族，为保护自己的特权而抵制日益强大的专制主义国王的权力。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国王们都赢得了这些冲突的胜利。只有在英格兰和荷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打败了国王。但他们所赢得的并不是自由，而仅仅是精英的自由，是少数人的自由。

那个时代的人一直没有通过法律解决诸如农奴制和奴隶制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把对自由的赞美说成是伪善，他们面临很多难题，

不知道如何妥善地解决。传统的生产体系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完全无法负担这么多人的需求。这些多余人口就沦为饥民、乞丐。他们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之维系构成了威胁，而很长时期内，没有人能想到，会有另外一种秩序，另一种事态，它可以养活所有这些不幸地陷入贫困的人。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予他们以充分的公民权利，更不要说使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统治者所知晓的惟一的权宜之计就是诉诸暴力让他们安静下来。

## 二

前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有局限性的。其历史基础是军事征服。获胜的国王们把土地分赐给属下的骑士，这些贵族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领主，他们并不依赖市场上的买卖活动来维持生产活动。相反，他们自己就是手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当时的手工业都通过行会组织在某种社团结构中。这种体制是压制创新活动的，它禁止偏离传统的制造工艺。农业或手工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用马尔萨斯的话说，很多人无奈地发现，“大自然已不能慷慨地令他容身”，“大自然似乎要他滚开”<sup>[1]</sup>。而这些穷人为了生存，又生出越来越多的孩子，结果，贫穷无助者令人绝望地越来越多。

然而，这时候，资本主义出现了。一般人都注意到了机器生产取代更原始、效率更低的手工作坊带来的激烈的变革。这是很肤浅的看法。资本主义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全新的市场营销原则（**principle of marketing**）。资本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大规模生产，相反，大规模生产只是在满足大众的需求。过去的手工业生产只能迎合人数有限的富人的需求，而工厂则能为更多人生产廉价物品。早期工厂生产的产品都是设计用以服务于普通大众的，当然，在工厂中工作的也正是这些人。他们或直接地供应商品为自己服务，或间接地通过出口，从而为他们自己提供食品和原材料。这种市场营销原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标志，当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员工自己就消费了他们生产的绝大部分消费品。他们是至高无上的消费者，他们“总是对的”。他们购买或是拒绝购买，将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何种品质。谁生产的商品最最适合于自己，他们就购买谁的产品，这些企业就获得利润进而扩展事业，另一些企业则可能会亏损、关张。由此，他们就不不断地把生产要素

转移到那些最完美地满足了他们需求的商人手中。这样，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就具有了社会的功能。由此看来，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只不过是消费者的受托人而已，而且对这些消费者的要求，谁也不敢说三道四。要想致富，就必须充分地节省和积累资本。为了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投资，并获得回报，就必须尽可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市场过程每天都在重复进行投票活动，那些不能按照公众发出的信号来使用其财产的人，不可避免地就会被这个过程赶出挣钱人的行列。那些仅仅由于为大众服务、因而变得规模大起来的企业，却成了当代政府和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最憎恨的目标。那些只满足少数人奢华需求的工厂，规模不可能做大。19 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缺点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工人是工业生产主要的消费者。在他们看来，工薪阶层只能从寄生的上层社会捡点残羹冷炙，他们形成一种错觉，以为工厂损害了大量手工工人。如果他们稍为留意一下统计数字，他们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大错特错了。婴儿死亡率下降了，平均寿命延长了，人口增长了，平民百姓也能享受到甚至过去的富人都不能想象的便利与舒适。

不过，大众的这种空前的富裕，并不仅仅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是，把经济的控制权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转移给所有人。平民百姓不再是只配干苦力，吃点富人掉下的面包渣，就可以满足。前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第三个等级贱民阶层——奴隶、农奴——消失了，教士或学者以及 16 到 19 世纪的不列颠法律都视其为可怜贫穷者。而他们的子孙，在新的商业形态下，不仅是拥有身自由的工人，更是消费者。这种深刻的变化，反映了生意对市场的依赖。做生意，头等重要的，除了市场还是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座右铭。而市场就意味着掏钱者即买家即消费者。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财富的惟一途径就是，比其他人以更低廉的价格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

在某家商店或某个工厂，所有者就是老板，或者在公司里代表股东的董事长是老板。但这种老板身份只是表面上的，是有条件的，他必须服从于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地位。消费者才是王者，是真正的老板，而生产者，如果不能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就什么也都不是。

正是这一伟大的经济转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很快就把政治权力从有特权的少数人手里转移到了人民手中。随着工业革命进

程，成人都获得了公民权利。平民百姓在市场过程中拥有选择企业和资本家的力量，在政治领域，他们也获得了类似的实力。他们成为了选民。

市场就是民主，每一便士都获得了投票的权利，这一点已为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我想，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可能是晚年的弗兰克·费特（**Frank A. Fetter**）。其实，可以更准确地说，民治的代议制政府实际上就是试图运用市场模式来安排宪政事务，不过，这种设计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在政治领域，经常是多数人的意志占了统治地位，少数人就只有服从。当然，假如他们在数量上不是很少以至于被忽略不计，他们的意愿会被多数考虑。然而，服装工业不仅为体态正常的人生产服装，也为胖子生产服装，出版业既为大众出版西部故事或侦探小说，也为鉴赏品味较高的人出书。第二点重要区别是，在政治领域，某个人或是某个小团体，不能违背多数人的意志，而在学术领域，拥有私有财产者却是有可能叛逆一回的。叛逆者当然要为自己的独立性付出代价，在这一领域里，如果不承担牺牲，恐怕也就得不到奖赏。但如果某人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他就可以自由地背离占统治地位的新旧正统教条。在全权计划体制下，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叔本华（**Schopenhauer**）、凡勃伦（**Veblen**）或弗洛伊德（**Freud**）等等异端会是怎样？还有莫奈（**Monet**）、库尔贝（**Courbet**）、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里尔克（**Rilke**）、卡夫卡（**Kafka**）等等能生存吗？古今中外，每种新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的探索者之所以能得以涌现，就是因为私有财产能够使其对多数认同的方式的蔑视成为可能。大量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惟有在经济上充分地独立，才能公然蔑视政府而挑战多数人的意见。在自由经济条件下，他们会发现，公众中就有人准备资助和支持他们。你能想象没有了工厂主恩格斯，马克思会是什么样吗？

### 三

左翼人士对资本主义经济方面的批评总体上看之所以是无的放矢，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理解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地位。他们只看到了各种各样企业和计划中的层级性组织，却没有认识到利润制度会迫使企业为消费者服务。在跟员工们打交道的时候，工会总是说，正是怨恨和贪欲才阻止他们所说的管理阶层给他们涨工资。他们目光短浅，看不到工厂大门以外的广阔世界的现实。他们及其理论代言人大谈什么经济权力的集中，却没有认识到，经济权

力最终是掌握在掏钱买东西的公众手里的，而工人自己本来就是这一数量巨大的多数的组成部分。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市场，从工业界的君主和领主之类不恰当的比喻性说法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很迟钝，看不到君主或领主与市场中的“巧克力大王”之间的不同，前者必须有一位更有实力的征服者，才可以把他赶走，而后者只要消费者宁愿去买另一位供应商的东西，就立刻丧失其王国。这种曲解可以说是激进左翼人士鼓吹计划的根本原因。假如某位激进左翼领袖也靠卖热狗讨生活，那他一定会理解，消费者才是至高无上的。当然，他们是职业革命家，他们惟一的工作就是煽风点火搞内战。某个俄国革命领袖的理想是按照邮局的模式创建某种国家生产体系，它可以不依赖消费者，因为它的赤字可以通过强制征税来弥补。他说，“整个社会就变成一个办公室和一家大工厂。”<sup>[2]</sup>他也注意到，如果世界上仅有邮局和工厂幸存，其性质将彻底改变，人民再也不可能在不同企业提供的种类繁多的产品和服务之间进行选择了。他的盲目性使他认识不到市场和消费者在资本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当然也就认识不到自由与奴役的区别。因为在他眼里，工人仅仅只是工人，而非同时也是消费者；他相信，他们在资本主义下就已经是奴隶，那么，在对所有工厂和商店实现国有化后，他们的地位就不会有什么变化。全权计划体制用一个独裁者或一个独裁者委员取代了消费者的主权。随着公民在经济上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丧失，他们必将失去政治上的主权地位。惟一的生产计划会剥夺针对不同消费者的多样的生产计划，相应地，在政体上，必然是一党原则，剥夺公民计划公共事务的任何机会。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如果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牌子的罐头食品或香皂，他也就失去了在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方案间进行选择及选举执政者的可能。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成了某个至高无上的社会工程师手里的一件工具。甚至他生育后代的自由也将被优生学所消灭。当然了，这些左翼领袖们偶尔也向我们保证说，独裁暴政只将适用于从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政治向未来太平盛世转轨的过程中，到了那个时候，每个人的需求和愿望都将得到极大的满足。<sup>[3]</sup>英国新剑桥学派很有名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女士曾经很仁慈地向我们发誓，只要那个理想政权“非常稳固不再受到批判，那时，甚至连独立的交响乐团”都将被允许继续活动。<sup>[4]</sup>因此，对不同政见者的清算，是把我们带往所谓自由的完美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另一位有名的英国人克罗瑟先生（J. G. Crowther）在赞扬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有益于科学发展，因为它保护了新兴阶级”时想的是什么。<sup>[5]</sup>一切的一

切就都明白了，只有当所有人都懦弱地屈从于独裁者，国家才会停止对于不同政见者的清算。卡里古拉（Caligula）、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罗伯斯庇尔之类的人物，绝对都会赞成这种解决方案。

这些左翼学者发动了一场语义学革命，把常用词汇的含义彻底翻转为它的反义词。在乔治·奥威尔所说的他们的“官方宣传语言”词汇表中，只有一个词，那就是“一党原则”（the one-party principle）。现在语源学上的党就起源于作为名词的“部分”。孤零零部分（The brotherless part）跟其反义词“整体”已不再有什么区别了；部分就等于整体。一个孤零零的党已不是一个政党，一党制实际上根本就是无党制（a no-party principle），它意味着对一切反对派的镇压。自由就是指在同意或不同意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而在官方宣传语言中，它却意味着无条件地同意的义务，而严禁不同意。政治词汇的传统含义的这种颠倒，不仅仅是俄罗斯人、法西斯和纳粹门徒语言上的怪癖。废除了私有财产的社会秩序必然剥夺消费者自治和自主独立的权利，从而每个人都得服从中央计划当局的独裁专断的判断，而如果这个当局不掩饰其主要特征，就难以获得群众的支持。如果左翼学者公开对选民说，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给他们套上枷锁，恐怕就不会有人支持他们。所以为了深藏不露的目的，他们不得不费尽唇舌，肆意曲解自由一词的传统含义。

## 四

而这些大阴谋的局内人之间进行的深奥的谈论却截然不同。在这些讨论中，那些发起者们并不掩饰他们关于自由的意图。在他们看来，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自由当然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推销他们的纲领的条件。然而，一旦新社会取得胜利，就沒有任何必要实行思想自由，个人之间也不得再有任何结社行为。太平盛世已经到来，人类已经臻于完美状态，则任何变化都是对这这种完美状态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容忍异端才是精神失常了呢。

俄国革命者曾说，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偏见。一般人并没有什么思想，他也不会写书，也不想当异端，更不会发明什么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只想着享受生活，所以，他们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并不关心，只有这些知识分子本身才是靠专业当异端和发明创新来讨生活的。

这可以说是对平民百姓能想得出来的最无礼的蔑视，根本就不值一驳。问题并不在于一般人是否会运用思想、言论和写作的自由，问题在于，哪怕是行动最迟缓的墨守成规者，是否能从比他拥有更高智力和意志力的人之运用自由中受益。普通人也许的确不关心甚至耻于与比自己出色的人打交道，但他也乐意享用那些发明创造的成果之好处。他并不理解这一切，他看不出这些东西有什么好。但这些思想和理论一旦为有进取精神的商人应用来满足他潜藏的愿望，他会马上接受这新产品。毫无疑问，普通人正是所有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主要受益者。

确实，以普通人的智力才干，可能的确没有机会爬到大企业首脑的位置上，但是，市场却把经济事务中最至高无上的地位安排给他，正是这种局面激励那些技术专家和制度创新者最充分地利用科学研究成果。而有些人却不准知识分子的视野扩展到工厂的内部组织范围之外，并且认识不到是什么东西在推进商人有所作为，惟有这些人注意不到这一事实。

那些仰慕俄国制度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说，自由并不是最高的善，如果它意味着贫穷，就“不值得拥有”。在他们看来，为了替群众谋取财富而牺牲自由是完全正当的。除了一些不愿意遵守党的路线的顽固的利己主义者外，全体俄罗斯人民都十分幸福。然而，我们却不能肯定，死于饥荒的几百万乌克兰农民，被关在劳动集中营中的人，那些被清洗的理论领袖是否跟俄罗斯人一样幸福。而我们也决不能忽视这一事实：西方自由国家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共产主义东方的生活水平。如果放弃自由原本是为了实现繁荣，那么，俄罗斯人显然做了亏本买卖，他们失去了自由，也没有获得繁荣。

## 五

浪漫的哲学家们有一种幻想，以为历史的早期，个人是自由的，而历史进化的过程则剥夺了个人原初的自由。卢梭曾经说过，人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由的，是社会把他变成奴隶。实际上，原始人是任凭强者摆布的，这些强壮的家伙会抢夺他可怜的赖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自由根本就免谈。自由的概念向来所指的乃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上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个人绝对地独立于世，根本就是虚幻的概念。生活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得指望他



人为他提供福利，反过来，他也必须为他人提供福利。社会从本质上说，就是互相交换服务。假如个人有机会进行选择，那他就是自由的，而如果他处于暴力或暴力胁迫下而只能屈从于某一个交换条件，不管他们的感觉如何，他们都失去了自由。这种奴役状态绝对是一种不自由，因为，这是主人给他指派任务，并决定在他完成任务后，只能接受什么回报。

说到镇压与强迫的社会组织即政府，跟自由根本就沾不上边。政府从本质上是对自由的否定。为了使所有人都遵守政府的命令，它必然依靠暴力或暴力胁迫，它才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的命令呢。一旦政府的权限扩张，那就只有强迫威压，而没有自由了。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制度，是确保社会协作体系平稳运转、免受境内外歹徒暴力行为破坏的手段。政府并非如某些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一种必要的恶（a necessary evil）。它不是什么恶，只是一个工具，惟有它能使爱好和平的人们得以共存。但它仍是自由的对立面。它在殴打人，在监禁人，在吊死人。政府不管干什么，最终都得靠全副武装的军警撑腰。如果政府想建立学校或医院，它就要征税，就要强迫公民们来买单。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一事实，即如果没有政府机构的暴力行为的控制，自然的人既不会有文明，也不会有和平，因此，我们可以把政府称之为最有益的人间组织机构。不过，事实却是，政府仍意味着镇制而非自由。自由只存在于政府没有干预到的范围内。自由向来就是免于政府之干预，它是对政府干预的一种约束。自由只有在公民有机会选择按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行事的地方才能发育成长。公民权利的意思就是，把那些管理国家事务的人限制个人自由行动的范围限定在一个严格的界限之内。

人们组建政府的终极目的乃在于，使按劳动分工原则形成的一定的社会合作体系得以正常运转。如果人们所欲求的是社会制度，是全权计划社会，那就没有自由的容身之所。全体公民在方方面面都得屈从于政府的命令。这样的国家是全能国家，政权则是极权主义的（totalitarian）。只有政府能制定计划，并强迫所有人按这惟一的计划行动。在市场经济下，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欲整合进社会协作框架的方式和途径。一旦市场交换的范围扩展，各个部分的人就可以自发行动做出反应。这一制度下的这种状态就被称之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称之为“守



夜人国家”(nightwatchman state)，这里才有自由，因为个人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的目的制定自己的计划。

左翼人士必须承认，在全权计划制度下不可能有自由。然而，他们不承认市场上商品与服务的交换中有什么自由，企图以此抹杀奴役性国f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区别。用全权计划制度的辩护士的话说，每一次市场交换，“都是对他人自由的一种强制”在他们看来，人们交税与向地方官员交纳罚款之间，自己买份报纸与获准看一场电影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这里的每种情况都一样是人们屈从于支配性权力。他没有自由，因为黑尔(Hale)教授曾说过，某人是自由的，“不受妨碍地运用他的物质资料”，<sup>[6]</sup>意思就是：一位妇女织了一件羊毛衫，可能送给他丈夫作了生日礼物，这样等于就妨碍了我使用它，因此，我就是不自由的。我反对别人使用我的牙刷，所以，我就在限制别人的自由。按照这种教条，我这么做的时候，等于是在行使私人的支配权(private governing power)，一种跟公共政府权力类似的权力，一种跟政府把某人投入新新(Sing Sing)监狱类似的权力。

对如此令人惊异的教条的那些解释，最后都得出一致的结论：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自由。他们断言，他们所谓的经济压力，跟奴隶主施加给奴隶的压力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拒斥他们所谓的私人支配权，却并不拒斥政府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他们倒要把他们所谓的限制自由之权力全部集中到政府手中。他们攻击私人财产权制度，以及他们所说的“用来强化财产权、否定他人按自己的方式侵犯这种权利”<sup>[7]</sup>的法律。

我们之前的那一代人，所有的家庭主妇都会根据他们的妈妈留下的配方或菜谱里的配方来烧汤，今天，很多家庭主妇更喜欢买上个罐头汤，热一热，就给家里人端上来。然而，我们那些颇有学问的博士们却说了，罐头制造公司有能力限制家庭主妇的自由，因为主妇们(除了要弄清罐头里装的食品本身的价钱外)，还要打听罐头盒的价格，这等于给她使用罐头食品设置了障碍。那些未能恭聆这些杰出的导师们教诲的人们会说，罐装食品是由罐头工厂生产的，生产罐头食品的公司等于是消除了消费者获得和使用罐头的最大障碍，也就是说它归于不存在了。一种产品最起码的本质就是，如果它还存在着，那它就没有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博士们却说，他们错了。公司支配了家庭主妇，其过分集中的权力破坏了她的个人自

由，因此，政府有义务防止这种野蛮的侵犯行为。在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一项研究中，这一集团的另一位成员伯勒（Berle）教授说，公司必须被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

我们的家庭主妇为什么会购买罐头食品，而不再按她妈妈或老祖母的方子自己做汤？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她认为，这种办法比起传统的方法来对她更有利。没有人强迫她。无数被叫做临时工、开发商、资本家、股票交易员的人，通过投资于罐头制造业，而满足了成百上千万主妇们潜在的愿望，还有同样成千上万家的各种各样的企业里的资本家，为消费者提供了成千上万种产品。一家企业越是较好地服务于公众，消费者受益越大，它也会越成长壮大。走进普通美国人家，你就会看到这种机制将如何左右那些企业的发展。

在自由的国度里，那些能比别人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的人，发起财来，挡都挡不住。他所需要的只是好点子和勤奋工作。英国一大串杰出经济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坎南（Edwin Cannan）说过，“现代文明，或者说差不多一切文明都建立在这一原则上：那些讨市场喜欢的人自己也能过上幸福生活，而那些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人就什么也没有。”<sup>[8]</sup> 在这里，谈论什么经济权力的集中化，没有任何意义。公司越大，它所服务的人就越多，它能做大，靠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越多，企业规模就越大。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权力掌握在消费者手中。

资本主义企业的每一种产品和生产方式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得不断地创新，每天都得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新、更好、更廉价的产品。任何生产活动的格局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总是有能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的产品涌现出来，排挤掉现有的产品和生产方式，这是大趋势。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上层是不断流动的。有些人之所以能爬到企业权力顶端，就是因为他们具备提出新点子并将其付诸实施的才干。但是，企业的大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一旦它不能适时调整自己，经常进行创新，以寻求满足消费者的最新最好的方法，它也一样搞不下去。而政治家和自命不凡的改革者却只看到了企业静态的结构。他们自认为很，可以从商人手里夺取工厂的控制权，并可以按照已有的套路管理这些企业。那些将成为未来企业大亨的雄心勃勃的暴发户，正在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业准备计划，然而他们所能想出的，只能是重蹈覆辙而已。还没听说有哪个官僚机构搞出了产业革新并将其付诸实施的。如果你不想

陷入停滞，就得让那些现在根本就不知名的人物自由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导人类向前，使我们的环境越来越让人满意。而这正是国家的经济组织力所不能及的。

物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并不会限制任何人选择他们最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的自由，相反，它令普通人处于购买者的位置，从而赋予了他们在经济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能刺激一个国家中最有进取精神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所有人服务。

## 六

然而，谁也不能穷尽资本主义给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带来的深刻的变化，我们仅仅提到了普通人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上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及作为选民在国家事务中享有的主权地位，和他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提高。某些结果并非不重要，即资本主义也使他通过储蓄、积累资本并进行投资成为可能。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所有者和穷人之间在社会地位和身份上所形成的鸿沟正在缩小。旧时，熟练工人的报酬非常低，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闲钱，即使他能攒点钱，也只能是在枕头底下藏几枚硬币而已。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攒下钱，并且可以通过一些机构对企业进行投资。美国企业中有相当数量的资本是雇员的投资。由于拥有储蓄存款，购买保险、债券或股票，工薪阶层也能获得利息和分红。普通人也对企业经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们不再仅仅是消费者和雇员，也是投资者了。这样一种大趋势，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消除了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与没有生产资料的人之间的鸿沟。当然，这种趋势只有在市场经济没有受到所谓的社会政策破坏的地方才能看到。福利国家搞的那一套宽松货币、信用扩张、公开的通货膨胀措施，使国家的法定货币单位的支付能力不断下降。那些以普通人保护者自命的人仍然相信这样一种陈腐观念：一种政策如果牺牲债权人，保护债务人，那么，大部分人民就能得到最大利益。他们始终没有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这也表现在，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自以为要帮助保护的人，也有可能是债权人，他们完全可能是储户，是保单和债券的持有人。

## 七

西方社会哲学的最具特色的原则就是个人主义。它旨在创造一

个空间，个人可在其中自由地思想、选择和行动，不受强制和压迫性的社会组织——国家干预之拘束。西方文明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成就都是此一自由观念的产物。

这种观念与个人主义的政策及其在经济领域的运用——资本主义毋须任何辩护式宣传，已取得的成就就会说明一切。

除此而外，资本主义和私人财产权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其无与伦比的生产效率，正是由于这种效率，资本主义才能养活迅速增长的人口，并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由此，群众的富裕程度不断提高，从而创造了一种社会环境，那些具有异乎寻常天赋的个人，才得以把他们的全部聪明才智贡献给社会。惟有私人财产权的社会制度和政府才能够鼓励引导那些天才人物创造出自己的文化。

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造出了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快的汽车，房间里有中央供暖设备、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等，有人对此却嗤之以鼻，说人类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这种说法纯属无聊。人类当然有更高尚的追求，但是这种更高尚的追求却不应该出自于任何外部的强制，而需要个人自己的决心和努力。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责备，毋宁说暴露出一种粗糙的、物质主义的观点，它以为道德与精神文化可以由政府或通过组织生产活动创建出来。这些外部的组织机构在这方面所能做的，只能是创造出一种环境，从而使个人可以自由地耕耘出自己的精神世界。群众喜欢看拳击比赛而不是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喜欢听爵士乐而非贝多芬的交响乐，喜欢读笑话而非诗歌，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罪过。然而，可以确信无疑的是，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那些优雅的东西恐怕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处在这样的时代，资本主义给很多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可以努力追求这些高雅的东西。

不管从哪一角度观察资本主义，都没有理由为所谓美好的旧时代的流逝而伤感，更没有理由证明，我们应该向往极权主义乌托邦。

今晚，我们恭逢朝圣山学社第九届会议开幕式，会上我们可能将发表不同于流俗和政府的见解，让我们记住，这样的会议惟有在自由的环境下才能召开，而自由正是西方文明最值得珍爱的标志。我们希望这种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将永不会丧失。<sup>[9]</sup>

## 注释与参引

### 序言

- (1)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于 1881 年 9 月 29 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莱姆贝尔格 (Lemberg, 今乌克兰地利沃夫)。师从庞巴维克后, 他于 1906 年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曾执教于维也纳大学 (1913~1938), 担任过奥地利商会的经济顾问 (1909~1934), 也担任过国际联盟之奥地利赔款委员会的主任 (1918~1920)。1927 年, 他建立了奥地利贸易周期研究所。米塞斯教授也曾执教于日内瓦的国际研究研究生院 (1934~1940) 以及纽约大学 (1945~1969)。米塞斯教授于 1973 年 10 月 10 日逝世, 享年 92 岁。
- (2) F. A. Hayek, "Tribute to Ludwig von Mises," app.2, in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76), p.189.
- (3) Lionel Hobbins, Foreword to F. A. 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p.ix.
- (4) Howard Ellis, *German Monetary Theory, 1905~19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77.
- (5) Fritz Machlup, "The Consumption of Capital in Austria,"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7 (January 15, 1935): 13.
- (6) James M. Buchanan, *Cost and Choice: An Inquiry in Economic Theory* (Chicago: Markham Publishing, 1969), p.34.
- (7) Carl Meng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71]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0] 1981).
- (8) William Jaffe, "Menger, Jevons and Walras De-Homogenized," *Economic Inquiry* 14, no.4 (December 1976): 511~524; 也可 Erich Streissler, "To What Extent was the Austrian School Marginalist?" in *The Marginalist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R. D. Collision Black, A. W. Coats and Craufurd D. W. Goodwin, ed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60~175.
- (9) Ludwig M. Lachman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Capi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 Market Process* (Kansas City, Kans. :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7), pp.45~64。关于早期奥地利学派的演变历史, 请 Ludwig von Mises,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New Rochelle, N.Y. : Arlington House, 1969), 及 Richard M. Ebeling, "Austrian Economics-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t.1: The Austrian Economists," *Humane Studies Review* 2, no.1 (1983)。
- (10) Eugen von Böhm-Bawerk, *Capital and Interest*, 3 vols. (South Holland, Ill. : Libertarian Press, 1959)。
- (11) 即机会成本。——译者
- (12) Carl Menger,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1883] (Urbana, Ill.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 (13) Ludwig von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outh Holland, Ill. : Libertarian Press, 1978), pp.122-123; 这些自传性质的“笔记与回忆”由米塞斯写于 20 世纪 40 年代, 那时他刚离开纳粹占领的欧洲而到达美国; 也可见于 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2nd enl. ed. (Cedar Falls, Iowa: 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 1984)。
- (14) Ludwig von 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1933]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0] 1981)。
- (15) Ludwig von Mises, *Nationalökonomie, Theorie des Handelns und wirtschaftens* [1940] (Munich: Philosophia Verlag, 1980)。
- (16)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rd rev. ed. [1949] (Chicago: Henty Regnery, 1966)。
- (17) Ludwig von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1957] (Auburn, Ala. :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5)。
- (18) Ludwig von 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 (Kansas City, Kans. :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62] 1976)。
- (19) 米塞斯, 《理论与历史》第 320 页; 也可参见 Richard M. Ebeling, "Expectations and Expectations Formation in Mises's Theory of the Market Process," *Market Process* (Spring 1988)。
- (20) 关于米塞斯对经济科学的看法与经济思想史中其他观点之间关系的分析, 请参见 Israel M. Kirzner,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Kansas City, Kans. :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60] 1976); 关于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其他成员的关系, 请参见 Lavyrence H. White, *The Methodolog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Economists* (Auburn, Ala. :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4); 及 Richard M. Ebeling, "Austrian Economics-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t.2: Methodolog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 Humane Studies Review* 3, no.2 (Fall 1985); 也请参见 Murray N. Rothbard, "Praxeology as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Individual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an Francisco: Cato Institute, 1979)。
- (21) F. A.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Indianapolis, Ind. : Liberty Press, [1952] 1979), p.52, n.7。
- (22) Ludwig von 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1912]; 2nd rev. ed., [1924] (Indianapolis, Ind. : Liberty Classics, [1953] 1981)。
- (23) Ludwig von Mises, "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 [1928] in *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Dobbs Ferry, N.Y. : Free Market Books, 1978), pp.57~171。
- (24) 米塞斯,《人的行为》第 398~478 页及第 538~586 页。
- (25) Richard M. Ebeling, ed., *The Austrian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 and Other 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 Gottfried Haberler, Munay N. Rothbard, and Friedrich A. Hayek (New York: Center for Libertarian Studies, 1978; reprinted by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3)。
- (26) Böhm-Bawerk, "Unresolved Contradiction in the Marxian Economic System," [1976] in *Shorter Classics of Böhm-Bawerk*, vol.1 (South Holland, Ill. : Libertarian Press, 1962), pp.201~301; 或 Böhm-Bawerk,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Clifton, N.J. : Augustus M. Kelley, [1949] 1975), 这是另一个译本。
- (27)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Exposition* [1922; rev. ed., 1932]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51] 1981)。
- (28) Ludwig von Mises, *Liberalism: A Socio-Economic Exposition* [1927] (Kansas City, Kans. :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62] 1978)。最初出版的译本题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 (29) Ludwig von Mises,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1929] (New Rochelle, N.Y. : Arlington House, 1977)。
- (30) 这并不是暗示瓦尔拉斯认为“计划”的解决方案可以与“市场”的解决方案互换。事实上, 他强调: 问题对于竞争性市场提供的解决方案之外的任何方案都过于复杂; Leon Walras,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54] 1969), p.106。
- (31) 米塞斯,《人的行为》第 257~397 页; Ludwig von Mises, "Profit and Loss," in *Planning for Freedom*, enl. ed. (South Holland, Ind. : Libertarian Press, 1980), pp.108~150。
- (32) 米塞斯,《人的行为》第 689~715 页; 也可参见 Ludwig von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1920],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F. A. Hayek ed. (London: Routledge

- and Sons, 1935), pp.87~130。关于米塞斯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辩论中的贡献之更为详尽的概述, 请参见 Murray N. Rothbard "Ludwig von Mises and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in *The Economics of Ludwig von Mises: Toward a Critical Reappraisal*, Lawrence S. Moss, ed. (Kansas City, Kans.: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6), pp.67~77; Karen I. Vaughn,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The Austrian Contribution," *Economic Inquiry* 18 (October 1980): pp.535~554; Don Lavoie,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Richard M. Ebeling,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Ludwig von Mises and His Predecessors," in *The Meaning of Ludwig von Mises* (Auburn, Ala.: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forthcoming)。
- (33) Ludwig von Mises, "Middle-of-the-Road Policy Leads to Socialism," in *Planning for Freedom*, pp. 18~35。关于米塞斯对国家干预政策之批评与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计算的批评间的关系之详尽论述, 请参见 Israel M. Kirzner, "The Perils of regulation: A Market- Process Approach," *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p.119~149。
- (34) 关于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参见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名篇, 收入《财产、法律与政府: 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萃》, 秋风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译者
- (35) Friedrich A. 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5]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pp.4~5。
- (36) Roger W. Garrison, "Intertemporal Coordination and the Invisible Hand: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Keynesian Vis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7, no.2 (Summer 1985); pp.309~321。
- (37) Arthur W. Marget, *The Theory of Prices*, vol.2 [1942]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pp.541 and 544。
- (38) Richard M. Ebeling, "Ludwig von Mises and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 Gold Standard: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by Llewellyn H. Rockwell, Jr., ed.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5), pp.35~59; 也可参见 Richard M. Ebeling, "Ludwig von Mises and Some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mes," in *Homage to Mises: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by John K. Andrews, ed. (Hillsdale, Mich.: Hillsdale College Press, 1981), pp.38~44。
- (39) Oskar Morgenstern, "Thirteen Critical Point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y: 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0, no.4 (December 1972): 1184; *Selected Economic Writings by Oskar Morgenstern*, Andrew Schotter,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88。



- (40)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090。
- (41) 指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译者
- (42) Wilhelm Röpke, "Homage to a Master and a Friend," *The Mont Pelerin Quarterly* (October 1961): 6。

## 第一部分 方法

### 第一章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 (1) Paul von Lilienfeld, *La Pathologic Sociale [Social Pathology]* (Paris, 1896)。[“当政府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贷款时，有机社会学设想其过程如下：……’在这一情况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正与身体的一群细胞一样。细胞相互合作以产生血液来供应大脑，寄希望于灰质细胞的反应来使自己恢复活力和积累新的能量。’同上，第 104 页。”见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J. Kahane, trans.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Classics, 1981), p.257 n.
- (2) John E. Cairnes, *The 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875]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pp.89~97。——编者
- (3) 为求完整性，我们需要指出：企业家一词在法律中还有第三种用法，这种用法需要谨慎地与上述的两种用法区分开来。
- (4) 原刊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ce* 7, no.3 (April 1942)。——编者

### 第二章 社会科学中对“非理性”的处理

- (1) 找对这些理论的评论性介绍，请参见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7) 和 Raymond Aron, *German Sociology* [1938]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54)。
- (2) Max Weber, *The City*, Don Martindale and Gertrud Neuwirth, trans. and ed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编者
- (3) 第一使用“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一词的是 Espinas, 见发表于 *Revue Philosophique* vol.30, pp.114 ff. 的论文，及专著 *Les Origines de la Technologie* (Paris: F. Alcon, 1897), pp.7 ff. 后来，Slutsky 将该词用于

- 他的论文 *"Ein Beitrag zur formal-praxeologischen Grundlegung der Ökonomik,"* Académie Oukroienne des Sciences, *Annales de la Classe des Sciences Sociales-Economiques* 4 (1926)。
- (4) Nassau W. Senior, *Political Economy*, 6th ed. (London: J. J. Griffen, 1872); John E. Cairnes, *The 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1875); Lionel 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1935); 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1933] (New York, 1981) 及 *Human Action*, 3rd ed.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66); Alfred Schutz,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1932]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F. A.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1952]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Press, 1979)。
- (5) Josef Back, *Die Entwicklung der reinen ökonomie zur nationalökonomischen Wissenschaft* (Jena: Gustav Fischer, 1929) 一书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作者欠缺经济学知识。尽管如此, 本书仍然值得更好的评价。
- (6) Max Weber,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and the So-Called Fundamental Law of Psychophysics" [1905],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75): 21~36 和 *Human Action*, 3rd ed.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66), pp.125~127。
- (7) Ernst H. Werber (1795~1878) 在精神物理学定律中宣称: 人类感觉强度上可以被注意到的最轻程度的增加, 总是由与上一次刺激成恒定正比的增长所导致的。Gustav T. Fechner (1801~1887) 在此基础上提出韦伯-费克纳定律, 声称: "为使感觉强度以等差级数增加, 必须使得刺激的强度以几何级数增加。" 可见 *Mises Made Easier, A Glossary for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Percy L. Greaves, Jr. 编 (Dobbs Ferry, N. Y.: Free Market Books, 1974), p.147。——编者
- (8) 思想上有点趣味的是, 在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奥地利历史学家 Theodor Gomperz 编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之作品集的德文版时, 年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为译者参预其中。当代的作家能够证明, 约瑟夫·布罗伊尔对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权威作品也相当熟悉。
- (9) eudaimonism, 亚里士多德哲学主张通过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而获得幸福, 并认为获得幸福是一切善行的最高标准和道德基础。——译者
- (10) hedonism, 一种伦理学说, 认为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幸福, 追求快乐是人生的目的。——译者
- (11) Henri Bergson, *La Pensée le mouvant*, 4th ed. (Paris: F. Alcan, 1934), p.205。[译文译自 *Mises Made Easier: A Glossary for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Percy L. Greaves, Jr. 编 (Dobbs Ferry, N.Y.: Free Market Books, 1974), p.76。——编者]

- (12) 伊曼纽尔·格鲁希，拿破仑的一位将军，因判断错误，延误了向拿破仑报告英军的动向，这本可能是法军避免滑铁卢溃败的最后机会。——编者
- (13) 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是 1815 年在滑铁卢战役中支援德国、英国与荷兰军队以击败拿破仑的普鲁士军队的指挥官。——编者
- (14) Vemehen 的相互冲突的种种模式（例如，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对宗教改革的不同解释，或对德国纳粹主义之兴起的各种解释）之重要问题，必须在一篇专论中解决。
- (15) E. Kantorowicz, *Frederick the Second*, 1194~1250, E. O. Lorimer 译 (London: Constable, 1931), pp.381~382。
- (16) 同上，第 386~387 页。
- (17) 就是社会科学中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说，这一学派最近的代表是 Werner Sombart 和 Othmar Spann。或许有必要指出：天主教哲学不赞成集体主义学说。根据罗马教廷的教义，自然法则只不过是得到正确运用的理性之指示，而人即使没有超自然力量的指点，也能够获取自然法则的全部知识。“上帝创造了人，赋予他充分的天资以达到他最终的目标。除此之外，上帝决定使人更容易获取至福，其方式是使得人能更简单更可靠地认识他的命运所依赖的法则。”G. H. Joyce, "Revelation" in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13 (New York: Encyclopedia Press, 1913), pp.1~5。
- (18) Moloch，古代腓基尼等地所信奉的神灵，信徒以焚化儿童向其献祭。——译者
- (19)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os the Story of Liberty*, S. Sprigge tra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41), p.33。
- (20) 原刊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4, no.4 (June 1944)。——编者

### 第三章 人的行为科学中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

- (1) Karl Knies, *Geld und Kredit*, 3 vols. (Berlin: Weidmann, 1873~79)。——编者
- (2)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vol.1 of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Tübingen, 1922)。英文版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译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47)。——编者
- (3) Gustav Schmoller 是“年轻一代”德国历史学派或“历史伦理”学派的奠基

- 人。这个学派的研究纲领是将研究经济现象的历史方法结合到基于“道德原则”的对经济与社会政治的追求。Lujo Brentano 是施穆勒的一位著名支持者和追随者，但在方法论上与施穆勒有分歧。——编者
- (4) 第一版以 *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vom Standpunkte der geschichtlichen Methode* 为书名出版于 1853 年。第二版以 *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vo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kte* 为书名出版于 1883 年，它大体上是在对前一版进行增补的基础上重印的。
- (5) “老一代”历史学派的支持者并不鼓吹政治是一种干预手段，也不像“年轻一代”历史学派的支持者那样认为政治学是经济学推理的基础。——编者
- (6) Jean Charles Leonard Sismondi 是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认为，经济学应关注人和社会改革，而不是财富和自由放任。1819 年，西斯蒙第第一个进行了现代周期分析。——编者
- (7) 有必要再分析韦伯列举的另外两个小类。关于对韦伯学说的详尽批评，请参见我的论文 "Socioilogie und Geschichte,"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vol.61 [1929], 收入我的书籍 *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Jena: Gustav Fischer, 1933), pp.64~121。这本书的英译本名为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George Reisman, trans. and Arthur Goddard, ed.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1960), 本文见第 68~129 页。
- (8) 当人类行为科学提及目标时，指的总是行动中的人所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将人类行为科学与美其名曰“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学说区别开来，这种形而上学学说称自己知道某些目标，而一个超乎于人之上的实体——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物质生产力量”——指引着历史的进程趋向于这个目标，而根本不受行动着的人所欲实现之目标之影响。
- (9) Otto Neurath, "Found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vol.2, no.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9.
- (10) 原刊 *Relativism and the Study of Man*, Helmut Schoeck and James W. Wiggins, eds. (Princeton, N. J.: D. Van IVostrand, 1962)。——编者

## 第二部分 货币

### 第四章 货币在经济财货中的地位

- (1) Karl Knies, *Geld und Kredit*, 2nd. (Berlin: Weidmann, 1885), pp.20 ff.
- (2) 交换学是人类行为学的一部分，它特别地研究市场现象。理查德·威特

- 尼主教最先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导论》(Richard Whately, *Introductory Lectures in Political Economy*, 1831) 一书中使用这一术语。——编者
- (3) Wilhelm Roscher, *G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25th ed. (Stuttgart and Berlin: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1918), p.340.
- (4) John Law, *Considerations sur le Numeraire et le Commerce* (Paris: Buisson, 1851), pp.447 ff.
- (5) 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2nd ed.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Classics, 1981), pp.146~153.
- (6) 克尼斯,《货币与信贷》第 322 页。
- (7)《货币与信贷》,第 322 页及以后。
- (8) 即使门格尔也是如此。参见他的 *Principle of Economics* [1871]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52~53.
- (9) 财政学派(The Cameralist school)在 17 和 18 世纪的中欧国家鼓吹完全实行家长制的管理。他们的纲领之核心是如何最好地管制工业、贸易和财政事务,以便为增长中的军事性、行政性国家提供资金。该学派坚持重商主义的基本教条,鼓吹解散行业协会制度,实现法律的统一。——编者
- (10) 也请参看 Edwin Cannan, *Money*, 4th ed. (Westminister: P. S. King and Son, 1932), pp.72 ff.
- (11) Benjamin Anderson, *The Value of Money* (New York: Macmillan, 1917).
- (12) Hans Vaihinger (1852—1933) 是德国哲学家,他主张“一种思想,如果其理论上的虚假或不正确被确认,它也不因这一原因而特别地无价值或无用;因为尽管它在理论上无效,但也可能具有巨大的实际价值”,参见其作品 *The Philosophy of "As If,"* C. K. Odgen, tr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5), p.viii。——编者
- (13) Irving Fisher, *Stabilizing the Dollar* (New York: Macmillan, 1925), pp.79 ff.
- (14) John Maynard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London: Macmillan, 1923), pp.177 ff.
- (15) Ludwig von Mises, 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 [1928], in *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Percy L. Greaves, Jr., ed. (Dobbs Ferry, N.Y.: Free Market Books, 1978), pp.83~103。——编者
- (16) 原刊 *Die Wirtschaftstheorie der Gegenwart*, vol.2, Hans Mayer, Frank A. Fetter, and Richard Reisch, eds. (Vienna: Julius Springer, 1932)。Albert H. Zlabinger 专为本书而译。——编者

## 第五章 货币的非中立性

- (1) David Hume, "On Money," in *Writings on Economics*, Eugene Rotwein, e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1970), pp.33~46;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Sir William Ashley, ed. [1909], bk.3, chap.8; John E. Cairnes,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873), pp.1~65。——编者
- (2) 在他的论文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中, 他提出了一连串的周期理论。——编者
- (3) Irving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20), p.157。“无可避免的结论是: 货币量的变化〔M0〕一般必定导致价格水平成比例的变化。”——编者
- (4) 1945 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国际黄金交易的标准, 它将美元定值为 1/35 盎司黄金。——编者
- (5) 这是 1938 年作者向巴黎的一个团体发表的演讲, 1945 年又向纽约市经济学俱乐部发表了这篇演讲。以前未公开发表。——编者

## 第六章 确定购买力变化的方法 对于指导国际货币与银行业政策的适宜性

- (1) 读者应当记住, 本文写于 1930 年。——编者
- (2) 该备忘录是为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黄金代表团(F/Gold/51)准备的(日内瓦, 1930 年 10 月 10 日)。这份备忘录被遗忘了, 直到为本书做研究时才在国际联盟的图书馆档案中重新发现。——编者

## 第七章 德国大通胀

- (1) 数量理论认为, 一般总水平基本上是货币供应的函数。——编者
- (2) 根据米塞斯的理解, 广义而言, 英国货币学派和英国银行学派都是中央银行的鼓吹者。然而, 货币学派鼓吹为货币与信贷扩张制订规则, 有些理论家甚至赞成百分之百的铸币准备。银行学派则鼓吹一种中央银行自由裁量的政策, 关于货币与信贷的扩张, 几乎没有什么规则。——编者
- (3) “年轻一代”德国历史学派成员, 他们利用大学里的地位作为拥护对经济进行政治干预和改革的工具。这些教授被称为“学院社会主义者”或“讲席社会主义者”。——编者

- (4) 鼓吹将全面控制经济计划作为政府职能的政治经济学家。——编者
- (5) 参见格雷厄姆的《恶性通胀中的交易、价格和生产：德国，1920—1923》，第 65 页。
- (6) 这是为弗兰克·D·格雷厄姆的《恶性通胀中的交易、价格和生产：德国，1920—1923》(*Exchange, Prices and Production in Hyper-Inflation: Germany 1920~192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0) 所写的书评。发表于 *Economica* (May 1932)。——编者

## 第八章 西尼尔关于货币问题的演讲

- (1) 纳索·威廉·西尼尔的关于“贵金属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与财富的重商主义理论”的三篇演讲，关于“货币的价值”的三篇演讲，“论获得货币的成本与私人纸币和政府纸币的效果”的三篇演讲，作为《罕见经济学与政治学小册子重版丛书》的第三、四、五本出版 (Numbers 3, 4 and 5 in *the Series of Reprints of scarce Tracts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31)。
- (2) 重商主义者认为，黄金和其他贵金属代表着真正的财富，因此，他们鼓吹最大限度地出口而最小限度地进口。——编者
- (3) 这篇书评原刊 *Economic Journal* (September 1933)。——编者

## 第三部分 贸易

### 第九章 国际劳动分工的解体

- (1) 弗雷德里克·李斯特，德国经济学家。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他赞成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运用自由贸易加关税保护来刺激幼稚工业的成长。——编者
- (2) 请注意，这篇摘录写于 1938 年，米塞斯在本处和本文中所指的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
- (3) 《公约》是一篇由 26 款构成的简短明了的文件，它规定了国际联盟的目的与意图。第 16 款说，所有成员承诺共同行动以对抗任何一个违反《公约》而发动战争的国家；也就是与违反《公约》的国家停止所有的经济交易或援助，如不奏效，则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条款也授权国际联盟理事会开除任何一个违反《公约》的国家。——编者
- (4)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42nd ed. (Munich: F. Eher Nachtfolger, 1933),

pp.726~743, 757, and 766。

- (5) Ludwig von mises, "The Freedom to Move a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 [1935], in *The Clash of Group Interests and Other Essays*, Richard M. Ebeling, ed. (New York: Center for Libertarian studies, 1978), pp.11~20。——编者
- (6) 本文选自国际研究研究生院成立十周年之际举行的研讨会文集 *The World Crisis*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Longmans Green, 1938)。——编者

## 第十章 自给自足及其后果

- (1) 曼彻斯特学派人物, 18 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者, 认为保障和平的最好方式是不受限制的自由放任经济。不管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上来看, 自由贸易都是维持永久和平的必要前提。——编者
- (2) 17 世纪世界的重商主义者认为, 储备贵金属是积累财富的最佳方式。他们鼓吹干预外贸以增加出口——将货币〔金属〕引入本国——同时限制进口。他们称这种形式的储备是有利的国际收支盈余。——编者
- (3) 读者应该注意: 这些段落写于 1943 年。——编者
- (4) 这一方案是现代国家福利的蓝图。其目标是通过增加普通工人的收入来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是通过政治干预和照顾劳工的立法来实现的。工会在这段时间极为兴盛。第一次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编者
- (5) 以前未发表的手稿, 写作日期为 1943 年 5 月 5 日。——编者

## 第十一章 经济民族主义与和平的经济合作

- (1) Julien Benda, *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 [1928]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编者
- (2) Carlton J. H. Hay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 Richard R. Smith, 1931); Walter Sulzbac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3)。——编者
- (3) 这里的贵族指向奥匈帝国皇帝效忠的普鲁士贵族成员。——编者
- (4) 国际联盟的《公约》签署于 1919 年 4 月 28 日, 由 26 个条款组成, 这些条款提议了一项协定来共同维持争端的和平解决以求世界范围的经济与社会合作。请注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努力之前刚刚在欧洲



结束。只要存在对进出口市场的限制和政府干预以保护工业，就必定有导致争端的冲突。——编者

- (5) 一项正式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之手段的条约，一项所有的签约国都同意只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协定。在使用武力以自卫和履行条约义务方面存在漏洞。条约不包含对违反协定的制裁，因而 63 个签约国在 1929 年 7 月 24 日走过场地签署了这一条约。——编者
- (6) 《大西洋宪章》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 1941 年 8 月数次会谈的结果。宪章的要点是致力于“为人类获得更好的将来”的 8 点纲要：不要求新的领土、民族自决与住民自治、享有贸易和得到原材料的权利、一旦建立和平所有国家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宪章后来被融入 1942 年 1 月 1 日的联合国宣言。——编者
- (7) 本文选自 1943 年的一次谈话中，以前未曾发表。——编者

## 第十二章 不发达国家的困境

- (1) Davi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vol.1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Piero Sraffa,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1973), p.137. ——编者
- (2) 克莱门特·艾德礼勋爵是英国工党领袖 (1935~1955)，忠诚的社会主义者。他在 1945~1951 年间曾任英国首相。——编者
- (3) 《大西洋宪章》第四条涉及的是平等地享受全球贸易和获得全世界的原材料、确保所有国家有得到改善的劳工标准、经济调整与社会保障的改善。——编者
- (4) 本文写于 1952 年，以前未发表。——编者

## 第四部分 比较经济体制

### 第十三章 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

- (1) Jeremy Bentham,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 vol.1, in Works, J. Bowring, ed.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1843), p.309.
- (2) 对于“现在”的人类行为学概念, *Human Action*, 3rd ed.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66), pp.100 f.
- (3) “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仅在其后多年才流行，在 19 世纪 50 年代之前仍

未被广泛使用。

- (4) “自由主义”在此使用的是在 19 世纪的意义。这一用法今天在欧洲仍然盛行。而在美国,“自由主义”一词更多地是作为社会主义或“温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词。
- (5) W. H. Dawson, "Births,"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573。
- (6) 关于 Frederick Engels 和 Karl Kautsky 的解释,见拙著 *Socialism*, J. Kahane, tra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240 ff。
- (7) 英国工党内阁推崇其在处理钢铁行业的理想。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仅仅只是为了掩饰各种英国左翼党派多年来的惨重失败。
- (8) 指理查德·尼克松第一任政府,他在 1968 年当选为总统。

## 第十四章 平等和不平等

- (1) Horace Kalleti, "Behaviorism,"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2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498.
- (2)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Gotha* [Letter to Bracke, May 5, 187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8)。
- (3) 如 John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en Mifflin, 1958)。——编者
- (4) Vance Packard, "Babes in Consumerland," *The Hidden Persuaders* (New York: Cardinal Editions, 1957), pp.90~97。
- (5) Vance Packard, "Babes in Consumerland," *The Hidden Persuaders* (New York: Cardinal Editions, 1957), p.95。
- (6) 同上, p.93。
- (7) Leon Trotsky,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R. Slrinsky, trans. (London: Gerge Allen and Unwin, 1925), p.256。
- (8)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l Program ef Gotha* [Letter to Bracke, May 5, 1875]。

## 第十五章 集团利益的冲突

- (1) 米塞斯在此用的是 19 世纪欧洲流行的“自由主义”的含义,意指自由放

任。——编者

- (2) 这段话可译为：要成为一个好的爱国者，就应当希望自己的城镇通过商业而繁荣，武器装备精良。很明显，一个国家有所获得时，就会有另一国家遭受损失。没有其他国家的凄惨，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繁华。
- (3)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Extinction du Paupérisme* (Paris: La Guillotière, 1848), p.6. 可译为：一个国家出口的货物数量，总是直接与其在荣誉与尊严要求下可以送给其敌人的子弹直接相关的。
- (4) Karl Marx,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Pfemfert, ed. (Berlin: Politische Aktions Bibliothek, 1919), p.54.
- (5)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p.28~29.
- (6) 两人系主张自由贸易的曼彻斯特学派代表人物。——译者
- (7) 原刊 *Approaches to National Unity*, Lyman Bryson,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5)。——编者

## 第十六章 马克思社会主义百年

- (1) 这一理论在这一点上有一个瑕疵，那就是给了资产阶级出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种特殊权利。他们就属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
- (2) Frank A. Fetter,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2nd ed. (New York: The Century Company, 1910), p.394.
- (3)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发展的电磁波理论。
- (4)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2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573.
- (5) Sidney Webb,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1889] (New York: Humboldt, 1891), p.4.
- (6) G. M. Trevelyan, *Shortened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Longmans, 1942), p.510.
- (7) Elmer Roberts, *Monarchical Socialism in Germany*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13).
- (8) V. I. 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17), pp.43 f.

- (9) 同上, pp.83 f.  
 (10) 同上, pp.83 f.  
 (11) 本文为冯·米塞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稿, 1982 年之前从未公开发表。

## 第十七章 俄国改革运动之观察

- (1) 这是好莱坞电影业行话在使用“票房收入”(box office accmiiu)这一术语时所指涉的意义。但它对所有其他的商业领域同样有效。  
 (2) 1960 年代, 叶夫塞·李伯曼 (Yevsei Liberman) 开始在苏联提出, 利润应是“企业效率的指标”。1966 年, 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旨在授予各行业中的 43 个不同企业自主权的计划。结果带来了生产率和工人收入的增加, 随之带来个人储蓄的极大增长和更多的可出口物品。见 *Socialism: The Grand Delusion*, Brian Crazier and Arthur Seldon eds.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86), pp.138~139。这一计划的成功令国家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十分尴尬。——编者  
 (3) 原刊 *The Freeman* (May 1966)。——编者

## 第十八章 合作社运动之观察

- (1) J. P. Warbasse, *The Cooperative Way, a Method of Worl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46)。  
 (2) H. M. Kallen,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Consumer* (Chicago: Packard, 1945)。  
 (3) H. M. Kallen,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Consumer*, pp.196~197。  
 (4) 同上, pp.422。  
 (5) E. S. Bogardus, *Dictionary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and Chicago: Cooperative League of the U.S.A., 1943 and 1945), p.54。  
 (6) Kallen,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Consumers*, p.294。  
 (7) E. S. Bogardus, *Dictionary of Cooperation*, p.54。  
 (8) Kallen,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Consumers*, p.294。  
 (9) 同上, pp.435。  
 (10) Plato, *The Laws*, bk 5, p.739。  
 (11) 合作社宣传中最令人惊异之处, Kallen 教授的书中已经提及。在

- pp.436-59, Kalien 教授提到一位虚构人物, 罗伯特·亚当·欧文·斯密。(显然这个名字是把亚当·斯密与鼓吹合作社的罗伯特·欧文混在一起。——译者) 主席在 2044 年向“世界合作社联盟”发表讲话, 在这份讲话中, 描述了把我们这一代与 2044 年分开的那些年中合作社运动的历史。斯密先生这样谈论合作社运动的未来历史: “大企业……使用其所有的狡计和力量来破坏它, 除了诉诸金融压迫外也诉诸军队……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就雇佣武装团伙来摧毁合作社组织, 杀害社员”(p.443)。对此毋须评论。
- (12) Manchesterism, 起源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场经济、政治、社会运动, 其主要创始人是 Richard Cobden 和 John Bright, 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和平主义。——译者
- (13) B. Potter Webb,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10th ed (London: G. Allen, 1920), p.65。
- (14) J. Baker, *Inquiry on Cooperative Enterprise* (Washington, D.C.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7), p.7。
- (15)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Study and Action* (Cooperative League of U.S.A. Pamphlet no. 43)。
- (16) Baker, *Inquiry on Cooperative Enterprise*, p.6。
- (17) M. L. Steward, *Cooperatives in the U.S. — a Balance Sheet*. (Public Affairs Pamphlets no.32, 1944), p.6。
- (18) Kallen,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Consumers*, p.436。
- (19) 时为 1891 年。参见 Webb,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p.xxiii。
- (20) Warbasse, *The Cooperative Way, a Method of World Reconstruction*, p.115。
- (21) *Cooperative League of U.S.A.*, Pamphlet no.43。
- (22) *Cooperative League of U.S.A.*, Pamphlet no.43, pp.18。
- (23) W. E. Regli, *A Primer of Bookkeeping for Cooperatives*, 2nd ed. [1937], p.5。
- (24) Warbasse, *The Cooperative Way, a Method of World Reconstruction*, p.158。
- (25) Warbasse, *The Cooperative Way, a Method of World Reconstruction*, pp.45~46。
- (26) Warbasse, *The Cooperative Way, a Method of World Reconstruction*, pp.46。
- (27) 同上, pp.46~47。

- (28) 同上，pp.46。
- (29) 转引自 *Tax-Free Manufacturing Cooperative Associations*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Tax Equality association, 1945), p.2。
- (30) Warbasse, *The Cooperative Way, a Method of World Reconstruction*, p.126。
- (31) 本文是石油产业研究基金 (Petroleum Industry Research Foundation) 1947 年为帝国石油协会和伊利诺伊州石油营销协会 (the Empire State Petroleum Association and the Illinois Petroleum Marketers Association) 撰写的报告《石油产业中的合作社》(*Cooperatives in the Petroleum Industry*) 的第一部分。——编者

## 第十九章 当前经济学方法与政策之观察

- (1) *The Eighteenth Bmnmair of Louis Bonaparte* [1852], Daniel de Leon, trans., 3rd ed. (Chicago: H. Kerr, 1913)。
- (2) 本文写于 1951 年，以前未发表过。——编者

## 第五部分 思想

## 第二十章 学说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

- (1) 本文可能写于 1949 年或者 1950 年。此前未曾发表。——编者

## 第二十一章 自由的思想源自西方

- (1) Otto von Bismark,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vol.1 (New York: Cotta, 1898), p.1。
- (2) H. Laski, "Liberty"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iences*, vol.9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448。
- (3) H. Laski, "Liberty"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iences*, vol.9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p.445~446。
- (4) 同上，p.446。
- (5) H. Laski, "Liberty"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iences*, vol.9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446。

- (6) 关于马克思在 1848 和 1849 年的活动, 请参见卡尔·马克思所著 *Chronik seines Lebens in Eiiueldaten* (Moscow: Marx-Engels-Lenin-Institute, 1934), pp.48~81。
- (7) 1845 年, 马克思自动放弃普鲁士国籍。后来, 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 他考虑在普鲁士从事政治生涯的需要又申请恢复国籍, 政府当局否決了他恢复国籍的申请。因此, 他的政治生涯是不得其门而入。可能是这一事实促使他留在伦敦。
- (8) 原刊 *American Affairs* (October 1950)。——编者

## 附录 米塞斯的精髓

- (1) 参见门格斯的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edition proposed by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Menlo Park, CA 94025* (1950 English edition by The Free Press, Glencoe, IL is out-of-prin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Dingwall and Bert F. Hoselitz from the 1871 German edition, *Gmndsati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也请参见 Menger 的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IL, 1963; Translated by Francis J. Nock from the 1883 German edition, *Untersuchungen li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
- (2) Eugen von Böhm-Bawerk 三卷本的 *Capital and Interest*: Volume I, *History and Critique of Interest Theories*; Volume II,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Volume III, *Further Essays on Capital and Interest*。First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nl-Fourth German edition by George D. Huncke and Hans F. Sennholz (Libertarian Press, Grove City, PA 16127, U.S.A., 1959)。这本巨著的德文书名为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and appeared in these editions: First edition for Volume I in 1884, II in 1889; Second edition: I, 1900; II, 1902; Third edition, and completely revised: I, 1914; Part of II & III, 1909; balance of II & III, 1912; Fourth (posthumous) edition: I, II, III—1921. Paperback Extracts: Chapter 12 of Volume I, "The Exploitation Theory of Socialism Communism." (Libertarian Press, 1975); Parts A & B of Volume II, "Value and Price." (Libertarian Press, 1973)。
- (3) Eugen von Böhm-Bawerk, Essay V, "The Ultimate Standard of Value" in *Shorter Classics of Böhm-Bawerk* (Libertarian Press, Grove City, PA 16127, U.S.A., 1962)。
- (4) Eugen von Böhm-Bawerk, Volume II,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pp.1~118, in the three-volume *Capital and Interest* (Libertarian Press, Grove

- City, PA 16127, U.S.A., 1959)。
- (5) Ludwig von 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translated by H. E. Batson in 1934; reprinted in 1953, enlarged with an essay on "Monetary Reconstruc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 ; out of print. Reprinted in 1971 by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Irvington-on-Hudson, NY. Reprinted in 1981 by Liberty Press/Liberty Classics, Indianapolis, IN 46250, with Introduction by Murray N. Rothbard.
  - (6)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ettina Bien Greaves (edited by Percy L. Greaves, Jr.), "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 in Ludwig von Mises, *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Free Market Books, Dobbs Ferry, NY, 1978), pp.57~171.
  - (7) 他直接从学生那里得到些许报酬。
  - (8) Jacques Rueff, "The Intransigence of Ludwig von Mises," in *On 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 Mary Sennholz, editor (D. Van Nostrand, Inc., Princeton, NJ, 1956), pp.15~16.
  - (9)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7: 86~121, 1920—1921.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 Adler (pp.87~130)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edited by F. A. Hayek; G. Routledge & Sons, Ltd., London, 1935.
  - (10) Ludwig von Mises, *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ans F. Sennholz (Arlington House, New Rochelle, NY, 1977).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in 1976 by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Germany), with a Forward by F. A. Hayek.
  - (11) Ludwig von 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translated by George Reisman; D. Van Nostrand Co., Inc., Princeton, NJ, 1960; out-of-print.
  - (12) Translation by Bettina Bien Greaves, "The Causes of the Economic Crises," in Ludwig von Mises, *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Free Market Books, Dobbs Ferry, NY, 1978).
  - (13) This is still one of the best brief introductions to the Misesian analysis of the cycle. See Gottfried von Haberler, "Money and the Business Cycle," in *The Austrian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Center for Libertarian Studies, September 1978), pp.7~20.
  - (14) Ludwig von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 (Libertarian Press, Grove City, PA 16127, U.S.A. , 1978)。
  - (15) Ludwig von 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 [1944] (Libertarian Press, Grove City, PA 16127, 1985).



- (16) Ludwig von Mises, *Bureaucracy* [1944] (Libertarian Press, Grove City, PA 16127, 1983).
- (17) 对于学界广泛拒绝和忽视米塞斯思想的哲学解释, Murray N. Rothbard, "Ludwig von Mises and the Paradigm for Our Age." *Modern Age* (Fall, 1971), pp.370~379.
- (18) Ludwig von Mises, *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 An Exposition of the Ideas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translated by Ralph Haico,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Princeton, NJ, 1962), pp.vi~vii. New edition in 1978 b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Inc., Mission, KS 66202 with title change: *Liberalism, A Socio-Economic Exposition*, pp.xiv—xv.
- (19) Jacques Rueff, "The Intransigence of Ludwig von Mises," in *On 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 edited by Mary Sennholz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Princeton, NJ, 1956), pp.16.
- (20) 本文最早发表于 1973 年。原题 *The Essential Von Mises*。作者 Murray N. Rothbard (1926~1995) 是米塞斯的学生和追随者, 美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运动代表人物, 著有 *Afan, Economy, and State* (1962)、*Americai Great Depression* (1963), *Power and Market: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1970), *The Ethics of Liberty* (1982) 等 25 本专著和上千篇文章。

## 补充 自由与财产权

- (1) Thomas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2nd ed. (London, 1803), p.531.
- (2) V. I. 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s.d.), p.84.
- (3) Karl Marx, *S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s von Gotha* ed. Kreibich (Reichenberg, 1920), p.23.
- (4) Joan Robinson, *Private Enterprise and Public Control*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Citizenship by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Ltd., s.d.), pp.13~14.
- (5) J. G. Crowther, *Social Relations of Science* (London, 1941), p.333.
- (6) Robert L. Hale, *Freedom Through Law, Public Control of Private Governing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52), pp.4 ff.
- (7) Robert L. Hale, *Freedom Through Law y Public Control of Private Governing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52), p.5.

- (8) Edwin Cannan, *An Economises Protest* (London, 1928), pp.VI ff.
- (9) 本文是作者 1958 年在朝圣山学社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第九届会议期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编者